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李葆嘉 著

翻开常见的任何一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在叙述三代文明之前，照例首先是『北京猿人』，这迫使人们接受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裔。然而这是一种『推论溢出发现』的盲导，准确的说法是：

东亚大陆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30万年生活在今称为北京的一带，仅此而已。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文起羲炎』，依据文献传说可以『稽古羲黄』，也许考古挖掘永远不可能发现像

商代甲古文那样证据确凿的伏羲炎黄的文化遗存，但是仍然无法否定华夏民族心理认同的历史开端。即使在『疑古时代』，除了极个别历史学家认为三黄五帝是子虚乌有，荒唐地把大禹『考释』成一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书目

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计算语言学探索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
汉语新论
汉语新词语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李葆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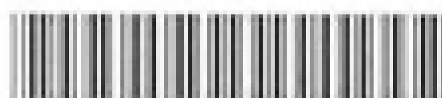




语言研究新思维 ● 丛书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B1288891

李葆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李葆嘉编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戴昭铭主编)

ISBN 7-5316-3797-9

Ⅰ.汉… Ⅱ.李… Ⅲ.汉语史—研究 Ⅳ.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137 号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HANYU QIYUAN YU YANHUA MOSHI YANJIU

李葆嘉 著

丛书责任编辑:杨雪松 徐德林 张天栋 李彤
张玉娟 王爱琳 张佳莉 张玉红
技术编辑:王秀艳 付辉
封面设计:张建设 伊延波
责任校对:耿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55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797-9/H·35 定价:24.00 元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顾　　问：季羡林　裘锡圭

名誉主编：胡裕树　吕冀平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晓明　李先耕　李　彤

吴国忠　邹韶华　戴昭铭

主　　编：戴昭铭

总　序

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推动了学术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语言学科也不例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知识最重要的负载形式和传播手段，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技术科学（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语言研究的新进展得力于知识更新。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新方法刷新了汉语研究的传统观念。拓宽了汉语研究的固有领域，促进了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推动了一批批新成果的成熟。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我们编成了这套《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学术研究最忌陈陈相因，本丛书的特点突出一个“新”字。但是，求新并不是标新立异。本丛书在求新的同时，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新思维”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 新观念。指对传统研究课题通过刷新理论或变换角度进行研究而获得的新认

识。2.新领域。指把汉语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或技术学科的研究相结合,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而扩大的语言研究领域。3.新材料。包括对新发掘的历史资料或新搜集的语言事实整理研究的成果。4.新方法。指对有同国际语言学接轨意义的研究方法的尝试使用。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在总体上具有实而不平、新而不奇的特色,而对各分册则要求能自成一家言,至于分册之间在流派和方法上不强求一致。

我们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读了各自需要的任何一分册后都有所收获,不致失望。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实践检验。限于水平,疏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不吝赐正。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编委会

2001年6月

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宏观研究(自序)

东亚华夏，为拥有5000年乃至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考古文化系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随着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的起源"或"汉语的祖先"这一挡不住的诱惑再次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从8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接触历史语言学。1985年夏，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汉语音韵学和藏语研讨班，有幸聆听民族语言学家周耀文、戴庆厦、倪大白和方言音韵学家郑张尚芳诸先生的讲授，并购得《汉藏语言概论》等书。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K. Benedict)40年代提出、80年代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的"澳泰语系假说"，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在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引起极大震动。登上长城的时候，面对关内的农耕和关外的游牧，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之间思索着万里长城的历史含义，遥想华夏汉语的起

源和演变。从那以后,在研究广韵学和上古音的同时,开始阅读民族语言学论著。

1987年看到竟成先生论及古代汉语和阿尔泰语相似性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1988年读到格勒先生论述距今6000年前考古文化学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三大历史传说氏族系统、东亚—南洋三大语言系统在脑海中冥然贯通。1988年草成《试论原始华夏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初步提出"东亚三大太古语言系统说"和"原始华夏语混合说"的假说。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991年从《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学者沙加尔(L.Sagart)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论文的报道,有如门捷列夫听到新元素的发现。邢公畹先生在《民族语文》上对沙加尔的述评,使大陆语言学家了解到"汉语—南岛语同源假说"的最新论证。郑张尚芳先生提出以之囊括汉藏、南亚与南岛诸语言的"华澳语系假说",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被包容在更大的语系之内。在沙加尔论证的影响下,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和一些古音学家开始从"澳泰语系假说"的论争转向"汉藏语和南岛语同源关系"的讨论。与之同时,"汉语的祖先"这一专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的热点课题。

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索。十几年来,首先立足于以音韵为本而贯通文字训诂,再打通古今汉语学和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进而力图融会贯通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神话传说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学术思想史等相关科学。以"大视野、全方位、重探索"的宏观立场,采取语言文化史的溯源沿流、跨学科成

果的融会贯通、史实和史论互渗的研究方法，相继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1993年写成《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以"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修正了桥本万太郎的"推移"说。蒙韩国仁荷大学校中国语学科教授蔡瑛纯博士和台湾大学文学院陈贵麟博士推荐，修改后的拙文分别刊载于韩国和台北。1994年秋写成《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从大文化史角度对当前通行的四种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瑞典]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美国]普林斯顿方言逆推型模式、[美国]张琨时空二维差异型模式、[日本]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逐一加以剖析，阐述了"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理论模式。1995年写成题为《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的五万字论文，力求贯通考古学、历史学、传说学、人种学、民族学与历史语言学诸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背景，将新模式概括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通过对华夏汉语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建立全新的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来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1999年又完成了《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提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农耕经济型语区、游牧经济型语系的四分法，试图从世界文化背景上来阐释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语言的关系类型和演变模式。

戴昭铭教授在《文化语言学导论》[①] 第十三章第四节援引并且评价了"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和"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理论模式：

① 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李葆嘉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不仅对于汉语的起源以及汉语方言的现状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可以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关于语言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关系的见解。'三元混成'理论的优长之处在于它可以促使我们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改换一种视角和方法，从而揭示出'一元分化'理论模式的研究中被忽视、被掩盖的语言事实，并给这些语言事实以新的、更合理的解释。比如，在以往'一元分化'模式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汉语的统一性和汉语方言对于共同语的从属性，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缺陷……一方面南方方言中作为底层现象的古夷越语的异质特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揭示，更看不到其与南岛语系的同源性质，另一方面则是对北方方言的阿尔泰化估计不足，对其中的有些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起源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缺陷都可望在'三元混成'观念指导下的研究得到弥补……如果上述关于华夏汉语'三元混成'的李氏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是说连远古的'汉语'也是一种混合型语言。"

第一次推溯到7000年前的《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曾寄呈同行赐教。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语言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光宇教授（1995年3月）评价："这是一篇宏观综论的学术论文。就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说，可谓上天下地，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就其驾驭的能力来说，可谓博观约取，剪裁适度；就作者的创造性思考来说，可谓继往开来，嘉惠学界。"

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史有为教授（1995年3月）来信说："我早年曾有志于音韵与语音史，欲向上溯源。但因工作所限不得已转而攻现代汉语。如今读来不禁想起当年理想今已有强手摘取，心中甚是欣喜。"

蒙史先生推荐，拙文忝列日本《中国语研究》首篇。又蒙史先

生与旅日同道悉心校对，在此再次一并深表谢意。

1994年7月，第三届汉语语言学国际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美国《中国语言学报》创刊人及主编、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院王士元教授主持了“汉语语源”专题研讨会。1996年夏，王先生欣然应邀来南京师范大学访问交流，亲授其学术经历和词汇扩散理论。在交谈中，后学才得知桥本是王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从而验证了拙文“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说与词汇扩散理论具有内在联系”的推断。在将有关汉语来源和汉语史研究模式的几篇拙文呈王教授赐教的同时，蒙王教授惠赠论文集《汉语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nograph Series No.8, JCL, 1995)并从黄山来信。同年11月，拙著《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在台湾出版，应邀出席著作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顺访香港中文大学，飞往台北前，王教授相约启德机场见面。1996年12月，王先生惠寄翻译出版《汉语的祖先》的授权书。目前，正在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同好合作翻译这部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昭示21世纪中国语言学以及东亚—南洋语言学研究趋势的论文集，以飨大陆关心这一具有世界语言文化史价值的专题的学人。

正如一些同行专家指出：要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7000年历史长河中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也只能提出纲目；若从专论的分析着眼，《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不免粗疏。关于这一宏大论题，需要详加探讨的专题比比皆是，而拙文更多的还只是体现一种多元思路、一种理论探索、一种贯通模式。

引人深思的是，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在中华大地上并没有发现新石器单一原始母文化，华夏汉语的单一来源论与近年来考古

文化的史前多元性相悖。在文化长河中，语言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处于"南耕北牧"生态环境中的华夏汉语不可能是一元自变型。不但新石器—金属时代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过程非常复杂，语言类型经历了从黏着转变为孤立的动态变化，而且秦汉以来汉语的推移发展，也在同化周边语言的过程中异化了本身。因此，我提出东亚大陆"汉语化"历史进程中的"同化即异化"观。

传统语言学注意到语言的地域差异，结构语言学突出语言的时间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社会语言学，拉波夫(W. Labov)才对美国城市语言的社团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社团差异或语主差异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的时间变化是语主的世代传承差异，语言的空间变化是语主的群体迁徙差异，语言的社会变化是语主的社会身份差异。更引人注意的是语主的突然部分变换，即原先语主的部分中断。语言换用过程具有双向性：对于换用语言的民族群体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换用的语言系统来说则是语主的变更。语言结构的变化，说到底是语主的变化。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在语言内部，而在语言外部，在于语言主体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的延展。因此我提出语言存在或演变的"时间·空间·语主的三维矢量观"。

如果要探索汉语的祖先，语料的匮乏决定了通常的语言研究方法无法"包打天下"。然而，只要人们探索汉语语源的欲望无法抑制，那么只有另辟蹊径。王士元教授在《汉语的祖先：回顾和前瞻》中，提出了对汉语的祖先的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人类学的交叉印证法和综合研究观。尽管有人囿于"纯正语言学"或"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立场，不赞成吸取非语言学方法，然而我仍然坚持："汉语的祖先"或"华夏语的起源"不仅是一个历史语言学专题，而且是一个与"华夏民族起源"和"华夏文化起源"密不可分的"大文

化"或"文化原型"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与同大西洋文化圈相对的太平洋文化圈的起源和演变相关的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大课题。与进行田野调查的"口语语言学"和依据文献考据的"文献语言学"不同,对"语言的祖先"不可能微观描写,只能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体质类型特征、传说历史资料、历史民族迁徙等,依据现存民族语言的特征以及历史语言构拟等,大致宏观勾画语网的区划和语区的形成,只能参照现存语言中所保留的古老结构类型来大致推测远古语言特征。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石器时代的语言研究可以命名为"考古语言学"。这一研究的价值是为后来语言的演变寻找一个可以追溯的预设源头,建构一条溯源沿流、梳理支脉的宏观线索。"祖先的研究"并非需要也无从进行微观确证,非微观确证性并不是考古语言学的"专利",就是文献语言学也在所难免。在不可能精密的地方苛求精确,无异于"画蛇添足"。模糊尚且可信,精确则难免荒谬,这正是科学主义的精确方法在人文学科领域使用不当造成的弊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对自然科学精确方法也同样有使用限度:宇宙大爆炸时间能否精确到距今的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从猿到人的演变又能否精确到何种环节?归根结底,自然发展的不可重现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注定了科学的"永恒之谜"。从以上立场来说,对使用非语言学方法来探讨史前语言面貌的任何指责都显得毫无意义。

科学不是永恒真理,科学只是一套证明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假说,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永远的可证伪性。长期以来,传统语言学研究偏重于微观考据的举证而忽略了宏观模式的建立,结构主义理论更是将"现代语言学"误导入共时和历时的割裂。微观语言学研究固然是基础,但是没有宏观理论指导难免盲人摸象。尽管有人不赞成"空对空"的理论研究,但是"地对地"、"地对

空”、“空对地”、“空对空”的探索都是可行的。尽管有人坚持语言学的“纯正本体”研究，然而语言的“本体”随着视角的转移而变化，通常所认为的边缘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在创始人拉波夫看来是本体语言学。如果我们同意人类语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合，那么任何语言研究，从对象来说都是本体(并非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音、语法结构才是语言的惟一本体)研究，从方法来说难免交叉。即使标榜为“内部语言学”的索绪尔方法论，也是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学术在于创新，创新需要宽容。没有理论的材料只是一盘散沙，个别研究结论在理论体系中获得新的价值。材料的价值不在材料本身，而在于阐释材料的理论模式。既可以从材料引出理论，也可以从理论审视材料。正如完全摆脱观点的材料从未见过一样，完全脱离材料的理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强调材料的同时不可以忘记“穷尽性”归纳是不存在的；批评演绎法的同时不可以忽视其实就是在应用演绎法。对于当代中国语言学，理论不是嫌多，而是过于短缺。在一个不习惯理论思维而善于从经验出发的国度，任何对理论研究的苛求都暗示着目光的短浅和思维的贫乏。一言以蔽之，直觉、灵感、类比、统觉、归纳、演绎、概率、演算都是认知世界的手段。中国宏观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套用”西方理论框架的传统，为微观和中微观语言研究提供中国语言学家创立的新的理论模式。

因此，窃以为：“语言史是广义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史就是这一民族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折射与积淀。一种语言的形成演变史与这一民族的形成演变史是平行展开的。语言的史前状态是非常复杂的。语言的演变因素除了时间、地域，还有语主，还有语言接触中的渗透、交融、换用和混合等等。很难设想，一种游移于文化史之外的语史研究模式，一种建立在并不完整

的文化史观之上的语史研究模式，一种得不到考古文化研究成果支撑的语史研究模式，能满足对这种语言的起源与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文化热"，或试图以文化学方法来剖析传统文化，或试图以国学方法来弥合西学东渐的文化断层，或把兴趣投放到对古代神话的重新阐释，或专注于挖掘国民性以寻求对误入歧途的解脱办法。凡此种种研究，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释读。然而一些名噪一时的"宏论"，往往因为缺少扎实的文献根底而实为皮相之见。与之同时，语言学界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从横的平面上看，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学科；从纵的剖面上看，文化语言学是一种思潮。这一思潮不仅是对近百年来套用欧洲传统或语法学框架的历史性反拨，而且蕴含着在与老一辈学者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灵的躁动、命运的沉思、价值的抉择以及期待的否定。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学术拒绝权威。尽管爱因斯坦调侃"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使我自己成为一个权威"，科学史和学术史还是一再证明——权威意味着窒息。文化语言学的历史价值不尽在其本身，而在于推进了中国语言学从一统到多元的历史性转折。与其他文化语言学的流派都不同，我所默默跋涉的则是另一条道路：一方面，以汉语音韵为对象从事中国文化音韵学的体系建构（难免"茕茕孑立，顾影自怜"）；另一方面，采取融会贯通方法进行东亚华夏汉语史的溯源沿流，而形成"历史文化语言学"的鲜明个性。

1996年秋，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徐通锵教授进修理论语言学。他最使学生难忘的两句教导是：1. 从空间发现时

---

① 李葆嘉：《高本汉直线型研究模式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间;2.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根简单的线索。在学生看来,前者是方法论,而后者是哲学观。从事语言的宏观研究,一方面要遵循从空间发现时间的方法,以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周边语言以及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追溯华夏汉语的源流,探索华夏汉语与接触语言互动交融的演变大势;另一方面要力求从复杂的事物中发现简单的线索,建立起能够对考古学、传说学、历史学、遗传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中一系列纷繁复杂问题进行通盘解决的理论模式。"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模式,仅仅是一个斗胆的尝试。

这本著作记录了一个探索者多年来坚持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思考足迹。文中的观点可能大胆假设有余,难免小心求证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剔削爬罗、去粗存精。具有远见的语言学家也许赞同:只有坚持汉语语言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家和国际语言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相关学科科学家通力合作,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方法和现代西方理论、宏观系统阐释和微观深入考证、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融会贯通,才有希望早日揭开披在原始华夏语这位美丽女神头上的神秘面纱!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1999年4月10日于古南都随园

◆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

◆ 顾　　问　李质林
　　　　　　裘锡圭

◆ 名誉主编　胡裕树
　　　　　　吕冀平

◆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晓明
　　　　　　李先耕
　　　　　　李　彤
　　　　　　吴国忠
　　　　　　邹韶华
　　　　　　戴昭铭

◆ 主　　编　戴昭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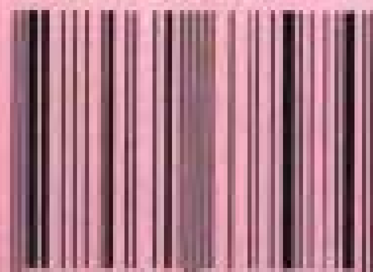
◆ 丛书责任编辑：

杨雪松　张天栋
李　彤　徐德林
王爱琳　张佳莉
张玉娟　张玉红

◆ 封面设计：

张建设　伊延波

ISBN 7-5316-3797-9
H·35 定价：24.00元



目　录

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宏观研究(自序) …………………… (1)
第一章　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理论模式…………………………… (1)
　第一节　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 (2)
　第二节　钱大昕的雅音归并模式…………………………… (6)
第二章　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模式 ………………………… (14)
　第一节　西洋学者与中国古音研究 ……………………… (15)
　第二节　中国音韵学界的高本汉传统 …………………… (16)
　第三节　高本汉模式面临的挑战 ………………………… (24)
第三章　普林斯顿学派的方言逆推型理论模式 …………… (33)
　第一节　中国语言学计划和普林斯顿学派 ……………… (33)
　第二节　罗杰瑞闽语研究的方法论 ……………………… (35)
　第三节　方言逆推模式中的若干问题 …………………… (41)
第四章　张琨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 ……………………… (49)
　第一节　文献语料的鉴定与《切韵》的性质 ……………… (50)
　第二节　张琨的二维语史观与研究方法论 ……………… (63)
　第三节　南北差异模式中的若干问题 …………………… (71)

第五章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 …………………… (76)
　第一节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 ………………… (77)
　第二节　桥本万太郎理论的学术背景 …………………… (85)
　第三节　桥本万太郎模式的反响与思考 ………………… (92)
第六章　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 (96)
　第一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学证据 …………… (97)
　第二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传说历史学证据 …………… (104)
　第三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历史语言学证据 …………… (114)
　第四节　中原三代的更替与华夏语的氐羌化 …………… (131)
第七章　秦汉以后汉语的推移发展 ………………………… (145)
　第一节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 ……………… (146)
　第二节　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南北历史变迁 …………… (149)
　第三节　规模人口的迁移和语言格局的演变 …………… (156)
　第四节　汉语方言的形成类型及其历史层次 …………… (175)
第八章　元代汉语音系和北方汉儿言语 …………………… (195)
　第一节　《蒙古字韵》与宋代两京音系 ………………… (196)
　第二节　《中原音韵》与社会文化背景 ………………… (201)
　第三节　北方汉儿和金元汉儿言语 ……………………… (213)
第九章　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与基础方言 …………… (221)
　第一节　官话考释及其市民文化内涵 …………………… (222)
　第二节　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说 ……………………… (232)
　第三节　清代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说 ……………………… (246)
　第四节　明清戏曲小说与明清官话 ……………………… (261)
第十章　官话音系特点和北京官话渊源 …………………… (266)
　第一节　明清官话基础方言非南京说商榷 ……………… (267)
　第二节　官话南北两系论和官话音系特点 ……………… (274)
　第三节　现代国音的确定和北京话的形成 ……………… (283)

第十一章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292）
第一节　东亚—南洋语言关系假说的歧异………………（293）
第二节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史前渊源……………（307）
第三节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变迁鸟瞰……………（318）
第四节　汉语和周边语言同源异流现象阐释……………（328）
第十二章　周边语言的汉语化和汉语的异化………………（332）
第一节　周边接触语言的汉语化…………………………（333）
第二节　汉语的阿尔泰化和夷越化………………………（339）
第三节　华夏汉语结构的演变大势………………………（346）
第十三章　语言混合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358）
第一节　混合语研究的历史回溯…………………………（359）
第二节　中国现存混合语的研究…………………………（365）
第三节　东亚历史混合语的研究…………………………（372）
第四节　混合语研究的理论方法…………………………（375）
第十四章　现代语言起源的科学思考………………………（380）
第一节　现代语言起源的考古解剖学思考………………（381）
第二节　现代语言起源的分子生物学思考………………（385）
第三节　人类思维交际符号演变的连续统………………（391）
第十五章　世界语言演化的宏观走向………………………（396）
第一节　语言关系类型演变的连续统……………………（397）
第二节　语言关系类型学的四分方法……………………（401）
第三节　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连续统……………………（410）
第四节　人类语言发展的世界化进程……………………（414）
主要参考文献…………………………………………………（419）
各章内容提要（中英文）……………………………………（429）
本书作者简介…………………………………………………（460）
后记……………………………………………………………（462）

CONTENTS

General Preface .... (1)
Author's Preface: Blending and Transition: Macro-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s .... (1)
Chapter I Theoretical Models of Studying Ancient Phonology in Qing Dynasty .... (1)
Section I Dai Zhen's Model of Ancient Sounds Interchange .... (2)
Section II Qian Daxin's Model of Standard Sounds Mergence .... (6)
Chapter II Bernhard Karlgren's Linear Theoretical Model ...... (14)
Section I Occidental Scholars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ounds .... (15)
Section II Karlgrenian Tradi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onology .... (16)
Section III Challenges to Karlgren's Model .... (24)
Chapter III Pricestonian Model of Counter-Inferring Dialects .... (33)
Section I Chinese Linguistic Plans and Pricestonian School .... (33)
Section II Jerry Norman's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Min Dialect .... (35)
Section III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Model of Counter-Inferring Dialects .... (41)

Chapter IV Zhang Kun's Theoretical Model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fferences ······ (49)
Section I The Evaluation of Corpus of Literature and the Nature of Qie-Yun ······ (50)
Section II Zhang's Bi-dimensional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Methodology of Study ······ (63)
Section III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Model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fferences ······ (71)
Chapter V Hashimoto's Theoretical Theory of Geographical Transition ······ (76)
Section I Hashimoto's Theoretical Theory of Transition ··· (77)
Section II Academic Background to Hashimoto's Theory ······ (85)
Section III Repercussion and Thought on Hashimoto's Theory ······ (92)
Chapter VI The Bl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o-Huaxia Languages ······ (96)
Section I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Evidences of the Bl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o-Huaxia Languages ······ (97)
Section II Legendar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the Bl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o-Huaxia Languages ······ (104)
Section III Historical Lianguistic Evidences of the Bl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o-Huaxia Languages ······ (114)
Section IV The Alteration of San-Dai in Central Plains and Di-Qiangization of Huaxia Languages ······ (131)
Chapter VII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fter Qin-Han Dynasties ······ (145)

Section I Conflict and Emergence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 ······································ (146)
Section II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Fundamental Phonology of Dominant Languages in South and North China ········· (149)
Section III Migration of Scaled Pop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s ·· (156)
Section IV Types of Forming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Historical Hierarchs ·· (175)
Chapter VIII Chinese Phonology in Yuan Dynasty and the Speeches of Northern Han-ers ·· (195)
Section I Menggu-Zu-yun and Phonology of Captal of North-South Song Dynasties ·· (196)
Section II Zhongyuan-Yinyuan and Its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 (201)
Section III Northern Han-ers and "Han-ers' Speeches" in Jin-Yuan Dynasties ·· (213)
Chapter IX Urban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Mandarin in Ming-Qing Dynasties and Fundamental Dialects of Mandarin ··············· (221)
Section I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ndarin and Its Urban Cultural Connotations ······································ (222)
Section II Nanjing Hypothesis of Fundamental Dialects of Mandarin in Ming Dynasty ·· (232)
Section III Nanjing Hypothesis of Fundamental Dialects of Mandarin in Qing Dynasty ·· (246)
Section IV Dramas and Fictions and Mandar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261)
Chapter X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Mandarin and the Source-Tracing

of Beijing Mandarin …………………………………………… (266)
Section I　Consultation of Non-Nanjing Hypothesis of the Fundamental Dialects of Ming-Qing Mandarins …………… (267)
Section II　Nanjing Hypothesis and Beijing Hypothesis of Mandarin as well as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Mandarin ……… (274)
Section III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National Sou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Dialects ……………………… (283)
Chapter XI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Circle Hypothesis …………………………………………………… (292)
Section I　Divergence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 Relation Hypothesis ………………………………………… (293)
Section II　Prehistoric Sources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Circle Hypothesis ……………………… (307)
Section III　A Bird's Eye on the Changes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Circle Hypothesis ……………… (318)
Section IV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Neighbor Languag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Source but Different Courses Phenomenon …………………………………………………… (328)
Chapter XII　Chinization of Neighbor Languages and Alienation of Chinese …………………………………………………… (332)
Section I　Chinization of Neighbor Languages …………… (333)
Section II　Altaicization of Chinese and Yi-Yueization of Chinese …………………………………………………… (339)
Section III　Great Trends of Evolution of Huaxia Chinese Structure …………………………………………………… (346)
Chapter XIII　Current Status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Blending ……………………………… (358)

Section I Historical Source-Tracing of the Studies of Blending Languages ……………………………………………… (359)
Section II Studies of Blending Languages existed in China ……………………………………………… (365)
Section III Studies of Historical Blending Languages in East Asia ……………………………………………… (372)
Section IV Theoretical Methods of Studying Blending Languages ……………………………………………… (375)
Chapter XIV Scientific Thought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Languages ……………………………………………… (380)
Section I Archaeological and Anatomical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Languages ……………………………… (381)
Section II Molecular Biological Thought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Languages ……………………………………………… (385)
Section III Continuum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 Signs ……………………………… (391)
Chapter XV Macro-trends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Languages ……………………………………………… (396)
Section I Continuu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ypes of Linguistic Relations ……………………………………………… (397)
Section II Tetradic Methods of Typology of Linguistic Relations ……………………………………………… (401)
Section III Continuu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ype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 (410)
Section IV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Human Languages ……………………………………………… (414)

Main Bibliography ······························ (419)
Abstracts of Each Chapters(Chinese/English) ·················· (429)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 (460)
Postscript ······························ (462)

第一节　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

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戴震(1723—1777),在音韵学方面撰有《声韵考》和《声类表》两部著作。早年他曾经计划写一部探求语源、阐明音义相变的专著《转语》,惜未能及时完成,仅存乾隆丁卯(1747)仲春写下的《转语二十章序》。序曰:

> 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缺一书,创为是篇,用补是缺。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

"转语"之说始见于西汉扬雄《方言》。对于那些义同音变的不同方言区的语词,扬雄则以"转语"、"语之转"解释。东晋郭璞注《方言》又发扬此说,用以阐释两汉至魏晋语词之变化。扬雄所观察到的语音变异,不是以音位类变为规则的音变,而是以个别词语为对象,通过寻绎语义线索而发现的不同方言区域之间发生的非系统音变。由于汉语形成的异质性,由于词语多滋生、语音多变转、文字多通假,因此秦汉文献中的语词关系呈现着复杂性。《尔雅》重在词语同训,《方言》重在词汇比较,《说文》重在字形本意,《释名》重在词源探寻,但是当时音韵学尚未产生,缺少语音框架来沟通音义,因此既未明晰也难成系统。

戴震借用扬雄的"转语说",试图构设一个秦汉时期古音和今音、通语和方言流变的声转模式,所定声类二十位就是他这一理论模式的具体体现。虽然他在《转语序》中并未逐一列出二十位,但其中列举的例子与他晚年(1777)撰著的《声类表》之中的声纽二十

位顺序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声类表》的声组系统就是《转语》的声组系统。

同位 / 位同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喉牙音(唇)	舌头音	舌上音(正齿)	齿　音(牙)	唇　音
一位	塞(擦)音 不送气	清 浊	见	端	知照	精	帮
一位	塞(擦)音 不送气	拟音	k	t	tʂ	tɕ	p
一位	塞(擦)音 不送气	章次	一章	五章	九章	十三章	十七章
二位	塞(擦)音 送　气	清 浊	溪 群	透 定	彻穿 澄床	清 从	滂 并
二位	塞(擦)音 送　气	拟音	kh	th	tʂh	tɕh	ph
二位	塞(擦)音 送　气	章次	二章	六章	十章	十四章	十八章
三位	鼻　音 (零声母)	清 浊	影 喻微	泥	娘日	疑	明
三位	鼻　音 (零声母)	拟音	ø	n	ȵʑ	ȵ	m
三位	鼻　音 (零声母)	章次	三章	七章	十一章	十五章	十九章
四位	擦　音 (边　音)	清 浊	晓 匣	来	审 禅	心 邪	非敷 奉
四位	擦　音 (边　音)	拟音	x	l	ʂ	ɕ	f
四位	擦　音 (边　音)	章次	四章	八章	十二章	十六章	二十章

"同位"与"位同"这两个概念,是戴震古声流转模式赖以建立的两根支柱。《转语序》说:"凡同位为正转,凡位同为变转。""同位"指发音部位近同,"位同"指发音方法近同,与现代语音学分析辅音的方法相同。发音方法近同而发音部位有别的同类声纽之间相互流转,称之为"正转";发音方法近同而发音部位有别的声纽之间相互流转,称之为"变转"。戴震又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所谓"同声"、"声变而同",主要是指发音部位即喉牙、舌头、舌上、

齿音、唇音五类的相同。戴震在《转语序》中举证古代词语的音义可通以后，进一步认为，“用是听五方之音及少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混必各如其位，斯足证声之节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设也”。由此可见，戴震颇为自得，以为这个模式不仅可以明古语音义沟通，还可以证方言之差异、儿童学习语言之发音。齐佩瑢评价：“他的精神全在启发风气，实是语音学的发音基础分别音素的部位而阐明音变条例的先导者，欲令学者准是以求语音之转的自然规律、声义变迁的法则及声义相通的原理。”①

戴震的二十位“古声流转说”是在其师江永（1681—1716）“古声混转说”之上的发展。与顾炎武相比，江永精通字母等韵之学，详于审音。在古音研究中，他已经接触到多种古声材料。在《音学辨微》中有“轻唇、重唇相转说”、“舌上、舌头相互说”、“正齿二等似精清非正音说”，在《古韵标准》中有“重唇、轻唇易混说”、“舌上、舌头转改说”、“正齿二等与齿头相混说”、“邪由定透转出说”、“见溪可通说”和“古音一等无群母说”。但是江永仅名之“近、混、转、改”，而形成古声混转说。这主要是由于：

1. 保守的字母观。江永以为三十六字母出于天籁，不可增减，只能以“互通”、“混转”解释古声中的字母之捍格。

2. 方音正误观。江永认为有一个由五方之音合成的由古到今的正音系统。由于各方水土不同，人之音呼亦有所不同，当辨其疑而矫其偏。

戴震20岁拜见江永，“一见倾心，取平日所学就正焉”。尔后，又参订江永所撰《古韵标准》。江永的方音观与古声混转说，无疑影响了戴震。戴震说：“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犹今也”。江永对古声

①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再版，第122页。

纽的研究重在等韵，对古声的论例是零碎的、肤浅的。戴震在25岁撰《转语序》时就已经表现出系统的、理论的特点。江永株守字母，斥方音为不正，用“混转”解释古声中的字母捍格；而戴震却摒弃字母，创立“同位”、“位同”之法，沟通秦汉古今方国之音变。江永、戴震师生之间的草创与发扬关系还是脉络分明的。

与其他古韵学家有别，作为哲学家的戴震，并非为古音而研究古音，而是“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借助古音系统与音转理论去释读文献，诠释思想。戴震的语文学，研究目标重在一个“道(经艺之道)”字，研究方法重在一个“理(语言文字之理)”字。贯穿戴震语文学的是以“正人心之要”的“道”和为“治经之涉津”的“理”。戴震的注释学强调语义系统(通古今异言)，文字学研究认定转注本为互训(同意相授)，音韵学研究突出语转原理(音近义通)，其目标都是解经明“道”。戴震的注释学重在“义理”(注释重语义系统；校勘重理校方法；倡导“声近义通”之理)，文字学重在“字理”(四体二用说)，音韵学重在“音理”(据韵母配比之理，主张阴阳入三分；据四声相承之理，认为《广韵》韵次有误；据审音之理，划分古韵分部；据音转之理，排列声纽二十位；据转语之理，撰《声类表》)，其方法皆据“理”推阐。也正是以“道”和“理”为基点，戴震才建立了清代语言文字学的系统研究模式。而其弟子段、王又以专著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顶峰。

与以考据著称的史学家钱大昕不同，戴震首先是一个注重宏观研究的哲学家。《转语》二十位并非是对古代某一具体时段、某一具体地点的声母系统的考证，而是一种企图驾驭古今方国语音流转的泛时跨域模式。从语言哲学的思维出发，企图以这一系统来阐释词语滋生、文字通假和经籍异文，乃至古今楚夏之音变。其立论前提是上古因为时地差别，难以归纳出一个单一音系，但是可

以构设一个泛时跨域的超音系来贯通音义流转。戴震虽然没有否认上古有一个雅音系统,否则他的古韵分部无从立据,但是二十位的立足点是语音的流转,因此对雅音和方音同等看待。由此可见,戴震对古代汉语的复杂性洞察至明,难怪章太炎在《新方言》中赞叹:“戴震者,可谓会其玄极矣!”

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之古声组研究是学术史上的第一个理论模式。章太炎的《古双声说》(1907年)、傅东华的《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1941年)和黄焯的《古今声类通转表》(1983年)都是承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之余绪,从而形成了上古声组研究中的流转派。

第二节　钱大昕的雅音归并模式

清代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钱大昕(1728—1804),43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类”。其时(1770)上距戴震撰写《转语序》已经23年,下近戴震写作《声类表》7年。钱大昕虽然涉入音韵学研究领域较晚,但是颇有创获。且官至詹事高位,告老还乡以后主持钟山、紫阳等书院前后20年,弟子如云,学术思想影响广泛。音韵学文章收集在《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以下引文皆出于此)中。

钱大昕在古声组研究中提出四个著名论断:

1. 古无轻唇音;
2. 古无舌上音;
3. 后代齿音古人多作舌音;
4. 影喻晓匣古双声说。

钱大昕的行文主要是考据式的材料罗列。他之所以认为古无轻唇音,是由于下列事实支持了他的论断。

1.《广韵》中轻唇字较少，并且都可读重唇：

《广韵》平声五十七部，有轻唇者仅九部。去其无字者仅二十余纽，证以经典皆可读重唇……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

2. 反切上字类隔，反映了轻唇音古读重唇：

古人制反切皆取音和……后儒不识古音，谓之类隔，非古人意也。

3. 等韵创制之前，声纽分类没有轻唇：

神珙《五音九弄反纽图》有重唇，无轻唇。

4. 佛经术语的音译有轻唇字的异译，今仍然读重唇：

释氏书多用南无字，都如囊谟。梵书入中国，绎译多在东晋寺，音犹近古。沙门守其旧音不改，所谓礼失之而求诸野也。

5. 方音存古：

今人呼鳆鱼曰鲍鱼，此方言之存古。

钱大昕还列举了吴音，江西、湖南方音和岭南方言中的轻唇今

读重唇的字。其中，最具有古音定性作用的是佛经译语与存古方音。

在钱大昕对"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立论之前，徐用锡已经提出"舌上古读舌头说"。徐用锡(1657—1737以后)，宿迁人，康熙年间进士。他在《字学音韵辨》中提出："等韵古音，端透定泥是矣，知彻澄娘不与照穿等同呼，曰：此古今异耳……今闽音尚于知彻澄一如古呼。"

徐用锡的闽方音知识，来自他的老师李光地。李光地(1642—1718)，福建安溪人，曾经奉诏承修《音韵阐微》，著有《榕村韵书》、《等韵辨疑》等。李光地在《辨疑》中说："知彻澄娘四字，今音惟娘字入舌音泥字内，知彻澄三字具混在照穿床齿音内。据等韵诸书具当作舌音。但端透定泥在舌头，而知彻澄娘收在舌上耳。今闽广人知彻澄犹作舌音也。"

这一论说也见于李光地承修、徐用锡参与分纂的《性理精义》。李光地立足于字母，引用闽广方音以证明"知彻澄"在唐宋等韵中原来属于舌音，不同于明清北方语音混入齿音。徐用锡不囿于师说而参以己见，就古音声纽提出自己的创见。

同样的方音材料，为什么李光地仅仅把它作为"知彻澄"在等韵中属于舌上音的证据，而徐用锡却以之推论舌上音古读舌头音呢？由此可见，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材料自身，而是与运用材料的前提及观念密切相关。换而言之，立论"舌上古读舌头说"，需要具备哪些前提与观念呢？

1. 注意到异文、形声、读若等古代文献语言材料中的舌上音与舌头音之间的相通现象。

2. 知道唐宋等韵中知组字是舌上音，与明清北方方音入齿音不同。

3. 了解南方方音中有舌上音并且现在仍然发舌头音的事实。

4. 更重要的是，必须确认闽广方音多存古音，不是方音之不正。

5. 研究字母的视野由明清时音，经唐宋等韵与中古《广韵》，再追溯六朝、两汉和三代之旧音。

6. 以雅正音系为立论前提，古代方音差异忽略不论或排除在外。

7. 不迷信字母与等韵，具有古今语音变化的观念。

8. 以三十六字母音系为参照系，采取归并字母的方法以推求古声纽。

其中4、6、8这三条最为重要。徐用锡立论"舌上古读舌头"，可以推知他大概具备了以上条件。

有些音韵学家虽然也接触到类似的材料，数量比这些要多得多，但是由于前提和观念的差别，因此立论就不相同。江永的《音学辨微》关于字母的读音，征引了许多文献材料，涉及古读、经注、古语分析、古代姓氏、反切类隔等等，但是由于他认为三十六字母"不可增、不可减，不可移动"，认为"闽广人呼知彻澄娘作舌音，此方音之正者，恐未必尽然"，因此只能停留在"舌头舌上相互"上面。李元（约1748—1816以后）不了解闽广方音，但是非常熟悉文献语音材料，在《音切谱》中证明"端透定三母与知彻澄互通"，举出异文32例、谐声34例，比钱大昕73例仅少7例。同时又以11例证明"泥娘二母互通"。李元的观点多受毛奇龄"通韵"观的影响，所强调的是"南北音异，古今音异"，立论的关键词是"互通"，而不是"有无"。夏燮（1801—1875）的观点多受江永影响，主张合用。在《述韵》"舌头舌上合用证"中，夏燮说，"端透定泥呼在舌前……知彻澄娘呼在舌后……二部之通由来久矣"，并且举出56例。夏燮认为

五方之音不齐而可以用喉牙舌唇四音齐之，以此作为古声合用证的基点。他并不斥责方音为不正，因此能够把江永的"相互说"推向"合用证"。然而兼顾五方之音，不以雅正音系为前提考察古声，自然也就不会采取归并字母的方式去研究古声纽。

徐用锡是清代归并字母以推求古声纽的先导。钱大昕之创说，或与前人之说有所联系。江永《音学辨微》[①] 为当时名著，钱大昕与戴震为友，江永的书应当看过，推测钱大昕受"轻唇、重唇相转"、"舌头舌上相互"论例的启迪不无理由。徐用锡《字学音韵辨》以抄本行世，与戴震订交的华亭名士沈大成有抄本，钱大昕对徐说是否有闻不得而知。但是，钱大昕的弟子任兆麟的《声音表》(1776)说，"竹汀钱师云古无轻唇音……《性理精义》云知彻澄娘等韵本为舌音"，其中"知彻澄娘"与"端透定泥"合并，以李光地之说为本。李光地所承修的官书《性理精义》，钱大昕不会不读，因此，即使钱大昕对徐用锡的创说并不了解，但是在研究舌上音古读的过程中，仍然可能受到李光地阐广古音说的启迪。

相同的材料，江永言混转，李元讲互通，夏燮名合用，都强调方音之异，而钱大昕却采取合并的方式，断其有无。除了赞叹钱大昕的远见卓识与精于考据，他在古声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学人的重视。

1. 不迷信字母的双声观

> 古人因双声。叠韵而制反切。以两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声，下一字必同韵。声同者互相切，本无子母之别。今于同声之中，偶举一字为例，而尊之为母，此名不

① 乾隆己卯年有川棣里堂室刊本。

正而言不顺也。故言字母不如言双声，知双声而后能知反语。

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

虽然钱大昕对字母的批评并不正确，没有认清双声只是个别字音之间的认同，而字母则是对音类的概括抽象，但是他认为唐宋以前没有字母，依据古双声而考证古声纽是正确的。正是由于他不迷信字母，因此考隋唐以前的古音，以双声为基础，又以为异文必同音、类隔为音和，才能在材料之上论断“古无”、“不可信”等等。同样，也正是由于不迷信字母，因此他只是考证，并不给所考结果确定古音字母。

2. 古代正音观

钱大昕在古声论证中每每提及“正音”，认为古代书面语存在一个不当拘于方音的雅正音系，这个正音为最初之音。

昔仓颉制字，黄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条不紊。许慎《说文》，分部别居，以形定声。

3. 方音扩散观

另一方面，钱大昕认为上古有方音，古今之方音不相远也。钱大昕强调魏晋以降，方音、俗音干扰正音，导致古代正音亡佚。他说，“宏嗣生于汉季，渐染俗音……汉魏以降，方俗递变，而声音与文字渐不相应”。音变的途径是由于方音的扩散，“声音之变由于方音，始于一方而遍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

4. 古音正转观

> 五方言语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是之谓拘于方……《易传》皆兼用之，此正圣人不拘方音之证。

由此提出"一字多音，音有正、转"的观点：

> 文字偏旁相谐谓之正音，语言清浊相近谓之转音。音之正有定，音之转无方……有正音以定形声之准，有转音以穷文字之穷。

以为"知一字不妨数音，而辨其孰为正、孰为转，然后能知古音"，试图以音之正转代替音之雅俗。

钱大昕的开创性工作不仅在于他的具体结论，更重要的在于他的雅正音系观和双声考据法，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古声研究归并模式。他的古声研究模式是以中古字母为参照系，寻绎字母在古声纽系统中的分合。在雅正音系的前提下，以异文、音注考互通，以谐声、类隔求正音，以译语、方音定音值。宋元以来等韵学界流行的"类隔"之谜，由钱大昕揭破——原来是反切上字的存古。其侄钱坫（1741—1806）以《诗经》相连之字"求三代之雅"，双声二十一位和谐说正为钱大昕古声纽研究之补充。后来的邹汉勋（1805—1854）、章太炎（1869—1936）和黄侃（1886—1935）则弘扬钱大昕说，以至成为古声纽研究中的主流。依据字母归并模式，研究起来比较方便，得出的结论在古书释读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因此钱大昕的论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他的论断因为方法的简单化与前提的局限性，也受到了后人的质疑与挑战。这方面的论著有符定一的《古有轻唇音说》（1943）、黄绮的《论声母分合》（1962）、王建庵的《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1983）和敖小平的《古

无轻唇音不可信补证》(1984)等。

在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和钱大昕的“雅音归并模式”之间，尚有李元的“古声互通说”和夏燮的“古声合用证”。李元的互通说多受毛奇龄古音通转说的影响，与戴震的流转模式较为接近。夏燮的合用证以喉舌唇齿四大限齐五方不齐之音，虽合用而不归并，却接近钱大昕的归并模式 归并——合用——互通——流转，构成了从静态到动态的逐步推移的理论模式的连续统状态。

章太炎在《小学说略》中提出了二十一声纽说，在《古双声说》阐明了声纽变转。很显然，如果拘守二十一纽，谐声中的许多现象根本无法解释。既要进行静态的描写，于是制订了二十一纽；又要进行动态的阐释，由此确立了古双声说。这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了章太炎古声纽学说。这种静态归并与动态流变相结合的方式，在章太炎的古韵学研究中也是一以贯之的。章太炎分韵二十三部，又另设展示旁对转的《成均图》。二十三部为静态描写，旁对转为动态流变。章太炎的古声二十一纽，多依钱大昕之考，因此章太炎说，“审纽莫辩于钱”，“(字母)钱大昕可谓得其中流”。章太炎的古双声说，依据戴震古声流转论，因此章太炎说：“戴震者，可谓会其(字母)玄极矣。”章太炎将“审纽”与“会玄”同时并举，将钱大昕的雅音归并模式和戴震的古声流转模式加以沟通，熔为一炉，在上古声纽研究学术史上可谓独树一帜。章太炎古声纽说的这种特点，一方面反映了钱大昕归并模式的局限性必然以戴震的流转模式为补充，另一方面则与他古音研究的目的相一致。要达到“讽典籍、明语源”的研究目的，仅仅凭静态描写是不够的。

无论是古韵部研究，还是古声纽研究，就依据文献资料考据归纳音类来说，清代学者的探讨已经是“山穷水尽”，传统音韵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期待“柳暗花明”。

第二章 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模式

汉语史研究的宏观理论模式，现当代主要有四种：

1.20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建立的直线型理论模式；

2.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普林斯顿学派建立的方言逆推型理论模式；

3.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籍华人张琨建立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

4.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桥本万太郎建立的农耕推移型理论模式。

通行的这四种理论模式，其中仅仅有一种即桥本万太郎模式，是涵盖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三个子系统的，其余的三种模式主要是针对语音系统的。然而，建立在某种语言史观之上的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即使从某一语言要素或子系统切入，也必然会以各种方式牵涉到对其他语言要素或子系统的观照，从而牵动整个语言史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模式也就是汉语语言史研究的理论模式。显而易见，这些理论模

式都是国外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建立的，中国大陆的语言学家在理论模式这方面的建树甚微，可以说是空白。

第一节　西洋学者与中国古音研究

运用西方语音学方法研究中国古音的先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西洋学者马士曼（Marshman）。他在1809年出版的《论中国语的文字和语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指出梵文字母和三十六字母的关系，又发现暹罗（泰国）、缅甸、西藏等语言和汉语相近，尝试依靠《字母切韵要法》推测中国古音。另一位西洋学者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1853年与1857年先后出版了《中国上海方言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与《中国官话文法》（*A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Mandarin Dialect*），证明中国古音里有破裂的浊音声母与收尾的塞辅音。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洋传教士用教会罗马字拼写多种汉语方言。据统计，至少产生了厦门、广州、汕头、海南、福州、台湾、客家、苏州、温州、金华、上海、北京等17种方言罗马字。传教士们主观上是为了传教而制定方言罗马字，但客观上进行了汉语方言的调查，为中国古音的研究和构拟积累了方言材料。1896年，第一本以"中国音韵学"命名的著作问世，作者是意大利学者武尔坡利齐（Z. Volpicelli）。他在《中国音韵学》（*Chinese Phonology*）中，根据盖尔氏《大字典》里的12种方言材料拟定中国古音，确定中古等韵四等各自的主要元音，虽多有失误，但排比参对多种方言材料而拟测中国古音由此开始。1898年，荷兰学者商克（S. H. Schaank）出版的《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根据《等韵切音指

南》拟测中国古音，介绍了声母 j 化的观点，提出古双唇音在三等韵合口变成唇齿音，并发现了一、二等没有 i 介音而三、四等有 i 介音的情况，这些观点和见解影响了后来居上的高本汉。

虽然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甚至在 19 世纪末已经有了一些像武尔坡利齐、商克那样的研究中国古音的汉学家，但是 19 世纪的中国古音学家还沉湎在以考据为主的“顾炎武传统”之中，洋务运动首先关心的是坚船利炮。以“智民强国”为己任的马建忠（1845—1900）研究语言的旨趣在于“泰西葛琅玛”，而疏于西方历史语言学与中国音韵学。实际上，晚清学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西洋学者对中国古音学的研究，章太炎用以分析鼻音韵尾的语音知识，来自于他东渡日本以后接触到的梵文悉昙。只有当 20 世纪新一代的中国语言学家，如胡适、林语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张世禄等，把目光投向西方语言学研究之时，适逢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在西方汉学界脱颖而出，其中“开一代风气”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于是高本汉便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介绍和模仿的主要对象。

第二节　中国音韵学界的高本汉传统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成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中国音韵学界介绍和模仿的对象，不仅在于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使之必然发生，而且在于高本汉以清代古音学研究和西洋前辈中国古音学研究为基础，把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运用到中国古音研究中来，并以

他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1]（*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为之提供了范例，成为中国音韵学由传统方法跨入现代理论的里程碑。正如高本汉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所说："要继续探究清代大儒开创的基业，并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钻研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以便构拟出某个阶段的古汉语音系，而这个阶段要古老得足以成为我们研究现代方言的必要基础。"[2]

1910年2月，21岁的高本汉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不寻常的远征。年轻的高本汉在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两年内，获得了相当惊人的研究成果。一开始的几个月，他就学会了足以使他进行实地语言调查的汉语口语，编制并应用有3100汉字组成的方言调查字表的书面语。高本汉走乡串镇，对24种方言的语音系统做了调查记录，记录了十万多个字音，加上他收集的其他9种已经发表了的方言和对音（域外方言）材料，一共有33种语音材料（第145页）。

北京话 山西话8种：归化、大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 甘肃话3种：兰州、平凉、泾州 陕西话3种：西安、三水、桑家镇 河南话3种：开封、怀庆、固始 四川话 汉口话	南京话 扬州话 吴语3种：上海、温州、宁波 闽语3种：福州、厦门、汕头 粤语：广州话 客家话 域外方言：高丽（朝鲜）译音、日本译音、安南（越南）译音

① 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48年再版，1995年影印版。下文引文所注页码即影印版页码。

② 转引自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译本聂鸿音前言，字词略有润饰。

这些方言材料大大超过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汉语语言学家。回到欧洲以后，在巴黎他结识了当时已经触及到中国古音构拟的两位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与马伯乐(H. Maspero)。高本汉将中国古代韵书音系(《广韵》和韵图)、现代汉语方言材料、域外对音材料与西方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用西方科学眼光审视东方语言事实，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15 年，25 岁的高本汉以《中国音韵学研究》(全书中的第一部分)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高本汉有目标地、一心一意地规划和从事他的汉学研究。早在 1917 年，他就草拟了使他成为"汉语语言学家"的在以后的各个阶段中应当完成的研究工作。在以后的多年中，高本汉以"超群的才智、无穷的精力、渊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以及献身学术的精神"[①] 不折不扣地实践着他的研究纲领。1915 年到 1919 年，他陆续完成了《古代汉语》、《现代方言描写语言学》和《历史上的研究》。1926 年他又完成了《方言字汇》。这四部分合成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构拟的中古音系音值和他的研究方法，引起了中国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中国的三位杰出语言学家赵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把《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成中文本。

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第 3 页)一书中，高本汉首先提出中国语言学的三个主要问题：

1. 考证中国语言的祖先与来源；

2. 考证清楚这个语言的历史；

3. 考证明白现代中国语言的各方面。

接着提出自己想开始的研究是：

---

① [瑞典]马悦然：《纪念高本汉》，转引自《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译本。

1. 把中国古音拟测出来，要想作系统的现代方言研究的起点，这一层是很必要的；

2. 把中国方言的语音作一个完全描写的说明，作过这层之后，然后可以；

3. 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第 13 页)。

自然，高本汉所讲的古音其实是中古音，距离中国语言的祖先或来源还相当遥远。对于中国语言，高本汉把《广韵》反切音系确定为公元 5 世纪到 6 世纪之间的一种语言，叫做中古汉语(le ancient chinois)，这个时期以前的叫做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ique)跟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广韵》以后的叫做近古汉语(le chinois moyen)——就是韵表(即韵图)的音，再以后就叫做老官话(le vieux mandarin)——就是《洪武正韵》的音。(第 21 页)

在完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后，高本汉就开始向重建上古汉语音韵的高峰攀登。1923 年，高本汉发表了《汉语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这是他研究上古音的第一部著作，全书收集了一千三百余套谐声字。在"序论"中他讨论了"谐声原则"，提出了上古汉语音节有起首音(即复辅音)和阴声韵带塞音尾的假设。这部著作成为整整一代西方汉学家的主要工具书。1928 年，高本汉发表《上古音当中的几个问题》(*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赵元任译文载《史语集刊》第 1 本第 3 分册)，第一次明确提出利用语音系统的"空档"研究上古音。1931 年，发表《藏语和汉语》(*Tibetetan and Chinese*，唐虞译文载《中法大学月刊》第 4 卷第 3 期)，进一步阐述上古汉语声母具有前加辅音的观点。1932 年，发表《诗经研究》(*Shi-King Researches*，张世禄与周祖谟各有中译本，皆未刊)与《老子韵考》(*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张世禄译文载《说文月刊》第123期)。1933年，发表《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张世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完成了他的汉语上古拟音体系。1940年，高本汉出版了把研究成果以词典形式写成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1957年出版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潘悟云等译中文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音系的努力探索，那么《汉文典》就是高本汉对上古汉语音系研究的辛勤结晶。

1954年，高本汉发表《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版)，全面论述了中古和上古汉语音韵构拟的材料、方法和结论，作为他的毕生研究中国古音学的总结之作。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学纲要》说："我们用'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600年左右的语言，这实质上就是陕西长安方言。这一方言在唐朝成为一种共通语(Koine)，除沿海的福建以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另外，用'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表示西周时代(从公元前1028年起)河南地区的语言。"

脚注说："有理由说，各地的底层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的土话里仍然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共通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现代方言的母语(福建与毗邻地区的闽方言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方言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确凿地表明，《切韵》描写了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是像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的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中混合的语

言。"①

这就是高本汉以《切韵》(隋唐陕西长安方言)为中枢,上推上古汉语(西周河南语言),下接现代方言(几乎是全部)的直线型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的预设是:

1.《切韵》为隋唐陕西长安方言。李按:隋唐学者已经指出《切韵》为传统读书音、综合音系或吴音。中国学者认为《切韵》是折中于金陵和洛下、综合六朝以来的读书音音系,并非是说"《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的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衷混合的语言"(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详见第四章)。"《切韵》音系隋唐陕西长安方言说"不能成立。

2.《切韵》音系在唐朝成为一种共通语。李按:虽然成为唐朝共通语的是秦音,但是《切韵》音系并没有成为唐朝的共通语。唐宋以降,汉语的共通语是变迁的。宋元以汴洛音系为"正音",明清以南京话为"官话"。

3.《切韵》音系是全部(除闽语)现代方言的母语。李按:一方面,汉语北方方言另当别论,而汉语各南方方言则是中原汉语南迁的后裔或对当地土著语言不完全性同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读书音影响了汉语方言的发展。这一迁移、同化和影响的"汉语化"过程,在《切韵》时代以前早就发生了,因此不可以断言全部(除闽语)现代方言的母语是《切韵》音系。

4. 上古西周汉语是河南语言。李按:西周的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东周迁移到洛阳,洛阳方言部分渊源于陕西关中。周代语言以秦音为标准,称为"雅言"。因此"上古西周汉语是河南语言"的断言不能够成立。

①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第2页。

5.《诗经》韵脚音系和谐声音系代表上古西周河南语言。李按：不仅“上古西周河南语言”的说法不能够成立，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诗经》韵脚音系和谐声音系是共时单一音系。

6. 隋唐陕西长安方言由上古西周河南语言演变而来。李按：可以认为隋唐陕西方言由“上古西周陕西语言”演变而来，但这其中有若干演变环节。

虽然高本汉研究中国古音具体音系的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是阐释这些具体音系演变的宏观模式却是违背中国语言史实的。所谓20世纪的中国古音学界的“高本汉传统”，就是包括具体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或方言拟测法)和宏观模式(直线型演变模式)这两个主要方面，而后者可以称之为“高本汉模式”。

从表面来看，中国语言学界对高本汉的古音研究批评多于肯定，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古音学第二次大辩论，林语堂、李方桂与高本汉你来我往，以及后来赵元任、陆志韦、葛毅卿、李荣、董同和、周法高等的修正，但这些都是对个别或局部结论的商榷。迄今为止，对高本汉的《切韵》古音构拟进行了全面系统批评和重新构拟的就是《隋唐音研究》，① 不过仍然采取的是高本汉引进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国古音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格局。可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高本汉古音构拟的原则、方法、格局和阐释汉语语音演变的模式，还是被中国语言学家普遍接受了。

以清代音韵学为基础，在高本汉传统的影响之下，20世纪的汉语音韵学有了重大的进展。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断代音系的研究，专书的反切系联(如《经典释文》、《玉篇》、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徐铉《说文》反切、徐锴《说文》反切等)、唐宋诗词的韵脚

① 葛毅卿遗著，李葆嘉理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归纳、元明韵书的音系梳理(如《蒙古字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西儒耳目资》等),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崇冈提出,如果能够拟定十个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以文献为依据的语音系统来,对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十个语音系统是:1. 甲骨文语音系统;2. 早期金文语音系统;3.《诗经》语音系统;4. 汉魏语音系统;5.《切韵》语音系统;6. 晚唐五代语音系统;7. 宋金语音系统;8.《中原音韵》语音系统;9.《韵略易通》语音系统;10.《李氏音鉴》语音系统。① 虽然这些断代研究对厘清汉语语音史的作用极大,但是崇冈的这一设想仍然是在高本汉"三点一线"格式上的延伸,仍然是以《切韵》为中枢的"十点一线"格式。

在《汉语语音史》② 中,晚年的王力一改《汉语史稿》(上册)中以《广韵》为枢纽联结上古汉语音系与现代汉语方音音系的"高本汉传统",汇结了近年来的断代研究成果,从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到隋—中唐,又从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直至现代,以九个历代音系前后贯穿,顺流而下,又以《历代语音发展总表》展示了汉语语音的直线型演变。虽然"历时音系连贯格式"细化了密度,但仍然未能跳出高本汉直线型的窠臼。

"导论"分四章(计 12 页),就材料和方法做了简单说明。

"第一章·韵书"开篇第一句"现存最古的韵书是《广韵》",就值得商榷。虽然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可以这么说,但是在 1946 年发现了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后,事实就是:"现存最古的完本韵书是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在故宫本发现以前,

① 崇冈:《汉语音韵学的回顾与前瞻》,《语言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最古的韵书是《广韵》,清代学者往往把《广韵》误以为《切韵》"。所谓"韵书",只仅仅列出了《广韵》音系。虽然本章最后一句话"《切韵》音系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在书中却完全抛开了《切韵》音系。

在"第二章·韵图"中,介绍了十六摄、三十六字母和宋元"等呼",提醒"等呼的概念很重要,我们研究先秦古音的时候还用得上,所以这里讲得详细些",但是为什么假设上古有等呼之别,并没有论证。

在"第三章·方言"中,一方面承认"汉语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另一方面却说"没有发现方言的痕迹","我们很少讲到古代方音,因为我们对于古代方音知道得太少了"。

在"第四章·方法"中,笼统而简略地将方法交代为:第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第二,要讲究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第三,要讲究比较语言学的理论;第四,要讲究音位学。对研究汉语语音史的理论预设、具体方法和宏观模式诸多重大问题却并未加以说明或阐释。所谓"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仍是建立在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理论和方法,其"普遍性"值得质疑。

王力的"历时音系连贯格式"仅仅是对高本汉模式的修补和扩展,尚不能够认为贯穿《汉语语音史》的是一个与高本汉传统迥然不同的新的理论模式。

第三节 高本汉模式面临的挑战

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之时,中国语言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汉语音韵学变革的是高本汉。从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高本汉建立的直线型理论模式,或称之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高

本汉传统”。清代古音学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资料，试图从中梳理出古音系统。这种文献语音学在获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国维语）的赞许的同时，研究却走到了尽头。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所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音标符号，不仅是历史比较方法，影响最深的是他的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当文艺复兴的欧洲语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普遍唯理语法出现，意大利商人菲利波·萨塞尔（Philipo Sasel）从印度发回的信件提到梵文词语和意大利词语有相似性。1786 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三周年演说》宣告了相距遥远的梵语和欧洲古代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19 世纪初，印欧语言同源性研究受到学者的热切关注。1816 年，葆朴（Francz Bopp）发表了著名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尔曼语相比较》，因而这一年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年。1862 年，施莱歇尔（A. Schleicher）出版了《印度日尔曼语比较语法纲要》，他所创立的谱系树理论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尽管 19 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傲气十足地宣布 19 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只是“语文学”，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才是“语言学”，但是事实表明，历史比较语言学只是人类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阶段或一个语言学研究流派。19 世纪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具有三个特点：1.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文明是最高的人类文明，欧洲语言是人类语言的最高阶段。2. 语言分化论。认为语言的发展主流就是从祖语到子语的历史分化。3. 语言进化论。认为事物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多样，由此构成语言的谱系。由于世界语言关系类型的复杂性，虽然依据不同语言材料得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互借鉴性，但是没有一种理论和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

高本汉将西方历史比较法和中国汉语音韵结合起来，选择中

古《切韵》音系作为联系古今汉语的枢纽和汉语史研究的作业框架。他认为，汉语的演变从上古到中古再到现代汉语方言是直线发展的，由周秦古音(《诗经》音系与谐声音系)演变为隋唐《切韵》音系，又从《切韵》音系中分化出现代汉语各个方言音系。徐通锵先生评论："高本汉用《切韵》这把'刀'把汉语史一切为二，认为现代的方言只能跟《切韵》联系，而与《切韵》以前的汉语无关。这就不能不与实际的语言现象发生冲突，而且也必然会影响高本汉对汉语史的研究。"①

在用高本汉模式对复杂的语言现象做简单化处理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了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那种"蛇吞青蛙的隆腹现象"或"橄榄形"扭曲。高本汉研究中的症结是错误地把《切韵》音系认定为单一音系。一方面，他认定《切韵》是隋唐长安音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代汉语的方言(除了闽语)，都是《切韵》音系的子语或后代。由此，这一观点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局面：如果《切韵》音系是隋唐长安音系，那么这个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现代各个方言的祖语；如果现代各个方言音系的祖语是《切韵》音系，那么《切韵》音系根本不可能是隋唐长安音系。一方面，以"单一音系性"的《切韵》为枢纽，从中古向上古溯源，《切韵》音系要比《诗经》音系(主要指韵目系统)复杂得多，由此形成了汉语语音系统从上古到中古的、由简到繁的膨胀型分化过程；另一方面，以"单一音系性"的《切韵》为枢纽，从中古向现代沿流，现代方言音系要比《切韵》音系简单得多，由《切韵》音系至现代方言，则出现了汉语语音系统从中古到现代的、由繁到简的收缩型合并过程。这种汉语音系历时演变的简—繁—简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状态，是完全不符合语言

①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页。

发展的实际状况和一般原理的。

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的失误主要有三个方面:1. 抽去了语言的横向空间差异,仅仅以一维的纵向时间差异来贯穿纷繁杂芜的语言演变。2. 以建立在印欧语语言事实基础之上的谱系树理论硬性框范中国语言,用语言分化论处理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3. 撇开汉语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了解汉人对汉语音韵的心理感受(我以为,高本汉的局限并不在于"他的小学根基远远不能与章太炎黄侃等人相比",而在于他不具备汉人的民族心理。语言的掌握有三个层面,表层是语言,中间是文化,底层是心理,高本汉还处在语言和文化之间)。由于囿于历史语言学"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只能产生同一音变"的封闭性系统原则,而不了解汉语语音演变的复杂性,这就导致高本汉在古音构拟中一味地追求"分";由于囿于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直线流变,而不了解汉语语音演变的错综性,这也导致高本汉在古音构拟中一味地追求"分";由于务必详细阐释上古汉语语音到"中古汉语语音"(《切韵》音系)的膨胀性发展,因此必然导致高本汉采取音素法而避开音位学。因此并非"高本汉虽然自觉地摆脱了清代小学的桎梏,但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语言学的樊笼",[①] 而是高本汉就是在用以印欧语言为材料提炼出来的"历史语言学"的眼光审视与印欧语言发展模式不同的中国语音史。

研究中国古音或重建汉语语音史的关键问题是《切韵》音系的性质。在高本汉以后,以《切韵》为依据构拟"长安方言"的兴趣,反映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唐代长安方音考》(1920)和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的《古汉语重建的贡献》(1928)中。与高本汉等人的"西

① 聂鸿音:《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

洋镜"中观《切韵》不同,中国学者传统的看法是:《切韵》是综合音系。

1.《切韵》作者陆法言说得很明白,"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

2. 隋唐学者的说法也很清楚:参与讨论《切韵》纲纪且多所决定的颜之推认为,"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商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长孙纳言说,"(《切韵》)酌古沿今";封演说,"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李涪《刊误》批评陆法言"采诸家纂述而为已有",讥刺《切韵》"吴音乖舛",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切韵》非一时一地之音。

3. 清代学者的说法一如既往。阎若璩以为,"洛阳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韵之正,天下惟金陵与洛下也。然金陵杂吴语,其音轻;洛下染北音,其音浊。当法言定韵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颜之推,南人也,当时参合南北而后定之,故韵非南音也";江永认为,"韵书流传至今者……陆法言之旧……皆杂合五方之音"。

4. 晚近学者章太炎以为,"《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黄侃以为,"乃包举周汉至陈隋之音";王国维说,"《陆韵》者,六朝之音也";陈寅恪说,"此复合体即以洛阳京畿之音为主,且综合诸家师授兼受纳各地方音而成者"。

诸家所言或重泛时"古今",或重异域"南北",或"古今"、"南北"兼而有之,而皆不认为《切韵》是单一性音系。

从史实来考察,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江南学子争仿"洛生咏",历宋、齐、梁、陈,形成了源于洛阳而在金陵得到发展的

文学语言系统。这一中古金—洛文学语言系统，从时间上纵贯古今（晋朝洛生咏为古，南朝金陵音为今），在地域上兼及南北（江东建康为南，中原洛阳为北）。到隋初统一，北留中原汉语和南迁中原汉语都发生重大变化，所谓“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陆氏父子与诸家相聚论韵，虽在隋都长安，然“折衷于金陵洛下”，即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韵部分合裁定；“剖析毫厘，分别黍粟”，即是“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反切用字推敲。十几年后，陆氏“屏居山野，交游阻隔，疑惑之所，质问无从”，“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

汉语中的“方言”与西方语言中的dialect不同。对某一方言语音进行共时的单一性描写，这是西方语言学的传统，也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特征之一；而在公元6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认为有必要对一个活的汉语方言做单一性的详细记录。首先，西方语音音素组合的继起性与屈折变化性导致了音素式分析方法的产生，方言之间的差别通过语词中的音素差别显示出来（比如古希腊有四种方言），因而较早形成了单一音系的概念。中国汉语语音音素组合的共起性与音节的附义性，决定了汉人对语音自然感知的音节性，导致了汉人把汉语方言的差别理解为词语的不同（西汉扬雄《方言》即是明证）。因此，尽管魏晋以降，反切蜂起，但是南北朝音义家在制作反切和编纂韵书时雅音和方音夹杂，因此“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并不存在现代语言学的这种单一音系观。与之相反，综合性是汉语音韵研究的人文传统之一，泛时异域性是汉语传统音系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其次，单一音系的描写与音素式分析方法和记音工具（音素式字母）密切相关。没有音素分析的工具方法，则无从准确分析音素；无从准确分析音素，则无从把握单一音系的范围；无从把握单一音系的范围，也就无从形成单一音系

观。汉语单一音系概念的形成是在以八思巴字母译写元代汉语的《蒙古字韵》之时。

主张《切韵》长安音系说的除了高本汉，还有马伯乐等。他们都不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历史背景或不了解东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别，不了解汉人对语音的自然感知或不了解屈折语和词根语对语音感知分析的差别，不了解汉语音韵研究的综合性传统或不了解汉语音韵学与西方语音学研究传统的差别，而以印欧语言文化和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透视《切韵》音系的性质，把中国历史上"长安论韵"的"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和《切韵》作者"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的"捃选精切，除削疏缓"的审音之举误以为在隋初的长安做方言调查。至于近现代一些中国语言学家附和单一音系说，则是受西方语言学影响所致。

高本汉"三点一线"式的直线型模式的表层是一维语言史观，而深层却是"文明一元扩散论"的文化史观。由于高本汉模式隐含着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满足了潜在的"汉族主义"情结，并且因为简单化而便于操作，与顾炎武古韵研究的"《唐韵正》沟通法"和钱大昕古声研究的"雅音归并模式"有相通之处，因此在西学东渐之际得到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并沿袭至今，但其不足之处也日渐显露。

虽然王力赞成罗常培"《切韵》的性质是一部兼综'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音汇"和陆志韦"《切韵》代表六朝的汉语的整个局面，不代表任何一个方言"的论断，同时肯定"《切韵》音系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①] 但他在《汉语语音史》中却完全抛开了《切韵》，仅根据历时顺序把汉语语音史分为不同时期。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在每一时期，大体上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根据他们的韵书、韵文或反切材料整理出各个时期的音系，然后比较异同，梳理出汉语语音的发展线索。虽然这一“历时音系连贯格式”取消了高本汉模式中的《切韵》枢纽地位，因而克服了汉语语音史的“橄榄形”，但并没有摆脱直线型理论模式的束缚。对汉语语音史的一维历时的简单化处理，不能够如实反映汉语语音演变的复杂状况。

由于抛开空间的差异而单纯追求时间的线索，《汉语语音史》仅把现代汉语方言作为汉语语音发展的归宿点，而没有把现代汉语方言也作为汉语语音研究的始发点，即从现代方言差异的比较中去探索历时语音的发展，对历史上“死”的文献材料做出“活”的解释。因而，“比起高本汉的研究，在书面文献资料的运用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在方言材料的运用方面却后退了一步”。[①]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除了现代方言的描写、阐述和利用，还有古代方言的考虑、鉴别、离析、描写和阐释。这种古代方言为“五方殊语”，包括诸夏语言和非诸夏语言。王力一方面认为，“汉语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另一方面却说，“在各种同时代的语音史料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在同时代的诗人用韵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曾经把《诗经》的十五国风分别研究过，没有发现方言痕迹”。[②] 因此，在王力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操作中间，实际上排除或否定了历史上的方言。

根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记寿余诱士会，可知当时的秦语和魏语不能够直接通话。根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记楚子傅于齐人，可知当时的楚语和齐语也不能够直接通话。而且，在周秦、两汉的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0页。
②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文献中，已经可以见到代表南方语言系统的楚语和淮南地域的方言材料。陈第以为，《诗经》“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韵其时之方音”。顾炎武虽然编撰了《诗本音》，但又认为《易经》用韵“或出于方音之不同”。戴震《声韵考·古音》说，“列国之音，各有正音，不可强齐也”。研究结论由理论预设和具体方法决定，如果《诗经·国风》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方言的区别，其原因要从预设和方法中去寻找。《诗经》音系的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是“韵脚系联法”，而韵脚系联法的前提就是主观上预设“《诗经》音系是没有方言差别的单一音系”。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韵脚系联的结果是音类，也许不同的方言区之间可能有相同的音类，但是不同音类的音值差异却被非音素性的汉字掩盖了；另一方面，一些已经发现的音类差别又被所谓“合韵”消解了。

虽然正如徐通锵先生所说，“王力在《汉语语音史》中提出的关于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他早年追随高本汉进行汉语音韵研究的一次自我否定”，“在汉语史分期、现代方言与《切韵》的关系以及汉语史研究的方法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王力与高本汉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①] 但是王力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没有跳出高本汉模式“点线一维”的窠臼。每一个时期只有一个音系并且前后相续承传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历时音系连贯格式”，仅仅是对高本汉模式的修补和扩展。

在20世纪上半叶，高本汉的中国古音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展开了中国古音的重建工作，促使汉语音韵学从传统进入了现代。毋庸置疑，高本汉模式曾使中国古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日益深入的研究中，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海外语言学家，已经觉察到高本汉传统的束缚，而新的理论模式已在质疑和反思中应运而生。

①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139页。

第三章　普林斯顿学派的方言逆推型理论模式

作为现代汉语音韵学奠基者的高本汉，自认为肯定无疑的中国古音研究成果，后来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广泛的修正，这使他感到意外和震惊。然而，无论是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陆志韦、董同和、周法高、李荣等的局部批评，还是西方学者马丁（Samurl Matin）的《中古汉语的音位》（1953）、蒲立本（E. A. Pulleyblank）的《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的彻底修正，都是针对高本汉中古或上古的构拟结论，尚未涉及高本汉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宏观理论模式。

第一节　中国语言学计划和普林斯顿学派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家们制订了一个"中国语言学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他们批评了高本汉的中国古音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面对日益增多的汉语方言学调查报

告，他们主张以现代汉语方言为研究古代汉语的基础，而不必一定要参考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证据。由此，这一计划被称为“普林斯顿假说”（Priceton Hypothesie），而参与这一研究的学者们，则被称为“普林斯顿学派”（Pricetonian）。

普林斯顿学派批评了高本汉所提出的简单而单一的汉语语音史发展体系，认为《切韵》音系以及由此上推得出的上古汉语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汉语的祖语，汉语的祖语应当依据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首先以现代汉语方言为基础，给每一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官话、原始客家话、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等等。然后再以这些原始方言为基础，尝试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这一全面的原始汉语，不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语言，而是带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原始汉语系统的某些特征，用传统音韵学方法是构拟不出来的，它仅保留在一些边远的方言群比如闽语之中。

这一学派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罗杰瑞（Jerry L. Norman）的《闽语声母的演变》（1971）、《闽语声调的发展》（1973）、《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原始闽语的韵母》（1981）、《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1986），耶鲁大学司徒修（Hugh M. Stimson）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乔治亚州立大学贝乐德（William L. 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余蔼芹（Anne Y. 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原始粤语前置辅音的两个特征》（1972），乔治城大学杨福绵的《现代汉语方言和原始汉语的前缀 * ke-》、《原始汉语的辅音前缀 * s-和 * sk-》

(1975),欧柯诺(Kevin A. O'Connor)的《原始客家话》(1976),等等。[①]

"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对于"普林斯顿假说"的理论模式,本文称之为"方言逆推型模式"。

第二节　罗杰瑞闽语研究的方法论

一、罗杰瑞的原始闽语声母研究

美国罗杰瑞是赵元任的学生,1969年获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学位,尤致力于闽语研究。在《闽语声母的演变》(*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1971)中,罗杰瑞对闽语中的"来"母字进行了研究。

首先,罗杰瑞排出"来"母字中现代各地闽语的声母:[②]

	卵	鳞	郎	两	聋	六
福州	louŋ	liŋ	louŋ	laŋ	løiŋ	løiʔ
隆都	—	lin	loŋ	laŋ	leŋ	lek
厦门	nŋ	lan	nŋ	nŋ	laŋ	lak
潮州	nŋ	laŋ	nŋ	no	laŋ	lak
建阳	snŋ	saiŋ	sɔŋ	sɔŋ	soŋ	so
建瓯	soŋ	saiŋ	soŋ	—	soŋ	—

① 以上材料主要依据殷方:《1965~1979年国外汉语音韵学研究述评》,《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转引自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原表中字音右上角所标调类代号兹处,姑略。

接着加以比较而分成三类:1. 福州和隆都的 l 类;2. 厦门和潮州的 l/n 类;3. 建阳和建瓯的 s 类。然后,依据这些不同种类的现代声母,构拟出一个原始闽语声母 * lh。原始闽语声母 * lh 演变成现代闽语有三种形式:1. * lh—l;2. * lh—n \ l;3. * lh—s。罗杰瑞依据这种比较构拟的方法,对现代各地闽语的声母逐个研究,从而构拟了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

二、对罗杰瑞方法论的批评

游汝杰在《汉语方言学导论》中讨论古代方言的拟测时,批评了罗杰瑞的原始闽语语音研究方法。首先,罗杰瑞的方法不参考任何古代文献,只是利用现代不同地点方言的材料,直接推论古代方言和构拟原始方言。游汝杰认为,汉语有大量丰富的古代文献,特别是《切韵》系韵书所代表的音系与现代方言的对应关系,不利用这些宝贵的文献是不明智的。

其次,这一研究方法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假定现代各地闽语是由一个统一的原始闽语演化而来的,然后才能够排比声母异同并归纳种类,构拟原始声母以追索演变轨迹。然而,这个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所谓"原始闽语、原始粤语、原始吴语"等"原始方言"的概念本身能否成立值得怀疑。这一概念假定古代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地点存在一个内部一致的原始闽语,后来使用原始闽语的人民在同一个时期四散移居到不同的地点,久而久之原始闽语分化成不同的支派。这个假说有悖于方言区移民的史实。第一批汉人入闽是在西汉末,移民只集中在冶县(今福州一带),大批汉人是三国时代从吴语区移居闽西北地区和沿海一带的。闽南方言于宋代传播到潮汕地区,于明初传播到海南地区。所以从移民史的背景来看,各地闽语并不是从形成于一时一地的"原始闽语"分化而来的。今闽语区最古老的汉语方言是汉末冶县的方言,但是其他地方方

言的出现不是当时冶县方言分化的结果。

再次，罗杰瑞利用现代方言材料构拟原始语言的另一个出发点是：现代方言中的所有语言形式都是从原始方言逐渐演变到现代的结果。游汝杰又对此做了批评，语言是历史的产物，不但各种现代方言是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成分累积的结果，而且任何一种方言内部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语言成分的累积。如果一视同仁对待各种材料，用于构拟原始方言，显然是不合理的。

语言的累积，与较晚产生的积压层处于较早产生的地质层之上的积压方式不同，不同时代的语言成分却可以并存在同一时间层面上，有些语言成分可能十分古老，有些语言成分可能晚近产生。分辨不同层次与确定不同时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所面对的障碍。划分语音的历史层次可能比较容易，但要确定层次产生的时代就并非轻而易举了，必须有一个参照系。除了与古代韵书的某个音系相似，或者有历史文献可以作为断代的工具，层次产生的时代难以确定。

三、闽语言文化的历史层次

邓晓华把闽语分为汉代、南朝和唐宋三个大的层次。[①] 反映汉代读音的证据，比如歌韵读音，白读 uai、ai 来源于闽语的原始形式，白读 ua 稍晚，文读 o 是最晚形式。反映南朝语音特点的证据，比如南朝鱼、虞分立，闽语中鱼的白读形式 y、u，虞的白读形式 u、uo、o。反映唐宋语音特点的证据，比如一二等分立、三四等合流等。

综合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福建文化层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阶段。在秦汉以前是"闽越土著文化"阶段。据考古发现，西周

① 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时代大陆的闽越族已经向台湾迁移,至今福建文化中还夹杂着土著越族的古老遗风。在秦汉以后是"中原汉文化和江南吴文化辐射"阶段。中原汉文化和江南吴文化对福建的影响是从北而南不断扩散的,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秦汉"中原文化"的入闽。秦立闽中郡,只是名义。西汉无诸为闽粤王,定都东冶。其后余善不受节制,汉廷入闽统治,在福州设置冶县,随"徙其民于江淮之间",但迁走的只有豪族,闽越族百姓仍住闽地。这些人的语言构成闽语的底层。由于采取的是"豪族北迁"而不是大批驻军的控制方式,因此中原语言文化对闽越土著语言的影响不会很大。

第二时期是三国"吴语文化"的入闽。孙吴崛起江东,多次用兵于闽,开疆拓土与军队驻防的范围在闽西北一带。通常认为这是第一批来到福建的"汉人",但他们不是中原汉人,而是说"古吴扬语"的"吴人"与"江淮人"(江淮在"永嘉之乱"前一直属于古吴语区)。吴人与江淮人所说的吴扬语与闽越语同源。

第三时期是东晋"中原文化"的入闽。"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使福建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带来了当时中原一带的口语,也就是一般人常说的"十五音系统"。他们以聚族而居为主,扩散到闽东、闽中和闽西一带。据说"晋江"是"以晋南渡衣冠避难者,都沿江而居故名"。

第四时期是南朝"吴语文化"的入闽。丁邦新在《吴语中的闽语成分》① (1988)中依据浙江西南角吴语底层的白话音具有闽语的成分(端、知不分的现象),提出"为什么吴语方言会有闽语的底层",反推南北朝时的吴语可能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原来的

①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吴语则经由移民到福建，慢慢成为今天的闽语”。游汝杰认为，“最古老的吴语特征则保留在今天的闽语中，或者说闽语的底子是古吴语”。[①]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南北朝时的吴语可能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但是由于中原语言的南迁，迫使部分江南居民南迁到福建一带，南朝吴语渗透进当时闽语当是史实。上面已经提出吴扬语与闽越语同源，因此“端、知不分的现象”，是吴语南迁还是底层同源必须加以探究，否则难以断言。

第五时期是唐代“中原文化”的人闽。高宗派兵镇压“蛮僚”，河南光州人陈元光、陈政父子率领 5 600 名府兵入闽。陈政说云霄江“此水像上党的清漳”，漳江由此得名，新建州县称之为“漳州”。闽西南的漳汀地区成为“民僚杂处”之地。

第六时期是唐末到五代“中原文化”的入闽。河南光州入王潮兄弟率领的数十万农民军人闽建立“闽国”。

由此可见，闽语是一个包含底层来源、时间层次、地域先后、文白异读等方面差异的异质系统。唐宋时期，闽语已经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语言为人注意。“福佬”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中。宋代文献中出现“闽语难晓”，《集韵》中收录了“闽人呼儿曰囝”等。

闽语可以分为七个历史层次。

① 《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9 页。

年 代	文化层	地 区	语言层	语言演变
秦汉以前	古代闽越文化	土著分布在此	古闽越语	语言底层
西汉	西汉中原文化	少量汉人官吏与军队到达闽北	前2世纪中原汉语	第一次汉语化
三国	东吴江南文化	吴人迁居于闽北	2世纪吴扬语	第一次吴语化
两晋	两晋中原文化	汉人扩展到闽东、闽中和闽西一带	4世纪中原汉语	第二次汉语化
南朝	南朝江南文化	南朝江南居民(江浙)南迁入闽	5—6世纪江南吴语	第二次吴语化
唐代	唐代中原文化	汉人(河南人)扩展到闽西南的漳汀	7世纪中原汉语	第三次汉语化
五代	五代中原文化	汉人(河南人)建立闽国	10世纪中原汉语	第四次汉语化

现代闽语方言的来源有:1. 原始土著闽越语底层;2. 江南古吴语;3. 中原古汉语;4. 畲族居民的语言(至迟在7世纪,闽粤赣边界地带已有大量的畲族居民)。

除了来源的复杂性,还有历史层次性,因此闽语的文白异读非常复杂。对于这一根本性的语言现象,罗杰瑞在研究中却忽略不计了。就文白异读而言,白读系统不是一个历史平面上的产物,而是一个具有每一次闽语分离时各个历史时代语音特点的分层结构。新的白读形式进入闽语,原来历史上留下来的白读形式就成为老白读,这样就可以解释闽语同一中古韵母的白读形式音值差别较大的现象。如支韵白读有 ia、ie、ai 等不同形式,就是因为不同时代的缘故。同样,文读系统也不是完全属于一个平面,如闽语支韵就有 i、-i、o 等不同形式。不同的文白系统可能并存,可能覆盖,可能渗透。以上这些都使作为分化源头的单一的"原始闽语"

化为乌有。

从逻辑上讲，构拟古老的闽语，似乎应当根据中原汉文化和江南吴文化对福建影响是从北而南不断扩散的历史轨迹反推。首先根据闽西南的漳汀方言，构拟出"唐宋闽语"；接着依据闽东、闽中和闽西方言，构拟出"唐宋闽语"，构拟出"南朝闽语"和"东晋闽语"；然后依据闽北方言和"南朝闽语"、"东晋闽语"，构拟出"东吴闽语"。在构拟的同时，如果能够分析土著闽越语对闽语形成的层累性影响，分离出土著闽越语的底层，便可以尝试进一步上推"土著闽越族语言"。既然现代各地闽语方言并非是中原汉语的一次性迁闽以后的历史分化，那么就不可能找出现代闽语方言的"原始闽语"。如果依据语言推移扩散论，"闽语"则是江南古代吴语(源于古吴越语言的古吴语)和中原古代汉语对福建土著闽越语层累性同化的结果。所谓"原始闽语"至少有四套：三国东吴闽语、东晋闽语、南朝闽语和唐宋闽语，每套还可能有两个或多个历史来源语。

第三节　方言逆推模式中的若干问题

显而易见，以现代汉语方言为基础构拟早期汉语的逆向推溯思路，是对一味依赖文献，仅将现代汉语方言作为音值构拟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然而应当指出，高本汉自己很早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周法高的《怎样研究中国语音史》[①] 也曾有此见解："过去的拟测，大部分仍是根据文献上的材料，现代方言只是用来帮助音值的考订，并没有能充分使用比较的方法。照说

① 香港《中国语文研究》，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

应该根据现代各系的方言、各个的拟测出较早的阶段(如早期官话、早期吴语、早期闽语、早期粤语等),再进一步拟测出它们的共同母语,这才是比较方法的正当途径。"① 一些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是不谋而合的。

对于这一理论模式,有一些学者表示赞同,如严学窘等;② 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理论模式表示怀疑,甚至做了较为严厉的批评。除了上文提到的游汝杰,李方桂则认为,"周代无疑存在方言,有些差别还能看出来,但要系统地构拟上古方言,证据还太少。比如说,根据现代方言材料,构拟原始闽方言是可能的,但由于缺乏早期的文献根据,构拟会不着边际"。③张琨则批评道:"运用现代的方言材料研究汉语史一定要参照《切韵》,但是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切韵》。完全抛开《切韵》是不对的。罗杰瑞写了一篇原始闽语的韵母系统的文章,完全不管《切韵》,忽略闽语中的文白异读。这是不对的。重建原始方言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汉语史,为了充分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丰富材料,同历史上留下来的可以参考的书面文献结合起来,使汉语史的研究建立在更扎实、更科学的基础上。如果完全不管文献材料,完全不管《切韵》,那建立起来的各个原始语言如原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粤语等等,相互之间风马牛不相及,那怎么能进一步弄清汉语的历史发展呢? 所以,完全抛开《切韵》,一定会把汉语的历史搞乱,甚至会得出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历史上不同源的荒诞结论。"④

---

① 转引自殷方:《1965—1979 年国外汉语音韵学研究述评》,《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6 页。

② 参见白丁整理:《严学窘先生谈汉语史研究》,《语言学通讯》1985 年第 3 期。

③ *Archaic Chinese*,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9, No.3, 1977.

④ 徐通锵:《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1984 年第 13 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47 页。

普林斯顿学派的方言逆推型模式,牵涉到如下一些理论问题:

1. 方言区内部的差异性与可比性

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可以划分为北方话(不包括晋语和江淮语)、晋语、江淮语、吴语、徽语、赣语(北部赣语和南部赣语)、湘语(新湘语和老湘语)、闽语、客家语、粤语、平话(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十一个方言区。各大方言区内部的方言或土语群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平衡的,因而它们的差异度也就不同,有些方言的差异度较小,有些方言差异度较大。差异度较小的可比性偏低,差异度较大的可比性偏高。相对而言,北方话分布区域广泛且内部语音系统较为一致,因差异度较小则可比性偏低,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与现代方言的音系差别不会很大。闽语分布区域较小且内部语音系统分歧严重,有"十里不同音"之称,因差异度较大则可比性偏高,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与现代闽语的音系差别较大。可以认为,方言内部的差异度与可比性成反比,而可比性又与构拟结果的"复原度"成正比。

2. 方言区内部的差异性与层次性

各大方言区内部的次方言或土语群之间,因其形成时间有先后而可能出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从时空观照的立场出发,方言区内部的地域差异也同时反映着这一大方言的时间差异。由此在构拟这一方言的早期语言时,将这些具有不同历史层次的方言材料不加区别地放置在同一平面上"一锅煮"是不适宜的。应当采取分层构拟的方式,即将这些方言材料分层处理,构拟出时间上由今及古的相互连续的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套音系。

3. 方言存古度与构拟的年代性

依据某一现代汉语方言直接构拟出来的某一早期语言,约当于汉语发展史上的什么时期的语言?如果抛开文献记录,仅仅依

靠活方言，则构拟音系的年代无从确定。如果以传统的中古音系即《切韵》音系为参照物，各个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因而构拟出来的各个方言的早期音系并不处于同一历史层面上。关于南方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认为，吴语、湘语是第一层次，粤语是第二层次，闽语是第三层次，客赣语是第四层次。游汝杰的《汉语方言学导论》认为，汉语南方方言吴语、湘语、粤语、赣语、平话的直接源头是古代北方汉语，闽语和徽语是从吴语分化出来的，客家方言是从赣语分化出来的。这是依据"语言分化论"对汉语方言形成所做的一种假定。有证据表明，南方语言原来是"非汉"语言，由于秦汉以来与汉人南迁和汉文化扩展相一致的对周边语言的"汉语化"，才在原居语言和南迁汉语的融合过程中形成南方汉语方言，因而这些南方方言中都可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原居语言的"非汉"底层残存成分。游汝杰所考先秦时代差异最显著的夏、楚、越、齐的地域方言，因为源于不同的考古文化，所以使用于不同的国家。根据《越人歌》等可以推定，这些语言应当就是不同的语种。至于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些语言是不同的语种，除了受欧洲一语分化的谱系树模式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其潜意识中存在着缺少历史眼光的"泛华夏主义"和"汉语文化中心论"。抛开这些非汉语言底层的孑遗，由于古代汉语扩展时期的不同或"汉语化"程度的不同，闽语、粤语、吴语、湘语、徽语、赣语、客家语、平话、江淮语、晋语以及北方话各自的存古度并不相同，大体上呈递减状态。如果以现代闽语方言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那么它可能约当于中古汉语；如果以现代粤语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那么它可能约当于唐宋汉语；如果以现代江淮语为基础构拟早期

[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语言，那么它可能约当于元明汉语；如果以现代北方话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那么它可能约当于明清汉语。可见，依据现代各个方言材料构拟出来的各个早期语言，并不处于同一语言史的平面上，由此再上推原始汉语存在着重重障碍。

4. 南北语言的异源性和原始华夏语的异质性

张书铎在《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看汉藏语系的形成》[①]中指出，考察一个原始"母语"存在与否，应该同时考察与之相应的原始"母文化"的存在与否以及母语如何伴随母文化扩散传播。根据近三十年来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目前"汉藏语系"所覆盖的地域范围之内，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种共同原始母文化的这一设想是不切实际的，而原始母文化的不存在表明原始母语的存在完全是虚幻的。人类体质学类型的差异也支持这一结论。

原始华夏语是历史混合语，南北语言不是简单的一语分化，汉语的南方方言是秦汉以后华夏文明与语言对周边文明与语言逐步扩散且同化程度各别的结果；与之同时，华夏汉语也因受到周边语言的侵染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纵观华夏汉民族语言文化史，远古时期，"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颜氏家训·音辞篇》)；三代时期，"中国夷蛮戎狄，皆有所安居……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序》)；西汉扬雄《方言》中收录了朝鲜等语词；东汉依然是"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王充《论衡》)。上古时期，"方"与"邦"音义相通，所谓"方言"即"邦国之言"。"方言"即不同

① 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的语种，相互之间不仅存在语音系统的差别，而且存在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差别。因而，《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的旨趣表现为“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即“古代语词和别国语言”)的词语网罗，而“转语”所反映的就是不同方言之间相互借词引起的个别性或非系列性接触音变。

普林斯顿学派企图以现代汉语方言为基础逆推原始汉语，虽然使用的材料及操作方法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是立论的语言史观即“汉语一元分化论”还是与高本汉如出一辙。与直线型一样，逆推型不可能摆脱欧洲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框架——谱系树理论，因此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现代汉语方言材料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本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全然抛开历史文献材料，将拥有丰富的文献材料的汉语的演变发展与没有文献材料的语言的演变发展等而同之，不仅不能够恰当地重建历史汉语，而且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高本汉的中古古音研究，在采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的同时，除了依靠《切韵》音系，还继承了清代古音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说高本汉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处理中国文献语音系统，那么普林斯顿学派则企图进一步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全盘处理现代汉语方言系统。两者的一致性在于：将在印欧语土壤上形成的语言谱系树理论作为适用于人类语言演化的普遍真理。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认为，印欧语诸语言属于同一语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如何证明。一方面，印欧语的语音结构和形态变化方面的特征，为比较法的成功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印欧语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古老材料，只要利用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和赫梯语这些公元前的文献语言材料就可以证明或验证印欧语系，并不需要先调

查各种现代语言或方言，然后再一步一步追溯祖语的比较构拟研究。如果从现代法语、俄语出发，印欧语系的假说是否成立，历史比较语言学自身是否能够成立，就非常值得怀疑。桥本万太郎曾经分别选取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 3 000 个基本词汇来构拟祖语，其结果"不要说拉丁语，就是俗拉丁语也构拟不出来"。[①] 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现代语言的存古度制约着构拟的复原度，与复原度相关的是构拟的可信度；如果是一语分化的方言，以之为基础而构拟的祖语尚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如果是逐步推移同化或混合形成的方言，以之为基础而构拟的祖语则令人疑虑重重，除非首先离析出方言中的异质因素。桥本万太郎打了一个比方：现代印度英语已经成为道地的英语方言，但是其中掺入了固有的印度语音系统。"假如后世有人不知道其中的经纬，用伦敦英语和印度英语来构拟英语祖语的话，我们怎样严肃地对待这个构拟的试图呢？"[②]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可供研究的、不止一种以上的古老的音素式文献资料，如果无法离析语言的异质性，如果无法认定"语言的等质原始共同体"，对华夏汉语祖语的构拟大概只能是"语言的神话"。

在汉语语言史研究和历史方言学研究中，方言逆推模式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必须进一步加以改进。首先，必须抛弃谱系树模式，抛弃一语分化的观念，抛弃单一原始祖语的设想，树立语言推移和语言混合的观念。其次，必须认真对待语言的历史层次性，根据有可能源于不同时代古语的现代方言材料，分层构拟不同历史阶段的古老方言形式。再次，必须认识到原始汉语来源的复杂性，

①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 页。
② 《语言地理类型学》，第 202 页。

认识到汉语方言形成的错综性。总之，中国境内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远古居民集体迁往无人区以及在居住地封闭性独立发展的结果，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必须以“语区”的宏观概念取代“语系”的宏观概念。

第四章 张琨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

高本汉模式和普林斯顿模式，都是“西洋镜”里看汉语史，难免游离于中国语言文化史背景之外。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美籍华人学者张琨，作为在苗瑶语、梵语、藏语和汉语方言学研究方面都具有显著成就的专家，揭示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存在着比时间差别更大的区域差别。张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与张蓓蒂合作，1972）、《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4）、《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1975）和《〈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等。张琨的学生张贤豹（即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张光宇）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将这些论文翻译成中文，合编为《汉语音韵史论文集》[①]（以下简称《论文集》，引文所注页码即该论文集页码）。

张琨以中国人的眼光，在汉语史研究中强调南北方言的差异，

①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注意到必须结合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转移来考察汉人文学语言基础的变异，以时空二维框架来研究汉语语音史，从而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式。这一我称之为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由三部分构成：1. 文献语料鉴定（主要是对《诗经》音系、谐声音系，特别是《切韵》音系性质的确定）；2. 二维语言史观；3. 投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文献语料的鉴定与《切韵》的性质

一、《诗经》音系和谐声音系北方方言标准语说

张琨认为，《诗经》音系是以“口说”的活语言为基础的、流行于黄河中游的周代雅言音系。虽然它有若干不同来源的痕迹，但“大体上呈现一个内部一致的音韵系统”（第85页）。可以假定这些材料多少是内部一致的，同时也代表着周代黄河中游盆地的读音。虽然《诗经》诸篇的来源不同，但它们在周代已经成为读书人的共同财产，常在宴享之际吟咏，这意味着读音的标准化。《诗经》与《楚辞》的押韵习惯有着显著的不同，“《诗经》只代表北方方言的语音系统，它未必是现代各个方言的老祖宗”。[①]

对清代古音学《诗经》韵部的研究成果，张琨予以认同。张琨的《诗经》韵部35部系统构拟（第164页）如下：

① 徐通锵整理：《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0~241页。

韵腹＼韵尾		舌根韵尾			舌尖韵尾			唇音韵尾			r韵尾
		－g	－k	－ŋ	－d	－t	－n	－b	－p	－m	－r
展唇	－i－	支 ig	锡 ik	耕 iŋ	脂 id	质 it	真 in				ir
	－ə－	之 əg	职 ək	蒸 əŋ	微 əd	物 ət	文 ən	内 əb	缉 əp	侵 əm	ər
	－a－ －ɑ－	鱼 ɑg	铎 ɑk	阳 ɑŋ	祭 ad ɑd	月 at ɑt	元 an ɑn	盖 ab ɑb	叶 ap ɑp	谈 am ɑm	歌 ɑ
圆唇	－au－ －ɑu－	宵 aug ɑug	药 auk								
	－uə－ －əu－	幽 uəg əug	觉 uək əuk	冬 uəŋ əuŋ							
	－u－	侯 ug	屋 uk	东 uŋ							

说明：＊－a－/＊－ɑ－和＊au－＊/－ɑu－只在三等－j－介音后头构成对立状态。李按：原表没有采用汉字韵目。

在这一上古汉语系统中，除了开音节＊a/ɑ，其余音节结构都是闭音节。张琨认为，如果要把系统拟定得较为均衡，就必须使开音节至少和闭音节一样多。虽然这样看起来似乎“自然”一点，但是文献证据却不容许这样构拟。只是到了汉代，汉语的开音节才增多了。可是就原始汉语和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来说，如果有很多的开音节，就无法解释许多表面上似乎是开音节，实际上跟－t、－k尾的字声符相同、互相押韵或互为异文的一系列现象。

高本汉是上古汉语音节结构闭音节派的首创人，王力持反对意见。虽然陈复华、何九盈断言“没有开音节的语言是不可思议的

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在世界上找不到，就是在历史上也不可能存在过”，[①] 然而蒲立本和李方桂却分别发现古 Mon 语和邵语中没有开音节。虽然雅可布森(R. Jakobson)说过，如果拟测出来的原始语与现在类型学研究所发现的通则有矛盾，那就应该怀疑所拟测的原始语的正确性，但是这一论述并不正确。对所谓“语言类型学所发现的通则”只能相对参考，不能够作为绝对标准，因为“语言类型学的通则”是“不完全归纳”的产物。因此上古汉语开音节和闭音节的多少，无所谓“自然”与否，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只能依据文献证据构拟。

在张琨这一系统中间有好些“空档”。比如空档 * auŋ，可能很早就变成了 * ɑŋ。还有舌尖韵尾、唇音韵尾不与圆唇元音一起出现。这些不平行的空档是原始汉语系统构拟的线索。历史语言学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原则是尽可能把空档填满，当然必须要有证据。除了依靠《诗经》音系的空档，构拟原始汉语音系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分析谐声字。张琨认为，声符不代表边区方言，谐声音系是当时的标准语音系。要使大家都能接受，声符必须以当时的标准语为依据，谐声字不大可能反映《诗经》后的方言。此外，苗瑶、藏缅等语言的原始形式，也可以作为构拟原始汉语的参考。

二、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争鸣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关键是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切韵》音系的利用。

在改进高本汉中古音构拟的同时，学者们对探讨《切韵》语言文化背景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探讨最初发轫于 1928 年广东中

① 《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6 页。

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切韵》讨论专刊，内容有丁山的《陆法言传略》和《〈切韵序〉校释》、董作宾的《〈切韵〉年表》。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切韵》音系的根本性质。从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讨论《切韵》音系的首推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1949)。一方面，陈寅恪否定了高本汉和马伯乐的《切韵》"长安音系说"。被认为代表长安或其他西北方言的7～10世纪的文献语音材料一致显示，7世纪或稍晚的长安音系比《切韵》音系简单得多。罗常培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所据方音考》(1931)指出，"鱼"、"虞"分部是当时太湖周围的吴音。另一方面，陈寅恪在否定"长安音系说"的同时却提出了"洛阳音系说"。他认为，《切韵》音系是源于东汉的传统读书音，金陵居民来自洛阳，官吏和文人讲的就是东晋南渡以前的洛阳旧音，但是这一传统"复合体即以洛阳京畿之音为主，且综合诸家师授，兼受纳各地方音而成音"。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切韵》音系性质的探讨掀起高潮。讨论的第一阶段，有黄淬伯的《论〈切韵〉的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1956)、李于平的《陆法言的〈切韵〉》(1957)和黄淬伯的《〈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讨论的第二阶段，有王显的《〈切韵〉的命名和〈切韵〉性质》(1961)、邵荣芬的《〈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何九盈的《〈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黄淬伯的《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1962)和赵振铎的《从〈切韵序〉论〈切韵〉》(1962)；讨论的第三阶段，是周祖谟的《〈切韵〉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3)。

陈寅恪的"洛阳复合体旧音说"，出于史学家的考据而非语言学家的研究。与之有别，王显等人在批判高本汉单一方言音系说的同时，主张《切韵》所依据的是洛阳口语，是一个以"活语言"为基础而兼采古音和方音的系统。但是黄淬伯、何九盈认为，《切韵》不

是为洛阳方言而做，而是集前人韵书之大成，进一步阐发传统的“综合音系说”。关于《切韵》的“杂凑性”，何九盈做了解释：“杂”是“杂糅古今”，“凑”是“拼凑南北”，也就是陆法言所说的“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韵书分韵的“杂凑性”与韵书音系的系统性不可以混为一谈。周祖谟则认为，《切韵》音系的基础是6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审音方面的细微分别主要根据南方承用的韵书；王显等人所谓的“洛阳音”，由于文献不足，空谈无益。依据西晋时代的语音并不与《切韵》相同，陈寅恪所言《切韵》音就是东晋南渡以前的洛阳旧音与历史事实不合。《切韵》音系不是单纯以某一地区行用的方言为准，而是根据南方士大夫所承用的雅言、书音，折中南北异同而确定的6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换而言之，《切韵》音系是以金陵音系为基础并折中南北的雅言音系。此外，葛毅卿一直在撰写《隋唐音研究》，但在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全面批评高本汉研究方法的同时，却承袭了高本汉的“长安音系说”。

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集中表现为四个分歧或对立：

第一个对立是“单一音系论”和“综合音系论”（非一时一地音系论）。单一音系论的典型代表就是“方言音系论”（长安音系说）。综合音系论可以分为“南北组合说”（“古今南北杂凑说”与之实同）和“南北通用雅言说”。在这两者之间是“非纯粹单一音系说”，或称之为“有限综合论”（兼采部分古音方言），包括“洛阳复合体旧音论”和“洛阳活语言音系基础说”，总体上倾向于单一音系论。

第二个对立是“口语音系论”和“书音音系论”。高本汉的长安音系说与王显的洛阳音系说主张是当时口语，复合体旧音论主张是传统书音。

第三个对立是“方言音系论”与“雅言音系论”。长安音系说主张是方言音系，南北通用雅音说主张是雅言音系。

第四个对立是“洛阳音系为主论”和“金陵音系为主论”。有限综合论主张以洛阳音系为主，通用雅音说主张以金陵音系为主。

<table>
<tr><td rowspan="5">《切韵》音系性质</td><td colspan="2">单一音系论</td><td>长安方言音系说
高本汉、马伯乐、周法高、葛毅卿等</td></tr>
<tr><td rowspan="2">有限综合说（非纯粹单一音系说）</td><td>传统读书音复合体说</td><td>金陵士族洛阳旧音说　陈寅恪等</td></tr>
<tr><td>洛阳活语音基础说</td><td>洛阳音为基础，兼采部分古音方言
王显、邵荣芬等</td></tr>
<tr><td rowspan="2">综合音系论</td><td>南北组合说</td><td>金陵洛下组合，综合六朝韵书或以雅言为基础又折中南北
黄淬伯、何九盈等</td></tr>
<tr><td>通用雅音说</td><td>以金陵音系为基础，折中南北的雅言音系　周祖谟等</td></tr>
</table>

对于这个“高本汉惹出来的”（陆志韦语）麻烦，只要不盲目相信欧洲历史语言学理论，认真读一读《切韵序》和《音辞篇》就可以解决了。关于《切韵》的综合性，陆法言的“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我辈数人，定则定矣”、“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定为《切韵》五卷”（《切韵序》）已经非常明确。关于《切韵》的审音标准和主要基础音系，颜之推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商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音辞篇》），“金陵”在前而“洛下”在后也已经一目了然。因此可以认为，《切韵》具有综合性、书音性、雅言性，所记载的是以金陵音系（冠冕君子）为基础，参对汴洛语音（北方朝野）加以折中的文学语言的标准语音系统。

三、综合金陵、洛下语音的《切韵》音系为当时标准语系统说

张琨认为，《诗经》韵部30个左右，两汉27部，三国33部，魏

晋39部，而对单一的自然语言来说，《切韵》音系的韵部未免过于庞杂。如果依据重纽二分的做法，《切韵》韵母有160个，其中舒声韵母104个，入声韵母56个。关于《切韵》音系韵部的庞杂性，以前争论过。有人认为，临川话有263个韵母，潮州话有303个韵母，广州话有360个韵母，怎能说汉语从来不可能有《切韵》那样复杂的音系呢？黄淬伯认为，"其实这一'抗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假如舍去声调因素，只谈韵母，究竟是《切韵》多呢，还是这三处方言多？连汤带水，渲染《切韵》多韵母是具体方言音系的论点，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①] 由此可见，音系的简单性和复杂性应当就声母系统、介音系统、元音系统、韵尾系统、声调系统几方面逐一比较，其中元音系统是最主要的。对于《切韵》来说，元音系统未免太复杂了。所构拟的一些音值，在单一方言的自然语言中根本无法区别，这些相近的音素在一个具体的方言音位系统中往往只能是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张琨认为，这些在齐梁时期南方文学运动下多出来的韵部表明，《切韵》除了具有北方方言成分，更多具有南方方言成分，这是了解《切韵》编撰背景及其系统庞大原因的一个关键。

张琨指出，对某一个方言进行平面的描写，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工作，在第5、6世纪，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对一个活的方言作忠实详尽的描写。武后时代的张戬和玄宗年间的元廷坚、武玄之，曾经编过几部以长安方言为根据的字书，这几部书常被慧琳引来驳斥《切韵》的音读。可惜，他们依据的方言范围太狭，不能够取代广受欢迎的《切韵》而终于亡佚。可见，隋唐文人所欢迎的是具有综合性质的存古性的书音系统的韵书，而不是仅仅记录某一方言的韵书。

① 《〈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4期。

《切韵》出而南北朝韵书皆亡，其原因就在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以已有的这些讨论为基点，张琨进一步重申《切韵》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第9页），也就是说《切韵》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综合性质。

张琨对《切韵》的性质、编撰的目的、依据和原则的认定归纳如下：

1.《切韵》是一个综合音系

《切韵》是一个综合体。（第16页）

对于单一的自然方言来说，《切韵》未免过于复杂。（第9页）

《切韵》所分的韵类不完全跟洛阳的旧传统相同。（第10页）

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把这种读书音和金陵官人的语音等同起来。（第11页）

《切韵》也许并不是就几部韵书所有的分别杂乱拼凑而成；倒极可能是那些学者努力把他们理想中的标准语可能的分别做成系统的内容，所根据的就是那三个主要城市（洛阳、邺、金陵）的方言，这些方言在隋统一以前比长安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方言更占优势。（第31页）

2.《切韵》音系是文人的工具

"洛生咏"，恐怕跟汉朝有关系，那时候人们在念古书、念

经书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口授的传统。[1]

当时的读书人，有一种普受采纳的标准用语，它不同于一时一地的任何一个实际的活方言。(第31页)

《切韵》所代表和培育的读书音曾是文人的工具。(第16页)

《切韵》不是一种“说”的语言，而是一种“看”的语言。[2]

3.《切韵》是为了重建标准音

隋统一以后，为了重建标准音读，乃采纳主要城市金陵、邺与洛阳诸方言的区别编成《切韵》一书。(第32页)

《玉篇》和《切韵》的目标同样都是为了保存新的标准的读书音——源于北方，而在南方得到发展和修饰。北方的传统就是晋都洛阳皇室的书生吟咏古典的读书音。他们为了吟咏古典必定用一种读书音，而不是洛阳平民的白话音。(第15页)

4.《切韵》的依据是早期反切

显然，陆法言独力负此巨任不免大量依赖早期韵书的反切。(第15页)

5. 分韵的原则是从分不从合

如果一本韵书分两韵，另一本韵书合为一韵，《切韵》从分不从合。(第11页)

《切韵序》曰“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彦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这就是

①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41页。
②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39页。

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长安论韵”。根据研究，聚会的缘起是“开皇二年(590 年)……又召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隋书·音乐志》)，卢武阳卒于开皇二年年底。“长安论韵”的时间只能在这一年——公元 590 年。[①] 同诣陆门聚会的学者没有一个人说长安本地话，颜之推、萧该、刘臻来自江南，说金陵冠冕语音；陆氏父子和其余的五位皆来自汴洛地区的邺(今河南临漳)，说的是属于洛阳语音的中原话。“萧、颜多所决定”，《切韵》的审音标准“独金陵与洛下”，可见生长于江南、操金陵文士口音的萧、颜，处于审音权威的地位。

《切韵序》中提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李季节与杜台卿的五部韵书。吕静晋代任城(山东曲阜)人；夏侯该齐梁人，曾在金陵做官；阳休之、李季节与杜台卿是邺城官吏。对于李季节，颜之推的批评是“时有错失”；对于阳休之，颜之推的批评是“殊为疏野”。五本书中，吕静的《韵集》和夏侯该的《韵略》分韵最细。《切韵》“取诸家音韵”，吕静《韵集》和夏侯该《韵略》居于主要地位。《切韵》分部取于《韵集》27 例，如对“仙:先”、“薛:屑”、“笑:啸”、“昔:锡”、“祭:霁”的区分。吕静是惟一对下列诸韵“台、海、代”与“灰、贿、队”，“元”与“魂、痕”，“阮”与“混、很”，“月”与“没”加以划分的人。这些分类多与魏晋时代的押韵习惯一致。《切韵》分部取于《韵略》34 例，夏侯该的特色是“元、魂、痕”为一类，而分“山:删”、“耿:梗”、“咸:衔”、“真:文”等等，这些分韵也正是齐梁陈押韵的特色。

依据早于《切韵》50 年成书的南方学者顾野王的《玉篇》和晚

① 吕朋林:《〈切韵〉议纲年份考辩》,《语言研究》1996 年增刊。吕文“卢武阳卒于开皇二年年底,按阳历为 583 年初”,误,应为“591 年初”。

于《切韵》50年成书的长安释子玄应的《一切经音义》的韵类系统，以及479—589年的诗歌押韵系统与《切韵》韵类系统的密切相似性，可以推断：当时的读书人有一种普遍认可的标准语音系，它不同于一时一地的任何一个实际的活方言。《切韵》的目标就是保存这一新的标准读书音。魏晋南北朝以降，“五胡乱华”，中国分裂，成为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颜之推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就是说南迁中原汉语吴越化和北留中原汉语夷虏化(阿尔泰化)。魏晋中原的“洛生咏”盖可以追溯至汉代经师的口耳相授的读音传统。吕静的《韵集》代表了早期北方中原汉语这一文学语言传统。“永嘉之乱”后，传统的吟咏标准音被带到了江南。南方语音对这个传统标准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源于北方中原，而在江南得到演变的金陵读书音，故“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夏侯该的《韵略》音系反映了较晚南迁中原汉语的读书音。“长安论韵”的旨趣不是想提供一个活的方言语音系统，而在于“赏知音”。为“捃选精切，除削疏缓”乃以金陵文士语音为主，兼采洛阳与邺城诸方言，从分不从合，重新审定了当时的文学标准语音系，因此《切韵》语音系统比单一的自然系统要复杂庞大。

与王力《汉语语音史》的中古韵部研究和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试拟》[①] 的结论相比较，可以看出《切韵》韵部系统与前后时期用韵系统存在巨大差别。

① 载《齐鲁学刊》1993年第3期。

韵系 / 时期	阴	阳	入	部数
《切韵》	26	32	32	90
《广韵》	26	34	33	93
王力:魏晋南北朝	12	15	15	42
王力:隋—中唐	14	18	18	50
王力:晚唐—五代	13	14	13	40
王力:宋代	10	12	10	32
居思信:中古	9	13	9	31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切韵》的韵部数量,几乎是依据当时文人实际用韵归纳出来的中古某一时期韵部数量的两倍。特别是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韵部系统与《切韵》韵部系统的比较,完全可以证明《切韵》音系的南北综合性。由于南北汉语发展的不平衡性,语音的南北兼顾就意味着音系的古今沟通。《切韵》之增广者,又结合唐宋时期的一些语音特征分之愈细。隋代的《切韵》及其承袭而来的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和《集韵》,所表现的都不是单一自然音系,并且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官方韵书音系的综合性传统。直到辽金时代"私韵"兴起,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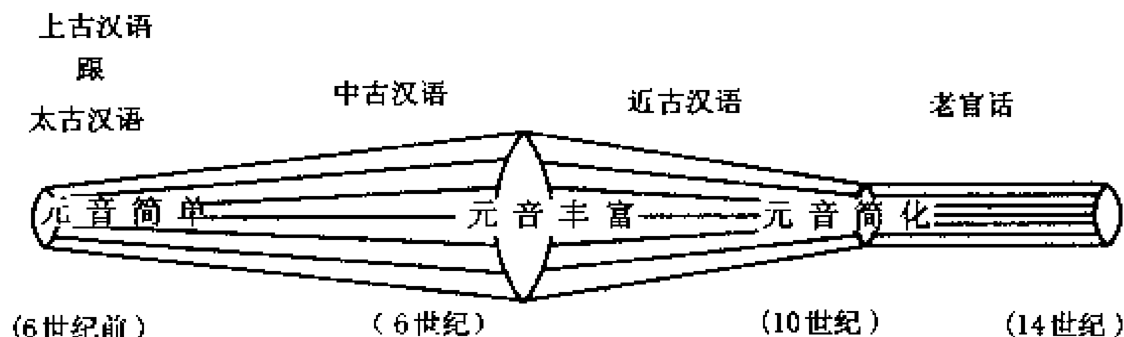
张琨指出,《切韵》音系中的许多来自当时南方语言的色彩,在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仍然有所反映:1.《切韵》的四声八调系统,仍旧保存在潮州、温州和粤语方言里。2.《切韵》的辅音韵尾 -p、-m、-t、-n、-k、-ŋ,仍旧完整保存在潮州、厦门、粤语和梅县方言里。3.《切韵》三等韵与四等韵的区别,金华的吴语和义乌话的舌尖声母字保存着"盐:添"与"仙:先"的分别。4.《切韵》舌根与舌尖韵尾前的元音的展唇与圆唇的对立现象,福州方言依然保存这种对立。5.《切韵》区分的"鱼:虞"两类。早在3世纪的北方汉语

中间已经消失，而在南方的金陵一带，从3世纪到6世纪的诗人用韵却有此分别，现代闽语中仍然保留了这一区分特征。最后两种现象，彻底驳倒了高本汉一再主张的观点：所谓现代汉语方言，除了闽语之外，都是从《切韵》相承下来的。恰恰相反，《切韵》的一些具有重要特点的成分只保存在这些南方汉语方言中。

经过"五胡乱华"，南北分立，汉魏两晋的中原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即南迁中原汉语吴越化，北留中原汉语阿尔泰化。杨隋重新统一中国，传统的读书语音亟待规约，因此有长安论韵之举。然太子之争，文帝迁怒，身为太子洗马的陆爽获罪，殃及其子法言。法言"屏居山野，交游阻隔"，以前所记，撰成《切韵》。"单一音系"论者忽视了这一文化历史背景和编撰旨趣，更不了解汉语音韵研究的综合性传统，[①] 依据高本汉的论述：一方面说《切韵》是隋唐长安或洛阳方言，另一方面说现代汉语方言都是从《切韵》音系发展面来的，势必推导出现代汉语方言都是隋唐长安或洛阳话的子语的错误结论。如果再把《切韵》音系看作《诗经》音系的发展，也就形成了从《诗经》到《切韵》是分化过程，从《切韵》到现代方言是合并过程的橄榄形。

关于高本汉模式的这一橄榄形，黄淬伯早在《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观点》[②] 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高本汉仅仅根据几种韵书、韵表以及古韵部，就把它联系起来，以致构成了这样一幅两头小、中间大的畸形汉语发展图：

①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② 载《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以《切韵》“单一音系论”为中枢的直线型，严重扭曲了汉语发展史的真相。

第二节　张琨的二维语史观与研究方法论

张琨的语言史观表现为：原始汉语系统方言差异说、汉语南北平行发展说、文学标准语基础变迁说。

一、原始汉语系统方言差异说

张琨认为，“方言差异无疑是自古而然的现象。免于差异的原始汉语是一个虽不实际但有用的抽象物”(第56页)。同时十分尖锐地批评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个没有方言差别的语言，后来才分裂为不同的汉语方言群，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假设。早期汉语方言一定比今天更为复杂，各个较小的、相对孤立的部落必有自己的语言。后来由于科技的进步、人口的繁殖及语言接触的机会增多且越趋频繁，方言才越来越感受到标准语统一力的影响。因此，历史语言学家所拟测的原始汉语系统“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语言，而是一个假想的对立系统”(第90页)，是以最简单、最符合语言实际的办法来解释已知的历史文献上所记录的一个抽象系统。要解决《切韵》和《诗经》以及域外方音的关系，就得首先重建原始汉语或

前上古汉语系统。

“原始汉语系统方言差异说”包含着两层含义：

1. 没有方言差别的原始汉语是不存在的，早期汉语的方言非常复杂；

2. 假想一个原始汉语抽象系统只是为了便于解释已知的文献记录音系。

其隐含意义则是：

1. 上古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是原来就包含着方言差别的原始汉语的发展结果；

2. 仅仅依靠上古北方方言不可能构拟原始汉语系统。

张琨所坚持的原始汉语与先秦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也就是并不同意被称之为“南方方言”这些地区的土著语言（如蛮楚语、吴越语、闽粤语）是“非汉语言”。在原始汉语存在方言差异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自周秦汉语甚至原始汉语以来的南北平行发展说。

二、汉语南北平行发展说

既然方言的差异自古而然，那么“汉语音韵史的文献不但代表的时代不同，同时代表的方言也不同”（第3页），早在周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记录中，已有代表南方传统的楚语和淮南地区的语言材料，因此整个汉语语音史南北平行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在《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一文中，张琨具体考释了周秦以来汉语南北平行发展的三种音韵变化。

1. 相对于《诗经》的侯 * ug、鱼 * ag 韵，其合流或对立在北方存在地区差异。

(1)侯 * ug、鱼 * ag 在一种变化中一直保持对立。

《诗经》　　魏晋南北朝　　北方官话

* ug ———— * u ———— əu

* ag ———— * o ———— u

(2)侯 * ug、鱼 * ag 在另一种变化里，汉代出现过区域性合流（如枚乘、崔援、曹丕的诗），但汉代以后又分开发展。

《诗经》		汉代		魏晋南北朝
* ug	————	* og	————	* ug
* ag	————	* og	————	* ag

2. 相对于《诗经》的 * jag、* jug 韵，其合流或对立存在南北差异。

(1)北方方言中的 * jag、* jug 在汉代合流。

《诗经》		汉代		魏晋南北朝		北方官话
* ag	————	* og	————	* u	————	u
* jag * jug	————	* jog	————	* ju	————	y/u

(2)南方方言中的 * jag、* jug 没有合流，现代南方的若干方言里仍然如此。

《诗经》		汉代		魏晋南北朝		南方潮州话
* ag	————	* og	————	* o	————	ou
* jag1	————	* jɯg	————	* jɯ	————	ɯ
* jag2 * jug	————	* jug	————	* ju	————	u

3. 舌尖韵尾和唇音韵尾主元音的圆(u、uo、ou、au)、展(i、ə、a)对立性，存在南北差异。

(1)北方方言，《诗经》韵部里唇音韵尾和舌尖韵尾的主要元音已经没有圆唇与展唇的对立。

原始汉语	《诗经》	汉代
* jin/t	* jin/t(真)	* jən/t
* jən/t * jun/t	* jən/t(文)	

(2)南方方言,唇音韵尾和舌尖韵尾的主元音圆唇与展唇长期对立,圆唇成分仍然保存在日语吴音和在福州、厦门方言里。在长江中游一带,* jən/t(真、谆)与 * jun/t(殷、文)的区别自古一直保存下来。由于受南方文士的影响,到了刘宋时期,北方文人一直混押的 * jən/t 与 * jun/t 才开始不相通押。

三、文学标准语基础变迁说

只有在汉语南北平行发展说的语言史长河中,才有文学标准语基础的变迁。张琨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方言曾在不同的时期占有标准语的地位,"随着政治及文化中心的转移,标准语的基础也由一个方言突然换成另一个方言"(第 85 页)。周秦两汉时期(前 1122—220)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而齐梁时期(480—587)的文学语言是南方方言。 * jən/t(真、谆)与 * jun/t(殷、文)的分押就是证据之一。到了唐宋元明清(618—1911),又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魏晋刘宋时期(220—479)是汉语标准语的中心由北南移的过渡时期。

以"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文学语言基础变迁说"为依据,张琨严厉地批评了高本汉的直线型模式。

"因此,如果把以北方音韵系统为基础的《诗经》押韵(公元前 1000—600)和取材于南方音韵系统的《切韵》音系(601)以及属于北方音韵系统的《中原音韵》音系(1324)挤成一条发展直线,无疑是粗疏地扭曲了汉语语音史的事实真相。"(第 56 页)

"汉语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把它划成一条直线乃是对事实

的最大歪曲。"（第85页）

"书面文献既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方言的差别，我们就不能把文献排成一条直线来讨论方音的历史，这样反而会把音韵史搞糊涂。"①

"我们一旦了解《切韵》成书的性质，就毫无选择地、必须放弃由高本汉发轫的传统方法。"（第32页）

张琨的批评进一步触及到高本汉立论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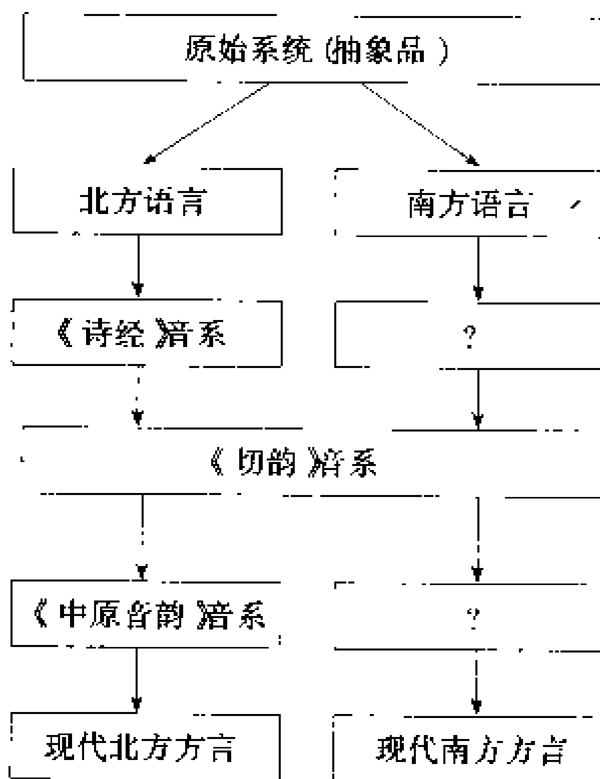
"不能把汉语的历史作简单化的理解……现代方言大概像波浪一样扩散形成……我们不能用谱系树理论来解释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而波浪说则有助于说明汉语方言的形成。"②

对于高本汉的直线型模式不必过分责难高本汉，因为一个外国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语言历史地理文化。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却盲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跟在外国人的肤浅之见后边跑。依据中国语言的历史分布，张琨对谱系树理论的质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赞成"波浪说"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扩散地区原有语言的存在，除非扩散地区是无人区。汉语方言的形成是汉语扩散和汉语与非汉语言融合的互动结果。正是中原汉语对北方语言的持久的"汉语化"运动，促成了大北方方言的最终形成；同样，正是中原汉语对南方语言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程度的"汉语化"浪潮，造成了南方汉语方言的复杂状况。

正如张光宇所说："新的学说不单是重视现代方言的差异，也

①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38页。
②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48～249页。

同样重视古代汉语方言的差异。"[①] 张琨以汉语的古今时空差异，超越了高本汉的时间一维语史观，建立了时空二维的汉语发展历史观。"新的方法就是拿《切韵》做一个参考来研究中国音韵史"，[②] "这不但是研究汉语的音韵史，而且也是研究汉语方言的分布，把方言和历史连在一块，用音韵学的眼光来看它的演变的方向、演变的可能。这样，可以简化汉语音韵史的研究"。[③] 依据张光宇在《张琨教授古音学简介》(第7页)中所给出的汉语语音史发展模型，再根据张琨论文中的有关论述加以扩充(其中的空格表示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音韵系统，但是张琨没有给出具体术语)，张琨建立的汉语语音史发展模型大致如下：



① 《张琨教授古音学说简介——代译序》，《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40页。

③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50页。

与国内的语音史研究主张分为不同时期进行作业不同，张琨认为，研究汉语语音史不要分期或划线，应当充分运用现有的方言材料并参照有关的文献资料，首先集中研究十几、二十几个重要的音韵或音类的变化。在理清了这些音类变化或音变追溯研究的基础上，再用合理的办法分析这些变化的前后时代关系，以建立完整的汉语语音史系统。

四、投射研究法

在文献语言材料性质鉴定和二维语言史观的基础之上，既然认定综合性的《切韵》相当于一部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史，就可以采取“投射研究法”来构拟原始汉语语音系统。张琨认为，只代表北方汉语的《诗经》的地理基础较窄，不能投射出汉语的历史来源，而从《切韵》广阔的地理基础上（代表的是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却能够投射出汉语的原始系统”。同时应当采用不同的音变来解释《切韵》分韵的差别，以及涵括《诗经》音系与现代汉语方言音系的种种区别。张琨认为，“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的差别能够反映汉语的历史发展。既然《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而反映当时各地方言的特点，那么，它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汉语的历史……《切韵》的系统不完全是一个平面的系统，它还代表中国音韵的历史演变，或者可以说，《切韵》就是中国的一部音韵史”。[①] 换而言之，既然可以凭借现代汉语方言的差别来推导中古汉语，也就可以从《切韵》系统去投射上古南方语音系统和原始汉语语音系统。原始汉语的重建，除了凭借《切韵》音系的投射，也可以适当参考《诗经》音系和谐声音系，而音值的构拟基本上是根据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和周边亲属语言的原始形式。

① 《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40页。

投射研究法的预设是:1. 语言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2. 共时的方言差异反映历时的语言演变;3. 可以通过语言的空间差异来发现语言的时间差异。由此进而推论:1. 现代汉语方言的差异反映了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可以通过这些语音系统的材料来重建中古至现代的汉语语音史;2.《切韵》的综合音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言差异,可以通过《切韵》语音系统来重建上古到中古的汉语语音史;3. 依据《切韵》音系地理基础广阔的特点,参照《诗经》音系,采取内部构拟法可以进一步投射原始汉语音韵系统。

采取投射研究法,张琨设计出来的原始汉语音系是:

1. 原始汉语元音系统 4 元音说。在这个原始系统中,a 音位有两个变体:在唇音韵尾和舌尖韵尾前是前元音 a,在舌根韵尾前是后元音 ɑ(u)。在 ɑ(u)变成了 ɑ 以后,就产生了《诗经》时期的 a:ɑ 对立,演变成为 5 元音系统。如下图:

原始汉语元音系统　　　　《诗经》时期元音系统



2. 张琨所给出的原始汉语语音的 66 韵母系统(第 165 页)如下表:

韵腹＼韵尾		舌根韵尾			舌尖韵尾			唇音韵尾			r 韵尾
		－g	－k	－ŋ	－d	－t	－n	－b	－p	－m	－r
展唇	－i－	支	锡	耕	脂	质	真	ib	ip	im	ir
	－ə－	之	职	蒸	微	物	文	əb	缉	侵	ər
	－a－	鱼	铎	阳	祭	月	元	ab	叶	谈	a
圆唇	－au－	宵	药	auŋ	aud	aut	aun	aub	aup	aum	
	－əu－	幽	觉	冬	əud	əut	əun	əub	əup	əum	
	－uə－	uəg	uək	uəŋ	uəd	uət	uən	uəb	uəp	uəm	
	－u－	侯	屋	东	ud	ut	un	ub	up	um	

由此可见，这个原始系统的特点就是把《诗经》系统的空当尽可能填满。

第三节　南北差异模式中的若干问题

张琨的差异型理论模式，得到海内外一些学人的赞同。张琨夫妇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发表于1972年，张光宇认为“1972年是汉语音韵学的分水岭，1972年以前是高本汉时代，1972年以后是张琨时代”。[①] 严学窘认为，普林斯顿假说的研究方法“难度大，费时久”，而张琨的“作法较为现实，较能取得效益”。[②] 徐通锵先生认为，张琨设法把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原则贯穿于语言史研究的始终，强调汉语史研究中的方言分歧是非常正确的。他评论道：“王力和罗杰瑞，一个只研究书面材料，一个只比较方言的差异，但在处理《切韵》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时，他们走到一起，结成了‘同盟’”，都把《切韵》放在一边，而“张琨正好相反，他充分利用《切韵》反映‘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特点而去清理语言发展的线索，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③]

张光宇在论文集《切韵和方言》[④] 中探讨了《切韵》和闽语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闽语去拟测古音，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对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颇具贡献。但是，中国大陆采用张琨模式来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文章还很少见。

与张琨的论述或差异型理论模式相联系，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① 《张琨教授古音学说简介——代译序》，《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与汉语音韵学的探索》，《音韵学研究通讯》1985年第7期。

③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1、147页。

④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 什么是古代(周秦两汉)北方方言？古代北方方言内部是否一致，是否包含不同的次方言？《诗经》音系是读音的标准化或标准音系统，是否就意味着《诗经》音系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

《诗经》诸篇时越数百年，地跨十余国，张琨所说的《诗经》诸篇有"若干来源不同的痕迹"的后面到底是什么？依据王健庵的研究(1988 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年会论文)，《诗经》押韵包含几个不同的方言音系。如果谐声音系是当时的标准语音系，那么从殷商甲骨文到东汉《说文》，谐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一千多年，这个"标准语"音系是否发生着历时的变化？依据一些学者的推测，殷商语和姜周语可能属于不同的语言，姜周承袭和扩展了殷商文字不是语言换用，那么谐声音系中是否掩盖着语种的变换？《说文序》中说，战国时期，诸侯力争，"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表明谐声音系并不始终是一个单一音系。关于谐声的异时泛域性，赵诚的《说文谐声探索》[①] 做了较为翔实的研究。

2. 什么是古代(周秦两汉)南方方言？在周秦时期，古代南方方言(夷越楚湘语)与古代北方方言(中原华夏汉语)是相同语言的地域变体还是不同的语种，向上追溯是同源还是异源？如果是相同语言的地域变体，它们的祖语是什么？作为方言，它们各自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或什么时间分化而成？如果是不同的语种，它们各自的来源又是什么？

3. 先秦两汉的文学语言是北方方言，是否意味着《楚辞》音系和《诗经》音系相同？如果自古楚夏有别，那么是否应当认为秦汉文学语言就有南北方言的不同？这种古代的南方语言(上古楚语、上古吴越语)和后来被称之为汉语方言的"南方语言"是什么关系？被称之为汉语方言的"南方语言"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南迁中原汉语的独立发展，还是与当地原居语言的互渗演化或"汉

① 《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语化"的不足？

4. 南朝的文学语言基础是金陵文士语言，现代吴语是六朝吴语的后裔还是南迁中原汉语的后裔？唐宋两代的文学语言基础，虽同为"北方方言"，但是否应当有"关中秦音"和"中原洛音"的区别？靖康之难，中原士人大量南迁，中原雅音又流播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地域，这一史实对近古汉语语音的发展和新的标准语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明清官话的基础是"北音"北京话还是"南音"南京话？

5. 中国秦汉时期的"方言"概念与西欧的"方言"概念有什么异同？周秦时代的中国北方是否只有一种语言？原始闽语、原始吴语、原始粤语等和原始汉语是同一语言还是不同语言？

6."原始汉语"是指中国历史上什么时期的语言？是否是指周秦汉语之前的殷商语？有证据表明，殷商语和周秦语是不同的语，利用南北语言投射原始汉语系统，殷商语与周秦语的关系是否可以避而不论？如果殷商语与周秦语不是同一语言，被姜周打败的殷商人的语言是否存在？不是殷商语后裔的周秦语的原始语言又是什么语言？这种原始汉语是否可能是南方语言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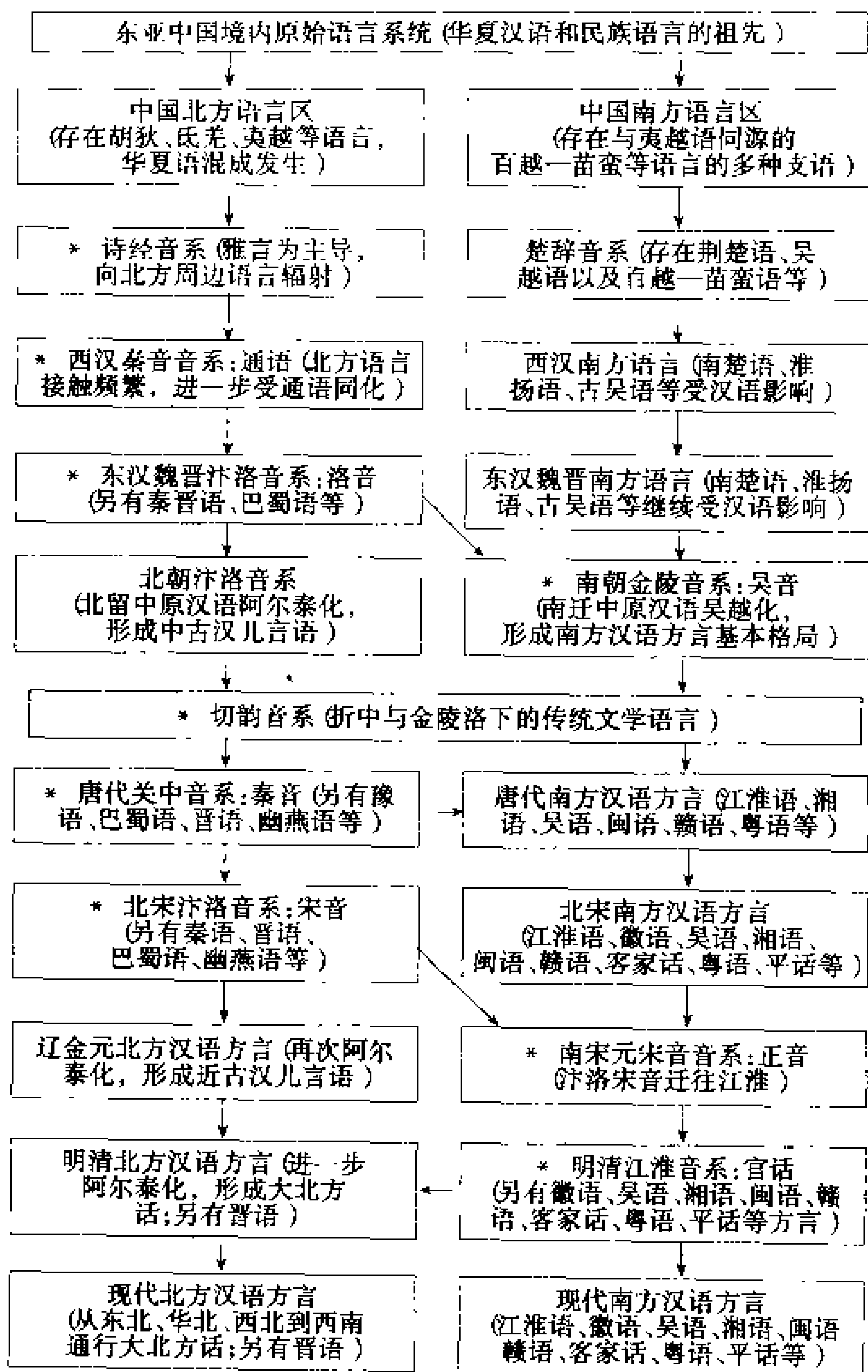
归根结底，1. 汉语史或汉语语音史发展的原点预设在哪里？汉语的祖先预设在哪里？2. 汉语的形成发展史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3. 对于上古汉语研究，是否存在揭示出汉字系统或文献资料掩盖下的不同语音系统分歧的可能性？把其他音系的附着成分从主导音系之上剥离出来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行？4. 汉语的沿流演变和地域扩展——从远古时期到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从河洛地区到中国北方，到江淮、吴越闽粤——到底是怎样的线索？

凡此种种，只有结合考古文化系统以及相关史料的研究，结合东亚人种体质类型学的研究和人口迁移历史，只有把华夏汉语的形成和延伸置于东亚大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久冲突的历史背

景上进行审视，才有希望解决。以时空二维为特色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虽然较高本汉的以时间一维为思路的直线型理论模式有极大的突破，但是仍未能彻底摆脱狭隘的“文明一元分化论”。对于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区域文明的复杂性、汉语主体形成的多元性以及汉语起源的多源异质性、汉语发展的推移整合性，仍然没有形成一条明晰的思路。因此，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在深层文化史观上与高本汉模式没有本质性对立。

作为西方人的高本汉根本无法体会到，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语言史实和现实，雅音和方音之间的关系给古音学家带来的困惑。面对这种困扰，一种是强调正音而撇开方音，一种是雅音和方音兼顾。撇开方音，干净是干净了，但显然是为了方法的简便性而牺牲了材料的全面性。如果回顾一下清代古声纽研究中的两种理论模式就会发现，高本汉直线型理论模式与钱大昕的归并模式较为相似，而张琨的差异型理论模式与戴震的流转模式却有相通之处。20世纪上半叶，由于高本汉的介入，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直线型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究其深层原因，与其说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外在威力，不如说是钱大昕创说的内在影响，即高本汉模式和钱大昕模式在语言文化史观上的一致性，引起了20世纪中国音韵学家的共鸣。在古声纽研究中，言必称钱大昕的“古无说”，而戴震的“转语说”受到冷落，甚至不被认可。只要翻阅一下常见的几本“中国语言学史”的书籍，就可以看到，论及清代学者的古声纽研究，惟标举钱大昕的“两个发明”，而无一字涉及戴震的“二十位”。对戴震以秦汉古今方言差异为基础的古声流转模式的视而不见，从另一方面透露出大陆“主流学者”对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研究的漠然和宏观理论思维的缺失。

根据“南北方言平行发展说”和“文学语言基础变迁说”以及李葆嘉所提出的“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与“汉语化说”，可设计出如下汉语史演变模型（注有 * 的为文学标准语或通行语）：


东亚中国境内原始语言系统（华夏汉语和民族语言的祖先）
中国北方语言区
（存在胡狄、氐羌、夷越等语言，华夏语混成发生）
中国南方语言区
（存在与夷越语同源的百越—苗蛮等语言的多种支语）
* 诗经音系（雅言为主导，向北方周边语言辐射）
楚辞音系（存在荆楚语、吴越语以及百越—苗蛮语等）
* 西汉秦音音系：通语（北方语言接触频繁，进一步受通语同化）
西汉南方语言（南楚语、淮扬语、古吴语等受汉语影响）
* 东汉魏晋汴洛音系：洛音（另有秦晋语、巴蜀语等）
东汉魏晋南方语言（南楚语、淮扬语、古吴语等继续受汉语影响）
北朝汴洛音系（北留中原汉语阿尔泰化，形成中古汉儿言语）
* 南朝金陵音系：吴音（南迁中原汉语吴越化，形成南方汉语方言基本格局）
* 切韵音系（折中与金陵洛下的传统文学语言）
* 唐代关中音系：秦音（另有豫语、巴蜀语、晋语、幽燕语等）
唐代南方汉语方言（江淮语、湘语、吴语、闽语、赣语、粤语等）
* 北宋汴洛音系：宋音（另有秦语、晋语、巴蜀语、幽燕语等）
北宋南方汉语方言（江淮语、徽语、吴语、湘语、闽语、赣语、客家话、粤语、平话等）
辽金元北方汉语方言（再次阿尔泰化，形成近古汉儿言语）
* 南宋元宋音音系：正音（汴洛宋音迁往江淮）
明清北方汉语方言（进一步阿尔泰化，形成大北方话；另有晋语）
* 明清江淮音系：官话（另有徽语、吴语、湘语、闽语、赣语、客家话、粤语、平话等方言）
现代北方汉语方言（从东北、华北、西北到西南通行大北方话；另有晋语）
现代南方汉语方言（江淮语、徽语、吴语、湘语、闽语、赣语、客家话、粤语、平话等）

第五章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东方语言学界最引人瞩目的是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类型地理论的建立。作为王士元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桥本万太郎(M.J.Hashimoto)60年代在美国就与白保罗等人创办了国际汉藏语言学会。1972年回到日本以后，他先后在朝鲜半岛(1972)、香港(1973)、尼泊尔(1975—1976)和前苏联中亚(1976—1977)等地考察语言状况，提出东亚大陆语言类型地理推移的设想。在16篇论文和演讲稿的基础上，1978年完成并且出版了《言语类型地理论》，[①] 将汉语置于东亚语言结构类型的连续体(continument)之中，揭出了从南方语言向北方语言"横"的推移(latitudinal transition)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纵"的演变(longtiudinal change)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言语类型地理论》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汉语史的著作，但是却以时空对应方式展示了汉语发展

①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的历史线索，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建立了推移型模式。

第一节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1. 语言的文明类型与语言的演变方式；2. 语言的地理推移和语言的历史演变；3. 汉语的异质属性和汉语的历史背景。

一、语言的文明类型与语言的演变方式

桥本万太郎认为，自远古以来印欧语言各自独立发展并分布在广大地域，主要是因为有史以来印欧族群以牧畜为其主要生产方式，远古时期的语言就随着牧场的迁移而远播欧亚大陆。他把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发展的语言，命名为“牧畜民型”语言。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印欧语中的数词比亲属名词稳定，语言学家把这种现象解释成是为了维护地中海通商圈的存在。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罗杰瑞建议，把“牧畜民型”改为“通商民型”或许更为妥当。有证据表明，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通商活动肇始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而后延伸到地中海东岸的亚细亚一带。腓尼基人制造了商船，开辟了地中海上的商贸航线，创制和传播了便于商业会计的字母文字。亚细亚与北非的埃及、南欧的爱琴海交通往来，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形成了早期的地中海通商圈或地中海文化圈。处于这一通商文化圈中的居民，绝大多数说闪含语言，只有一小部分说印欧语言。尽管说印欧语言的古希腊亚该亚人（前1400）和多里亚人（前1200）先后卷入地中海通商圈，古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化的摇篮，但是印欧语言的分化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公元前第二千纪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他们当时还是游牧部落。史实表明：1. 印欧语言的分化主要是在史前（前 6000 年以前或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即文字没有产生以前就发生了；2. 印欧语言的分化并非由于通商的需要，而是由于牧场的变迁。当然，并不是说“牧畜民型”的印欧人从不进行简单产品交换，只是说在语系形成时期他们不是以通商经济为主导，仅凭因产品交换的需要而导致的印欧语的数词稳定性，并不能够证明他们就是“通商民型”。虽然印欧居民有过早期原始农业，后来有商品交换，但就主要生产方式和整个经济格局来说，印欧语言为“牧畜民型”语言。

我曾经设想闪含语言才是“通商民型”，但是考虑到说闪含语言的居民的经济方式仍然以牧畜为主，由此可见“通商经济”只是在“牧畜经济”上的部分延伸。印欧语系和闪含语系在地中海通商文化圈出现前已经形成了，后起的“通商民型”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语系形成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通商民型”语言，只是由于通商的需要发生在局部地区的语言接触而相互混合的现象。

由于东亚大陆这一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农耕方式，这一地区文明的传播是以某个文明发源地为中心（暂且认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边民族，语言也是通过这一相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桥本万太郎把这种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而发展的方式称之为“农耕民型”，换而言之，东亚大陆的语言是与印欧语言不同的“农耕民型”语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言逐渐被文明中心地的语言同化，因此“农耕民型”的语言的词汇中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抽象词汇、文化词汇具有一致性，而被认为不易变化的表示亲属关系、人体器官等方面的基本词汇反倒存在差异。

语言的文明类型不同，语言的发展方式也就不同，语言研究的

理论模式也就应当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生产方式只不过是部分族群的、局部的历史,一些学者把这种发展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通则,而把不适合这个框框的东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视为"东方式停滞"。然而,这种观点本身就宣告了西欧社会经济方式的发展不具有人类普遍性,同时也就宣告了印欧语言发展模式不具有世界普遍性。"牧畜民型"的印欧语言有着可资比较的、在广大地域中毫无接触地(日尔曼人知道印度人的存在,大概是在几千年以后的事情)、独立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古代资料,构拟祖语容易获得成功,谱系树理论自然成为研究印欧语言的主要模式。印欧语言属于同系似乎"不言自明",普通人都可以一眼看出,问题在于如何"证明"。"农耕民型"的东亚语言由于与其文明中心的语言不断互动同化,要想阐明这种同化的复杂过程,用建立在"牧畜民型"语言基础之上的印欧语比较法来研究"农耕民型"语言的谱系就非常困难,采取谱系树理论来构拟祖语几乎不可能。

当然,并非一定要把"农耕民型"和"牧畜民型"的对立说成是西方和东方的差异。罗曼语言同样存在相互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发展起来的历史,东亚大陆也往往有独立发展起来的语言。谱系树理论和波浪扩散理论的对立,就起源于这些语言的发展事实。语言的谱系和语言的扩散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为了把这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统一起来加以阐述而提出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便是语言的牧畜民型发展和农耕民型发展的观点。

桥本万太郎进一步质疑,所谓"同系"语言到底是什么?"同系"这个词语往往给人以从同一祖先分得血液的印象,但事实上是指借用或同化的部分。在这里,桥本万太郎对"语系"的形成提出了一种与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的观点,即语言的同系不是由于一语分化形成不同语言的结果,而是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各种语

言逐步借用或同化所出现的结果。如果并不完全否认印欧语系是原始祖语分化的结果，那么由此出现了两种语系：一种是传统概念的“分化型语系”，一种是与“语言联盟”相似的“同化型语系”。桥本万太郎进一步提出东亚大陆语言的“原形”概念，以区别于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祖语”概念。在对谱系树理论提出根本性质疑，借鉴波浪圈理论或区域语言学方法阐明东亚语言结构的发展机制的基础之上，桥本万太郎建立了语言发展的农耕民型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地理类型学”就是“农耕民型语言发展理论”。

也许，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1. 亲缘分化关系。亲缘关系的语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研究概念是“分化性语系”、“亲缘语系”或“语言共同体”，其来源是“祖语”。2. 地缘同化关系。地缘关系的语言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研究概念是“同化型语系”、“地缘语系”或“结构连续体”，其来源是“原形”。3. 上面两种关系的叠合即亲缘·地缘关系。既有语言起源时的亲缘分化，又有语言发展中的地缘内化。研究概念就是“分化·同化型语系”或“亲缘·地缘语系”，其来源是“祖语·原形”。如果用连续统格式来表现，就是：亲缘……亲缘·地缘……地缘，或分化……分化·同化……同化。对于第一种，可以称之为“语系型”；对于第二种，可以称之为“语区型”；对于第三种，可以称之为“语系·语区混合型”。

二、语言的地理推移和语言的历史演变

与牧畜民型语言不同，农耕民型语言首先必须假设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语言，然后产生了某个文明中心或“强势语言”，文明中心或“强势语言”缓慢地同化周边“弱势语言”，而使各种原先不同的语言成为一种内部存在着若干差异的“统一型语言”。在这种统

一型的语言中，既没有“等质原始共同体”或“祖语”的假设，也没有语言的“直线型发展”。在这一不断扩散的同化过程中，看到的是语言的区域差别可能比时代差别更大的现象。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语言的区域推移与历史演变互为验证的观点。

1. 句法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依据语言结构类型学理论，无论是名词短语还是动词短语，凡修饰语依次置于被修饰语（中心语）之后的结构是顺行结构，凡修饰语依次置于被修饰语之前的结构是逆行结构。东亚大陆语言、南亚语言是顺行结构（名词短语为 NA 结构，N 是中心语，A 是修饰语，后置；动词短语为 VO 结构，V 是中心语，O 是被支配宾语，后置），阿尔泰语言是逆行结构（名词短语为 AN 结构，A 是修饰语，前置；动词短语为 OV 结构，O 是被支配宾语，前置）。在某种自然语言的各种结构中，某些部分是顺行结构，其他部分也常常是顺行结构；反之亦然。如果找出一个语言具有两种结构相混的反常例子，多数也能以在历史的、区域的推移过程中产生的过渡现象加以解释。处于阿尔泰语和南亚语两者之间的汉语绝不是等质的，越往北越具有阿尔泰语式的逆行结构特征，越往南越具有南亚语式的顺行结构特征。上古汉语名词短语有 NA 顺行结构，秦汉以后北方汉语趋向于以 AN 逆行结构为主，但南方汉语中仍然存在大量的 NA 顺行结构。现代北方汉语动词短语为 VO 顺行结构而兼有 OV 逆行结构的特点，这种 OV 逆行结构到唐代才开始明确出现。句法结构上的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纵”的演变和句法类型上的南方语言向北方语言“横”的推移正好相对，可以互为验证。

2. 基本词汇的区域性推移

(1)河流词。古汉语河流的总称是“水”或“川”，以长江为界，古代北部叫“河”（淮河、涡河、卫河、滹沱河、桑干河、滦河、辽河），

南部叫"江"(钱塘江、建瓯江、闽江、赣江、湘江、珠江)。"江"的本义是长江,古音 * krong,与南亚语言 klong/krong 同源。"河"的本义是黄河,古音 * ɣal,与阿尔泰语言蒙古语 ɣool 同源。

(2)否定词。南方语言否定词绝大多数用鼻辅音 m-,而北方却使用塞音 p-或擦音 f-。古代汉语大致分为两类:m-型的"无"、"勿";p-型的"不"、"弗"。由此也可以觉察到否定词"横"的推移和"纵"的演变的互为验证。

(3)类别词(量词)。一种语言的单音节性强,类别词就丰富;一种语言的复音节性强,则类别词就贫乏。若剔除借词,南方语言几乎全是单音节词,北方语言则几乎全是复音节词。夹在中间的汉语各方言,越往南单音节性越强,越往北复音节词越多。南方语言中的各种类别词,往北渐渐变得单纯化。北京话、济南话,最通用的类别词是"个"字,东干语的类别词只剩下一个"个"字。汉语文献中,最古老的类别词是类别性名词的"自身复指",在先秦时代才出现了专用类别词。结构上符合历史汉语中所描写的类别词发生和发展范例的语言现象,至今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南方最典型的纳西语中。另外,藏语中还存在像甲骨文中"自身复指"的那种"反响型"类别词。

3. 音韵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音素配列。南方语言一般都具有 CVC(C 为辅音,V 为元音)结构,以闭音节为主;北方语言大部分是 CV,以开音节为主。汉语方言显示了从南向北由 CVC 到 CV 的逐步推移。粤语、客家语 6 个辅音韵尾,闽语 6 个以上,赣语 4 个,湘语、吴语、北方话 2 个,东干语 1 个。

(2)声调数量。随着由南向北的移动,声调的数量渐次减少。贵州侗语 15 个,云南台语 10 个,壮语、粤语 8 个,客家话陆丰 7

个、梅县6个，闽语厦门7个、福州6个，南昌话、湘语长沙话6个，双峰5个，苏州话4个（李按：苏州话7个，常熟8个，江淮话南通7个、泰州6个）、南京话5个，北方话西安、济南、北京、沈阳4个，黑龙江虎林方言、宁夏中卫方言、东干语（正在从声调型向重音型转移）3个。

(3)语素的语音结构。粤语广州话有1 800个音节单位，北京话只有1 277个音节单位，减少了将近30%。音节单位的减少促使复音词增多。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复音节化。

以上依据《语言地理类型学》，对桥本万太郎的举例没有一一核实，因为个别例子的疏漏并不能改变总体的结论。

东亚大陆语言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突破了所谓的“语系”差异，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结构连续体状态。依据这一观点，桥本万太郎分析了东亚大陆语言的句法结构、基本词汇、语音结构的逐步推移情况。南方语言的句法结构顺行为主，而北方语言逆行为主；南方语言的音节结构以CVC闭音节为主，而北方语言以CV开音节为主；南方语言声调丰富，而北方语言声调锐减；南方语词的语素结构以单音节为主，而北方语词的语素结构以复音节为主。这些语言结构特点由南向北的区域性推移和汉语的从古到今的历史演变相一致。

三、汉语的异质属性和汉语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与张琨一样，桥本万太郎对直线型模式早就加以批评；另一方面，桥本万太郎接受了张琨汉语音韵史研究的影响，认识到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存在比时代差别更大的区域差别、性质差别。依据推移型理论模式，汉语就不再是一种封闭的、仅仅

具有时间性的、以分化为发展方式的语言系统，而是一种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中不断同化周边语言的同时导致自身不断异化的非等质语言系统。

桥本万太郎认为，对于联结东亚大陆“南”(南亚诸语言)“北”(北方阿尔泰诸语言)的汉语，直到近年来才查清了它的语言结构绝对不是等质的。南方汉语和南亚诸语言结构雷同，北方汉语和阿尔泰语言结构相似。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凭印象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是语音，而这种语音差异通常又被理解为词语发音的不同而不是音韵结构的不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古代文献语言资料，其实是混同了那些异质语言要素而确立起来的书面语。换而言之，本来存在的方言或语言的差别，在这种书面语里面被彻底“统一”了。

由于考古学家在东亚大陆的南端泰国北部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约前2500)的青铜器文化，从而要求重新彻底考察东亚大陆的史前文化史，因此美国学者白保罗在《早期汉语借词》(*Early Chinese Borrowings*，1976)中提出了东亚大陆南方语言文化向北传播的假设，并且试图以之建立东亚大陆语言形成的学说。与之不同，桥本万太郎坚持，在东亚大陆实际发生的民族迁移和社会变迁，一直是从北向南展开的。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带，自古以来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过去的10个世纪的大半时间内，中原长期处于北方阿尔泰诸民族的控制之下，同时又有众多的汉人迁往关外。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政治中心的人口，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契丹的移民、女真的后裔、满人的子孙，因此北方汉语不可能不深受阿尔泰诸语言的影响。这就是桥本万太郎提出的中原汉语的“北方化”或“阿尔泰化”，即国际语言学界有名的“汉语阿尔泰化假说”。对于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关系，桥本万太郎完整

的表达是“中原汉语阿尔泰化并且同化南方语言”。关于南方汉语，根据桥本万太郎夫人余蔼芹在《南方汉语和台语连续体中的底层》(*Substratum in Southern Chinese – the Tai Connection*,1976)中提出的假设，闽语、粤语都是古代“百越语言”被“汉语化”的结果。

桥本万太郎认为：“对于现代语言学家来说，最有兴趣的是探讨语言结构发展的原理。既然一种语言里的各种共时的非规律性，都源于这些结构发展的结果，而语言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的内在要素引起的，那么，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与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及其作为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推移和历史发展。”① 尽管语言类型地理论上升到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高度，论例涉及到若干非汉语言，但是其出发点与落脚点仍然是中国语言史。以空间地理推移追溯汉语的历史演变，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不仅针对语音结构，而且涵盖基本词汇和句法结构，因而是一个覆盖面全面的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第二节　桥本万太郎理论的学术背景

“语言地理类型学”的创立，除了归因于桥本万太郎对丰富的语言材料的掌握，更主要的是由如下具体因素促成的。

一、河野对藏语特征研究的启示

随着20世纪对藏语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言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言。藏语所处的语言地域，也正在汉藏语言和阿尔泰语言

①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的中间。河野在提到这样的事实时对桥本万太郎说："桥本同学，如果从语言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桥本万太郎回忆，最初他是从河野博士的这一教诲中获得了"地理类型学"这一课题。从学生时代开始，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思想就开始孕育。

二、爱梅诺对区域语言学研究的启迪

穆来·爱梅诺的《作为语言区域的印度》(1956)，是二次大战以后"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这个领域的先驱著作。以地域为线索的"扩散"(diffusion)和以时间为线索的"演变"(evolution)是一组相对立的概念，区域语言学关心的是在某一区域之内的超越语言差别的语言特征的"扩散"。爱梅诺以印度次大陆语言为实证，阐明了这种语言特征的扩散并不局限于语音和单词的范围，也包括形态特征一直到句法结构。然而，爱梅诺没有建立随着各语言的全部结构的地理推移，去深入寻求结构原理的观点，并且以此一方面阐明各语言结构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阐明区域语言学的扩散不是要素的扩散，而是可以看作谱系树上伸展的"枝干"。区域语言学看不到这一点，不是研究者本人的责任，而是由于印度次大陆未必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语言材料来促使语言学家创立这一观点。既然在桥本万太郎看来，爱梅诺超越了以研究印第安语言而著称的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弗朗士·博厄斯和爱德华·萨丕尔，由此可见爱梅诺的区域语言学研究成果深深震撼了他。与河野的教诲沟通起来，便引发了桥本万太郎的创造性灵感。

三、东亚大陆丰富的语言研究成果

20世纪，东亚大陆语言的研究日益扩展和深入，特别是20世

纪汉语方言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材料。依据东亚大陆的语言材料，桥本万太郎才能够牢固地立足于这种"随着各语言的全部结构的地理推移，去深入寻求结构原理"的崭新观点之上，从而产生了"根据东方语言发展史的事实和资料，建立新的、更为普通的语言发展理论"的欲望。同时桥本万太郎认为，只有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区域广阔，北接阿尔泰语言、南交南亚语言的汉藏语言的东亚大陆，才是验证这一设想最合适的地方。

四、张琨的汉语语音史研究

桥本万太郎早就对西方历史语言学家的"等质原始体"和"直线型模式"持批判态度，后来又接受了张琨汉语史研究的影响。桥本万太郎说，(欧洲语言学家)"理论上假定什么等质的原始体，从而把语言史看成一条直线的发展，笔者虽然早就批判地指出，语言史的此等描写纯属虚构。但是认识到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存在比时代差别更大的区域差别、性质差别，则是最近几年的事(例如张琨《中古汉语语音和〈切韵〉》)"。[1]

五、语言变异与词汇扩散理论

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可以发现，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还有更为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从历史上来看，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 Schleicher)与约翰内斯·施密特(J. Schmidt)的师生之争颇为有趣，"谱系树"模式和"波浪圈"理论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传统的"谱系树"理论和现实的非印欧语言事实的方柄圆凿，20世纪语言的研究由"语系"转向"语区"，由"分化

①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演变"转向"扩散推移"是势所必然。20世纪60年代后期，最早追随乔姆斯基学派的，如王士元、马提索夫、拉波夫等纷纷转向。1968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城市学派的代表人物拉波夫(William Labov)在《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中提出语言的"变异理论"(Variation Theory)。与之同时，美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Wang William S - Y)发表论文《相竞的演变是剩余的原因》，提出语言发展的词汇"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作为王士元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桥本万太郎，日后创立"语言发展理论"显然与这一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1. 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理论

社会语言学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外部语言学或边缘，在社会语言学的创立者拉波夫看来，社会语言学就是本体语言学。与索绪尔建立在静态语言观基础上的语言系统同质论不同，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理论认为，语言系统不是一个同质系统，而是一种"有序异质结构"系统(orderly helerogeneous)。语言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变异成分和某种控制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常见的控制因素有风格、年龄、阶层等等。变异规则是在概率为X(Y、Z)的条件下A变成B(C、D)。虽然语言变异的研究着眼于正在进行中的变异，因而是一种微观语言史研究，但是这一研究揭示了从语言的起变到逐步扩展、到完成演变的整个过程，从而表明：既然语言的共时变异体现语言结构的变化，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微观的变异规律去研究中观、宏观的语言史，为历史上的语言结构变化提供具体的解释，即用"现在的变异来解释过去的演变"。

根据变异理论，徐通锵先生提出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和叠

置式音变三种格式，[1] 并且将此理论运用于山西祁县方言和浙江宁波方言的研究，从而对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音系中的变异和语言的空间差异有着紧密的联系，变异的社会控制因素是社会结构的空间。不管是语言的社会变异空间，还是语言变异的地域空间，其同源的各个变异形式都可以排列成一个序列而表现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顺序。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因为空间和时间的联系环节已经中断，人们看不清语言发展中二者的一致性，从而出现了关于语言是在时间上发展还是在空间中扩散的"规律说"和"波浪说"之争。语言变异的微观研究使人们有可能从微观去透视宏观，为人们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去探索语言在时间的发展序列提供了方法论根据。

潘悟云在《汉语音韵学展望》[2] 中认为，汉语语音演变特别快，有些音变20年之内就有可能完成。因此，研究音变必须冲破结构主义的静态音位理论。实际上，每个音位都是对语言社团中千千万万个成员口中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音值的概括，忽视了这种语言存在的随机性，则无法探讨音位的变化过程，更无法解释音变机制。因此，对活的语言音变机制的阐释，在对历史语音演变的阐释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 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

王士元认为，语音音值的变化在一个字词中是突然的顿变，而语音音值的变化在词汇中却是扩散的渐变。词汇扩散理论认为，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以及19世纪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认为，语音的变迁是从一个音素渐渐地、

① 详见《历史语言学·语言的变异》，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 载《上海青年语言学》1986年创刊号。

不知不觉地游移到另一个音素，而语音一旦改变，所有相关的词汇都同时受到影响。事实上，许多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都有不同演变规则的字词存在。这些例外很有可能就是语音演变的发端，或者语音演变的末梢或残留。某些语音演变现象，如音节里某一音素的消失或增加等等，都不是根据传统的音值渐变的那种游移观念可以解释的。语音的变迁在音值上是从一个可辨认性单位到另一个可辨认性单位，而在词汇上通常是从一个字词扩散影响到另一个字词，因此有必要从词汇扩散的观点重新审视汉语音韵在历史上的演变。这一理论对近年来的汉语语音和方言研究都有显著的影响。在美国，郑锦全与王士元合撰的《中古汉语声母的演变》(1971)、陈渊泉的《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音》(1976)、朱赫尔(Robert A. Juhl)的《陶潜文学作品方言：韵类与韵母》(1976)等文都采用了词汇扩散理论。

正如王士元所说："词汇扩散理论，据我所知，是中国语言学第一次影响到国际历史语言学。"[①] 当然，并非所有的音变都是通过扩散方式进行的。1979年，王士元在《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②] 中论述道，不同的音变可能由于语音的性质、社会环境等的不同而走不同的道路。就音变方式而论，有的是按照青年语法学派的方式，有的是按照变异理论的方式，有的是按照词汇扩散的方式。就音素变化而论，有的是突变的，有的是渐变的。就音变原因而论，有些可以通过生理性因素来解释，有些可以通过心理性因素来解释。就音变结果而论，有些是进行到底的变化，有些是半途中断的变化。徐通锵先生将语音演变归纳为三种方式：类推式音变、扩散式

① 徐通锵整理：《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54页。

② 译文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

音变和叠置式音变。[①] 在后学看来，类推式音变是心理性解释，扩散式音变是社会性描写，叠置式音变是文化性阐释。

徐通锵先生认为，"中断的变化"可以说是词汇扩散理论的精华，为探索音变的层次和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虽然词汇扩散理论研究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从而把字词看成音变的单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确切的。从表面来看，音变扩散时以字词为单位，但实际上演变的单位既不是字词，也不是音位，而是字词中的一个音类。就汉语来说，就是音节中的声、韵、调。在词汇扩散中，发生变化的是音素或音位，通过音素的扩散变化达到音位的变化。音位变化可以分成四种类型：1. 音节内音素的增加。音节内增加的音素，如果是原来音位系统中没有的，则可能成为新的音位。2. 音节内音素的脱落。音节内脱落音素，如果音位系统中没有同一音位，则可能出现音位的减少。3. 引起音位替换的音值变化。在一种语言系统中，一个音位可能包含不止一个变体。在音位变体中，可依据语感、最常用性或音系格局确定其中的一个为标准体，其余的则为非标准体。这些非标准变体不具备辨义功能，以音节为主体的字词，并不会由于语音的微殊而误解语义。然而，不管是旧变体的存在，还是新变体的突然出现，非标准变体与标准体都处于显形或隐性的竞争之中。在一定条件之下，可能伴随着强势语言的渗透，可能伴随着语主的变换（用母语语音系统框范换用语音系统），非标准变体以扩散方式逐步覆盖含有这一音位的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字词，旧的标准体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新的标准体，从而实现了某一音位的音值转变。4. 引起音位裂变的音值变化。在新标准体仅与部分音位配比的情况下，则出现了音位的分裂（比如，

① 详见《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上古重唇到中古分化出轻唇)。换而言之,音位替换是旧音位消亡了而新音位诞生了;音位裂变是新音位诞生了但旧音位仍然存在。一方面,音位的变化受制于音位的平行对称性;另一方面,音位的变化又反映了语音变化的不平衡性。在平行对称性与不平衡性中间的这一系列变化可能改变音系格局。

3. 陈渊泉的时空投影法

研究音变的前后顺序与有机联系的理论,国外语言学界有"相关年代学"(relative chronology)。相关年代学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差别是,它不是以具体的音位或形态特征这些语音实体为构拟对象,而是旨在建立一种音变的时间顺序。近年来创立的一种具有独立方法论价值的、与古今语音对照法不同的方法,就是通过现代方言和亲属语言的语音分布去推断其历时演变先后的研究方法。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陈渊泉称之为"时空投影法"。[①] 他在《相关年代学:三种构拟方法》(1976)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从现代语音差异的分布推断历史语音变化先后的方法。时空投影方法的基本构想是:同一音变因为空间读音的不同,可以反映出音类演变的先后时间顺序,因此可以尝试从空间去发现时间,从地域差别中去寻找音变发展的顺序。陈渊泉在《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音》(1976)中运用时空投影法和词汇扩散理论分析了汉语音韵的变化。这些理论方法和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模式可谓异曲同工。

第三节 桥本万太郎模式的反响与思考

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不仅可以远超施密特的"波

① 冯蒸:《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

形扩散"理论,而且运用了西方文化圈理论,以及语言的区域推移与中心文明的传播过程相一致的文化学方法。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理论,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大陆语言学界长期以来的理论寂寞。余志鸿在1979年底见到桥本万太郎的这本书,立刻被书中崭新的观点与方法所吸引,随即翻译了这部著作。稍后,一些学者对桥本万太郎的学说做了评价。朱德熙在中译本"序言"中赞赏桥本万太郎的理论冲出了索绪尔"历时和共时截然分开"的藩篱,可谓"高瞻远瞩,一空依傍"。《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译本出版以后,桥本万太郎的理论遭到大陆语言学界一些人的反驳。桥本万太郎曾经估计到种种反驳,他认为一些个别情况的批评和纠正,并不能够改变他对整个东亚语言结构推移的总体看法。

令人觉得有趣的不是这些执著的反驳,而是大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对桥本万太郎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式抵制。据说,主要是因为感情上接受不了"汉语是南北少数民族语言挤压形成"和"汉语方言原来是不同语言"的结论。桥本万太郎的理论草创,未能进一步臻密,大陆一些学者在没有深入研读之前,难免产生误解。其中"汉语南北少数民族语言挤压形成论",就与桥本万太郎的"中原汉语阿尔泰化并且同化南方语言"的论断并不切合。至于中国南方语言原来是"百越语言",与上古汉语是不同的语言,在秦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又何必以今日之中国疆域观照商周之"中国"(含义与"中原"相近)疆域,又何必以今日之汉语区域框范秦汉之汉语区域?

对桥本万太郎理论的冷淡式抵制,究其心理原因,出于潜在的"汉族主义情结"(对于汉语的阿尔泰化假说,民族语言学家大概不会如此义愤填膺),无视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民族政权对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几百年统治,情绪因素干扰了理性思维。究

其学术原因，20世纪的大陆语言学界受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太深，以至于误以为谱系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能对东西方语言文化历史进行批判性深思，陷入墨守“高本”而拒绝接受“桥本”的迷谷。更令人担忧的学术背景是，大陆语言学界在几十年的“重事实”、“让材料说话”的研究主流中，形成了轻视甚至歧视宏观理论的严重倾向，满足于引进欧美语言学理论到汉语中找事实。而缺少独立的理论思考和跨学科的宏观研究，也就不可能萌动像桥本万太郎这样的“根据东方语言发展史的事实和资料，建立新的、更为普通的语言发展理论”① 冲动而不懈努力。一昧追求“纯正”语言学研究的中国语言学家，对文化史的研究漠不关心，对史前文化了解甚少，更谈不上运用文化圈、文化区域的理论来观照中国语言的历史和现状。有趣的是，桥本万太郎在写《语言地理类型学》之前，去过东亚和中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却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为此他深感遗憾。对于中国语言学界更为“悲惨”的是，中国语言学家特别是方言学家所做的大量方言调查材料，竟然成为桥本万太郎立论的证据。有人为“国内研究出材料，国外研究成理论”的事实而愤愤不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确实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无言悲哀。

桥本万太郎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推移型模式的基础“黄河文明中心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考古文化研究成果大相径庭，但是其书成于70年代，尚可理解。然而，又正是这一“黄河文明中心说”，与高本汉模式赖以建立的文化史观颇有相通之处。推移型模式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

1. 东亚大陆的文明中心是如何形成的？

---

① 《语言地理类型学·汉文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在文明中心形成之前，东亚大陆语言的状况是怎样的？

3. 推移发展可以阐释秦汉以后的汉语发展和现代汉语方言格局的形成，秦汉以前的华夏汉语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桥本万太郎留给后来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无论是推移型模式，还是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或时空投影方法，都注重语言的空间研究，都试图通过空间来探索时间，以共时差异阐释历时演变。然而，语言的“矢量”并不仅仅表现为时间的延伸与空间的扩散。语言是人的文化符号、认知工具和表达工具，语言是没有生命的，说语言的人才是语言的主体。语主的存在或迁徙在时空中进行，由此引起语言的运动，但并非依据时空差异就能够进行全面深人的阐释。语言的波形扩散，如果设想为“单点扩散”，即由语言中心向周边“无语言区域”的扩展，在某些环境下也许是可能的，但在周边“有语言区域”的情况下则是不可能的。在东亚大陆，史前就存在多种语言，虽然有“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分，但是语言的渗透或扩散往往是双向甚至多向的。因此，一方面，在考察语言发展的时空表现时，必须密切联系语主的变迁和文明的传播，用“时间·空间·语主的三维观”来建立语言史的研究模式，以全面而深入地阐释语言的时空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语言结构连续体的存在，除了要考虑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化的接触渗透，还必须考虑到史前语言的网状分布或原始结构连续体的存在。

第六章　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现代新人的有声分节语音成熟于距今三四万年之际，并由此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革命。在最近的一次冰河期结束以后，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严冬的洞穴中走出来，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灿烂春光，相继叩开了“文化”和“文明”的大门。

英语的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语的“colere”，意为栽培、培育，即将自然界野生动植物加以驯化或培育，使之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品种。英语中的“农业”(arriculture)和“文化”(culture)同源，欧洲语言“文化”的本意就是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发端于距今一万年前的农牧化(domestication)或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新石器革命。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东亚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一万年前的河南徐水南庄头和江苏溧水神仙洞考古文化遗址。与之相关，英语中文明一词“civilization”的含义就是“城市化”，在欧洲人的语义世界里，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东亚地区最早的城市文化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大溪考古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城址。

第一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学证据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张光直在《华南史前民族文化史提纲》[1]中曾经提出，黄河流域前新石器文化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undiffemtiated Sino-Tibetan-Austronesion complex)，从新石器时代起，这一综合体开始出现向中国南部的移民活动，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两个原始群体。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东亚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并非仅在黄河流域。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最大突破，就是发现了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体系萌发阶段的农业文化。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可能属于前仰韶文化的是：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汉水流域的李家村文化和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集中在长江流域的可能属于前青莲岗(或龙虬庄)文化的是：淮河流域上游的裴李岗—贾湖类型文化、山东境内沿海地区的北辛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另外，在华南地区有甑皮岩文化和仙人洞文化，在东北辽河下游有兴隆洼—查海文化。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文化是否源于同一旧石器文化母体，至少目前尚未找到确凿证据。因此“原始汉藏南岛综合体假说”和东亚文明由北向南的远古推移线索，尚缺乏考古学证据。

竟成在《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2] 中认为，汉语和阿尔泰语之间的底层关系可能反映了语系分化之前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状况，因此有必要提出“非谱系性”或“前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概

① 载台湾《民族学研究的集刊》1959年第7期。
② 载上海《现代语言学》1992年总21期。

念。为了冲破西方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模式对东亚语言研究的束缚，依据桥本万太郎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的区分，我进一步明确提出印欧语言的“分化型语系”和东亚语言的“同化型语区”的区别。这种区别仅仅就语言运动的总体趋势而言，并非说分化型语系中就没有局部同化，同化型语区中就没有局部分化。为了迁就习惯，“同化型语区”可以沿用已有的“语系”这一术语，但是其内涵应是“同化型语系”。同时，我还提出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连锁型语网”演变为新石器时代的“分化型语系”和“同化型语区”的假说。在语系或语区形成以前，当有连锁型语网状态。随着文明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语言的发展总体趋势从相递趋于近同或走向分化，由远古语网演变为太古语区或语系。然而，要推断东亚大陆太古语区的形成时间，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支点。

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①] 中认为：“考古学上的文化体系与民族学上的涵义是相同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系统化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包含一系列具有特征的文化因素，像社会组织制度、民族的思想行为和方式、生活习俗和风尚、工艺技术特点和风格，以致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等社会行为模式。这些因素，互相熔铸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石先生的论述非常精彩。然而，无论是作为文化本体的语言，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考古语言证据，但是在考古文化形态综合体中都是不可或缺并且具有显著特征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当假定农业社会之前存在“文化·民族·语言”原始网状体，而定居农业的出现则是促成原始网状体分化的历史条件，并

① 《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且由此进一步形成考古文化系统和太古民族(可以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准。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前社群称为氏族,产生文字之后的社群称为民族,但是二者没有本质区别)系统,那么也就为太古语区的形成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支点。

考古文化的研究表明,大约距今7000年前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大致形成。在论及人类文化原始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因素时,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会发现不同的生活资料,所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处于东南沿海及湖泽平原的是以植稻农业为特征的青莲岗(含龙虬庄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水耕文化系统,处于西北黄土河谷地带的是以种粟农业为特征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系统,处于河套大漠草原的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①] 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体质特征有所区别。东南文化的创造者是南亚型种群,即太古夷越人;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新石器时代是南亚型与东亚型种群,青铜时代是东亚型种群,即太古氐羌人;北方文化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型种群,晚期有北亚型和东亚型种群混合的趋势,即太古胡狄人。[②]

青莲岗文化是黄淮平原及东部沿海沃野的产儿,以黄淮下游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扩及长江中游及东南沿海河山。这一系统可以分为14个亚文化区:1. 山东—辽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和龙

① 参见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格勒:《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新华文摘》1988年第3期。

山文化(海岱文化);2. 江淮之间的青莲岗—龙虬庄文化(淮东文化);3. 长江三角洲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文化);4. 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文化);5. 巢湖周围的薛家岗文化(巢湖文化);6. 江汉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江汉文化);7. 赣江流域的山背文化(赣江文化);8. 峡江周围的大溪文化(峡江文化);9. 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闽江文化);10. 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珠江文化);11. 邕江流域的大龙潭文化(邕江文化);12. 台湾的园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台湾文化);13. 贵州的平坝文化(原黔文化);14. 云南的闸心场等文化遗存(原滇文化)。

对以"青莲岗"命名东南地区的考古文化系统,考古学界有人并不赞成。主要是因为:1. 青莲岗遗址未经考古发掘,所有资料仅限于两次调查采集的数百片陶片、少量的陶器和石器,文化遗物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当时仅依据其有别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的红陶提出了这一命名。2. 以后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文化层的新石器时期龙虬庄考古遗存,以及地处淮河上游、可能是龙虬庄文化来源的贾湖考古文化。青莲岗文化遗存只相当于龙虬庄遗址第二阶段。其实考古文化系统的地点命名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点发现更早的文化遗存,就一定要改换"考古文化系统"的名称。"地点文化遗存"不等于"文化系统","仰韶考古文化系统"也是如此,早期半坡考古文化遗存早于仰韶地点的考古文化遗存,但并未改为"半坡考古文化系统"。只要这一考古文化遗存具有与别的考古文化系统不同的特征,那么就可以用最先发现文化遗存的地点名称来命名这一系统,以后发现的同一系统的更早的文化遗存仍然属于这一系统,没有必要重新命名。否则,只有等到发掘到这一系统的最早文化遗存才可能命名,而这在考古文化研究中是不切实际的。因

此，尽管江淮地区发现了更早的文化遗存，但仍然可以沿用“青莲岗考古文化”这一术语。

这一文化系统的显著特征是：1. 陶器的共相显著。早期是红沙陶，中期是灰黑陶，晚期是印纹陶。以三足器最为显著，炊具以釜鼎为主。出现大量礼器和酒器，造型以鸟形为最突出。2. 石器工具以扁平穿孔石斧为代表。3. 具有制作精美玉器的工艺或玉器文化。4. 流行拔牙习俗。5. 耜（犁铧）耕农业为主。6. 住宅以杆栏式建筑为主。7. 多葬制。青莲岗文化分布的区域是古代夷越族的活动范围。作为九夷、百越、百濮和僚俚远祖的古代夷越族，与其后裔存在着相同的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考古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特征有许多吻合之处。

青莲岗文化的创造者是水稻种植的发明者。湖南澧县的城头山（8000 年前）、舞阳的贾湖（8000—7000 年前）、高邮的龙虬庄（7000 年前）、浙江的河姆渡（7000 年前）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迹是人类最早种植稻谷的证据，比印度中部距今 3700 年的卢塔尔（Lothai）遗址要早四千年左右。考古发现表明，东亚的原始稻作可分为三个栽培带：1. 淮河流域的粳型稻栽培带；2. 长江流域的籼粳型稻栽培带；3. 华南的籼型稻栽培带。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原始稻作是在江淮流域繁衍起来，然后逐渐向周围传播的。粳型稻作农业的东北传播，起自淮东原始文化，沿海向北至山东半岛，再经由朝鲜半岛南部，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北九州。[1] 因此，东南原始文化系统——青莲岗考古文化系统可以称为“稻作文化”。

仰韶考古文化系统是黄土高原和河谷孕育的精灵。远古先民

① 张敏、汤陵华：《江淮东部的原始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李天石主编：《文献与考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以渭水河谷为基地，发展到河套地区、湟水之滨，以至川滇西北。仰韶文化系统的早期是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中期可以分为4个亚文化分支：1. 漳河流域的后冈文化（漳河文化）；2. 关中地区的史家文化（关中文化）；3. 江汉北部的大寺文化（汉北文化）；4. 河套地区的清水河文化（河套文化）。晚期亚文化有：中原地区的西王村文化、渭水流域的半坡晚期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向西南方向扩散的金沙江的大墩子文化、澜沧江的卡诺文化、云南的白羊村文化、洱海的马龙文化。

这一文化系统的主要共相是：1. 以粟类作物为主。2. 以椭圆形石斧为典型。3. 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以圜底、尖底和平底为主。拟人形造型较多，彩陶工艺发达，以鱼、蛙图纹为特征。炊具以罐为主。陶器上有刻划记号。4. 住宅以圆形半窑式黏土木构建筑为主。5. 多葬制。仰韶文化系统分布的地区，正是古代羌戎诸族活动的范围，而且在考古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诸因素中有许多可以验证的史迹。

仰韶文化的创造者是粟类作物的发明者。目前世界上发现粟类的遗迹以仰韶文化为最早，距今大约有八千年，比非洲、欧洲种植粟类的历史要早4000年。梵文中"粟"的名称是"china"，说明它是由中国传过去的。瑞士植物学家认为粟类起源于中国的华北，在史前时期已经传入西方。因此，西北原始文化系统——仰韶考古文化系统可以称为"粟作文化"或"稷文化"。只有麦子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史前即从西方传入中国。"麦"，来也，外来农作物，因此与"来"同源。

北方细石器文化是山林、草原、大漠的产物。已经发现遗存数百处，但是系统的研究还不够。具有代表性的是：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内蒙的苏尼特文化遗存、新疆的七角井文化遗存和西藏地

区的黑河文化遗存等。

北方细石器文化的文化共相是:1. 以船形石核、楔状石核为特征的剥片技术,圆锥状石核较普遍。2. 压剥法为制石的主要技术。3. 以石片器为主,盛行嵌镶石刀的复合工具。细石器文化分布的地区是历史上狄人、胡人等阿尔泰诸族活动的范围。这一地区的西北是羌人活动的地域。在黄河流域腹部、山西的下川和丁村等遗址,发现了与细石器文化关系密切的远古遗存,也许这些地区是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发源地。以狩猎和畜牧混合经济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比较接近早期仰韶文化系统。

在东北发现的兴隆洼—查海文化(或称为新乐文化)和红山文化十分令人瞩目。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兴隆洼—查海文化分布在以辽东为中心,南到大连、北到松花江中游的地域,具有与细石器共存的红陶文化,以红褐陶器为代表。器形以深腹罐最为典型,以压印的之字纹饰为特色。这些远古先民,使用长体圆刃斧磨制石器,住半窖穴式房子。距今 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出现了"草原第一村",反映出兼营农业—狩猎—畜牧的混合经济生活。距今 6000 年的红山文化,发现了最早的祭祀遗址、母性偶像和碧玉龙型器。虽然其时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细石器文化,但驯养动物以猪、羊、牛为主,没有发现马的遗骨,推知当时还是"猪文化"时代。只有在长于奔驰的马驯养成功或传人以后,草原大漠地带的原始农牧混合经济才演变为专门的游牧经济,从而孕育出四处驰骋、迁徙机动、善于征战的"马背上的文化"。从原始采集中出现农业的萌芽,从原始狩猎中产生动物的驯化,由此形成农业—畜牧的原始混合经济,在此基础上才从受控于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分化出较为专门的农业经济或游牧经济。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远古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无法摆脱

生态环境的制约。总体来说，青莲岗考古文化和仰韶考古文化属于原始农耕文化（兼有原始狩猎），北方细石器文化属于原始游牧文化（兼有原始农耕）。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就当时的文明程度而言，处于东南得天独厚的青莲岗考古文化系统最高，处于西北河谷地带的仰韶考古文化系统次之，处于北方草原山林的细石器考古文化系统再次之。这一与东亚大陆远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考古文化系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新石器—金属时代以来的东亚大陆的本原文化、社会组织、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制约着中国境内文化史、社会史和民族史以及语言史的发展走向。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形成相平行，三大太古语区也同时形成。如果根据考古文化系统命名法，可以分别称之为太古青莲岗语区、太古仰韶语区和太古北方细石器语区；如果根据古代文献族称命名法，可以分别称之为太古夷越—苗蛮语区、太古氐羌语区和太古胡狄语区；如果根据已有语系术语命名法，可以分别称之为太古南岛—南亚语区、太古藏缅语区和太古阿尔泰语区。

第二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传说历史学证据

《史记·老子列传》索隐曰，“稽古羲、黄”；《汉书·魏豹田传赞》曰，华夏为“炎、黄之苗裔”。《易传》以“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的伏羲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神农氏——“初造书契，百工以乂”的黄帝为原始华夏文化演进之先后次序。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证发的，正是中国传说古史中的这三大原始氏族系统。

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历史考古学所谓“现代科学方法”的影响，其“灵感”来自于民间戏剧歌谣的流传（顾颉刚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写道：“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

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滥用“默证法”，把大禹考证为一条虫。上古流传下来的种种传说史料，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下被认为是战国秦汉时期杜撰的“伪古史”，5000年华夏文明史一笔砍去2000年。（关于顾颉刚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另撰文批判。）到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尹达在《衷心的愿望》中认为，在考古工作中已经“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材，切不可一概抹杀”。

上古远史先是口耳相传，辅以原始实物记录，如结绳、刻划和图画等等，至文字发明始书之典册。尽管在世代口耳相传和后人契刻笔削中会有神话、夸张、讹变、附会、删并、嫁接等等，但是绝不可以视为子虚乌有而一笔勾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口传历史时期和文献历史时期。口传历史时期没有文字，氏族事件口耳相传，可能有考古遗存验证。文献历史时期具有文字，除了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同时逐步将口耳相传的史前神话传说记录为文字。与之相应，历史学的研究应当有“史前历史学”（原史）和“史后历史学”（正史）两部分。史前历史学可以一分为二：以考古文化学为内容的“考古史前学”，以神话传说学为对象的“相传史前学”。把地底下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上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相互验证，是史前历史学的任务和目标。

正是有了文字，远古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才有可能以文字形式转变为可供研究史前史的神话传说学；正是由于逐步追记，才使神话传说学显得记录的时间越晚反而记录的内容年代越古。虽然追记的史前神话传说不如当时所记的史后文献资料那么直接，但

是神话传说中的许多事件都被考古发现逐步证实，使我们不得不认为神话传说以曲折的方式记录了远古历史的素材。其实，就是文献资料，也并非即为确凿无误的“正史”或“信史”。由于欧洲的一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从公元前就开始的绵延几千年的编年史传统，所以欧洲一些国家或民族的古史研究必须依赖考古学的成果。虽然中国历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印证和新发现，但是切不可以完全照搬西方考古史学的那一套，把历史研究完全置于考古发现之下。这和语言史的研究具有某种相似性，绝不可以像普林斯顿学派那样完全抛开文献语言资料，而只依据现代方言来重建中国语言史。近年来的考古文化成果促使我们走出传说历史研究的误区，彻底告别20世纪上半叶的“疑古时代”。

一、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对应的三大原始氏族系统

兴于江淮而发展到黄河下游的太昊(皓)号伏羲氏，被夷越(苗蛮百越等先民)人奉为始祖。任何远古氏族首领的称号都具有双重性：既是远古氏族首领的个人称号，又是远古氏族的集体族号。“伏羲”字形又作“庖牺”，即以火烤肉，可见其经济生活以佃以渔。根据河姆渡考古文化遗址中的大量碳化稻米、家猪骨骼与陶盆残片上的稻穗纹和猪图纹，可以推断作为中国南方居民的米饭加猪肉的饮食习惯在7000年前就已经萌芽。相传“伏羲作卦”(在江淮考古文化中发现了八卦的雏形)，用抽象符号概括事物变化，可见当时文明程度较高。《左传》曰，“陈，太皓之墟也”。陈在近淮南淮阳一带，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为最早之“淮夷”。伏羲氏从淮河流域向北逐步扩展，共有九部，合称“九夷”。扩展到山东的“东夷”，其首领为少皓。少皓之墟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后裔主要活动在海岱地区。少皓氏以鸟为图腾，“以鸟名官”共24种，盖24个氏族

名称。太皓氏“九夷”中有“风夷”，少皓氏有“凤鸟官”，“风”与“凤”相通，少皓氏与太皓氏的源流关系由此可见。传说“及少皓之衰，九黎乱德”(《国语·楚语下》)，“黎”是“夷”的转音(后世有“黎民”，即“夷民”或“人民”，“夷”、“人”、“黎”是同源词)，“九黎”就是“九夷”，所谓“乱德”的首领就是东南夷越的氏族英雄蚩尤。

考古学家认为山东大汶口考古文化(前4500—前2500)就是太昊部族文化，在这一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有学者把这种刻画符号称为“陶尊文字”(陶文)，并认为这是比甲骨文早2000年的中国文字的祖先。当然，也有文化史家认为这些不是文字，而是大火图像、生殖崇拜等宗教性祭祀符号。依据普通文字学理论，文字符号必须具有记言性和语词对应性，单个的图画符号还只是前文字阶段的记事符号。根据用于占卜的甲骨文的使用者商人为原始夷越族，可以推测中国文字起源于东夷巫士文化。虽然大汶口陶文与甲骨文字的萌芽可能有一定渊源关系，但是不能认定大汶口陶文就是中国文字的祖先或中国最早的文字，因此不可能以此为标志将中华民族发明文字的历史从甲骨文时代推前2000年。

兴于渭水而发展到黄河中游的炎帝号神农氏，为氐羌人之始祖称号或集体族号。据说炎帝生于姜水，而姜水是陕西渭水的一条支流。从渭水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氐羌人活动的地方，因此炎帝被奉为古代氐羌人的宗神。神农氏或神农氏的一支后裔称“烈山氏”，生活在今湖北一带。“烈山”即放火烧山。在夏代以上，烈山氏被奉为稷神，说明他们是从事刀耕火种的氏族部落，主要种植旱耕作物稷子。神农氏的另一支著名后裔称“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被奉为社神。

兴于北方草原而后进据中原的黄帝号有熊氏，为胡狄人之始

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 第一册认为，黄帝是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所追思的祖先。推定黄帝为北方阿尔泰或胡狄族之宗神的依据是：1. 黄帝请旱神女魃助战才大败蚩尤，表明黄帝族是适应北方干旱气候、"迁徙无常处"的游牧部落。2.《国语》有："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十二姓中的骊戎、狐戎、白狄中的鲜虞都是姬姓，透露出那些奉黄帝为祖先的北方氏族部落原来就是戎狄。只有后来进据中原的一部分部落居民才参与融为华夏族。3. 周初将黄帝的后裔分封在幽燕，冀北为黄帝族的故乡。4. 黄帝又称为轩辕氏，"轩辕"即马车，传说黄帝造车。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早发明或使用马车，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5. 黄帝的一支后裔夏后氏，姒姓，也是戎人，夏禹称为"戎禹"(《潜夫论·五德志》)。《诗经·商颂·长发》曰，"禹敷下土方"。依据甲骨文卜辞研究"土方"在今河套一带，夏后氏从此沿黄河南下而进人中原。夏后氏南下中原之后，有些戎人还居留原地，如秦汉之"匈奴"。《史记·匈奴列传》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伏羲氏称"太皓"，"皓"为日光，"太皓"即太阳。神农氏称"炎帝"，"炎"为烈焰，亦为日光之强烈。"黄帝"之"黄"从"光"，喻义为太阳；黄帝称"有熊氏"，"有"是阿尔泰语词头，"熊"为火势之烈。由此可见，三大原始氏族宗神的称号，皆反映了东亚先民对太阳神或火神的自然崇拜。

传说黄帝在公元前 3000 年进据中原，可以将其时三大原始语区分别称之为原始夷越语区、原始氐羌语区和原始胡狄语区。石兴邦认为："从考古文化的观点说，在一个文化体系中，还包含若干

①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这些文化共同体是由该氏族部落聚居的地区、时间和从事经济生活性质的异同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相”。[①] 因此，每一种原始语区中也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即若干由聚居的地区、时间和其他因素而形成的特有语言相，或“语群”与“语种”。原始夷越语区可能包括九夷语群、百越语群、苗蛮语群、僚人群等；原始氐羌语区可能包括氐人群、羌人群、焦侥语群、百濮语群等；太古或原始胡狄语系可能包括西戎语群、北狄语群、貉人群等。这些有差别的原始语言，又成为后来语言交融或分化演变的源点。

二、史前三大原始战争和原始氏族文化的接触融合

考古研究表明，青莲岗考古文化系统溯黄河而上，仰韶文化考古系统沿黄河而下。经过一千多年的频繁接触，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在河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即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这个文化共同体包含两大文化系统的一些共同文化特征，但以东方文化占优势，其特征与青莲岗考古文化比较接近，而渗人仰韶考古文化的一些因素。由此可知东南系统的文明程度在当时较高。庙底沟氏族文化形成以后，就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而有力地融合着附近的氏族部落，逐步占有着原半坡仰韶氏族部落文化的区域。中原地区像一个文化融合的漩涡，将新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而又洪溢出具有“融合性”的文化因素，向边缘区域漫延，由此出现了最早的混合型中国文化原始共同体。[②]

青莲岗文化系统创造者的体质特征是蒙古利亚人种南亚类型，仰韶文化系统创造者的体质特征是早期蒙古利亚人种东亚、南

①②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

亚类型并存，青铜时代为东亚类型，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创造者的体质特征是早期蒙古利亚人种北亚、东亚类型并存，晚期趋于混合。[①] 与文化的接触交融和体质类型的混合相平行，语言的混成融合也不可避免。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文明的传播洪溢或冲突交融，往往以残酷的战争为媒介。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次氏族部族战争，成为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与三大传说氏族系统冲突交融而逐步混合的史前史折光。

第一次是东南蚩尤与西北共工的"涿鹿之战"。这一原始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之际。蚩尤部落是伏羲氏的一支，共工部落是神农氏的一支。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部落的土地。共工"振滔洪水"，危害了九夷部落的利益。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逸周书·尝麦》）。"涿鹿"据说在今河北地方。共工拥有的"九州"全被蚩尤攻占了，便"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

第二次是北方黄帝与东南蚩尤的"冀州之战"。共工部落战败后，炎帝族北上求援，"乃说于黄帝"，结成炎黄联盟以对付蚩尤。相传"蚩尤作兵"（《世本·作篇》），已经拥有金属武器，迫使黄帝一开始处于守势。但黄帝"使应龙蓄水"（蓄水，积蓄水。不给蚩尤以水，让蚩尤部落干旱难熬。通常误注"蓄水以冲击蚩尤"，与下文请来旱魃文义不合），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天大晦冥"，风雨交作而旱象全消。黄帝只得又请来更厉害的女神旱魃，致使天气放晴，气候干燥。蚩尤原居东南，习惯于阴雨潮湿气候；黄帝属于"迁徙无常处"的北方游牧部落，适应晴天干旱气候。利用旱魃的威力，黄帝终于打败了不服干燥气候的蚩尤。蚩尤只得南逃，黄帝擒杀蚩尤

① 格勒：《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

于冀州之野。黄帝乘胜进入山东一带，并令“少皓清正司马鸟师”统领夷人各部，黄帝与夷人结成部族联盟。

第三次是西北炎帝与北方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不再返回北方，“诸侯咸归轩辕”。“炎帝欲侵凌诸侯”，与黄帝争夺盟主地位。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地·五帝本纪》）。“阪泉”据说也在今河北一带。胜利了的黄帝族乘势向南发展，进据黄河中游，又扩张到江汉流域，“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在中原地区，炎帝族的后裔大概又与黄帝的后裔结成联盟了。①

原始部族战争促成了原始华夏族的形成。蚩尤和共工之间的夷羌之战，暗示了东南夷越水耕文化与西北氐羌旱耕文化的早期交流，可能即庙底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在古史传说中的投影。炎帝“乃说于黄帝”，结成炎黄联盟，表明了西北氐羌农耕文化与北方胡狄游牧文化的早期接触。黄帝擒杀蚩尤的夷狄之战，北方游牧民族打败东南农耕民族，后令少皓统领夷人各部，反映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东南农耕文明的冲突交融。黄帝与炎帝的狄羌之战，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北农耕民族的冲突。黄帝进据中原，“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为三大原始文化系统的加速融合创造了历史契机，为中原华夏文明、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黄帝被后世奉为5000年华夏文明史的“人文初祖”，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落笔溯源。

游牧民族强悍机动、征战常胜，然农耕文明先进，因此胜利了的征战者进入中原却被战败者的先进文化所浸润而同化，伴随着民族的融合而出现语言的融合。黄帝部族南迁中原以后，逐步由游牧或半农半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促进了中原各部族内

① 以上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部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加速了中原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进程。氏族部落之间交错居住，互相通婚，结成联盟，跨出了华夏民族和华夏语言混成发生的第一步。

在古代传说中，后人不但把夷人和羌人的一些部落列为黄帝的后裔，而且把许多发明创造，如衣服、舟车、文字、历法等等，都归功于黄帝。黄帝部族十二姓氏有些已不可考，有些和夷人中的一些氏族同姓，可能是互相融合的缘故。黄帝十二姓氏中，比较突出的有姬、祁、任、姞四姓。姬姓相传为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成为庞大的势力，江汉一带的称为"汉阳诸姬"，河北北部一带的诸姬，周初分封为燕国。祁姓中的陶唐氏，迁到今山西汾水流域，最杰出的人物就是唐尧。黄帝后裔夏后氏，最著名的首领是夏禹，从河套一带沿黄河南下而进入中原。留居在原地或继续游牧草原的胡狄人，则成为古代阿尔泰人，如周代的猃狁、秦汉的匈奴等。

较早融入华夏族的夷人是皋陶、伯益、颛顼和帝喾。传说皋陶生于曲阜（东夷），但皋陶的后裔南迁到江淮之间的今安徽六安、舒城一带（淮夷）。皋陶的后裔有群舒：舒蓼、舒鸠、舒鲍、舒庸、舒龙、舒龚，这些族名的结构都是南方夷越语言的 NA 顺行结构。"舒"和"徐"古音同义通，群舒的后裔就是后来的"徐夷"。伯益也是较早融入华夏的夷人，主要活动在今鲁、苏、皖、豫之交，秦、赵也是伯益的后裔。皋陶的姓氏为偃，伯益的姓氏为嬴，"偃"、"嬴"音近，当是两个近亲部落。夷人中最著名的一支是颛顼，号高阳氏。《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卫，颛顼之墟也"，在今河南濮阳县，盖受蚩尤战败的影响而南迁。火神祝融是颛顼的后裔，《左传》文公十八年："郑，祝融之虚也"，在今河南新郑一带。祝融氏八姓，其中有楚人的祖先芈姓。楚人自称为"高阳氏之苗裔"而祭祀祝融，在商朝灭亡时逃往江汉流域湖北一带，后来建立了强大的楚国。夷人中的

另一支帝喾,同颛顼是近亲关系。帝喾号高辛氏,其后裔中杰出者是有虞氏帝舜。有虞氏农业、饲养业和制陶业都相当发达,相传日月干支是从帝舜时代产生的。在传说里,关于有虞氏父权世系的记载最多,表明其时父系社会较发达,华夏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商人源于帝喾封在丘商的儿子商均,因此商人所说的始祖契是帝喾的后裔。从"契"的形和义是用刀刻木,可以推定"契"与文字的创造相关。由于颛顼族和帝喾族很早就融入原始华夏族,所以有些传说把他们当作黄帝的后裔。皋陶、伯益、颛顼和帝喾这四个分支融入华夏族以后,其余的东南夷人遂与华夏族有别,被称为"淮夷"、"东夷"、"三苗"、"南蛮"、"江蛮"、"百越"等。

相传炎帝的后裔中得到发展的是姜(与"羌"同源)姓的四岳。四岳的始祖为伯夷,后来这一支的首领吕尚(姜子牙)协助武王伐纣,受封于齐国。古代羌人的一部分曾经到了今山东地方,更多的则是分布在今陕甘宁和川青藏的广大地区,后来被称为"氐羌"或"羌戎"。据说"伯夷生四岳,四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可证氐人和羌人都与共工氏和四岳等有血缘关系。只是因为四岳等部落较早地融入华夏族,居住在西北地区的炎帝后裔后来就成为与华夏族有别的西戎了。

从黄帝以后,华夏文化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只是约指几个最显耀的部族联盟首领,他们的氏族部落原来分布在不同的地区。经高阳氏颛顼(夷越系,河南)、高辛氏帝喾(夷越系,河南)、陶唐氏唐尧(胡狄系,从山西汾水流域进入中原)、有虞氏帝舜(夷越系,河南)、夏后氏戎禹(胡狄系,从河套一带南下进入中原)此起彼伏逐鹿中原。华夏族在中原地区逐步融合形成的同时,原始夷越语、原始氐羌语、原始胡狄语也逐步混合而成原始华夏语。而没有卷进融合旋涡的周边初民,或留居故土,或四处迁徙。西北

的远至青藏高原，朔方的远游大漠以北，东南的越过长江岭南，甚至抵达南太平洋诸岛。在中国境内的原始民族，以华夏族所处的中原区域为基点，“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说文解字》)，另外还有“苗”、“越”等称呼，或统称“四夷”，后世遂有“夷夏之别”。

这种围绕富庶中心地区反复征战的情况，在其他文化圈也曾经存在。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的两河流域，前第四千纪到第二千纪，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早期的两河流域文明。前 24 世纪，北部的阿卡德人在萨尔贡(前 2369—前 2314)国王的率领下打败了苏美尔人，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前 18 世纪，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王朝，在汉穆拉比(前 1792—前 1750)国王时期统一了两河流域。前 14 世纪，亚述又征服了两河流域。这些反复征战和扩张统一，在摧毁了原有文明的同时，又在原有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地域更为广阔的强大文明，同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长期以来，囿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传统观点，一直没有揭示出华夏民族来源的复杂性，只是到了 20 世纪，随着考古文化的发现和三代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才开始逐步认识到。

第三节　华夏语混成发生的历史语言学证据

原始华夏母文化发轫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阿尔泰胡狄，西与藏缅氐羌，东南与南岛夷越毗邻，华夏语言与这些周边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而言之，河洛地区在古代是阿尔泰、藏缅、南岛三种文化与语言的交汇之处。历史语言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华夏汉语与这三种毗邻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或语言接触中的渗透关系，由

此出现了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华夏语和毗邻语言之间的三种同源论。

一、汉藏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藏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和藏语同源。除了主张此说的西方学者如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等以外，中国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学者主要有李方桂、王静如、闻宥、罗常培、董同和、俞敏、邢公畹等。最早从词汇上加以系统比较的是王静如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试探》，[①] 最早从语法上论证汉藏语言同源的是俞敏的《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②] 最早提出汉藏语系四分法的是李方桂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37）。

俞敏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③] 中认为，卜辞语系未定，不作讨论，而汉藏两族人种族同宗且语言同源。从种族来看，周人和藏人同宗共祖。其始祖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而姓姜。周人虽然姬姓，但是其祖母为姜原，姜、姬是通婚氏族。有着姜氏血统的周人东进而灭商，统一中国北方八九百年，经过春秋战国、先秦两汉而形成汉族。"羌"、"姜"同源，留在西北的羌人仍然过着食肉饮奶的放牧生活，秦汉以后只有零星的部落偶尔强大。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王国，明朝叫"乌斯藏"、"卫藏"，这个民族就是汉人5000年来的亲骨肉——藏族。就语言而论，汉语和藏语同源共根。最奇怪的是，藏语和姜姓独有的方言现象更相似，即藏语和周姜王公诸侯所用的语言较相似。比如，藏语近指代词为 adi，远指

① 载《史语所集刊》1931年第3本第1分册。
② 载《燕京学报》1949年第37期。
③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代词是 de,《尚书》中近指代词为“时” * də,远指代词为“是” * de,两者之间具有对应关系。

藏族自称 bod,其来源说法不一。一说是地名,一说是“农业”,而较流行的说法是源于宗教 bon。在佛教传入之前,古代藏族信奉“本教”,而古藏文 - d、- n 交替。秦汉时代称青藏地区的各族为“羌”,群羌之中的“发羌”被视为藏族先民。“发”,方伐切,读若“拨”,与 bod 音近。唐代文献中称西藏为“蕃”或“吐蕃”。元明曾有“乌斯藏”的记载,但“乌斯”指后藏,“藏”指前藏。以“藏”称“藏族”,时在清末。“藏”取之雅鲁藏布江中流至后藏的“藏布”,“藏布”是江河的含义。[①] 羌人是宗祖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因此姓姜。姜为水名,藏语的江河叫“藏布”gtsaypo,gtsay,是否与“姜”、“羌”同源值得深究。“江”汉语 * klong(上古见东),傣语 krang;“姜” * klang(上古见阳),“羌” * khlang(上古溪阳)。以原始氏族名称为河流名称,再以河流名称为现代民族名称,这也许是语言文化的历史孑遗。

多年来的汉藏语历史比较,主要集中在挖掘同源词和寻找可能的语音对应关系,较少涉足语法领域。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两者在语法结构上的分歧已经超过共同点。藏语是黏着语,有一套位于名词性成分之后的格标志系统。藏语动词运用元音交替和辅音前后缀表示动态动词的时态变化,还有及物与不及物、使动与非使动、自主与非自主等特殊语法范畴。此外藏语的施受语序是 SOV 型,修饰语序是 AN 与 NA 并用。根据河野和桥本万太郎的研究,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言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

①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言。[1] 周代语言是否具有名词的格和动词的形态，由于汉字的非拼音性质，从文献中已经很难看出，但先秦文献中有 SOV 和 NA 语序结构。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言大有关联，是因为汉藏语言确有同源关系。至藏语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言，我的解释是：这种相似性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而是汉藏语言和阿尔泰语言之间的原始类型相似，藏语保留着古老汉藏语的句法特点。

二、汉南同源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K.Benedict）在《汉藏语言概论》[2] 中于 40 年代提出的“澳泰语系假说”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把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对长期奉行“汉藏苗瑶侗台语言同源说”的中国语言学界震动很大，由此引发了我对汉语起源探讨的兴趣。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言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991 年在《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学者沙加尔（L.Sagart）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论文的报道。随后郑张尚芳提出“华澳语系假说”，以之囊括汉藏、南亚与南岛诸语言，白保罗的澳泰语系则被包容在更大的语系之内。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20 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如孔好古（A.Conrady，1923）和吴克德（K.Wulff，1942）等，就已编写了汉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

① 详见胡坦：《国外藏语语法研究述评》，《国外语言学》1993 年第 2 期。
②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乐赛月、罗美珍译。

语的词汇对比表。他们认为,词汇比较证明,在澳斯特利(Austric)语言(孟高棉语—南岛语)和汉藏语言(汉泰语—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吴克德的观点牵涉到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试图提出一个汉藏泰澳语言的超级语系,来重新解释东亚及南太平洋诸岛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问题,并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北部和中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1937年,海因·格尔顿(R. Heine Geldern)指出,商代艺术与南太平洋马贵斯群岛艺术以及马来群岛的新几内亚艺术之间存在相同点,设想这是由于在公元前1800—600年之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的结果。他还指出波利尼西亚的一些岛屿(尼余、伊斯特岛、夏威夷、马贵斯群岛)和中国在时间计算制方面的共同点。1951年,凌纯声根据印尼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中国中部的洞庭、鄱阳两湖之间。1969年,他又推定中国东部的"东夷"就是今天密克罗尼西来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1980年,张光直指出商王朝的继承方式和一些南岛语社团现代继承制度之间的共同点。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杨江的研究,早在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印尼,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依据南太平洋诸岛的考古成果,杨江甚至给出了一份东迁时间与到达地点的运行表。除了部分人与当地土著(如巴布亚人)混合之外,绝大多数迁往南洋诸岛的夷越人至今还保持着与中国东南部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

1990年,法国学者L.沙加尔在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发表《汉语南岛语同源论》(*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一文,使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研究掀起热潮。沙加尔用构拟的原始南岛语和近三千五百个见于《集韵》的词语(拟音依据高本汉《修订汉文典》的中古和上古音),进行历史性比较。与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和梅祖麟的观点相同,沙加尔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中古声调是从上古喉塞尾演变而来的,而原始南岛语也没有声调。沙加尔认为上古汉语语素是典型的单音节,音节结构是C/CC(M/MM)V/VV(E),即一个无选的单辅音C或复辅音CC、一个可选的单介音M或复介音MM、一个无限定的主要元音V或复元音VV和一个可选的韵尾辅音E构成。面对原始南岛语语素的双音节性(甚至可以多达三个音节)以及辅音交替和元音交替的普遍情况,沙加尔发现一个规律——汉语的"字"经常与南岛语语词的末尾音节相对应,而南岛语的许多双音节词语的词根正处在末一个音节上,也就是说经历过单音节化过程的古代汉语保留了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音节。如:南岛语 * lalu(在前走、经过),汉语"逾"上古 * lju、中古 * ju。邢公畹同意沙加尔的观点,发表了评价与补正沙加尔研究的《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1991)的系列论文。

学术界认为侗台语各族先民与古代百越人有关,而百越人的一部分原居住在江淮一带。郑张尚芳在《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①] 中揭示了江淮一带的古越语底层残留。苏北地名"盱眙",古地名皆作"善道"。《谷梁传》:"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其中"稻"当为"道"。"伊"古音 * ʔli,"缓"古音 * ɦwa:n,与今侗台语"好、善"与"道路"分别相当。侗台语语序为NA,华夏语语序为AN。侗台语的"缓伊"(路好),在先秦华夏语中

① 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意译为“善道”(好路)。秦代始改名为“盱台”(“台”后类化为“眙”),古音为 * ɦwa - lɯ,“盱”与“缓”为阴阳对转。先秦的“善道”为意译词,秦汉的“盱台”(秦音)、“缓伊”(鲁音)为音译词,可证“盱眙”为古吴越语之孑遗。《左传》哀公元年曰“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夫”古音 * pja,与侗台语“石山”pja、pha、pa(岜)相对,“夫椒”即吴越语的“椒山”。又《左传》昭公十年曰“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夫于”在山东济南一带,又称为“於陵”,“于”、“於”相通,“夫于”即“于山”。《左传》桓公十一年曰“公会宋公于夫钟”,“夫钟”在山东宁阳,隋代设龚岳县,后改为龚丘。“夫钟”即“钟山”,即“龚丘”。从这些古代地名可以看出,黄淮—江淮—太湖流域一带的古代居民是与侗台语各族先民同源的夷越族,他们的语言都源于原始夷越语。

在《汉语方言一些语音现象的历史解释三题》(油印稿)中,郑张尚芳认为,吴语、粤语有些方言古帮母字、端母字读先喉塞音 ʔb、ʔd 或者 ʔm、ʔn/ʔl;浙西南古见母字、章母字白读 ʔj;上海郊区见母字读 ʔɟ;闽北方言见母变读 ʔ 或 x,闽南方言日母字、云母字白读 h 声母;闽北、闽南的来母字、以母字都有 s 白读。通过引证侗台语言中的相类似例子,说明这些声母的特殊读法属于古百越语底层的影响。陈忠敏在《某些音位变体在语言底层研究和史前史、民族史、人类学研究里所起的作用》[①] 中也指出,上海与浙南地区至今尚存的缩气音,为古百越居民的居住地域及其迁徙路线提供了线索。

至于古越语的文献,在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收录了一首附有汉语译文的汉字记音《越人歌》,是公元前 528 年左右的作品。

① 载《上海青年语言学》1987 年第 4 期。

1981年，韦稳庆发表了《越人歌和壮语的关系试释》，利用壮语和《越人歌》语句进行比较。郑张尚芳依据书面泰文重新释读了《越人歌》，[1] 又利用台语解读了《越绝书》中的越王勾践“维甲”令，[2] 进一步证明了春秋时代的吴越语和现代侗台语同源。“越绝书”之“绝”古音 * dzod，与泰文 cod[tsod]“记录、记载”音义相近，又《越绝书》别称“越录”、“越记”，亦可证“绝”即“记录”。

远古时期，江淮流域和东南沿海属于原始夷越(苗蛮)语区。上古江淮居民分别称之为“夷”(江淮—黄河下游流域)、“越”(江浙太湖流域)、“蛮”(鄂湘赣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蛮”是古代苗瑶族的自称 mlwan，其意义是“人”。汉语“蛮”上古音 * mran，与“苗” * mjao 同源。现在苗族自称为 mhu、muŋ、ɕoŋ 等，瑶族自称为 mjen、mun，畲族自称为 ne，跟蛮 * mlwan/ * mran 具有对应关系。“苗”在先秦典籍已出现，但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瑶”作为族称见于唐代的《梁书·张缵传》，与免除其徭役有关。“畲”作为族称见于宋代，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有关。远古时期，苗蛮居住在洞庭—鄱阳湖流域，“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被中原华夏击败以后，才向荆州以南迁移。唐宋时期，苗族分布在湘西和贵州一带，约在明初从贵州迁人云南。瑶族分布在湘西南和广东、广西境内，元朝时从广西陆续西迁云南。[3]

《后汉书》、《华阳国志》、《魏志·僚传》分别记载夜郎、蜀中有土僚，僚人有拔牙风俗。历史上的仡佬族，曾被称为“土佬”，“佬”与“僚”音近，可以看出僚人和仡佬族的关系。仡佬族又自称为“布

---

① 《越人歌解读》，以英文发表于法国 C.L.A.O.20 卷，1991 年第 2 册；中文译本载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第 7 辑，语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勾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 年第 4 期。

③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傣"、"傣门"("门"与苗自称 muŋ,瑶自称为 mjen、mun 音近)、"傣德"、"布雄"("雄"与苗族自称 ɕoŋ 音近),可以看出古僚人与苗瑶壮傣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的居民中,包括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良渚等考古文化的先民和华南印纹陶文化的创造者,广泛流传拔牙风俗。这种风俗一直保留在云南、贵州、四川的一些南方民族中间。苗瑶—壮侗各族的迁移走向是自北而南,再从东向西。拔牙风俗在地理上的分布走向,与壮侗语群居民的分布走向一致。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居民体型与蒙古人种玻里尼西亚(南亚)类型最为接近。唐兰曾提出大汶口文化是传说中的东夷氏族的少昊文化遗存。[①] 如果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氏族文化,那么东夷氏族语言与原始壮侗语群则属于一个古老系统。台湾高山族居民也有拔牙风俗。这一风俗与白保罗的壮侗语群和印尼语群同源论、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之间具有联系。

虽然从黄帝时代开始,黄淮的一些夷越语就卷入华夏语的混合发生,但在西周依然存在豫东(宋国)、齐(齐国)鲁(鲁国)一带的原始夷语,江浙皖东(吴越)一带的原始越语和鄂湘赣(楚国)一带的原始楚语三大语群。豫东齐鲁夷语最早逐步华夏化,成为上古华夏语和齐鲁语。江淮以南的越语,由于泰伯南奔,致使今江苏境内成为以古越语为主体的古吴语,吴越之间可以通话。越消灭吴,吴越语言混同。楚又灭越,楚语和吴越语连成一片,南奔越人和一直居住在浙南闽粤的越人被称为百越。原来的吴越地语言称为吴语(吴扬越语),吴越地之南部语言称为百越语,鄂湘赣的语言被称

① 《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为南楚语。“永嘉之乱”时中原居民大量南迁，吴语和楚语相连的格局被打破。江南吴语受中原语言同化成为中古吴语，中原居民的南迁又促使部分浙江吴语区居民南迁闽粤。江淮之间的吴语和鄂东的楚语受中原语言大面积覆盖成为江淮语，皖南境内受中原语言影响成为徽语，江西境内的南楚语受中原语言影响则成为客赣语，形成江淮语、徽语、客赣语对吴越语言的环状包围。吴语和楚语遂被分割，湖南境内的南楚语则成为湘语。岭南的百越土著语言从秦汉开始受到汉语的逐步同化，在唐宋时最终演变成为粤语。吴语虽然受汉语同化，但是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百越语言的底层。至于闽语和粤语含有较多古越语词语，甚至有人认为闽语是汉语和越语混合的“方言”，[①] 而粤语是汉语语群中的独立语言。[②] 留在大陆长江以南的南岛人后裔，一部分早已汉化为操吴、湘、闽、粤方言的居民，一部分则成为受中原语言文化影响语言发生转型的壮侗民族。

三、汉阿同源论

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同质关联的部分，有人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就发表了《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③] 后来又发表《〈楚辞〉注要翻案的有几十条——〈楚辞〉中的古突厥语》。[④] 但是当时历史语言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汉藏语苗瑶侗台语言的关系上，因此岑仲勉的研究并没有引起重大反响。

---

① 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李敬忠：《粤语是汉语语群中的独立语言》，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 年 27、28 期。

③ 载《东方杂志》1945 年第 41 卷第 5 号。

④ 载《中山大学学报》1961 年第 2 期。

20世纪80年代，民族语言学家赵相如专门探讨汉语和维语的关系。在《维吾尔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从语言上看历史上维汉人民的密切关系》[①]一文中，赵相如从维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的研究入手，用大量篇幅讨论了25个维语常用词，认为现代维语中至今保留着一些具有上古声母（如轻唇读重唇、舌上归舌头）特点的语词。维语中的一些"死词根"，如果从古代汉语的音义和黏着语词根和词缀结构的特点来分析，可以从古代汉语语词中找到词源。进而提出，维语和汉语的关系已不是一般的相互影响、相互借词的关系，二者可能在来源上具有某种一致性。随后在《维吾尔语的音节结构和借词拼写法的关系》[②]一文中，第三部分的21个注脚，每个注脚分析一个词，认为这些都是源于汉语的词。

在《汉语"氏"和维吾尔语"tɛg"的关系初探——兼及汉语阴声韵的辅音尾》[③]一文中，赵相如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古代汉语的"氏"及其派生的同族词，与现代维语tɛg或由此派生和演变的同族词及其后缀的关系。得出三点结论：1. 汉语和维语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2. 与从"氏"得声和派生的同族词的现代汉语读音相比，现代维语从tɛg或由此派生和演变的同族词的起首辅音完全保留着舌头音th或d，强烈反映了与上古汉语相近似的端知合一的原始情况；3. 从现代维语由tɛg派生或演变的同族词的收尾辅音来看，与入声韵相配的上古汉语阴声韵似乎带有韵尾辅音。再深入进行论证的是《试论现代维吾尔语辅音的弱化》[④]一文，赵相如从汉语音韵学和现代维语某些辅音弱化规律出发，对古代汉语

① 1983年第三届突厥语学术研讨会论文，载《语言与翻译》1996年第2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③ 载《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④ 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和现代维语的辅音作了一系列成套的比较。其结论是二者有密切的语源关系,其中列举的绝大部分属于维语的基本词汇。

赵相如还进一步推进到哈萨克语与古代汉语的比较研究。在《哈萨克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初探——兼论 qazaq(哈萨克)一词的源流及涵义》[1] 中指出,从上古时代的音义到现代哈萨克民族的称谓,从物质文化及民间习俗到畜牧经济的转徙,从衣食住行到日常生活,处处呈现着哈萨克先民和中原汉人先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清晰地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很深的历史渊源。文中具体考证的现代哈语 14 个常用词,作者认为它们分别来自古代汉语某个字的本义或引申义,并且有语音规律可寻。现代哈语的 qaz -“掘、挖”,来源于古代汉语的“掘”和“撅”(中古汉语的 - t尾,在哈语和其他突厥语中辅音弱化为 - z)。由此“哈萨克”的族称 qazaq 源于古代汉语“掘”或“崛”的派生词,其含义是“崛起者”或“起义者”。

虽然学术界对以上研究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具有说服力的商榷或驳论面世。尽管对汉语和突厥语乃至阿尔泰语言的关系需要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但是赵相如的探索应当得到肯定。从宏观语言学着眼,汉语和阿尔泰语不可能没有某种历史渊源。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竟成先后发表了《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2]、《关于“方法”》、《谈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3] 和《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4] 等文,对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源关系也做了初

① 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
② 载《探索与争鸣》1986 年增刊。
③ 载《现代语言学》1991 年总第 19 期。
④ 载《现代语言学》1992 年总第 21 期。

步探讨。

竟成提出:1.上古汉语和阿尔泰语都存在元音和谐。从《尚书》、《诗经》、《山海经》中选择了94个联绵词,将王力的30部分为A(央元音)、B(后元音)、C(前元音)三组,然后按语音结构进行联绵词的排比统计。依据统计结果:B、C两类可以自身同类组合(《尚书》53%、《诗经》64%、《山海经》47%);B、C两类可以分别与A异类组合(《尚书》45%、《诗经》30%、《山海经》43%);B、C两类不可以组合(《尚书》2%、《诗经》6%、《山海经》10%),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上古汉语元音和谐的特征是部位(前后)的和谐。元音和谐是阿尔泰语的普遍现象,无论从人种学、民族学,还是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方面考虑,汉族与阿尔泰民族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学良和乐赛月分别从羌语支和苗语中发现了元音和谐现象。张琨在藏语拉萨话口语里发现过元音和谐现象;虽然阿尔泰语的元音和谐格式多样(唇状和谐、部位和谐、松紧和谐),表现得十分严整,广泛分布于词根内部和词根与词缀之间,但是从本质上看,上古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元音和谐并没有什么不同。

2.汉语和阿尔泰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相似。不但形容词重叠的构成方式很相似,而且都是以之表示意义的加强。

3.汉语的入声韵尾和阿尔泰语韵尾的对应。汉语入声以-p、-t、-k收尾,在阿尔泰语的对应词中以-r或-l收尾,显示出较整齐的对应关系。

4.前缀a在汉藏语和阿尔泰语中都存在。汉藏语言中广泛分布着前缀a(可能来源于“有”),阿尔泰语的基本亲属词语也都带有这个前缀a(与“有”存在渊源关系)。

5.汉语方言人称代词和阿尔泰语复数后缀相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人称代词构成复杂,其中一类为-t、-l,这类复数后缀

在阿尔泰语中也是最古老的后缀之一。

6. 汉语和阿尔泰语有一批对应词。根据共同汉藏语的构拟形式，在阿尔泰语中已经找到一批与汉语有对应规则的基本词语，有些见之于斯瓦迪士(M. Swadesh)词表。

竟成认为，上述这些现象(2至6)与苗瑶—侗台语言无关，出现的时间很早。这些相似现象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并非由语言接触而成，有些成分类似于底层形式。汉语和阿尔泰语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反映了语系分化以前这一地域的语言状况，因此有必要提出"非谱系性的"或"前语系"的历史语言学概念。

关于汉语和阿尔泰语的相似性或同源性，要考虑如下问题：

1. 相似性形式的汉语时代。秦汉以后，北方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太大，有些相似形式可能是汉语阿尔泰化的结果。

2. 同源相似与接触相似的区分。虽然语言同源和语言接触没有绝对界限，远古接触也是造成同源的一种方式，但是较有所考的接触相似务必排除。

3. 这些相似性与其他语言的相似性。如果与其他语言也有相似性，那么这种现象就可能是一种更古老的语言关系的体现，也就是竟成的"非谱系性的"或"语网"关系。这种现象可能源于新石器时期甚至旧石器晚期的东亚语言共相。就元音和谐来说，要么上古汉语和原始阿尔泰语有底层同源关系，所以上古汉语中依然存在元音和谐的孑遗；要么在东亚原始语言中普遍存在，所以上古汉语和羌语、藏语、苗语也曾具有或一直存在到现在。另外上古汉语的双声词，是否可以从声母部位或方法的角度来考虑某种和谐呢？上古韵部通转是否与元音和谐有某种联系呢？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至于竟成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像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复

数 - t、- l 这样的词尾，广泛分布于东北亚诸语言（藏缅语言、蒙古语言、满—通古斯语言、突厥语言）以及北美印第安语言中。在印第安文图（Wintu）语中找到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类型特点等方面的许多材料，都可以与东北亚诸语言进行对应比较。这就从更深层次揭示出中石器时代太平洋语言文化圈北环原始语网的某些共相，北美印第安人的巫术和东北亚原始萨满教的相似性可与之互证。尽管可能像张光直所说的曾经存在过一个“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也许细石器文化确如王建和石兴邦所说最早产生于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典型的华北下川文化（山西沁水），沿东北亚、东西伯利亚等直到北美，北美旧石器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国华北，[①] 但在原始蒙古利亚人种进人北美演变成印第安人以后，文化传播由于地域的阻隔已不再通畅，两者的发展渐渐分道扬镳，除了残留某些远古共有文化相（宗教、政治、语言）的孑遗，其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体在东亚进人新石器—金属时代以后不复存在。

4. 如果这些语言相似性为史前时期的孑遗，那么可以认为汉语和阿尔泰语具有古老的语网同源关系。

四、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

面对汉语的三种“同源论”，如果坚持套用欧洲历史语言学的谱系树模式，那么就只能选择一种。反之，如果在证明一种同源论的同时，并不可能彻底驳倒或完全排除其他的同源论，那么只有放弃套用欧洲谱系树模式。历史语言学中的华夏汉语的“三种同源论”，表明了华夏汉语形成的复杂性。将三种同源论置于 7000 年至 5000 年之间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导致华夏民族产生的史前

① 参见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战争的宏观背景之上，可以提出"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

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不管是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语言材料、人种学与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分别论证了汉语与毗邻语言的同源关系。原始华夏族的形成是史前民族或种族融合的结果，与之同步形成发展的华夏语不可能不具有与被融合语言的对应之处。与其说华夏语仅仅与某一毗邻语言有同源关系，不如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语言的"祖语"都先后发生过渗透、换用与混成关系。换而言之，原始华夏汉语就是一种在伴随着多种原始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

混合语既是语言混合的结果，又是文化融合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语言的混合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在现代中国境内，从西北到西南再到海南的这条"语言文化走廊"中存在多种各具特色的混合语。在欧洲历史语言学谱系树模式占统治的时代，一味地强调语言的分化，认为语言的混合根本不可思议，给语言关系研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于三代华夏语的异质混成性，白保罗在《汉藏语言概论》中曾经提出，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来源，周朝人所操的某种汉藏语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至于商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是什么语言，白保罗没有进一步明确。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G.Pulleyblank）曾主张夏是古汉语族，商与南亚语系关系密切，而周之先世是藏缅语族，[①] 未见到详细论证。

① 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与之相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如果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差异如此，那么他们之间的文化应该代表歧异的历史经验与彼此之间基本性的差距应有很大。例如现代的汉语语族有汉人，现代的南亚语族有柬埔寨人，现代的藏缅语族有缅甸人，这三个民族之间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制度信仰都有相当显著的差别。从物质遗存来看，三代的文化是相近的，纵然不是同一民族，至少是同一类民族。①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张光直忽视了以下几点：1. 辽金时期融人中原汉族的契丹、女真，在元代与汉人已经没有什么不同；清代融入中原汉族的满人，在现代与汉人也已经没有差别。这种融合的时间都只有两三百年。2. 现代汉人、柬埔寨人和缅甸人的显著差别不仅有远古时代文化因子的遗传，更有近三千年的分别发展。3. 不同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域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现象。4. 在中原地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往往是武力强大而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文明，承袭了在战争中失败而文明程度较高的原有农耕文明。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以及"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只是表明三代礼制的既有承袭又有变革，并非三代文化的各自创造者族源同一性的证据。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可见殷周之际存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尔雅》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可证基本词汇的差别，另外不排除周人在承袭商人文字的过程中可能采取训读法。因此华夏汉族和华夏汉语一样，都是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融合的结果。

现存具有文化传承性的中国最古典籍成于西周时代。因为周

①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人是氐羌与胡狄之混血，所以周代文献《周易》、《尚书》、《诗经》等中的语言，既有与藏缅语言同源对应之处(这就是能够利用周代古音构拟与藏语进行比较的基础)，又具有联绵词元音相配与阿尔泰语元音和谐相似的孑遗(这就是能够利用周代古音构拟与阿尔泰语进行比较的基础)。因为周人因袭了夷越系的殷商文化，而江淮流域和东南沿海的东夷、吴越、百越、荆楚、南蛮的语言，不仅两周未能迅速华夏化或氐羌化，而且秦汉也不可能完全汉语化，直至魏晋南北朝的江南以及南中国依然存在许多夷越后裔的语词，并且以汉字的形式不断进入汉语。由于“永嘉之乱”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中心逐步南移，这些词语大量被收进隋唐宋时代的《切韵》、《广韵》和《集韵》，所以在古代汉语中仍然可以发现与南岛语言对应的成批词项。这就是沙加尔能够利用《集韵》语词的古音构拟来与南岛语言寻求对应关系的原因。因此华夏汉语与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即使不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详尽比较，也可以从考古文化学成果和地缘文化学原理中推测出来。

第四节　中原三代的更替与华夏语的氐羌化

在传统的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单源论”长久占据主导地位。1989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①] 然只有经过多元聚合才有一体主导。切不可以用现代中国境内文化的眼光，来揣测古代东亚地区文明的多元性和华夏文化的复杂性。只有在数种不同的文明冲突进程中而后混成整合的强大文明中心形成以后，并以洪溢方式向周边区域持续扩展，才会出现主导文明和区域文

①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明相互冲突交融、映辉发展的格局。对史前考古文化系统的研究和中国最早原始文化共同体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生老根”及其形成文明中心的历史氛围。

既然华夏民族奉黄帝族（胡狄系）为远古先祖，那么原始华夏语的源头亦当追溯至5000年前，即以黄帝进据中原为起点。自此以后，经颛顼族（夷越系）、帝喾族（夷越系）、尧族（胡狄系）、舜族（夷越系）交替统治，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逐步形成、巩固和发展；与之同时，原始夷越语、原始氐羌语、原始胡狄语也逐步混成为“原始华夏语”。以往传说历史研究中觉得困惑不解的氏族首领谱系的混杂性和氏族首领居住地点的变更性，正折射出原始华夏文化的远古游移性和互渗混成性。

一方面，考古学的发现促使人们摆脱了黄河流域文化单线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观点，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同时互相激荡而产生了中华民族文化，强调了中原文化的聚合产生过程；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认为夏、商、周三代并非同一种文化的历时一脉承传，而是在地域上、时间上都是三个互相重叠、交错影响的部分，经过持久的激荡融合而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格局。

一、夏、商、周三代语言的此起彼伏

1. 戎夏语

华夏语虽经夏、商、周三代而完全成熟，但夏代无文献传世，因此夏语难以详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申之义，大也。从夊、从页、从臼。从臼，两手；从夊，两足也”。根据“夏”字形，是一个有首、有手、有足的人形，为此民族自称。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自称与该民族语言中对“人”的称

谓具有一致性或同源性。“夏”引申为大，其实“大”也是人之形，二者同源。“夏”兼有夏族自称和人的种称的双重性。

中原居民称“夏”始于夏代，因而夏王朝对华夏族的巩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夏禹又称“戎禹”，据《诗经·长发》“禹敷下土方”，夏人由西北今所谓河套一带进据中原，可推知其为胡狄族系。《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称”。匈奴又译为“胡”。上古音“胡”＊ɣa、“夏”＊ɣəa，十分接近，差别仅在等呼。[1] 如果根据上古音没有等呼的观点，“胡”、“夏”则完全同音。“夏”有“大”义，“胡”也有“大”义，也可证二者同源，皆源自原始胡狄语或阿尔泰语。戎夏族与胡狄族关系密切，戎夏语与胡狄语同源异流。又《史记·六国年表》曰：“禹兴於西羌”，西羌为氐羌之地，这暗示着夏禹以胡狄为主，在进入中原以前可能已经与氐羌族混血。进入中原以后，又与中原夷越居民发生交融。因此，进入中原的夏语可能是以原始胡狄语为主导，而混有原始氐羌语和原始夷越语的语言。

2. 殷商语

商人称“商”，其字为象形，上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为祷告占卜之口。象征王权和神权的“商”，成为这一氏族的名称和居住都邑的名称。中国古代以贝壳为宝，“商”亦从贝，为君王赏赉下人之义。又引申为“通四方之物”的商贾之人，据考证商族人可能是在东南一带最早从事商贸活动的人们，从一方面证明了商贸活动起于东南沿海。

商人又称之为“殷”（据王国维的研究，在甲骨文中用“衣”，如

①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衣袘"),"殷"是《说文》部首"㐆"部的惟一字。《说文》:"㐆,归也,从反身"。"归也"即"出嫁也",婚嫁以后才有子,故"从反身"。反文法是甲骨文造成同源区别字的方法,如"司"(发号司令)与"后"(司令者,君长)。甲骨文中"身"、"孕"同字,"身"即腹中有子,本义是妇人妊娠。"娠"与"身"同音,"妊"与"人"同音。"人"、"身"、"孕"、"㐆"、"妊"、"娠"皆为同源词。"殷"为后起字,加"殳"表示器乐。《说文》曰"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其义是殷王功成作乐,祭祀天地以配祖考,使与天同其功,可见殷人是一个奉行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习称商人为"殷",是因为崇尚并且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殷"从"作乐之盛",引申为程度深,因此后世汉语有"殷勤"、"殷红"、"殷殷"等词语。

"殷"人为"夷"人的一支,"殷"与"夷"阴阳对转,本为同源。在东南地区古音同,因此可以用"衣"同音替代。《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弓、从大"。"夷"之字形为执弓之人,盖以射猎为业也,夷人后羿为上古善射之人。根据字义,《说文》"羌"字下解释:"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也,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夫"。"寿"指敬老。又《说文》曰"仁,亲也。从二人",人与人之间相亲,可见东方夷人文明程度较高,敬老相亲,"仁"与"人"同源。根据"夷"的音形义和民族自称与种称的一致性,"夷"与"人"又同源。而"夷"进入中原的一支又自称为"殷",可证"夷"、"人"、"殷"同源,汉语中的"人"来自原始夷越语。

《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崇拜是东南夷越文

明以及环太平洋文明的特色之一。[1] 商人以玄鸟(燕子)为祖先之来源,已为甲骨文所证实(早商先公"亥"上有鸟形),由此可见商族人是以鸟为图腾的夷越族的一支。但《史记·殷本记》曰"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又《诗经·长发》曰"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这又表明了继起的中原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中原戎夏文明,殷商祖先盖是以夷越族为主而融进胡狄—氐羌族的混血。由此可以推测,殷商语或夷商语是以原始夷越语为主导而渗入原始胡狄—氐羌语的语言。商王所拥有的是一个"邦联"政权,见于甲骨文的商王朝邦国就有九十多个。[2] 在商邦联之北有以"居方"为首的部落联盟(盖为胡狄系),之西有以"周方"为首的部落联盟(氐羌系),之东南亦有未曾经进入中原的属于夷越族的"九夷"部落联盟。胡厚宣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3] 中国之称谓,由"夏"而"中商"(商邦联之"中央"即王畿),再发展成"国中"(以上为夷越语言的顺行结构),至周代演变为"中国"(此为氐羌语言的逆行结构)。

商人的语言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为疾口、疾耳,此顺行结构 NA 为南方语言之特征。在甲骨文语法研究中,关于动宾补的语序,六种可能有的语序竟然都存在。[4] 对这种不以语序为严格手段的结构现象的解释只有一种可能,即这是一种利用形态变化(词缀附加或内部屈折)为手段的语言。因此夷商语可能还是黏着型语言,只是这种黏着方式被表词字掩盖了,殷

① 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腾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中国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赵诚:《商代社会性质探索》,《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③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台北大通出版公司。

④ 余志鸿:《论古汉语补语的移位》,《语言研究》1984 年第 6 期。

商甲骨文记载的可能是原始夷越语。如果能够将商代甲骨文语言和南岛语进行比较一定非常有趣。已经做过的一些商代甲骨文语法和音系研究，因为预设"商语和周语是同一系统语言"，因此在"同一系统的文字的掩盖下"不可能有特别价值的发现。

3. 姜周语

周人来自西方，其祖母为姜原。《说文》："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根据字形和字音，"姜"与"羌"同源。《说文》："羌，西戎，羊种也。从羊、人。"各本作"牧羊人也。"可见周人是源于西方羌人，后来迁徙到渭水流域得以兴旺发达的一支。《国语·周语》："昔我王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既自以为是黄帝族后裔，承袭黄帝姓氏之"姬"，如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又追溯其祖先为虞、夏之臣。在周人看来，推翻商朝是光复"有夏"，因此又自称"有夏"、"区夏"（"有"、"区"即"域"，"有夏"为顺行结构），其同宗诸族称"诸夏"，其语言名"雅言"，亦即"夏言"。

田倩君在《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①] 中考订，"华夏"一词不见于殷墟文字。殷墟文字中没有"华"字，在金文中发现了不少"华"（没有草头）字。"华夏"之词是周人本其"尚文（采）"之风尚，在沿用已久的"夏"字前冠"华"而成的。《尚书》中记载"夏"字计43次，指本族仅4次，其余多指夏王及其有夏一代，可见周人具有"对夏代之自我肯定"的意识。[②]《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一方面，从语源考察，"华"与"夏"音近同源；另一方面，"尚文"并非"华"

① 载台湾《大陆杂志》第31卷第1期。

② 见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之本义，"华"为"花"之本字，取花卉生生不息之象以喻氏族兴旺发达之义，因此演变为合"华夏"二字自称。由此推知，周人以氐羌族为主，曾经与胡狄族混血，其语言可能是与胡狄语有所接触交融的氐羌语。

虽然俞敏认为藏语与周代姜姓独有的方言更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事情可能比这要复杂些。当时的中原殷商文明显然高于当时渭水流域的姜周文明，既然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承袭了中原文化且借用了殷商文字，其西周雅言势必接受夷商语言的影响。当然，通过文献语言和藏语的对比，周代雅言以氐羌语为主导。在以河洛为中心的广袤疆域建立的周朝封建联邦制国家，历时900年，通过分封宗亲、移民洛邑和周礼雅乐使雅言得以传播和推行，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王族语言→官场语言→礼教语言→文学语言，这就是上古雅言出现和扩展的轨迹。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相传为周公始撰(在秦汉之间定型)。"尔"，迩也，近也；"雅"，夏也，夏语也。"迩夏"即向夏语靠拢，《尔雅》的旨趣就在于促使方言(邦言)向雅言靠近，以夏语为通语。尽管一方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动摇了周天子的王权地位，另一方面"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邦国语言文字分歧，但是雅言作为文化礼教的象征地位尚且稳固。与商朝文字仅仅掌握在占卜贞人手里不同，周朝文字的使用却不断扩大化，一方面华夏典籍《易》、《书》、《诗》、《礼》和百家诸子皆撰成于两周；另一方面私学兴起，师生口耳相传，形成了绵延至汉魏的读书音传统。这些"氐羌化"的华夏书面文献语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对后世之影响十分深远。

二、华夏汉语结构类型的动态演变

以汉语为立足点，除了与南方汉语相连的苗瑶侗台语、越南语

是孤立语,周围广大区域的语言几乎都是黏着类型。北方的阿尔泰语是黏着语;南方的南岛—南亚语是黏着语;东方所谓语系不明的朝鲜语和日本语也是黏着语。西方的藏缅语中有些附加成分已经不多,有些语种(如嘉戎语、僜语、景颇语)却有着丰富的词缀。依据藏语形态变化以粘附词缀为主,句法方面藏语更像阿尔泰语,同时也使用屈折方式,有人推测历史藏语很早就经历过黏着型→屈折型的变化,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原始藏缅语为黏着结构。

为什么在这些黏着语包围圈内的汉语却是孤立型?这是多种语言在中原反复交汇、层累性混合的结果,原始华夏语应为黏着类型。与汉语毗邻的苗瑶—侗台语言,虽然确定为孤立类型,但是依然有不少黏着形式。根据雅洪托夫(S.E.Yakhotov)的研究,它们的孤立型趋向的成因是4世纪以后受孤立型汉语长期影响的结果,其历史背景是从"永嘉之乱"开始的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浪潮。苗瑶—侗台语言的古老类型当和南岛—南亚语类型一致。根据东亚—南洋诸语言的现状及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断,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三大原始语区,其语言类型都是原始黏着型。从而表现出东亚—南洋(太平洋)语言的黏着型与闪含—印欧(大西洋)语言的屈折型的两大分野。

蒲立本等人推测古代汉语曾经有过丰富的形态,试图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王力在《同源字典》中对同族词的研究表明,古代汉语构词使用语音交替方法。潘悟云在《第三代汉语音韵学》①中提出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有"两个窗口":一是对异读、假借、谐声的系统研究,一是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在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的过程中,必须预设华夏汉语的原始类型和动态演变线索。预

① 载《现代语言学——全方位的探索》,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设华夏语言的原始类型是黏着型，历史上经历过黏着型→不完全屈折型→孤立型的动态演变，也许可以为历史形态研究构拟提供理论模式。

在华夏语的混成发生过程中，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渗透、换用和融合，导致了音节结构的变化和语言类型的转变。三代以前的原始华夏语不可深究，三代华夏语也只能够大致推测：原始胡狄(阿尔泰)型的戎夏语是原始华夏语的最底层，原始胡狄语被原始夷越(南亚—南岛)型的夷商语所覆盖，原始夷越语又被原始氐羌(藏缅语)型的姜周语所覆盖。戎夏语没有传世文献，故不可细考。也许商代华夏语还是以黏着型为主导。周代华夏语发生单音节化，黏着性词缀有辅音性和音节性两种，同时使用屈折方法。秦汉以后，词缀和屈折形态纷纷脱落，进一步向孤立型方向演进。同时复辅音大量蜕变为单辅音，阴韵尾辅音开始失落，音位性声调渐次出现，复音节合成词逐步增多。在华夏汉语类型孤立化进程中，华夏汉语的句法结构也经历着巨大嬗变。在黏着型或不完全屈折型时，语序以顺行结构为主导，但并不是刚性语法手段。随着形态的失落，一些音节性词缀与实词相继蜕变为独立性的虚字，语序和虚字上升为主要语法手段。在周秦汉语中，南方型的 SVO 及 NA 与北方型的 SVO 及 AN 共存，并逐步稳定为顺行的 SVO 与逆行的 AN，不合乎通常的混合性语言结构。

公元前第五千纪，中国境内存在三大太古语网。公元前第三千纪左右，在三大太古语系的交汇之处，伴随着三大太古文明的接触→冲突→交流→融合，在原始华夏文明萌发的同时，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后期，华夏语有着系统的文字与书面语。殷商华夏语以原始夷越语为主体。公元前 1100 年到前 200 年，历时 900 年的周代统治使华夏语完全成熟并留下文献典籍。

姜周华夏语以原始氐羌语为主体,致使原来的中国殷商语“氐羌化”。秦汉统一以后,中原语言渐有汉语之称。在这漫长的7000年中,中国语从太古语、华夏语到汉语,经历着持久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华夏汉语的语言类型,从原始黏着型,经由不完全屈折型而演变为孤立型。语言的多向性、层叠性接触、交流、换用和混成,促成形态的失落,蜕变为无形态的孤立类型。与西方学者的语言类型孤立→黏着→屈折的“进化论”臆断相反,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史实表明,孤立语言类型才是形态语言类型演变的结果。

三、强大的文明中心的出现和强势语言的形成

苏秉琦认为:“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①

蒋祖棣参考地理学界的自然景观分类法,综合新石器时期到东周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特征,把当时的文化分为六个文化亚区:1. 华北平原区(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覆盖,夏文化中心,商文化中心);2. 黄土高原区(大地安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陕西龙山文化覆盖,周文化发祥地);3. 山东沿海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商文化,齐鲁文化);4. 燕山南北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下层,燕文化);5. 长江中游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商文化,楚文化);6. 长江下游区(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吴越文化)。② 邓晓华根据严文明所分中国古代六

①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4日。
② 《玛雅和古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大考古文化区，再根据张光直等人的观点补充一个闽台地区的东南沿海文化区，分为七个考古文化—语言区：1. 甘青文化区（藏缅语言）；2. 中原文化区（华夏语言）；3. 燕辽文化区（阿尔泰语言）；4 山东文化区（东夷语言—侗台语言支）；5. 江浙文化区（古越语——侗台语言支）；6. 长江中游区（苗瑶语言）；7. 东南沿海文化区（南岛语言）。[1] 也许，燕辽文化区属于阿尔泰语区，甘青文化区属于藏缅语区，山东（淮夷语）—江浙（吴越语）—长江中游（苗瑶语）—东南沿海（南岛语）文化区属于南亚—南岛语区，中原文化区为三种语言交汇的华夏语区。

相传黄帝时期中原邦国有万，《左传》哀公九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夏朝尚有邦国三千，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这种邦国就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不难想像，即使不是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情况也非常复杂。虽然可以划分为一些语区，但在许多地带仍然是语网状态。经过夏、商、周的统治，原始华夏语的地域不断扩大。特别是周公建洛邑和平王东迁，镐京雅言两次大规模的东迁。春秋战国时期，华、夷、戎、狄、蛮等大规模融合。战国以后，秦、楚、吴、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2] 经过两周的统治，伴随着黄河流域强大文明中心的出现，雅言成为北中国的强势语言。

根据沙加尔的观点，原始南岛语的语词是复音节的，它的不少后代语言的音节结构缩短了或经历了单音节化进程。上古汉语已经是典型的单音节结构，原始南岛语和汉语的"字"相对应的经常是语词的末一音节，由此揭示了华夏汉语音节结构的演变过程。

① 《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李亚农：《西周和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但语词音节结构的单音节化进程，在各语言或方言中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郑张尚芳认为，印尼语 balut“涂抹”与汉语“笔”对应。《说文》曰“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笔，秦谓之笔”。东汉时秦语 * pljiət、楚语 * ruət 和燕语 * pjət 已经单音节化，而地处江淮的吴语 * pjəu - ljuət 仍为双音节。郭璞《尔雅注》曰“蜀人呼笔为不律也”，东晋蜀语仍是双音节。

虽然周王朝境内的夷、戎、狄、蛮都包括在广义“华”的概念之中，以与周边“四夷”区别，雅言通行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但华夏语仍主要分布在中原河洛地区，毗邻语言依然十分复杂。

1.《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斥楚人许行“今也南蛮鴃舌之人”，此为南楚语。

2.《孟子·滕文公下》：“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此为东齐语。《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力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言齐者皆予齐王。”此七十城，相当于今山东巨野以东到即墨一带。

3.《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侯归，效夷言。”卫侯在吴地郧(今苏中海安)被软禁几天，居然学会了几句夷言，此为吴越语。

4.《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同，言语不达。”此为西戎语。

5.《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晋国担心秦国任用晋人士会对晋国不利，派魏人寿余诈降秦国以骗回士会。秦国欲取魏国降地，寿余说“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秦人只得派会说魏语的晋人士会和他同行而落人圈套。此为秦语和魏语不能直接通话之证。

6.《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战国末期，

荀子已经区别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越(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楚(以江淮流域为中心)、夏(以河洛流域为中心)三大语言文化区。

《礼记·王制》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所定居……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不同的语言之间交往,要通过古代的译官"象胥"或"司言","象胥谕言语,协辞命;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周官·秋官》)。周秦政府对邦国语言十分重视,"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应劭:《风俗通义序》)。春秋战国周室式微,许慎《说文序》曰:"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语言的同化和歧义随着统治权力的合分而时起时伏。

因此可见,周秦汉时期的华夏汉语的周围分布着与汉语具有远古同源性或接触相似性的不同语言。在中原的北部是西北地区的三晋语、华北北部的幽燕语、辽东半岛的朝鲜语,在中原的东部是山东半岛的齐鲁语,在中原南部的长江流域是淮东江南的吴越语、湘赣鄂皖的南楚语和西南四川的巴蜀语,与华夏语合在一起共八个语群。在北方大漠是胡狄族阿尔泰语,在西方甘青是氐羌族藏缅语,在南方闽粤是百越族南亚—南岛语。图示如下:

<table>
<tr><td rowspan="5">氐羌藏缅语</td><td colspan="3">胡狄阿尔泰语</td></tr>
<tr><td>三晋语</td><td>幽燕语</td><td>朝鲜语</td></tr>
<tr><td colspan="2">华夏语</td><td>齐鲁语</td></tr>
<tr><td>巴蜀语</td><td>南楚语</td><td>吴越语</td></tr>
<tr><td colspan="3">百越南亚—南岛语</td></tr>
</table>

虽然桥本万太郎提出的推移模式反映了周秦以后汉语与周边语言互动发展的基本态势，但是只有在强大文明中心和强势语言形成以后，才有以华夏文化和华夏汉语为主导的推移性延伸。如果不进行寻根推源式的探讨，秦汉以后的中原汉语则成了无源之水。在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汇的河洛地区，以黄帝进据中原为起点，经五帝到三代时期形成了一种与强势文明相伴随的混合型语言。成为主导语言的华夏汉语，伴随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交融及中原文明的持续辐射，像一个巨大的旋涡逐步同化着周边语言。周秦以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发展主流是因接触交融而出现的混成发生，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华夏文明的崛起勃发相一致；秦汉以后北方民族进据中原、中原士族持续南迁而出现的华夏汉语的推移发展或阿尔泰语和南方语言的汉语化，与汉民族和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延伸相一致。

第七章　秦汉以后汉语的推移发展

从公元前第四千纪到第二千纪，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原野上，先后出现了两河流域、尼罗河、爱琴海、印度河、黄河—长江等五个文明中心。除了黄河—长江文明属于东亚文化圈，两河流域、尼罗河、爱琴海文明连成地中海文化圈，印度河文明则处于地中海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以两河流域为枢纽，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形成了最初的农耕文明带。随着再向周边逐步延伸，公元前后的欧亚大陆南半部形成了一个东西绵延的农耕世界。它包括东亚黄河—长江流域、南亚印度河—恒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耕区域。农耕世界的南部是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印度洋和太平洋，其北部边缘是连绵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兴安岭、阴山、祁连山、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札格罗斯山、高加索山、陶鲁斯山和喀尔巴阡山诸山脉。生活在南北两侧草原和大漠的原始部落，逐步开始从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相继形成了阿拉伯半岛游牧带、中欧黑海北岸游牧带和北亚蒙古草原游牧带。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成果而向农耕世界

发动进攻，两种文明接触、冲突、交融的世界交响曲开始循环往复地演奏。

第一节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

农耕世界以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文明为主，生活富裕而精神保守；游牧世界以流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文明为主，生活艰难而勇于开拓，没有城市的羁绊而有马匹的便利，因此机动性很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两个文明带一经形成，冲突就频繁发生。总的趋势是游牧民族处于攻势，而农耕民族处于守势。进入金属时期以后，两个世界的冲突愈演愈烈。当某个游牧民族在强大头领的率领下统一起来之时，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就来临了。在长期的民族征战史上，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方式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并且还可能换用了被征服者的语言。这成为旧世界的一条规律——征服者被征服了。当农耕世界恢复平静、民族融合渐趋完成之时，战争的乌云又在山那边重新聚集，一场新的民族战争又在酝酿之中。游牧民族由于渴望享受文明成果而发动的进攻，成为旧世界一个循环往复的问题，征服、迁徙、融合，再征服、再迁徙、再融合……成为欧亚大陆古代民族接触史的主旋律。[①] 与之相应，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亦成为古代语言史的交响乐。在东亚大陆，对于进据农耕世界的征服者来说，则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者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则是语主的嬗变，从而使语言变化的矢量表现为"主

① 详见商友仁：《古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鸟瞰》，《北方论丛》1988 年第 4 期。

体·时间·空间”的三维互动。

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三个发祥地：阿拉伯半岛、黑海北岸和蒙古草原。兴于阿拉伯半岛的闪人“如洪水泛滥”，其中西渡红海的喜克索斯人曾经征服了埃及（前1700—前1590），与北非人融合成为含米特的古埃及人。向北部“肥沃的新月地带”两河流域的周期性迁徙，由征服苏美尔的阿卡德王国（前2369—前2189），到古巴比伦（前1894—前1595）、亚述（前9世纪—前605）、新巴比伦（前604—88）三大闪人帝国，再到7世纪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这一系列兴衰影响了闪一含语系的扩展。起于黑海北岸的印欧人的大规模迁徙“如浪花四溅”，导致了从欧洲到印度次大陆的印欧语言的分化。向爱琴海北岸的反复迁徙，建立了迈锡尼文明和荷马文明，先后出现了波斯（前558—前340）、亚历山大（前334—前325）和罗马（前578—395）三大印欧人帝国。兴于东北亚大漠草原的阿尔泰人“如阵阵旋风”，迁徙特点是先南下，与中原华夏汉人征战融合，然后率部西进，抵达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多次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除了在中国建立民族政权，先后建立了横跨欧亚的世界性蒙古帝国（13世纪—14世纪）和土耳其帝国（14世纪—20世纪），形成了分布于欧亚北部广袤区域的阿尔泰语系。

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东亚大陆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交融就已经发生了，并由此触发了中原华夏文明和华夏语言的混合产生。商周期间，与中原文明冲突的主要是鬼方、混夷、薰粥和獫狁。春秋战国时期，与中原文明冲突的主要是戎、狄、胡。由此出现了北征獫狁的宣王中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修筑早期长城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秦汉以后，这一南耕北牧的冲突交融更为广阔、持久而深人。

在北方先后继起的游牧民族，有汉代的匈奴、丁零，魏晋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南宋的女真，此后是蒙古和满洲。尽管中原汉人以征战、长城、联姻、册封、任用、内迁等一系列方式企图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地向中原农耕文明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从秦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前221)到清帝皇冠落地(1911)的2132年间，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统治中原或中国全境长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的326年统治。其中尤以近古时期，从辽、金、元到清的北方民族政权连绵不绝，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近古复杂画面。

尽管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居民修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但是并未割断两种文明的冲突交融。“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1.作为文化古迹，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2.作为统治形态，是秦始皇暴政的物质文化孑遗；3.作为政治目的，是中原华夏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南北分界线；4.作为战争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的“马其诺防线”；5.作为文化象征，是中原农耕文明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失败的象征。历史一再表明：北方游牧民族只要向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进攻，战马的铁蹄一定会跨越貌似坚不可破的万里长城。即使明王朝将京师迁往北京，即使再怎样加固万里长城，也无法防范汉人自己打开山海关城门。就是吴三桂不主动献关，昏聩腐朽的明王朝也已经无法阻止勃发的清入关。因此长城既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象征，也不是现代“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是一座历史的废墟。

东亚大陆经济生态圈南耕北牧的特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

除了若干次小规模的人口迁徙，以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盛唐之末的“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靖康之难”为三大高潮，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引发了中原汉族居民屡次大规模南迁，导致了中原汉语一分而二为“北留中原汉语”和“南迁中原汉语”的分布格局。经久不息的大规模民族融合，又导致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居民的语言换用，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夷越化或夷越居民的语言转型。在这一绵延不断的华夏文化和华夏汉语日益延伸扩展、华夏汉族日益壮大的同时，华夏汉语在对周边语言“汉语化”的历史性进程中也就异化了汉语本身。

第二节　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南北历史变迁

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历程。西方称中国为 Thin、Cina、Sinae，盖源于“秦”的对音。英语中演变成 China，佛经中翻译为“支那”。而中原民族自称为“汉”则始于汉朝，匈奴单于遗汉代皇帝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虽然秦汉疆域空前广大，但由雅言演变而来的汉语只是河洛地区中原居民的通语。以中原汉语为核心，秦汉境内分布着三晋语、幽燕语、齐鲁语、吴越语、南楚语、巴蜀语、百越语，在秦汉西北和北部是氐羌语、胡狄语和朝鲜语。虽然秦汉境内的语言仍然非常复杂，但从周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一种主导语言即官场、文学或商用的通行语。周秦为“雅言”（夏言），西汉为“通语”，东汉魏晋为“洛生咏”、“洛语”或“晋语”，南朝为“北语”或“吴音”，隋唐为“汉音”或“秦音”，宋元为“正音”或“雅音”，明清为“官话”或“官音”。其中“雅言”、“通语”、“汉音”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长安（西安）话，“洛语”、“中原正音”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洛（洛阳）汴（开封）话，“吴音”、“官

话"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金陵(南京)话。

秦汉以降,随着中原汉人的迁徙和汉语言文化的扩展,在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汉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变迁,呈现出西安音→汴洛音(以洛阳为标准)→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以汴京为标准)→南京音的周而复始的轨迹。东汉魏晋汴洛话是周代镐京(西安)话在中原的后裔,南朝建康(南京)话又是魏晋洛下(洛阳)话在江淮的发展。至于20世纪逐渐上升为主导音系的北京话,则是明初迁往北平的江淮话的演变;换而言之,现代北京话是明代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在北方的后裔。

一、汉语主导语言的第一次大变迁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以镐京(西安)为"宗周",王族或王畿语言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雅言。随着分封宗亲、礼制教化和文学典籍,雅言也就流播到各地。鲁人孔子会雅言,《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周公为控制东方,在中原建洛邑(洛阳)为"成周",迁王畿之众驻守,镐京雅言由此东传。东周(前770—前256)平王迁都洛邑,镐京雅言再次东迁。因此,周代雅言可以称之为"上古河洛音系",以"镐京音"为基础。平王东迁以后,原西周之地成为秦国的领土,秦人承袭了周人的雅言传统。秦朝(前221—前206)统一六国,建都在与镐京毗邻的咸阳。秦始皇"书同文"的实质就是以秦文字为规范,"罢六国文字不用"。以秦文字为规范即以秦音为正音,企图通过焚书坑儒和文字同一来钳制六国民众的思想,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刘氏王室为东楚之人,而西汉(前206—25)建都长安。虽然其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势必承袭周秦王畿雅言,但楚人语言文化处于上

升地位，由此逐步演变为扬雄《方言》中所说的“通语”。

东汉（25—220）都洛阳，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转而为洛阳语音。汉晋之间虽有三国鼎立，但曹魏（220—265）一直以中原为中心统治中国北部，不久又一统西晋（265—317），相沿建都于河洛。河洛建都历时近三百年之久，从而形成了魏晋文学的标准音“洛生咏”或“晋语”，可以称之为“中古河洛音系”。虽然这一中古洛阳话可以溯源至上古周镐王畿之音，但魏晋之时距平王东迁已千年左右，二者当有时间和地域的差别，故可分别称之为“关中音”与“中原音”。

始于东汉末年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内迁浪潮，在晋室内乱之机攻陷洛阳，导致“永嘉之乱”。《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汉人潮水般越淮渡江，相继南渡人口约为九十万（亦说一百万以上），其中侨寓今属于江苏境内约二十六万，今属于安徽境内约十七万，占南渡人口近一半。许多佃客、部曲不计入编户，所以实际移民远比政府统计的数目多。东晋建都建康（南京），在江淮（此为约指，包括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一带设置侨州，洛音流播于江淮。吴人学习洛语，这是他们从政治臣服到文化渗透过程的一部分。从西晋起，一些江南大族为了到中原做官，就注意学习洛语。晋室南迁以后，建康盛行“洛生咏”，中原洛语成为大江南北的时尚语言。官吏对士人说洛语，对庶人用吴语，洛语和吴语成为分辨士族和庶族的明显标志。到了刘宋时期，洛语在江南上流社会已相当普及。陈寅恪以反证法推断，江东贵族只有几位吴音不改，其余士族虽为吴人但不说吴音，显然他们用洛语。同时，中原人士为拉拢吴地巨族豪门，亦仿习吴语。南北人口与文化的渗透交融，导致了吴越语的汉语化或汉语的吴越化局面的出现。

“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分裂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为秦汉以来中原语言之一大巨变。经过宋、齐、梁、陈,随着中原文化在江南新生且日益成熟,形成了源于中原洛阳而在江东建康有所发展的新的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中古金陵语音系统。隋初统一中国,遂有长安论韵。依据萧、颜等人所商定的纲纪,汉化鲜卑人陆法言“捃远精切,除削疏缓”,以维护金洛之正音余绪。“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金陵为南而洛阳在北,金陵为今而洛阳已古,故时人评价《切韵》“酌古沿今”。日本的“吴音”,就是奈良时代到7世纪输入的六朝汉语字音。

从秦和西汉的长安音,到东汉、魏和西晋的洛阳音,再到东晋南朝的金陵音,由此形成了历时八百年之久(前206—600),上古至中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洛阳→金陵的“横折型”(由西迁东为“横”,再由北迁南为“折”)大变迁。

二、汉语主导语言的第二次大变迁

隋代(581—618)都大兴(长安),又以洛阳为东都。唐代(618—907)相沿建都长安(今西安),以洛阳为东都。《切韵》虽折中于金陵、洛下,唐初佛经翻译或多以洛音为正,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官方语言或文学语言必受秦音浸润。李氏起兵太原,统治集团为关中集团,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难免西移,“秦音”或“汉音”逐渐成为唐代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武周时,张戬曾依据当时语音编撰《考声切韵》。天宝年间(742—755),元庭坚更一反“时俗共重,以为典则”的《切韵》,直以关中秦音撰成《韵英》。至慧琳《一切经音义》(807),反切一以《韵英》为准则,斥责陆氏《切韵》为“吴楚之音”。当时日本遣唐学生和僧人,将长安方言作为正雅之音带回日本,称为“汉音”,并逐渐排斥六朝旧音,有“诵两京之

音韵，改二吴之讹响”之说。[1] 王国维说：“陆韵者，六朝之音也；《韵英》与《考声切韵》者，唐音也。六朝旧音多存于江左，故唐人谓之吴音，而以关中之音为秦音。故由唐人言之，则陆韵者谓吴音也”。陇西人李涪作《刊误》(880)批评《切韵》“吴音乖舛”，同时提出“中华音韵，莫过东都”，实不知北朝以后北族语言掺杂的洛阳语音，已非魏晋洛阳旧音，而魏晋洛音南迁江淮以后，金陵语音亦非江左吴越土音。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北方战火纷飞，中原居民被迫大规模南迁。唐亡以后，五代(907—960)相继建都汴洛(洛阳、开封)。北宋(960—1127)统一以后，建都汴京(开封)。一方面，在书面语言中先后颁行官韵《广韵》等，其旨在“设教崇文，悬科取士”；另一方面，在通行口语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由长安转为汴洛，形成了宋元明所称的“宋音”、“正音”、“中原正音”、“中原雅音”或“中州音”。北宋汴洛语音，可以称之为“近古河洛音系”。

唐末五代，北方民族契丹兴起，建立了与北宋对峙的辽国(907—1125)。女真兴起后，建立金国(1115—1234)，灭辽以进攻北宋。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金人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由此引发中原居民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日本镰仓时代由江南输入的汉语字音称之为“宋音”，即指由中原迁往江南的南宋(1127—1279)汴洛语音。

迁往江南的汴洛“宋音”主要两处。一处是临安一带。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杭音》：“城中语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

---

① 尉迟治平：《“上声厉而举”解》注㉓和㊼，《音韵学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惟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一百字来’。”杭州话因周围为吴语区,虽保留中原汉语的一些特点而终究为吴语同化,成为具有中原色彩的“杭州话”。一处是以南京、扬州等为中心的江淮一带,迁入几十万中原居民。元人戚光《集庆路续志》:“金陵山川浑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绝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还迁巨族士家,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衔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时建康多为汴洛流民,直至南宋中后期仍有北方移民陆续涌入。因江淮语在六朝时已被中原汉语覆盖且处于吴语北部边缘,因此迁往江淮的“宋音”相对纯正地得以保存。

在北方金国,进入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在接受农耕经济和汉文化的过程中换用了汉语,金亡后中原女真人与汉人融合。建立元朝(1279—1368)的蒙古宣布蒙古语为“国语”和八思巴字为“国字”,对汉文化和汉语言不加提倡。元亡明(1368—1644)兴,留居汴洛的中原之音,历金、元近三百年统治,已非北宋中原旧音,难免再度“北杂夷虏”;而迁往临安为吴语所包围的宋音亦已复陷“南染吴越”;惟有江淮之间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壹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一概念从狭义地理区域演变为广义地理区域,又从地理区域概念演变为文化传统概念。《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杨慎解:“野间谓之中原”,是为“原野”,与作为地理区域的“中原”含义不同。《荀子·王制》曰:“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月暴露,毁折之中原”、《商君书》曰:“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已指攻取天下的关键——河南平原。秦之东下、楚之北上、齐的西进,其目标都是中原。与“中原”义近的是“中州”,始见于司马

相如《大人赋》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颜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中国"本义为中央帝王所都，《五帝本纪》曰"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刘熙《释名》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中原"与"中州"、"中国"义近，但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各不相同，"中州"专指河南，"中国"由帝王所都扩大到北部王朝和整个国家。"中原"则从指河南地域的狭义扩大到指黄河中下游的广义。诸葛亮《出师表》曰"当率三军北定中原"，三国的"中原"与江东、西蜀相对，可见其时作为区域名称的"中原"已经扩大到陕东。南北朝以后，中原与江南的划分通常以淮泗为界。在靖康南奔以后的中原居民心中，"中原"已成为文化象征。南奔居民的眷念故土，从《宋诗纪事》的诗歌可以略见一斑。薛居实《老妓自称汴京宫人，泣而赠之》，见到汴京老妓，"黑发尚占梁苑雪，素衣还带上林风"。葛天民《尝北梨》，吃到北方梨子，"甘酸尚带中原味，肠断春前不见花"。蔡勘《题盱眙》，经过淮东盱眙，"自古东南第一山，于今无异玉门关……中原父老应遗恨，只见毡车岁往还"。南奔居民对中原语音更是特别亲切，路德章《盱眙旅舍》"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①]。至于陆游临终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知南宋王朝无力收复中原而寄予无限希望，更是令人肝肠寸断。南宋以降，"中原"这一词语，已从地理概念演变成为"文化传统"概念。所谓元明的"中原正音"实指保留在江淮语中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前朝"宋音"，并进一步成为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日本江户时代传人的汉语"唐话"，初有南京、杭州和漳州口。后主要学习南京口，"唐话"便成为明清南京话的专称。

从隋唐的长安音，到北宋的汴洛音，经由南宋与金对峙、元蒙

① 参见龙晦：《释〈中原雅音〉》，《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古统治的周折，再到明代官话南京音，由此完成了历时近九百年之久(600—1468)，中古至近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汴洛→南京的又一次“横折型”大变迁。

秦汉以后，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巨大变迁，出现了由西至东再南移的“横折型”循环趋势。这种近乎八九百年一次的音系演变大循环，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征服战争密切相关，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又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周期有关。由于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牧草的生长与牧民的生活休戚相关，但是不可能年年雨水充沛，牧草的生长有丰年和歉年之别。如果雨水充沛则牧草丰茂，马羊肥壮，牧民也就自得其乐；倘若天气干旱则牧草稀少，马羊瘦弱，牧民生活艰难，就会四处掠夺。轻则“南下牧马”，重则“逐鹿中原”。这种因自然气候变化的周期，引发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周期性的变化冲突，最终导致了中原汉语基础音系的周期性循环变化。

第三节　规模人口的迁徙和语言格局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的“方言”和汉语方言的本质

1. 中国古代的“方言”不是 dialect

现代汉语以“方言”对译的英语 dialect，源于古希腊语名词 dialectos(言语、方言)，与动词 dialegesthai(谈话)为同族词。古希腊的 dialect 是差别不大可以相互通话的几种土语(可能源于早期的语网)，并且依据不同 dialect 的语音特点出现了希腊字母的地方变体，稍后在雅典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希腊文学语言，即以雅典方言为标准希腊语。西方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一样，同样是以语言分

化模式为前提,dialect 反映的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由于中国语言文化与古希腊以至欧洲语言文化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中国古代的“方言”,既不是古希腊语言中口音稍别的 dialect,也不是现代西方语言学中定义的“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而是不同的语言。

今所见《方言》一书,虽然前有所承、后有所改,但根据所记词语的古老性和《答刘歆书》以及东汉应劭所言,应为西汉扬雄(前53—18)所撰。根据研究,“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并且以此简称书名皆始于东汉应劭。[①]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自述“以问其异语”、“知绝遐异俗之语”。刘歆《遗扬雄书》:“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后世流传本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方位之“方”。商周称周边国家为“土方”、“鬼方”,“方”邦也,邦国也,“方言”即邦国言语。全称书名说得非常清楚:“輶轩使者”,仿周秦“奏言”旧制;“绝代”之“语释”,指远古先代之语词,即刘歆的“先代绝言”;“别国”之“方言”,指不同邦国之语词,刘歆的“异国殊语”可为旁证。《答刘歆书》时,书未写完也未最终定名,扬雄自称其书《殊言》,“殊”亦“别”也,“殊言”即“别国方言”的雏形,刘歆的“异国殊语”和王充《论衡》的“古今言殊,四访谈异”(皆与之同义。郭璞《方言注序》曰“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九服”指天下,相当于“九州”;“六代”盖指尧、舜、禹、夏、商、周),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的辞赋家、肆心广意的哲学家,撰著《方言》的旨趣正在于此。

据周祖谟研究,《方言》的大多数词条来自王朝的中心地区:分布在都城一带的秦语和山西的晋语。《方言》以“通语”为标准,但是并非与之比照的其他“方言”就是“通语”的地方变体。张清常认

① 鲁国尧:《“方言”和〈方言〉》,《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① 据李敬忠研究,全书13卷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言的非汉词语。其中八卷“虎”词条:“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现在土家语中雄性老虎为[li pu],雌性老虎为[li ni],与《方言》汉字记音吻合。② 陈魏宋楚和江淮南楚在今黄淮和江淮一带,可见当时所说的是南亚语(即夷越语或百越语)或受华夏汉语影响的南亚语。虽然秦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疆域内华夏汉语所占据的是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是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是藏缅语。因此记录了一些“汉字化”周边词语的《方言》,不是一部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 dialectology 专著,而是一部以多种语言为对象的比较词汇学著作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

关于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方言”,在后世不同行文中可以定指不同的具体语言,如“异域方言”(印度语)、“阇婆国方言”(印尼语)、“彼中方言”(女真语),在《鸡林类事》或《辍耕录》中分别指“高丽语”或“回回语”,鲁国尧先生已经一一列举,所考中国古代“语言”、“语”、“言语”、“方言”是近义词,立论确凿。这种通行用法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所谓“广方言馆”就是推广外语的学堂。“方言”不作为“土语”dialect 使用,还有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北京官话普及会”成员的“满洲”高官赠给太田辰夫一幅匾额,上面写着“普及方言”,他觉得这种提法很奇怪。事后才体会到这“方言”是指与

① 《胡同及其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词语试析》,《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文言相区别的口语。[1] 此“普及方言”相当于“白话文运动”。

“方言”一词，在西方语言学进入之前通指各种语言，偶称地方土语，西方语言学进入之后仅指地方土语，这是常用义和偶用义、古本义和今新义的问题。从词义演变途径来看，渊源是中古以后偶尔特指用法所导致的词义缩小（宋人林希逸：“乡邦俗语即方言也”），关键是现代对译 dialect 过程中所导致的词义替换，赵元任《语言问题·第七讲》（1960）中的“广义说”实为本末倒置。“方言”的古本义和常用义就是不同的语言。西方或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中国习称为“土语”、“土话”、“土言”、“俗语”或“俗音”。

2. 方言的本质是民系的语言相

根据世界语言的数量统计，“语言”包括着不同的语种和言种（方言）。当今世界语言的统计总数在 4000～6000 种，无法给出准确数字的原因，除了一些地区的语言调查未能全面或对已知语言研究不够深入以外，关键的问题是牵涉到语种和言种（方言种类）的划分，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语种界定标准。语种界定的标准，到底是语言学标准，还是其他标准？如果坚持语言学标准，那么就要制定相异度细则，即以多大差别作为区别语种和言种的标准。就相异度而言，北欧的不同语种之间的差别比同一语种内部不同方言的差别要低得多，但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来看，则确定为不同的语种。至于中国与毗邻国家之间的跨境语言，是确定为一种语种还是不同语种，至今也没有统一标准。东北的朝鲜族语和境外的朝鲜语/韩国语合为一种，新疆境内的民族语和毗邻的境外语也合为同一种，而西南的傣族语与境外的泰语却划为不同的语种。不很清楚，这是否因为语言学家顾忌到朝鲜和前苏

[1] 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3 页。

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泰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呢？因此，独立的语言或语种的确定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民族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文化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实际上，语种或言种的认定是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无论是语种的认定，还是言种的认定，都需要依据民族心理认同、国家疆界划定和文化历史渊源。

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的 dialect 概念研究汉语地域变体时，有必要做一些内涵和外延上的修正。方言的形成既有同一语种的同源分化，也有不同语种的异源交融。因此，方言的属性是语言的文化历史属性，方言的界定是语言群体(民系)的文化历史属性的界定，方言的划分是相关语言群体的文化历史属性的划分。一句话，方言的本质是民系的语言相。现实一再提醒，是同一语种还是不同语种，只有依据民族心理、国家疆界和文化渊源的综合标准，而不是以语言相异度为惟一标准。之所以有人认为粤语是一种独立的语种，[①] 其原因就在于撇开了其他标准。一些方言学家以为列出一系列共时语音标准，就可以将汉语方言区划分清楚的看法，不仅是皮相之见，而且难以贯彻。方言的地理分布仅仅是语言相似性的共时表象，语言的历时差异仅仅是语言变化层的累积，人口的迁徙和语主的嬗变才是方言形成的真正动因。可以这么说，一个妥贴的方言划分系统，就是一部历时的人口迁移史和语言演变史的共时排列。正如王士元所言，"汉族"不是一个具有共同遗传特征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概念。[②] 因此，汉语的

① 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 年第 27、28 期。

② 王士元：《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

“方言”不是一个以严格的语言特征为标准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以可追溯的文化渊源为内涵的历史文化学概念或人文地理语言学概念，汉语方言的划分必须以汉人移民史和“汉语化”程度作为基本依据。或者说，汉语的方言就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汉语民系的语言文化相。

二、汉语方言分区就是中国移民史投影

语言的变化是语主的变化，方言的形成是人口的迁徙。一部汉语的方言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国的移民流播史。中国境内的成规模移民活动，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一方面北方民族常常陆续迁入中原北鄙，另一方面中原内部的争斗和动乱在引发中原汉人迁移的同时，往往又给北方民族南下中原造成时机。

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和铜马战争引起汉人的迁移，从元始二年(2)到永和五年(140)的一百三十多年间，人口迁移量占全国的15%，南方人口显著提高。[①]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中原居民大量西迁秦蜀，当时的中原人口仅剩下十分之一，匈奴、鲜卑、乌桓等胡人乘机南进。三国末年和西晋初期的战乱，导致人口迁移达到二百多万，除了长江以北地区内的迁徙，主要迁往两湖一带。[②] 两汉魏晋的移民浪潮，一方面造成了中原语言内部的交融，另一方面促使了中原语言和接触语言的混化。然而，由北方民族进攻中原所引起的大规模的中原居民南迁，则肇始于公元4世纪以后。以三次大动乱为高峰，北方游牧民族呈周期性地向中原农耕文化区域泛滥，引发了中国境内一次又一次人口迁徙，促使中原

① 陶元珍：《西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禹贡》四卷十一期。
② 刘掞藜：《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迁徙》，《禹贡》四卷十一期。

汉语和南方语言迅速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原汉语及中国境内语言的分布格局。

1. 人口迁移的宏观鸟瞰

朔北一马平川，民族游牧，善于征战。江南丘陵险阻，民族农耕，人口分散。北方民族南迁中原，迫使中原居民南迁江淮，或继续南下江南三大湖流域，或再沿东南沿海和赣江、湘江远徙岭南闽广。长江流域和秦汉以前百越人居住的"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的广大华南地带，逐步成为中原居民新的栖息地区。秦汉以后，中国境内人口迁移的总体走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由朔北大漠到中原河洛；中原汉族居民由中原河洛迁江淮流域，由江淮流域抵长江以南，由长江以南下岭南闽粤；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又引发南方百越民族的进一步南移和西移的连锁效应，导致了南方民族从江浙平原到闽粤山地，从长江流域到湘西川康，从岭南珠江到云贵高原的迁徙效应。

这种此起彼伏的人口大迁徙，在人口生物学上留下了烙印。根据中国和日本人口生物学家的研究，在中国现代人口生物学树形图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与一个汉族群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往往并不是汉人，而是地理位置接近的其他民族群体。东北长春汉人与朝鲜人生物学关系最近，青海西宁汉人和蒙古人关系最密切，湖北黄石汉人与大理白族人是最近的亲族，湖南邵阳汉人与四川西昌彝族人最密切。与江苏南通汉人关系最密切的是甘肃保安人。徐州人与藏族、蒙古和朝鲜人的关系，比跟北京汉人的关系更近。[1] 这些情况可以通过移民历史和民族融合的原因来解释。历

① 王士元：《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

史记载，蒙古人（保安人属于广义的蒙古人）曾经被流放到当时还很贫瘠的海滨南通，因此与南通汉人关系最密切的是甘肃保安人。徐州人与藏族、蒙古和朝鲜人的关系比跟北京汉人的关系更近的原因是，一方面地处豫、鲁、皖、苏的淮北重镇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人口迁徙变动频繁，辽金南下必经此地并且大量同化为汉人；另一方面明代淮兵扫北和永乐北迁时，大量的江淮人北迁成为现代北京汉人的部分祖先，因此徐州汉人与阿尔泰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跟北京汉人的关系稍远。在这种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日益壮大的“汉族”，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以内部遗传上的聚合为基础的种族概念，而只能够是一个以共同文化渊源为心理基础的“国族”概念。

2. 人口迁移的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是“永嘉（307—316）之乱”。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中原生灵遭涂炭，北方民族纷纷起事。304年，匈奴人刘渊举兵，从此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316年刘曜攻陷洛阳，西晋灭亡。东晋时期，中原居民南迁规模较大的有五次。第一次永嘉（307—316）初年，千余家随司马睿渡江。接着，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苏皖淮北的居民，相率扶老携幼渡过江淮。第二次成帝（326—334）初年，石勒南侵，淮南居民和北人侨居淮南者渡江。第三次康帝（343—344）、穆帝（345—361）时，“胡亡氐乱”，中原兵燹连年，桓温北伐关中，秦雍居民多南出樊沔，或避难汉中。第四次在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淝水之战后苻坚北逃，黄河流域再次分裂，中原居民又相率渡江。第五次在安帝（397—418）时，刘裕北伐，河南等地收而复失，居民南渡过江者转多。根据推算，南迁至长江流域的侨民约有七十万人以上，南迁总数在90万。中原居民平均八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居民中平均六人中就有一人为中

原侨民。东晋在今江苏境内设置侨郡23个、侨县75个，与今江苏境内的江淮方言的分布地区基本一致，在江南集中在今江宁、镇江、武进一带，在江北集中在今扬州、江都、泰州、淮阴一带。居于今江苏境内的侨民约有二十六万。其中南徐州（治所在今镇江），领有侨民约二十二万，比当地原有人口尚多二万余人。[①]

刘宋时期，中原居民的南迁又出现两个高潮。第一次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琴至瓜步，大量流民南渡江淮。第二次泰始二年（466），刘宋丧失淮北和淮西豫州之地，又有大批流民南下。大量中原移民促使南朝人口增长较快；建康周围的扬州、南兖州、南豫州等州郡约有人口二百四十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强。

从全国范围看，当时中原居民避难流徙的方向，“其中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流民亦非一往而不返，有回迁的，南北朝时无一大事不与移民有关”。[②] 中原居民南迁的路线，东路从青徐沿邗沟、越淮河、渡长江，留居江淮之间或抵达太湖流域；中路从司豫沿汝水南行，越长江到达鄱阳湖流域，或再沿江东行抵达皖南、苏南一带；西路从秦雍沿汉水流域南下长江，到达洞庭湖流域，以后几次中原居民的南迁路线也大致如此。

肇始“永嘉之乱”的中原居民迁徙的结果是，南迁中原居民给南方带来了中原汉语，流向东北和西北的中原居民致使当地的语言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汉语化，彻底打破了中国境内两汉魏晋以来的语言分布格局。从宏观来看，主要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1）沿江中原汉语带的出现。南渡人口90万，迁居之地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江淮之间移民总数多达43万，占南渡人口

---

①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
② 万绳楠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的近一半。中原汉语的大面积覆盖，致使在古北部吴语区和北部楚语区形成一条东起海滨、西达湖湘的中古江淮语带。

(2)江淮—皖南—鄱赣中原语言文化南流走廊的形成。部分中原居民，由江淮继续南迁皖南山区或经鄱阳湖平原沿赣江流域而下。上古连成一片的吴语和楚语区域从中隔断，逐步形成了长江下游东部江淮语、徽语、赣语和客家语对中古吴语的弧形包围圈。

(3)洞庭湖北部出现了西南话的雏形。从秦雍沿汉水流域到达洞庭湖流域的居民，成为西南话的祖先。

(4)浙江沿海吴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中原汉人到达江南以后，迫使江浙吴越土著递相南移，引发了浙江沿海百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和闽广境内百越语的变化，形成中古闽语层。

(5)波及南方民族的人口迁徙和语言演变。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皖南—鄱赣中原语言文化南流走廊的出现和沿海吴越、百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进一步波及越、蛮、俚、僚等南方各族的人口迁徙和语言演变。

(6)中原语言对幽燕语和三晋语的汉语化运动。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所占，中州士女很多迁往东北方向的辽西或流向西北避难，势必引起中原语言对幽燕语和三晋语的汉语化运动。

(7)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长久战乱和人口流迁致使中原人口急剧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和乌桓等北方民族，估计远远超过二百万。北魏鲜卑"断诸北语，一从正音"，鼓励胡汉通婚。通过阿尔泰人的语言换用，引发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

此次巨变就总体来说，首先，出现了南迁中原汉语和北留中原汉语的格局，并且走上了各自发展的不同道路。东晋郭璞《方言

注》中“北方”首次作为一个大区域的语言文化单位出现，南北朝后期颜之推《音辞篇》出现了“南方”、“北方”的语言特征分析和“北杂夷虏，南染吴越”的结论。其次，出现了中原南迁汉语的“T字型”纵横语带，所谓“横向”就是沿江中原汉语带，所谓“纵向”就是中原语言文化南流走廊。就是这样一个“T”字型，奠定了近古汉语方言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决定了中古以后中原汉语的持续流向。

3. 人口迁移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次是“安史之乱”(755—763)。唐代任用胡人将士戍边，将部分突厥人内迁，推动了中原汉语和北方民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交融。755年胡人安禄山在北方渔阳发难，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中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造成大批中原居民纷纷南迁。《旧唐书·地理志》：“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豫南鄂北)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就长江中游而言，中原移民的前锋到达湘资流域，移民数量是当地土著人口的10倍，出现了完全覆盖当地土著语言的局面。在促使湘语演变的同时，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据《元和郡县志》，唐代中叶惟独鄱阳湖平原和赣水中游流域户口大增，仅饶州(上饶)就净增四倍多。[①] 另一方面，吐蕃乘机在西北发难，一度攻陷长安。《新唐书·吐蕃传》：“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藩镇割据，直至唐末黄巢起义，一再迫使“永嘉之乱”以后迁徙到长江中游北岸豫南和皖北中原居民的继续南迁。从中唐以后到黄巢起义期间，大量中原居民进入江西，促使客赣方言成型并且进一步向南推进。唐亡以后，中国进入五代

① 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第1、2合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十国时期，突厥人后梁（都洛阳、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都开封）、后汉（都汴洛）和汉人后周（都开封），逐鹿中原，战祸连绵。中原人口的流动变迁，促使了北留中原语言和北方民族语言的交融，为中原之音又一巨变。

4. 人口迁移的第三次高潮

第三次是“靖康之难”。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中原，汴京陷落。一时在京衣冠士族、百姓诸军夺门南奔者数万，多迁徙于江淮之间。两河人民纷纷渡河南奔，西北州县为之一空。由“靖康之难”引发的中原居民的南迁，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1126）至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靖康元年，金兵攻河东，“士庶携老提幼，适汝、颍、襄邓逃避者莫知其数”。建炎三年（1129），金兵越淮渡江，“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食货志》）。此后淮南人民又渡江南徙，“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宋史·赵俊传》）。金军渡江以后，建康“悉为灰烬”，苏州“烟焰见百余里”，杭州火焚，明州屠城。除了闽广、四川，整个南中国都遭到金军的严重破坏。次年（1130）金兵北撤以后，中原居民的继续南迁才稍停。绍兴七年（1137），金废刘豫政权，直接侵占河南、陕西，西北人民又复“襁负而归，相属于路”。直至宋金达成和约，人口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年（1160）至乾道元年（1165）。绍兴三十年，金主完颜亮又大举南侵，沿淮一带居民又大量南奔，昼夜不绝。江浙、湖湘、闽广各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庄季裕《鸡肋编》）。宋金达成和约后，人口南迁浪潮始告消退。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1206）至嘉定元年（1208）。南宋北伐失败，金军乘胜南下，淮南“奔逃渡江求活者，几二十万家”。集结在建康的淮人以数十万计。嘉定元年宋金再订和约，部分流民复归

淮南。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1217)至十七年(1224)。嘉定七年(1214)金朝受蒙古威胁迁都南京(开封)，于十年进攻南宋。陆续渡淮来归的北方义军安置在淮南，同时有大量饥民“日数以千、万计”进入淮南。或进一步南下，仅进入太平州(当涂)的两淮流民就达四十余万。直至金向宋求和，流民才不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六年(1233)至景定元年(1260)。绍定六年，南宋与蒙古联合攻金，次年蒙古灭金，宋军占领河南后不久南撤，当地百姓随迁湖北境内。宋襄阳守帅“招中原尖锐之士万千余”。蒙古军南下攻打四川、襄阳和淮南，大批流民集结在从江阴到池州的江南府州境内，一些难民迁入江陵和公安或远奔两浙。蒙古军占领北方以后，迫使中原居民大量迁入江淮地区，仅在扬州参军的汴梁流民就达两万人。直至南宋灭亡，北方人口的南迁一直陆续进行着，京西南、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四路的人口增加。

第六阶段，德佑二年(1276)至宋亡(1279)。德佑二年，临安陷落。南宋残部进入广东。

当时中原居民的南迁路线，大体仍然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主要自河北、河南、山东、苏北、皖北等经汴河及其两侧南下，渡长江在镇江上岸，分别进入江浙、皖南和赣北。再分若干支线，主要一支是经浙江金衢盆地入江西，再经建昌进入闽地；另一支溯赣江而下，翻越南岭到达广东。中路主要自山西、河南一带经湖北南下，进入湖南，到达广西及海南。西路主要自山西、陕西、河南一带进入蜀汉地区。这一期间，南迁淮南、江南、江西、福建、两湖、岭南、蜀汉地区的北方移民，估计有五百万以上。南迁人口的一半以上集中在淮南和江南地区。扬州、平江(苏州)、临安等十个南宋初期土著居民锐减的府州，绍兴以后的移民可能都在数量上超过当

地土著。[①] 南宋人口数字从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 19 229 008 猛增到乾道二年(1166)的 25 378 684,净增六百余万,显然是北方移民造成的。[②]

两宋之交与南宋年间,中原之音四分五裂,有被金人掳往北方而为近古燕代方言之祖语,有迁往浙江后为吴语同化之临安宋音,有迁往江淮后为明清官话之江淮宋音,亦有留在中原未迁后阿尔泰化为汴洛方言。"靖康之难"引发的移民高潮造成了中原之音的第三次巨变。南方汉语方言又有新的发展:江淮语被近古中原汉语大面积覆盖;客家话进一步扩散到闽西南和粤东北;在吴语中出现了中原汉语味道的杭州话。另外,北宋留在广西屯驻的"平南军"的北方语言则成为桂南平话的源头。

汉语在胡人进据中原、中原士民南迁与南北民族融合中"北杂夷虏,南染吴越",于是出现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南亚化("南亚化"相当于"夷越化",与"南亚语系"语系的"南亚"不是一个概念)。所谓汉语的"阿尔泰化"主要是北方民族在换用中原汉语的过程之中以阿尔泰语的底子异化了汉语;所谓汉语的"南亚化"主要是南迁中原汉语对南亚语的不完全汉语化而残留了南亚语底层,由此导致了近古南北汉语的巨大差异。在这种多次移民和语言交融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形成了与欧洲语言演变模式不同的推移发展模式。过去的两个千纪中,在周边接触语言绵延不绝的汉语化过程之中,华夏汉语在同化接触语言的同时也异化着自己。

---

① 详见吴松弟:《宋代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第 50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② 详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4 页。

三、中国境内语言分布格局的演变

1. 上古语言分布的"三字型"格局

周代所统治的黄河—长江流域,语言分布为"三字型"格局:中部为原始华夏语、原始东夷语;南部为原始吴越语、原始蛮楚语、原始巴蜀语;北部为原始辽东语、原始幽燕语、原始三晋语。在周代联邦的北境是阿尔泰语,西鄙是藏缅语,南方是百越—苗蛮语。齐鲁地区的东夷语逐步华夏化,成为向华夏语靠拢的齐鲁语。江淮地域的吴越语,在楚灭越以后与古楚语连成一片。南迁瓯闽的越人和南方越人(扬越、山越、瓯越、闽越、南越等)的语言,合称为百越语。

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可以黄河江淮语言大致划分为楚语区、越语区和华夏语区三大板块,未包括边鄙的巴蜀语、三晋语和幽燕语等。尽管林语堂依据扬雄《方言》将西汉语言分为十四区,但约而言之,汉代语言可以概括为北部三晋语、幽燕语、辽东语,中原华夏语和齐鲁语,南部吴越语、南楚语和巴蜀语。

2. 中古语言的"T"字型格局

"永嘉之乱"以后,不管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还是中原汉人起义动乱,都迫使中原居民大量南迁。随着中原语言文化南流的一次次涌动,在中国南方的吴楚语言文化的北部出现了沿江中原语言文化带的"一横",在吴楚语言文化的中间形成了南迁中原徽赣客语言文化带的"一竖",原来连成一片的南中国吴楚语言文化被这纵横相交的"T"字型所分割。在中原语言覆盖当地土著语言的"T"字型格局中,一方面地处江淮的北部吴越语和地处鄂东的南楚语,受中原语言覆盖形成"江淮语",横向连成南迁中原沿江语言

带；另一方面江南的吴越语和南楚语，被中原语言文化南流走廊(江淮—皖南—鄱阳湖—赣江—闽广)分割，纵向形成了“徽语”、“赣语”、“客家语”中南语言带。

“T”字型东西两翼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地处太湖流域的吴越语受中原语言渗透成为“吴语”；地处湖湘流域的南楚语受中原语言影响则演变成为“湘语”。中原居民的迁入又引起吴越语区居民南迁闽越，形成了“闽语”的一个历史层次。在这个“T”字型的最南部是原始粤语，中原移民的进入岭南形成“粤语”的一个历史层次。东西两翼语言的变化，又进一步波及到南方百越民族语言的变迁，受到汉语影响的百越语开始向汉语类型靠拢的转变。在汉人和南方民族的杂居之处，最终导致南方民族语言不同程度的换用。

3. 近古语言的连续体格局

阿尔泰居民换用汉语的阿尔泰化，可以追溯到北朝。北魏孝文帝“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北史·咸阳王禧传》)，鲜卑人所换用的“正音”就是河洛汉语，《隋书·经籍志》著录《河洛语音》。到了辽宋以降，这一换用汉语的阿尔泰化更加日益扩大。辽亡以后，进入中原北境的契丹人全部同化为汉人。女真人占领中原后迁都燕京(北京)，一度使华北汉人女真化。范成大使金(1170)记载：“至东京，金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陆游记韩元吉使金(1173)在汴京所见：“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依靠武力统治致使华北汉人女真化只是暂时的，中原农耕文明必然促使女真走上急剧汉化的道路，否则就得重返草原大漠。首先是一些“好学嗜书”的统治阶级成员，劝太宗改用汉制。到了进一步汉化的熙宗、海陵两代，“熙宗……得汉人韩昉及中国儒士

教之……尽失女真故态矣”,“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擅长汉语和汉文的海陵,实行统治中心南移政策,民间出现女真与汉人杂处通婚。至世宗告诫“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如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表明汉语化进程已不可遏止。宣宗南迁汴京以后,金廷政治上的用语几乎完全使用汉语。一些高官对汉文学有极高造诣,“同讲经学,读书不辍”,惟策论女真进士之科依旧沿行。金亡,中原女真人完全和汉人融合。元世祖拟订军官格例:“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将汉地女真人称为“汉人”。[①] 清人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除了留在东北的极少数,满人都彻底换用了北方汉语。进人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的这三次语言换用以及元代统治期间对汉语的影响,是促使近古北方汉语迅速整化、广为流传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明清时代的大规模移民,近古北方汉语才占据了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大片地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向川青、云贵的人口迁移和屯垦,促使西南方言逐步南移。青海的土著是西羌,从 4 世纪开始的百余年间,迁人青海的鲜卑人达几十万。虽然从汉宣帝赵充国的湟水屯田开始,已有北方汉人人居青海,但是一直到元代都没有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从 13 世纪开始,大量蒙古族军士和眷属西征后留居青海,一度成为青海的主体民族之一。直到明初洪武年间,将大量的北方人和江淮人迁人青海军屯和民屯,青海东部的汉人人口才超过其他民族,汉语方言从此流播青海。虽然先秦时代就有楚人进人云南,以后陆续有汉人零星人迁,但难免不被当地民族同化。西征的元代蒙古族军士及其眷属,也留居云南。明

① 详见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初洪武年间从各省调来数十万军士驻守云南各地，军士及其眷属大都落籍云南，其中有大量的江淮人，至今许多云南人都认为祖先是明初从南京迁来的。另外还有大量贬迁官吏和流放百姓以及工商业者，先后移人云南。云南的人口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258 693到万历六年（1578）的 1 290 972 人，185 年中增加了 5 倍。汉人迁入贵州的情况，和云南类似。广西西南方言区的形成也是在明清时期。明代北来移民，一是世袭的汉人土官或属员的同乡，一是屯田的士兵与百姓，依据《明史·土司传》就有邕州屯兵 20 万，断藤屯兵 16 万。清代将土官制度改归流官制度，大量移民进一步深人原来实行土官制度的广西西部。据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统计，明清两代移人广西的汉人几乎占汉人的十分之九。康乾年间，大量的湖北、四川、安徽居民流人陕南地区，陕南也成为西南方言的天下。

清王朝一直阻止汉人向关外移民，19 世纪关外的移民点仅集中在齐齐哈尔等处。20 世纪 20 年代，才出现成批的河北、山东人的“下关东”，致使东北人口猛增，其中又以山东人为多，由此形成东北方言。就辽宁而言，辽东与胶东隔海相望，移民通过海路而形成胶辽方言；辽西与河北相连，移民通过陆路而方言彼此相近。

大西北的新疆在汉唐时期，就通过文化交流受到中原汉语的远程辐射，但是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性汉语方言。近代新疆汉话的分布格局，主要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以后，通过驻军和屯田定居以及汉回人民的几次西迁浪潮所形成的西北方言。①

从淮河以北到长城内外，北留中原汉语与北方民族语言不断同化，促使汉语变化迅速。除了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山西一带幸

① 刘俐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方言》1996 年第 3 期。

存保留古汉语较多成分的“晋语”，从辽、金、元、明、清、民国以来，最终导致了广大北方汉语带(东北—华北—中原—西北—西南)的连成一片。在这一语言带的广大边缘地域又形成了北方汉语和西北、西南民族语言交汇的语言文化走廊，引起了北境和西鄙民族语言的一系列变化，形成了一些混合语。

汉语南方方言的分布格局，在近古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流行于广西的平话，可以分为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随着安史之乱以后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中原流民进入广西，形成语言驳杂的桂北平话土语群。在北宋“平南军”留屯广西士兵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桂南平话。宋元之际的闽语区居民的向东南迁移，使闽语大量扩散到潮汕地区，并且进入海南。客家人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在继续向广东沿海、粤西、桂东地区移民的同时，形成了许多客家方言岛。

在北中国，从宋元以来，在北留中原汉语阿尔泰化的语言互动中，淮河(南北王朝的传统分界线)以北的大北方汉语迅速变化、日趋统一且流通地域不断扩展；在南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方言特征、不同语主比例、不同语言底层的南迁中原汉语呈现出复杂歧异的局面。由于地接南北、时贯古今的江淮语言带相对保留了两宋中原正音，其中古源头与南部汉语相同，其近古源头与北部汉语密切，从而形成北部(包括西南地区的长江以北区域)—中部(横贯东西的江淮地带)—南部(除西南地区的长江以南区域)汉语的方言推移连续体状态。明清以后的汉语运动，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

第四节　汉语方言的形成类型及其历史层次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类型

汉语方言的形成类型，大致可以分成五种：

1."占据式移民"的换用类型。以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为背景，迁人中原的大批北族居民在语言换用的过程中形成汉语方言，如"汉儿言语"及其后裔华北话。内迁北族居民的语言换用导致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

2."覆盖式移民"的覆盖类型。如果移民人口占绝对优势，则几乎完全覆盖原居民语言。中古以来进入沿江一带的南迁中原汉语，覆盖当地的吴越南楚语形成江淮语。明清时期进人东北、西北的华北话，覆盖当地民族语言而形成东北话、西北话等。在这种覆盖类型中，几乎难以找到原居民语言的底层。

3."封闭式移民"的自变类型。远徙南方的中原居民，在闭塞的地区聚族而居，与当地民族语言可能接触但渗透不深，其语言保持相对的独立发展而成为汉语方言，如客家话、桂北平话语群等。

4."主导式移民"的交融类型。移民人口虽然占主导位置，但南迁中原汉语并不能够完全覆盖当地吴越、南楚、百越语言，而当地土著也没有进行彻底的语言换用。长期交融过程中形成以当地非汉语言为底层、以南迁中原汉语为上层的汉语方言，如吴语、湘语、粤语等。不管是语音还是词汇或句法结构，古百越语的底层残留仍然可以见到。

5."杂居式移民"的混合类型。不占优势的迁人汉人与当地居民杂居，在汉语与当地占优势的民族语言水乳交融的过程中，形成

“汉语化严重不足”的民族混合语。如福建的畲话、海南的儋州话、湘西的乡话、广东的韶关土话等，这些混合语往往难以确定其归属。

从“永嘉之乱”以后就开始发生的历次中原汉人移民的轨迹，最终投影为汉语区域分布的六大语言带：1. 中部横向的沿江语言带（江淮语）；2. 南部纵向的皖南鄱赣语言带（徽语、赣语、客家话）；3. 东南的沿海语言带（吴语、闽语）；4. 华中的湖湘语言带（老湘语、新湘语）；5. 华南的岭南语言带（粤语、平话）；6. 北部的东北—华北—中原—西北—西南语言带（大北方话）。

二、汉语南部方言的历史层次

依据中原居民向南方移民时序，汉语南部方言出现的历史层次大致是：粤语（秦/西汉/东汉/永嘉/唐/北宋）—闽语（西汉/永嘉/五代/南宋；汉语化程度低）—吴语（东吴/永嘉/靖康；其中北部吴语汉语化程度高，南部吴语汉语化程度低）—湘语（永嘉/安史；其中新湘语受西南官话的影响）—赣语（北部赣语：永嘉/唐初；南部赣语：中唐以后）—客家语（永嘉/安史/北宋）—徽语（永嘉/黄巢）—江淮语（永嘉/靖康）—平话（桂北平话：秦/两晋/唐代；桂南平话：北宋）。

1. 粤语。《汉书》：“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通志·舆地考》：“自岭而南，为蛮夷之地，是百越之地。”在福建，我参观过称之为“古粤”的古老聚落和宫殿遗址。古代“浙闽广”统称为“越”，“粤”、“越”同音而可替代，故《史记》作“越”而《汉书》作“粤”。后世以“越”指浙江，以“闽”（怀疑源于“蛮”）指福建，以“粤”指广东。“交趾”地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典籍之中，《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注：“大传说尧南抚交趾。”又先秦典籍

中有“南海”，或以为指今南海一带，但“海”在古代指大湖，上古的“南海”有可能指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而不一定就是后世的南海。如果先秦典籍中的“交趾”确实指岭南，那么岭南一带的百越很早就与中原接触了。百越包括于越、吴越、扬越、山越、瓯越、骆越、闽越、东越等。吴越相争，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这是“于越”。汉高祖六年（前201），无诸立为闽越王，这是“闽越”。“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摇为勾践之后，被封为东海王，又称之为东瓯王，这包括从浙北南奔的“于越”和土著“东越”（东瓯）。吴越瓯闽之“越”，与岭南的“扬越”和“南越”各为百越的支派。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50万秦军越过南岭征南越，是中原汉语入粤的起点。广东境内的扬越和南越进入丛林，宁可与禽兽同处，也不做秦军的俘虏。结果尉屠睢被杀，秦军等于驻守在无人区。秦亡后，中原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所率部当与土著逐步融合。汉武帝时，平定越人叛乱后置以为郡。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东汉末年，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据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岭南地区的继续汉化和汉越杂处的结果形成“古粤语”。自“永嘉之乱”以来，汉人相率南下，其中一部分来到岭南。到唐朝开发岭南方广置州郡，贬谪岭南的文人学士传播了中原文化。总体来说，唐代南迁汉人居民还是少于百越居民。韩愈《送区册序》：“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语。始至，言语不通，画地写字。”可见到粤地的唐代中原人看到的是“夷面”，听到的是“鸟语”，汉人南迁的语言难免“越化”。[①] 粤语区居民自称“唐人”以及

①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名之"唐山"、"唐装"、"唐话"的这一传统,仍然反映了当时唐文化的对粤地的深远影响。

朱熹《朱子语类》:"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从现代粤语和《切韵》音系的密切对应关系,可以推断中古粤语的形成应有唐末宋初时期大量北方移民的背景。黄巢起义、五代十国,导致汉人南下广东避难。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客户占广东总户口的39%。[①] 据容观琼研究,广南东路编户的非汉居民约占十分之六七,汉人居民占十分之二三。到了北宋时期,广东总户口数突增为唐代的2.7倍,正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南迁奠定了近古粤语的基础。广东县志的记载,广东许多望族多是南宋末年随皇帝逃难而来。

从秦汉开始,南迁中原汉语与当时的百越语及其苗裔壮语的长期交融形成现代粤语。现在粤语与壮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就是早期百越语留下的痕迹。因粤语区域地处珠江流域,南下中原居民越过南岭就可抵达,难免受到历代南迁中原汉语的影响,因而粤语的语言特征并非最古老,粤语约当于唐宋时期的中原汉语层面。

2. 闽语。《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五戎、六狄之人民。"注:"闽,蛮之别种也;七,周所服国数也。"楚灭越以后,南奔的于越进人闽越之地,勾践之后自号闽越王。秦平定南方以后,把闽越王和越东海王降为郡长而立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前202),又以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东冶以统治闽地。一说元封元年(前110),闽越王余善不受节制,汉武帝的军队进人闽地,始实现汉人的直接统治,并且迁徙闽越居民于语言同源的江淮之间(当时江淮居住的是古吴语居民的后裔)。一说建元三年(前138),东瓯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受到闽越围攻向朝廷求援，武帝派兵解围并就此将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取消了东瓯国。约昭帝始元二年（前85），立东瓯为回浦县的同时设立冶县。此为中原汉语对闽越的最初影响，或是作为汉语方言之古闽语的萌芽。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崛起江东的孙吴进攻会稽，太守王朗由海路奔东冶。孙军追踪至闽江下游，其后四次用兵绵延62年之久。建安八年（203）驻兵五千于建安都尉，后改为郡。当时入闽开发的江南居民，多为与百越族同源的吴越人，江南吴越语对闽语的渗透与中原汉语对闽语的影响不同。大规模的中原居民入闽，是"永嘉之乱，衣冠渡江，如闽者八族"（《三山志》）。在中原居民抵达江南的迫使下，也引发了江浙越族的入闽，这次移民使福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建安郡分出晋安郡。北方移民带来的当时中原汉语，也就是所谓的"渡江十五音"，成为闽语的中古层次，在地名上打下了如"晋江"这样的烙印。从六朝到唐代，中原人口的陆续迁入致使福建人口增长在十倍以上。其中尤以唐初河南光州人陈政父子，统率府兵五千六百入闽"征蛮"，带来了7世纪的中州汉语。抵达云霄江边时，陈政说"此水像上党的清漳"，"漳江"（今名九龙江）由此得名。五代时期，河南固始人王潮兄弟，率几十万军队南下转战八年并据闽称帝，带来10世纪的中州汉语。唐时"福佬"的名称，可以作为闽语在唐代已经形成一支独特方言的旁证。北宋太宗（976—997在位）时，"闽语"的名称已见于文献。南宋端宗（1276）在福州即位，为元兵所迫奔走于泉、潮、惠等州之间，大量宋室保驾御敌的遗民留居福、泉、漳、潮等地。

福建境内还生活着畲族（即唐代"发生啸乱"的蛮僚）居民。一方面，也许他们是百越族在闽地（原居地在闽西北和闽南，从14世纪迁往浙西南和闽东北）留下来的惟一未被汉人同化的一支；另一

方面，说闽语的汉人中不可能没有畲族汉化的后裔。从民族体质学来看，林惠祥指出闽人的容貌特征可能是百越和汉人的混血；从语言学来看，在闽语中存在一些源于古畲语的词汇。因此，闽语是以闽越土著语为底层、以中原汉语为上层的汉语方言，即以百越语的底子去学习中原汉语的结果。[①] 根据闽语轻唇、舌上尚未从重唇、舌头中分化出来，有人认为闽语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但如果注意到现代壮侗语一般没有轻唇、舌上音，现代苗瑶语一般都没有舌上但有轻唇(腊乙坪苗语没有轻唇)，印尼语、朝鲜语、日本语也没有轻唇音，那么闽语的只有重唇、舌头，到底是百越语的底层，还是东晋或唐代南迁中原汉语的历史层面，目前还难以明确判断。

因福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语言内部分歧至今相当严重，可以说至今在某些地区的闽语还保留着语网的某些特征。由于早期的汉语化程度就不高，以后接受历代北方汉语的影响又不及粤语，因此闽语中保留的百越语成分最多，语言年代最为古老，以至于高本汉对闽语不得不另眼看待。假如认定从淮南越长江(古吴越)，经浙南(瓯越)到闽粤，当时都是东南百越语的范围，那么中原居民的南迁对东南百越语的影响则是由北向南依次减弱：江淮全覆盖，江南深融合，浙北浅融合，浙南深渗透，闽地浅渗透。由此推定，闽语不是从作为汉语方言的“古吴语”中分化出来的，而是中原汉语对百越语汉语化程度较低的结果。因此，难以首肯“闽语的主要渊源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和“南北朝时期的吴语就是闽语的前

① 详见张光宇：《闽南方言研究导论》，《切韵与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身”的“闽语源于吴语的假说”,[1] 而应认为吴语和闽语的底层来源语都是百越语,不排除是有内部差异的百越语方言。虽然东汉三国南北朝时期,有吴语区军民入闽,但是这些军民所说的吴语是与当时闽越居民相近的语言,并非从吴语中分化出的闽语。闽语成为汉语方言,关键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入闽者八族”和这以后中原汉语对闽语长期汉语化不足的结果。[2] 因此闽语的历史层次相当于唐代以前,并且包含明显的百越语底层。

3. 吴语。《小戴礼·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正义》注“以丹青雕刻其额”,又:“非惟雕题,亦文身也。”夷蛮风俗相同,当时分布在黄淮之间、长江中下游和江浙沿海一带。《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勾吴。”《索引》:“勾者,夷之发声,犹言于越也。”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断发。”勾践一族相传为少康庶子,似乎暗示于越人也有部分中原文化血统。勾吴和于越“接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吕氏春秋·知化》)。可见泰伯、仲雍带去的先周华夏语,由于人口比例太低因而对当地土著语言影响不大。楚人伍员奔吴,渔父为之歌吟,证明吴语和楚语亦可以相通。《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反映了古越语与侗台语同源。

孙吴崛起江东,对江南(苏南)的开发吸引了一些北方士族,《三国志·吴书》所载孙权的谋士大将有21位是北方人。两晋之交

① 罗杰瑞:《闽语里的吴方言字》,1983年;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年;丁邦新:《吴语中的闽语成分》,1988年。

② 详见张光宇:《闽南方言研究导论》,《切韵与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的大量中原移民不仅完全覆盖了古吴语北域的江淮之间，而且深入江南浙东地区。一方面，吴人为做官"作洛生咏"而习北语；另一方面，北方士族与江东士族接触"共重吴声"。古吴语受中原汉语影响形成中古吴语。东晋以后的《子夜歌》和"吴声歌曲"显示了吴语如第一人称用"侬"的特点。

"靖康之难"的北方移民，不仅在浙北造成了最富有语言特色（儿尾发达、人称代词北方词语）的杭州中原方言岛，而且深入到浙南地区，中古吴语逐步演变为近古吴语。以瓯越土著语为底层的浙南吴语，土语非常复杂，受中原汉语影响较少而与闽语、徽语却具有许多共同点。吴语中的清浊对立，保留了中古汉语的音系特征。

4. 湘语。湖湘流域的土著居民是"三苗"（三犹多也）。先周时期，源于夷越族（帝高阳之苗裔）的楚人，由中原进入鄂南湘北和苗蛮土著混合形成蛮楚语。战国屈原和汉初宋玉的《楚辞》反映了古楚语的一些特色。扬雄《方言》提到"南楚之间"、"南楚江湘"、"荆楚江湘"和"江湘九嶷"，所指皆为南楚语。因此鄂湘一带的蛮楚语，秦汉时期已经演变成南楚语，"南楚之外"、"南楚以南"则是指南楚以南一带的百越语。

地处湖湘的南楚语在晋代以前非常特别。《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语音亦楚。"又《轻诋篇》："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因为听不懂南楚语，所以中原人诋讽楚人交谈像一群乌叫。随着"永嘉之乱"中原居民的南迁，南楚语演变为古湘语。近古以后，受北方汉语或西南方言的渗透影响，又进一步分化出新湘语（浊音消失）。在新湘语的归属问题中，出现了到底是根据语言相异度，还是根据历史文化性确定的矛盾。其实，新湘语和老湘语（保留全浊声母）受中原汉语影

响的不平衡性，与南部赣语和北部赣语（保留全浊声母）的不平衡性相类似。吴越语和南楚语原来同出一源且连成一片，即使在“永嘉之乱”后被徽语和赣语隔断，但是这些方言仍然保留着声母清浊对立的古老特征。至于湘东平江、浏阳一带的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的特征，可能是受南朝中原汉语或邻近赣语的影响所致。

至于《方言》屡次提到的与“南楚江湘”有别的“齐楚”，是指楚国后期扩张到的、与山东接近的淮北鲁南一带的“东楚”，因为与齐鲁语言接触渗透，因此扬雄称之为“齐楚”。“东楚”语是吴越语和齐鲁语的过渡，充其量是古楚语的一种方言。东楚语因地处淮北而与中原和齐鲁相通，在汉魏西晋不免受中原和齐鲁汉语的同化。“永嘉之乱”，迁往江淮的北人有许多来自青徐，因此东晋南北朝的地处徐淮的东楚语应与江淮语相近。徐淮的东楚语，在隋唐又进一步中原化。辽金时期北方汉语的阿尔泰化浪潮，致使东楚语终与江淮语分道扬镳，然而在现代徐淮方言中仍然可以看到江淮语的底层。

5. 赣语和客家话。鄱阳湖—赣江流域古称“吴头楚尾”，上古为“三苗”的活动范围，后包括在吴越—蛮楚语以内，汉代包括在“吴扬越”语言区域之中。湖南、江西、浙江南部地名用字“洋、潦、寮、圳、墟”的一致性，说明这一地区古代都属于百越语区。南昌话的词汇更接近吴湘和江淮语，而与客家话没有特殊的亲密关系，表明北部赣语与吴湘、江淮语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层次，而客家话另有来源。

根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旧说，客家话的形成是由于客家人的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南迁虽然始于东晋，但形成特殊的民系却在宋代以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谈到汀虔南韶居民的语言

接近汉音，与南方其他汉人的语言不同。依据客家方志记载，宋代客家居地户口始有“主”、“客”分列，“稽诸往牒，《元和郡县志》载程乡户口无主客之分，惟《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皆分主客，是主客之名当起于宋。”（罗翽云《客方言》自序）表明客家先民的迁徙，在宋代是显著的事实。另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客户占广东户口的39%。东晋以来客家南迁的五个时期中，前三期（“永嘉之乱”到南朝；“安史之乱”到宋初；“靖康之难”到明初）的客家南迁以后，定居在闭塞山地，保留固有传统，与当地畲族杂处并贸易婚姻，而与周围平原地区的其他汉族居民却有距离，客家话的形成应当在这前三期。后两期（康熙中期、乾隆以后）的客家迁徙，使客家分布的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一系列“客家方言岛”。

根据沙加尔[①]的新说，汉至唐初，特别是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鄱阳湖平原，到天宝年间（742—755）赣北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0～50人，其时赣南人口每平方公里才1～10人。这些移民的北方话和当地语言接触，形成了保留全浊声母的原始北部赣语。中唐和晚唐的北方移民带来了接近长安的北方话，和原始北部赣语接触以后形成全浊声母消失的原始南部赣语。至宋以来，人口稠密的赣中地区的北方移民经江西东南部的武夷山地区，进一步移至闽西再转粤北。他们原来使用的原始南部赣语，和赣东南、闽西和粤北东南沿海的土著语言相接触，于宋明之间形成原始客家话。[②]

依据现代苗、瑶、壮、侗语言一般都存在声母的清浊对立，可以推断与闽语、客家话、南部赣语、粤语接触的或作为这些方言的底

① *On Gan-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8 No.1, June, 1988.

②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4页。

层古老土著语言都存在声母清浊对立。因此具有浊声母的吴语、徽语、北部赣语和老湘语可能是没有浊音清化的唐代以前北方移民运动形成的结果，而没有浊声母的客家话和南片赣语是浊音清化以后唐宋北方移民运动形成的结果。由此可见，赣语的南北差别可能隐含了移民的两个历史层次，客家人可能是从南片赣语居民中分化出去的。虽然客家和南部赣语居民的语言差别不显著，但是由于生活地区不同，始终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因此可以划分为两个民系或方言。退一步说，如果根据语言的相似性，那么客家话和南部赣语可以合并为一区，而北部赣语则独立为一区。

6. 徽语。徽语是一种界于吴语和赣语等方言之间的丘陵盆地方言。历史上的皖南山区，是山越的居住地。《越绝书》曰"黟、歙以南皆大越之民"，《汉书·地理志》"黟"字下注释："浙江水出南蛮夷中，入东海。"东汉时期，北方流民和宗族开始零星迁入黟歙，汉族文化传入徽州地区。三国时期，山越在此仍然非常活跃，东吴对山民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直到两晋之交，才出现中原汉人迁入黟歙的浪潮，他们往往聚族而居。民国《歙县志·风俗》曰："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期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宋人罗愿《新安志·风俗》曰："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因此，作为汉族民系的徽州人在宋代已经形成。

现代徽语的声母系统接近赣语和江淮语通泰方言，古全浊声母今都全清，塞擦音不论平仄以读送气清音为主；其韵母系统和语法特点却与浙南吴语（处衢片、东瓯片）较为接近。根据江淮语（通泰方言）、赣语、客家话和徽语的全浊声母塞擦音今读送气清音的共同特征，可以推断这一特征（江淮语）是源于"永嘉之乱"的南迁

中原汉语的历史层次，而韵母系统和语法特点（浙南吴语）具有土著百越语言的历史底层。对由淮南渡江的中原居民，皖南山区可以是留居栖息之地，也可以是由江淮进入赣江流域的必经之道。也许，留居皖南山区的中原居民比例不是很多，现代的徽语居民部分来源于山越人的汉化。与浙南吴语的形成相似，徽语的汉语化程度不足。其韵母系统与浙南吴语较为接近，有些不见于浙北和苏南吴语的浙南吴语的特殊成分，但可以在徽语里找到，证明了皖南徽语和浙南吴语包含着皖南—浙南土著百越所共同使用的古越语底层。因此，徽语不是从吴语中分化而来的方言，而是魏晋以后南迁中原汉语对山越语同化不足的结果，不仅与浙南吴语较为接近，而且与江淮语具有共源性。只是由于两晋之交中原移民覆盖率比江淮语区域来得低，而两宋之交的迁人居民规模更不能够和江淮流域比较，因此才形成了徽语和江淮语若即若离的联系。

7. 江淮语。无论是从民系特征，还是方言特征，江淮语都不是北方官话的次方言，而是一支独立的汉语方言。所谓"官话"，就是明代以南京话为标准的江淮语。江淮语所处的地区原来是古吴语（淮南地区）和古楚语（鄂东地区）的通行地区，受到"永嘉之乱"和"靖康之难"等南迁中原语言的两次大面积覆盖，才形成保留中原语言不同历时特征的中部汉语方言。因此，江淮语具有三个历史层次：上古吴语；中古中原汉语；近古中原汉语。东部通泰区域地处海隅，非兵家必争之地，语言特征最为古老。运河一线和皖北鄂东地区交通方便，多受近古中原汉语影响，语言变化速度较快。就声调来说，通泰方言的南通 7 个、泰州 6 个，洪巢和黄孝方言 5 个；就山摄一二等的唇牙喉音的合口字来说，通泰和洪巢方言的韵母不同，而洪巢与黄孝方言近同；就古全浊声母的今音而言，通泰方言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都是送气清音，而洪巢和黄孝方

言则是不送气清音。凡此种种，表现出语言特征的从古到今与地域分布上的从东到西相一致的推移状况。

“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居民的多次陆续南迁，分别形成的江淮语（通泰方言）、徽语、赣语、客家语，保留着都有两个入声调且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全部或部分保留着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以及不论平仄一律都是送气清音的特征。[①] 另外，江淮语（通泰方言）、赣语和客家语还具有古浊上声调归阴平的共同特征。

8. 平话。平话可以分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桂南平话是宋代军事移民形成的结果。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狄青率兵西征。平息广西侬智高之乱以后，在“平南军”留屯广西的同时，当地土酋羁縻制度改为大半由汉人担任的土官制度。当时的汉人多居城厢内外，依附于土官势力。在原籍多为山东的平南军士兵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了桂南平话。此后，宋熙宁年间（1068—1077），陆逵率领10万大军收复被交趾李朝攻占的邕州以后，又留下一批军队戍守，其中一部分落籍南宁。

与军事移民形成的桂南平话不同，桂北平话实际上是陆续迁入、方言来源歧异的一片汉语零星语群。中原居民的入桂可以追溯到秦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派兵进入岭南，其中两支进入广西，控制了漓江通道和九嶷通道。进入广西境内的秦军“三年不解甲”，开凿灵渠，此为中原居民入桂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桂林郡治在今贵港一带。秦王朝还迁徙中原居民充实岭南，“使与百粤杂处”。两晋以后，迁入广西的中原人士渐

① 详见鲁国尧：《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多,始安郡(桂林)和合浦就是南朝流放获罪官僚的地方。但除了桂、梧等郡之外,汉人多湮没在当地"俚僚"之中而土著化了,当时通行的是南方民族语。李涉《鹧鸪词二首》"岭外行人少,天涯北客稀",柳宗元《柳州侗氓歌》"愁向公庭问重译",谪居岭南的中原汉人稀少,需要翻译才能够与当地人交流。"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和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流民入桂者更众,直至20世纪80年代桂北汉人仍然保持着"唐装"传统。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述钦州有民五种,"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北方移民带来的汉语,才是桂北平话的主要来源。这些经不同路线越过南岭入桂而没有土著化的汉人,就将不同方言的汉语带进了广西,从而形成了彼此差异极大、通用程度很低的桂北平话。生活环境的闭塞和文化传统的保守,以致至今没有形成一种四方认可的桂北平话通语。

在平话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首先,由于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形成的时间不可以同日而语,因此实际上这二者不是具有共同内部特征的一种汉语方言。其次,由于桂北汉人不是一次性集中迁来,严格来说桂北平话本身就不是一种方言,而是具有一定历时和地域差别的中原汉语沉积在同一行政区域的一片驳杂语群。显而易见,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以及桂北平话的内部,既不具有历史上的同一移民来源,又不具备语言演变现状的共时一致性。

随着宋代的军事移民和掌握地方政权,宋代入桂汉族所使用的中原语言遂成为广西的通行语,因而源于南宁"平南村"的"平"成为广西汉语的称呼,并且被隋唐五代入桂的汉人所认同。直到元明以后,说白话(粤语)的广府人、说西南话的桂柳人和客家话的客家人才进入广西地域。

三、汉语南部方言的存古程度

南迁中原移民的历史层次并不等于南方汉语方言的存古程度。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了北方移民的先后次序，与南方汉语方言的存古度或语言年代并不完全平行。大致说来，闽语的语言年代最古老；粤语次之；吴语、徽语、北部赣语、老湘语再次之；南部赣语、客家话再次之；桂北平话再次之；桂南平话再次之；江淮语再次之；新湘语再次之。其中，闽语保留了没有轻唇和舌上的原始特征；粤语保留了鼻韵尾和塞韵尾的对立；吴语、徽语、湘语、北部赣语保留了声母的清浊对立；客家话、南部赣语和江淮语通泰方言具有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的一致性特征；至于江淮语洪巢—黄孝方言和新湘语则最接近现代北方话。

对于南方汉语方言的存古度歧异性，可以用多种因素加以解释：

1. 就迁人汉语来说，中原北人南下时间有先后，语言年代不同(时间差别)；中原北人原居地区有东西，语言地域不同(空间差别)。

2. 就土著语言来说，与中原汉语互动融合的百越语内部原来具有差异。

3. 就语主差别来说，迁入中原人口和当地土著人口的比例不同。

4. 就方言演变来说，源于中原居民南迁的南方汉语方言，在形成以后所受中原汉语影响的历史层次和程度深浅不尽相同，各南方方言内部独立发展出的新成分也不相同。

到底什么是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



语言文化现象，古代南方土著印纹陶文化的分区和汉语南方方言的区域具有明显的对应性。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是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一种重要古越文化遗存，其繁荣阶段约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春秋时代。考古学家依据各自的特征，一般分为七个次文化区：1. 宁皖区（原始侗台族山越文化）；2. 太湖区（原始侗台族于越文化）；3. 赣鄱区（原始苗瑶族苗蛮文化）；4. 湖湘区（原始苗瑶族荆蛮文化）；5. 岭南区（原始侗台族南越文化）；6. 闽台区（原始侗台族闽越文化）；7. 粤东闽南区（原始侗台族骆越文化）。除了覆盖式移民造成的江淮语（东晋南朝）插入宁镇地区，封闭式移民造成的客家话（北宋）分布在赣南、粤东和闽南地区，还有陆续移民和军事移民造成的广西平话（唐宋），南方印纹陶次文化区的分布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1. 徽语（江淮语）；2. 吴语；3. 赣语；4. 湘语；5. 粤语（平话）；6. 闽语；7.（客家话）——的分布区域一一对应。[①]

根据考古学界的意见，南方印纹陶是古越族创造的文化，也就是古代南岛—南亚民族创造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就是原始南岛（侗台）—南亚（苗瑶）语言。原始侗台族分布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原始苗瑶族分布在长江中游一带。《战国策·卷七》："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赣鄱区即鄱阳湖—赣江流域，湖湘区即洞庭湖—湘江流域。如果南方印纹陶文化中的不同的亚文化相包括了不同的亚语言相，可以推定，汉语南方方言具有不同的古越语支派底层。换而言之，在中原居民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与当地百越土著的语言特点密切相关。归根结底，各文化区域不同的当地土著语言底层导致了汉语南方方言的

① 参见杨锡璋：《古代南方印纹陶与汉语南方方言》，《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巨大差异。

中原北人南下的时空差别，接触语言的语主比例的差别以及其后所受中原汉语影响的历史层次和程度深浅，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或综合指数决定了南方汉语方言的存古度或语言年代，导致了中原移民的历史层次并不等于南方汉语方言的存古程度。依据民族历史语言学和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现代南方汉语方言的一些特征并非当时南迁中原汉语所独有，而是中原汉语的前身华夏语和南方侗台—苗瑶语的所共有的同源特征。

四、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从章太炎、黎锦熙开始，到1934年以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后三次划分，趋于精细。其中《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①] 最为详尽，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一类：1. 北方官话；2. 西南官话；3. 下江官话；4. 吴语；5. 湘语；6. 赣语；7. 客家话；8. 粤语；9. 闽南语；10. 闽北语；11. 徽州方言。

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丁邦新主张"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区……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能确指其时间"。[②] 与主要强调语言共时歧异的划分思路不同，丁邦新的历时区别原则建立在汉语历史语音学研究的成果之上。若依据古声纽学的研究，汉语语音史上声母演变的层次为：1. 轻唇和重唇的分化；2. 舌头和舌上的分化；3. 齿头和正齿的分化；4. 舌根和舌面的分化，另外还有清浊对立的消失。然而，一方面韵母的历史分化研究目前还难以做到像声母这样明晰，另一

① 上海《申报》馆1948年版。
②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8页。

方面分化最早的轻重唇，依据文献材料也只是从南朝开始，而方言的形成在这之前早已发生了。如果进一步思考，汉语历史语音研究和汉语现代方言研究其实是互相印证，历史语音研究还要依靠现代方言语音研究的成果。

汉语方言是汉族民系的语言文化相，汉语方言分区的本质上是汉族民系的划分。方言的形成类型、出现层次和存古程度，与中原汉人的移民轨迹密切相关。因此我提出汉语方言划分的三个基本原则：1. 移民历史与方言分布的一致性；2. 语音标准和语言结构的综合性；3. 历史语音和方言语音的互证性。

关于语音标准和语言结构的综合性，首先，务必废止以推广普通话为方言研究的功利性目的或以北方话为主要参照系统的方言研究定式，方言研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其次，应当彻底破除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在于语音差别的观点，冲破汉语方言"一元分化"的理论模式。再次，务必突破静态系统的音位记录方法，接受动态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的理论，采取音素或音位变体的记录方式。否则，南方汉语的百越语底层会视而不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音素或音位变体或许是历史语音的孑遗，或许是语音变化的先兆，因此音素记录更能反映方音系统的真切面貌。第四，制定综合南北方言的基本词汇、核心结构的比较项目。除了汉语方言之间的对比，要注重与古代语料的历史对比以及与毗邻周边民族语言的对比。

下面以六个历史层面，大致展示汉语方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脉络：

<table>
<tr><td></td><td colspan="5">北方地区</td><td colspan="12">江南地区</td></tr>
<tr><td>商代语言</td><td>氐羌语</td><td>胡狄语</td><td>华夏语（商语）</td><td>东夷语</td><td>巴蜀语</td><td colspan="12">百越—蛮楚语</td></tr>
<tr><td>周代语言</td><td>三晋语</td><td>幽燕语</td><td>华夏语（雅言）</td><td>齐鲁语</td><td>巴蜀语</td><td colspan="4">吴越语</td><td colspan="4">蛮楚语</td><td colspan="4">百越语</td></tr>
<tr><td>秦汉语言</td><td>三晋语</td><td>幽燕语</td><td>雅言</td><td>齐鲁语</td><td>巴蜀语</td><td>闽越语</td><td colspan="3">吴扬越语</td><td colspan="4">南楚语</td><td colspan="4">南粤语</td></tr>
<tr><td>中古汉语</td><td>古晋语</td><td>古燕语</td><td colspan="2">北语</td><td>古蜀语</td><td>古闽语</td><td>古吴语</td><td>古徽语</td><td>古江淮语</td><td colspan="2">古湘语</td><td colspan="3">古客赣语</td><td>古粤语</td><td colspan="2">古桂语</td></tr>
<tr><td>近古汉语</td><td>晋语</td><td colspan="3">汉儿言语</td><td>西南话</td><td>闽语</td><td>吴语</td><td>徽语</td><td>官话</td><td>老湘语</td><td>新湘语</td><td>赣北语</td><td>赣南语</td><td>客家语</td><td>白语</td><td>桂北话</td><td>平南话</td></tr>
<tr><td rowspan="2">现代汉语</td><td>晋语</td><td>东北话</td><td>中原话</td><td>西北话</td><td>西南话</td><td>闽方言</td><td>吴方言</td><td>徽方言</td><td>江淮方言</td><td>老湘方言</td><td>新湘方言</td><td>赣北方言</td><td>赣南方言</td><td>客家方言</td><td>粤方言</td><td>桂北方言</td><td>平话</td></tr>
<tr><td colspan="5">北方汉语</td><td colspan="12">南方汉语</td></tr>
</table>

说明：

1. 由于中古时期北方民族的进入中原和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汉语周边的古代民族语言区一些才逐渐成为汉语方言区。

2. “永嘉之乱”以后出现“古客赣语”或“原始客赣语”，唐宋以后新的中原居民的南迁才分裂为“北部赣语”（简称“赣北语”）、“南部赣语”（简称“赣南语”），又从“南部赣语”中分裂出“客家话”。

3. 宋以前广西地区的汉语方言群称之为“古桂话”，宋以后才出现“平南话”，逐步形成“桂南平话”和不同来源的所谓“桂北平话”的分野。

4. 中古以后在湖湘流域形成汉语方言“湘语”，唐宋以后分化

出与西南话接近的“新湘语”。

5. 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方言当时人称之为“北语”，宋辽金元的中原冀燕（包括流通于关外辽东一带的）方言当时称之为“汉儿言语”（见之于朝鲜文献）。

6. “官话”一词明清时期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语。



第八章　元代汉语音系和北方汉儿言语

元代汉语是近古汉语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由于统治中国全境的是蒙古民族政权，从宋代到明代的汉语演变过程发生了巨大的曲折。这一中原正音发展中的曲折或断裂，从靖康之难所引发的中原居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南迁、女真金人统治中原北方就开始了。一方面，以汴梁话为代表的宋音或中原正音南播浙北（以临安为中心）和江淮一带（以建康为中心），另一方面，蒙古统治时期，人们所听到的北方中原音韵已经是经过辽（907—1125）金（1115—1234）两代大量契丹、女真人语言换用之后的北方汉语了。

北宋奉《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为官韵。金人入主中原（1126）以后，附在韵书上的官方压力随之消失，于是依据中原实际语音改并前代韵书或另撰新韵的"私韵"兴起。在金国，相继出现了荆璞的《五音集韵》（1141—1149）和韩道昭的《改并五音集韵》（1208），稍后又出现了分韵一百零六的王文郁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1229年前）和张天锡的《草书韵会》（1231：成书于金国都城南

京即汴梁),逐步形成了反映当时中原实际语音的十六摄(最迟出现在1208)概念。在南宋,出现了刘渊的一百零七韵《韵略》(1252)。元代福建人黄公绍据《韵略》改编为《古今韵会》(约1292),其门人熊忠再改编为《古今韵会举要》(1297),此外当时还流传着反映元代汉语正音的《蒙古字韵》(1308前)。

尽管元代的南北汉语口音可能差别较大,但因为前有所承并互相借鉴,故《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二者音系较为一致,但与后27年面世的《中原音韵》(1324)却差异明显。因此《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两部韵书的音系基础或音系性质,学术界分歧十分严重。

第一节 《蒙古字韵》与宋代两京音系

一、《蒙古字韵》的音系

在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多仰慕汉文化并自愿同化。惟有蒙古元,对汉文化尽力排斥,又国人分四等而"南人"最下,并企图以八思巴字(1269年制订)拼写元朝境内一切语言而取代汉字,所撰《蒙古字韵》即为其实践之一。

汉人对韵书向有增补刊订的习好,《蒙古字韵》的传本当时存在多种。王存义《稼村类稿》记载,李弘道编过一部《蒙古字韵》,其韵分15部,字母32个,与现在看到的至大元年(1308)的朱宗文校订本不尽相同。从编纂体例可以看出,《蒙古字韵》体例承袭了反映北留中原音系的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浙江衢州人朱宗文,曾据反映南迁中原音系的黄公绍《韵会》来校正误字,而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又根据《蒙古字韵》来改订声韵,可见二书关切密切。朱

订《蒙古字韵》十五个韵部如下：

一东	二庚	三阳	四支(配入)	五鱼(配入)
六佳(配入)	七真	八寒	九先(配入)	十萧(配入)
十一尤	十二覃	十三侵	十四歌(配入)	十五麻(配入)

《蒙古字韵》十五个韵部与宋代等韵的十六摄非常接近，仅少已经并入阳部的宕摄。除十一尤外，以入声韵相配阴声韵六部，表明相配的入声韵和阴声韵的元音趋于中和。因为八思巴字母中没有设计入声塞尾字母，因此入声尾未能够以字母符号明确标注出来。

《蒙古字韵》采用传统 36 字母系统，但知彻澄与照穿床相混同，实分 33 个声母。声母系统的最显著特征是保存了全浊声母系列，但在八思巴标注汉字的对音中，如果依据现代语音学的审音记音规定，清浊字母却全部颠倒。标注汉字对音的学人，如果是蒙古学者，可能未掌握汉语声母清浊的实际发音(蒙古语没有辅音清浊的对立)；如果是中原汉儒，可能未了解八思巴字母清浊的使用区别。不管是什么原因，《蒙古字韵》中声母清浊两类的区别是明了的。

二、《蒙古字韵》宋代两京音系说

关于《蒙古字韵》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多种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Miyoko Nakano)的《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语音研究》。[①] 引人注意的是，中野美代子认为《蒙古字韵》音系具有宋代两京(汴梁、临安)音系的性质。

---

① *A Phonological Study in the Phags – Pa Script and the Meng – Ku Tzu – yun*,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1.

与国内研究者通常认为《蒙古字韵》音系代表大都音不同，在中野美代子之前，日本学者服部四郎早就提出——《蒙古字韵》记录的是迁徙到临安的汴京方言。[①] 中野美代子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详加阐发"《蒙古字韵》宋代两京音系说"。

除了认为《蒙古字韵》代表宋代两京（汴梁、临安）语音，中野美代子还认为这一音系有许多吴方言成分：

> 就其声母辅音系统来说，看来非常奇怪的是《蒙古字韵》保存了浊音声母和卷舌音声母，而这两类声母则分别是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特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蒙古字韵》是元代编纂的，即正好在官话区的语言的浊音声母已经消失之后……当汴京方言迁徙到临安，浊音声母甚至很可能就一直保存在官话之中。相反，《蒙古字韵》中的卷舌音声母也是作为正齿音出现的，而这些音就是中古音在吴语方言中的残余。
>
> 在韵母系统中其主要元音的数目和性质显然比《中原音韵》更为古老和复杂。同样，对于韵母系统的其他一些特征，特别是特有的 N，《蒙古字韵》表现了与吴语方言而不是官话方言的更多的相似成分。[②]

中野美代子虽然大体上同意服部四郎的假定，即《蒙古字韵》音系可能是迁徙到临安的汴京方言，但又提出今传本校订人朱宗文，可能在某些语音上参考了衢州（冯蒸原按：衢州原名信安，朱宗

---

① 见《元朝秘史の蒙古语を表はす汉字の研究》，东京，1946 年。

② 转引自殷方：《1965—1979 年国外汉语音韵学研究述评》，《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文的出生地)的语音系统。因此,中野美代子推论:《蒙古字韵》音系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

三、《蒙古字韵》吴语方音成分说剖析

1.《蒙古字韵》音系的浊声母是否来自吴语方言的特征?

依据中野美代子的假定,既然"当汴京方言迁徙到临安,浊音声母甚至很可能就一直保存在官话(李按:似指南迁杭州的中原话)之中",那么浊声母也就不是当时吴语方言已经具有的特征,而是由靖康南渡时的南迁中原汉语带来的新的语音特征。

具有浊声母的现代方言,是在长江以南一线的吴语、徽语、北部赣语和湘语区域,再向南的方言都没有清浊对立。这些方言中的清浊对立,没有证据表明一定是在靖康南渡时由中原带来,如果浊音清化在唐代的北方某些地区已经逐步开始,那么更有可能是唐宋以前南迁中原移民的语言特征。《蒙古字韵》的清浊对立固然可以与当时的吴语验证,但是并非来自吴语方言的特征。北方中原的浊音清化,大概始于唐宋以后,地区之间具有清化的不平衡性。《蒙古字韵》音系的浊声母到底是依据传统韵书或读书语音,还是当时实际中原的口语语音?明初反映南京语音的《洪武正韵》也保存浊音声母,而南京地区在靖康南渡时为中原汉语彻底覆盖。另外依据今天的江淮语通泰方言的清声母发音带有些浊音性色彩,可以推论元明的江淮语可能还保存着浊音声母。也许,编撰《蒙古字韵》时的元朝中原地区汉语浊声母已趋消失,但是宋代南迁江淮的中原汉语浊声母系列仍然存在。

2. 卷舌音声母是否是官话(李按:这一"官话"的含义是北方话,不是明清官话的真正含义)方言的特征?

虽然在吴语的很多地区如今都没有卷舌音声母,但在无锡、常

熟等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着卷舌音声母。同样,江淮语中的通泰方言(李按:根据我的观点,江淮语不属于"北方话")区的许多乡村中也存在着卷舌音声母,因此卷舌音声母不是北方话的独具特征。也就是说,《蒙古字韵》不是吴语方言浊声母特征和北方话卷舌音声母特征的复合体,而是两种声母特征都同时存在的元代汉语正音系统。依据《洪武正韵》,只有源于南迁中原汉语的南京语音与这一正音系统吻合。

3.《蒙古字韵》韵母系统主要元音的数目和性质是否比《中原音韵》更为古老复杂?

《中原音韵》与《蒙古字韵》都有闭口韵和入声韵,韵母系统格局基本相同,都与十六摄有因袭关系。关于《字韵》与十六摄的关系,可以参见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1986);关于《中原》韵部与十六摄的关系,可以参见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90)。《中原音韵》与《蒙古字韵》的最显著的语音差别表现在清浊声母的是否对立上面。

4. 朱宗文是否可能在某些语音上参考了衢州的语音系统?

朱宗文不是《蒙古字韵》的作者,而是校订者。刘更《序》说:"今朱伯色增《蒙古字韵》,正《蒙古字》误。"朱宗文也说明他曾用《韵会》来校正《蒙古字韵》误字,并用"诸家汉韵"来证其然否。虽然不排除《蒙古字韵》的个别字音,可能依据具有中原传统的衢州读书音系统做微小调整,但整个音系格局不可能做大的改订。

5.《蒙古字韵》的音系是不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

既然"《蒙古字韵》的音系可能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那么又怎么可以说"《蒙古字韵》这一音系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既然"《蒙古字韵》这一音系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那么又怎么可以说"《蒙古字韵》的音系可能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

一"？或者《蒙古字韵》音系含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或者《蒙古字韵》音系是吴语文读形式的原型，不可能《蒙古字韵》音系既含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而又是吴语文读形式的原型。

宋元吴语口语与中原音韵有别，读书音当以中原音韵为准，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研究》① 中写道，"所有的其他吴语方言大量的词语都有文白两种读法，而杭州却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都只用其文读"，已经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靖康南渡，赵宋政权和士族文人南迁，势必给吴语方言带来了新的文读形式。在元代的吴语之中，这一源于南宋的文读形式可以与当时的韵书互相验证，但没有证据说明《蒙古字韵》音系吸收了当时吴语方言的语音特征。可以认为《蒙古字韵》所反映的音系与宋元以来的吴语方言文读形式之间关系密切，但元代《蒙古字韵》音系不可能是源于南宋的吴语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

因此，《蒙古字韵》音系代表的不是宋代的两京正音，而是源于宋代两京（汴梁、临安）正音，而在江淮地区有所演变的元代读书音系。中野美代子所说的《蒙古字韵》音系中的这些"吴语方言成分"和"官话方言成分"，正是源于宋汴代两京正音，并且在明初仍然保存在以《洪武正韵》为代表的江淮语中的语言特征，或所谓明清"南方官话"的宋元中原语音渊源。

第二节　《中原音韵》与社会文化背景

以《中原音韵》的研究为中心，20 世纪出现了"北音学"这一术语。当然，这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所谓"北音"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① 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8 年印行。

以及"北音"在近古汉语语音史上的真实地位,这些都没有明确,其中关于《中原音韵》音系性质的研究,至今仍然有一些关键问题亟待深入追究。

一、《中原音韵》是否包括《正语作词起例》?

宁继福在《中原音韵表稿》[①]（以下简称《表稿》,引文所注页码即该书页码)中认为:"《中原音韵》一书由《韵谱》(也称《音韵》)和《正语作词起例》两个部分组成。后者是前者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说明。"(第157页)根据周德清和友人的序言,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1.《中原音韵》就是《中原音韵》,不包括陆续撰写的《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简称《作词起例》)。《中原音韵》是重视张汉英的请教,为作词之法而编。

周德清《自序》曰:"泰定甲子,存存(李按:周德请友人萧存存)托友张汉英以其说问作词之法于予……因重张之请,遂平分阴阳,及撮其三声同音,兼以入声派入三声,如鞞字次本声后,葺为一帙,分为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又周德清《后序》曰:"泰定甲子秋,余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青原萧存存……明当尽携《音韵》的本并诸《起例》,以归知音。"

除了在《自序》和《后序》将《中原音韵》并《作词起例》分陈,周德清在《作词起例》中一再提到"《中原音韵》"或"《音韵》"。如果《作词起例》是《中原音韵》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在《起例》内一再称另一部分为《中原音韵》。

再罗列时人给《中原音韵》写的序言,以证明《音韵》不包括《作

①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词起例》,《音韵》和《作词起例》并非一本书。

青原人罗宗信,通过同乡萧存存知道《中原音韵》并“求锓诸梓”,其《序》曰:“高安友人周德清,观其病焉,编葺《中原音韵》并《起例》以砭炳之。”

西域人琐非复初,到元大都读书,又游学江南,其《序》曰:“吾友高安挺斋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并《起例》。”

在大都做官的虞集(1272－1348,江西崇安人),返乡后为之《序》曰:“高安周德清,工乐府,善音律,自编《中原音韵》一帙,分若干部,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

2.《中原音韵》没有《韵谱》这一简称。周德清简称《中原音韵》为《音韵》,如《起例》第一条“《音韵》不能尽收《广韵》”,但并未称之为《韵谱》。

3.《作词起例》是在编撰《中原音韵》之前思考、之中写作、之后修改的。《表稿》作者也觉得:“《起例》竟像一堆多年累积的札记。”(第157页)《中原音韵》可以单行,因此卓从之厘定本《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无《作词起例》。虽然《作词起例》可以作为《中原音韵》的附论(如《四库全书》称其为《附论》)而合并印行,但是《作词起例》毕竟不是《中原音韵》的一部分。

4.《作词起例》是《中原音韵》“理论上与实践上的说明”,其言正确。周德清本意如此,《后序》“余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青原萧存存”可以为证。

二、“北方”是否就是指“中原”?

研究者常引用《作词起例》中的“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首先借助“北方”这一概念的语义模糊性以之证明“中原”包括元蒙古的“兴自北方”,其次进一步

引出“中原之音”就是“大都音”的结论。元人孔齐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至正直记》)，确实容易误导现代人认为元人把“中原”叫做“北方”，但孔齐下文随即落实：“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所指北方“中原”是“汴洛中山”一带，并非包括朔北的元大都。孔齐以北方称代“中原”，既承袭了郭璞、颜之推的用语，又因为孔齐是距离中原遥远的南方人。

以上所引《作词起例》句的上下文是：“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李按：沈约之韵)，总亡国之音，奚足为明世法？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立足点不同，方位词语的使用则有所不同，周氏立足于“江南”(江淮语和赣语区)，认为闽浙为“南方”，大都为“北方”，汴洛为“中原”。对南方“闽浙之音”称之为“缺舌”，对北方提出“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前提也就是说北方语音并非中原之音。长期做官大都的虞集，在《序》中批评“燕冀失于重浊”，可证燕冀之音并非中原之音。《作词起例》所言“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实天下之公论也”，即以中原语音为标准，又取四海与中原相同之音而编撰之。又曰“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即要求《中原音韵》达到既以当时口语语音为基础(可以表达上口，不是说不出来的《广韵》古音)，又要能够通行天下的语音(可以交际推行，不是听不懂的某地方言)。

三、周德清有没有去过元大都？

《作词起例》曰：“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宁甘受缺舌之诮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矣！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李按：蒙古语)翻译、国学(李按：蒙古国子学)教授言语(李

按:汉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

"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这是不是周氏去过元大都的证据?《表稿》认为:"在'都会'二字上冠以'天下'二字,则只能是国都的代名词"。(第184页)"天下"即全中国,"天下都会",即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并非定指,比如"天下人"。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元代仅把"大都"称之为"天下都会"。

可以称为"天下都会"的,元代非仅有大都。周氏长期淹留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杭州、苏州、集庆(南京)、镇江、扬州都是当时的大都会。元代的"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数"(危素:《说学斋稿》),其地"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姚燧:《牧庵集》)。至于隔江相对的镇江,据至顺《镇江志·户口》,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人口已经达到114 237户,超过了南宋嘉定年间108 400户、644 100人的数字,而至元年间(1335—1340)的大都人口,只有401 351人。

虞集《序》曰:"余昔在朝,以文字为职,乐律之事每与闻之……当是时,苟得德清之为人,引之禁林,相与讨论斯事,岂无一日起余之助乎?惜哉!余还山中,眊且废矣。德清留滞江南,又无赏其音者!"依据虞集的旁证,周德清根本没有到过元大都。因此,"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不能够作为周氏到过元大都的证据。

四、是否存在泰定甲子大都之争?

因为不能够证明周氏到过元大都,同样也就无法推定"泰定年间,在大都展开一场关于'正语作词'的论争"(第1页)。所谓泰定甲子之争"可算一次汉语规范运动"(第185页),但"规范"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民间文人行为。周德清《自序》中说得很清楚,《音韵》是重张汉英之请为作词之法而编。中国文人向有客主问答的

行文格式,《作词起例》中关于"通济之言"的对话可能是虚拟。即使友人之间有过议论,但"闻人间"为虚指,"公论"亦非直接引语。"同志之间相互切磋"应当属实,"泰定甲子之争"盖为乌有。

五、周德清曾经漫游过哪些地区?

周氏《后序》曰:"尝游江海"。虞集《序》曰:"德清留滞江南,又无赏其音者"。琐非复初《序》曰:"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当时之独步"。由此可知,周氏淹留江南,游历长江下游江海一带。周氏"闻人间通济之言",既不会在地处偏僻的家乡高安,更不可能在连去都没去过的中原汴洛和北方大都,惟一的可能是在"尝游江海"的"天下都会之所"。《作词起例》曰,"亳州友人孙德卿,长于隐喻",周氏套数《遗张伯元》曰:"我淹吴楚,君显江淮"。与之交往的孙德卿、张伯元都为江淮语区人,可见周氏对保留宋代中原音韵的元代江淮方言有所接触了解。

六、《中原音韵》在何处编撰?

《稿本》虚拟泰定甲子之争,也就是为推论《中原音韵》大都编撰说做铺垫。李新魁对之逐一剖析,以为是"臆必之词":1."天下都会之所"不等于是大都;2. 琐非复初的留学地点在大都,不等于周氏《中原音韵》的"审音工作"必在大都;3. 周氏所处的江西有词曲流传的基础,周氏尝游江海,接触中原共同语的机会很多。李新魁反而提出:1. 琐非复初《序》中"以余观京师之目,闻雅乐之耳……"的口气,反映他从大都来到南方得遇周氏,叹其精通音律,正可能在江西家乡(高安)中进行。[①]

① 《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据虞集《序》"德清留滞江南，又无赏其音者"，据《自序》"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张汉英以其说问作词之法于予"以及《后序》"泰定甲子秋，余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青原萧存存"，或者周德清、张汉英、萧存存其时都在大都，否则大都与江西路途遥遥，不可能当年"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青原萧存存"。在至今没有周、张、萧中任何一人到过大都的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推论——《中原音韵》的编撰工作是泰定甲子年"留滞江南"期间完成的，周、张、萧其时都在江南(包括江西)。编撰《中原正音》期间，周氏人不在中原汴洛，却又欲"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因此只能以所见到的流行词曲为材料，以传统韵书为参照，以读书音和下江话(广义下江话包括江西话)为自然语感。"编撰地点高安说"的预设是萧存存托友人张汉英到高安求教，惜周《自序》中没有明确交代。

根据《自序》和《后序》，表明《中原音韵》在泰定甲子(1324)秋天完成。依据《表稿》(第 244 页)对《后序》提及的地名"螺山"、"鹭渚"和"吉之多士"之"吉"的考证，可以认定《后序》写于吉安，而且尽地主之谊("同志罗宗信见饷")宴请周氏和琐非复初的是青原罗宗信。

依据《后序》"予作乐府三十年"，《表稿》推测周氏"大约十七八岁，他开始创作"(第 1 页)，则《后序》写于四十七八岁(1324)。果真如此，岂不是与完成《中原音韵》同年？《后序》中交代，完成《中原音韵》(泰定甲子秋)"未几"，才聚会写《后序》。以此为据，可以推断《中原正音》在家乡一带编撰。但如果考虑到周氏"尝游江海"，并不排除也可能在游历江淮期间编撰，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确证。

七、《音韵》初刻本何时行世?

依据《起例》所言"《中原音韵》的本("的本",定本)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萧存存欲锓梓以启后学,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书成以后一直没有付梓。后罗宗信曾经"求锓诸梓"(1325—1326),未果。欧阳玄在至正改元不久(1341 年初)南归,1343 年 3 月回大都。据欧阳《序》"青原好事君子(李按:指罗宗信),有绣梓以广其传,且征予序"推算,直至十五六年以后,约在 1341 到 1343 年之间方有初刻本,但至今未发现实物。除非卓从之所见为写本,据其厘定本《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的印行,《中原音韵》的初刻本行世当在 1351 年以前。

八、元曲杂剧是否以"大都"土音为韵律标准?

姚华《曲海一勺》曰:"又杂剧一种,且为词话开山,传奇导源,授受相承,皆宗北宋。徽钦既降,宋徙而南,北剧人金转盛……金源既亡,元又继承,南北混一,两系皆存"。[①] 金元杂剧"大半因仍"源自北宋的中原正音,"变革无多"。日本青木正儿说:"所用的音韵,也以大都地方的为标准。那音韵,是在金时从原来为北宋首都的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和各种文化一齐输入此地的,故称为中州或中原的音韵。"[②]

元曲第一期(金代和元初)的作者以大都文人为多,但用的并非大都土语。合乎"韵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的语音,只有源自北宋传入北方、演变于金元的中原语音。在北京成长的京剧音韵(老京剧)以苏、皖、鄂江淮语音唱白,可以为之旁证。至于到

① 转引自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41 页。

② 隋树森译:《元人杂剧概说》,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版。

了第二、第三期，则以杭州江浙一带文人为多，自然以源自北宋传入南方、演变于南宋的中原语音为标准。虽然杂剧“皆宗北宋”，但因为宋金南北（1117—1279）对峙，不免韵律歧异。到了泰定年间（1324—1327），周德清才觉得有必要厘定元初已“混一”以后的“中原音韵”。正如罗宗信《序》言：“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后之不得其传，不遵其律……高安友人周德清，观其病焉，编葺《中原音韵》并《起例》以砭炳之。”《起例》中的剖析释疑，不但是为不谙“中原音韵”却热中于元曲的南人，也是为帮助北曲文人正确使用“中原音韵”。

九、何谓《中原音韵》有没有入声？

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中原音韵》有没有入声”的论题，本身就含混不清。必须将其剖析为三个明确的问题：1.《中原音韵》的基础音系有没有入声？2.《中原音韵》的韵部划分有没有入声？3.《中原音韵》时代的中原及北方有没有入声？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原音韵》的基础音系有入声。周氏《起例》讲得极为清楚：“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原音韵》的韵部划分没有入声，但韵部内部的韵字排列黑白分明。虽然《起例》言“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但就韵部内韵字的排列，入声次本韵后，与平上去三声区别。这样处理的目的，《起例》说得很明确：“派入三声者，广其韵耳，有才者本韵字足矣”，“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与宋代以来词韵的平仄通押传统，与元代宫调和早期元曲作品的入声与三声相协的普遍现象一致，并非周氏的首创。周氏只是根据自己确定的标准，全面厘清入派三声的次韵。

关于第三个问题,《中原音韵》时代的中原及北方并非没有入声。1955年的方言普查结果表明,北方话有一个东起河北西部,西至陕西延安,南至河南新乡,北至内蒙古的入声调区域。① 虽然《中原音韵》时代的中原及北方口语,入声韵尾已逐步中和或进一步弱化,入声韵母音色与阴声韵母趋于相近,但是一些北方语区的入声一直保持到晚近时候,特别在读书音中则有意地保存入声调的传统。北京话口语的入声,大概在明代后期才最终消失。② 把"入派三声"当作"入声消失",实在源于硬性以晚近北京话证明"《中原音韵》大都音说"的心理基础。

后学从系统论出发,指出凡有-m闭口韵则有塞音韵尾,而且除了相应的-p,至少还有一个-ʔ。③ 近日翻阅《表稿》中所附邢公畹给作者的信,邢先生早在1979年就已经指出:"一种方言,只要它有带-m(-n、-ng)尾的字,就十之八九有带-p(-t、-k)尾的入声字。这种现象,不仅许多汉语方言可以证明,侗台语、苗瑶语的许多方言也可以证明。现在要说《中原音韵》所依据的那个'自然之音'(姑且不论它是不是大都话)有-m尾字,但是没有带塞音尾、入声调的字,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第345页)。由此可见,音系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周德清从存古出发而有意识地仅仅保留了传统的闭口韵,然而不保留入声又有悖传统。

因此只能说"《中原音韵》的韵部划分没有入声,但韵部内部的韵字排列黑白分明",而不能够含混地说"《中原音韵》没有入声"。因为"《中原音韵》没有入声"则意味着"《中原音韵》的基础音系没

① 详见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③ 详见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101页。

有入声"或"《中原音韵》时代的中原及北方没有入声"。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和《中原音韵无入声再证》[①] 所能够证明的——《中原音韵》的韵部划分没有入声韵部。

十、《音韵》是否以某点方言为基础音系？

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元代的河南音系，[②]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周德清去过河南或通过什么途径知晓河南音系的证据。

根据《中原音韵》编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周德清的交游经历的零星资料，《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以汴洛宋音为承传（通过传统韵书）、继承了宋词平仄通押与早期元曲入声与三声相协（反映了宋元以来河南、河北一些地区入声韵尾弱化、入声元音与阴声韵趋于中和的变化）的习惯（依据元曲创作）、以自己所接受的读书音和方言知识（"尝游江海"、"闻人间通济之言"）为语感（所谓"自然之音"），为纠正浙闽之音（吴音）和北方燕冀之音（北音）而制定的曲韵音系。《中原音韵》不是当时河南或某地方言音系的调查报告或音值描写系统，但又是当时读书人能够"说出来"、"写下来"的通俗文学音类系统。虽然称之为"中原音韵"，但并非定指元代的河南汴洛中山某地方言。靖康南渡以来，"中原"和"中原音韵"、"中州音韵"（虞集《序》中就将周书称之为"中州音韵"）已经演变为一个传统文化概念或文学语言概念。周德清所写定的"中原音韵"，是一个以宋元以来的读书音为基本依据，又与已经进行着的现实口语语音变化（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等）相折中的音类系统，不可能落

① 《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论〈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

实到中原某一地点的方言音系。如果一定要提出《中原音韵》的“基础音系”,那就是南宋以来从中原迁到江淮以后有所发展变化的口语语音系统。这种口语音系中有入声,但是在词曲(注意:词曲相当于现在的“通俗歌曲”,而不是像格律诗一样的“高雅音乐”)创作时继承并且扩大了自宋以来形成的平仄通押传统。

虽然《中原音韵》不是元代的大都语音,但生活在大都的文人可以使用既具有宋元读书音传统,又兼顾现实语音变化的《中原音韵》。因此,琐非复初《序》曰:“以余观京师之目,闻雅乐之耳,而公议(李按:相当于现代汉语“公认”)曰: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外邦人琐非复初“读书是邦”(李按:《表稿》将“邦”解释为“吉安”不切,“邦”为“邦国”,“是邦”当指“中土”。至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周去过西域,是不了解“访西域友人,琐非复初,读书是邦”的“读书是邦”为“西域友人,琐非复初”的后置定语,其意为“访读书是邦之西域友人琐非复初”),到中土学习汉文化,通常以当时的读书音或通行语为标准。任何地方的方言,包括经历辽金元统治的中原地区的汴洛中山方言,都不可能达到“乃天下之正音”的标准。正因为如此,周德清可以自诩:“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实天下之公论也”,所撰与《广韵》不同的韵书可以实现“韵共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的旨趣。

周德清留滞江南,漫游江海,缅怀故国,在《中原音韵》中集中刊布了《看岳王传》、《韩世忠》、《误国贼秦桧》与《张俊》四首曲文。为捍卫汉语正音,撰《中原音韵》的周氏,岂会以没有去过的“元大都”语音为中原标准?[①] 一些音韵学研究者,受“政治中心标准语说”的盲目驱使,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汉民族文化心态,孤立地

① 赵越:《周德清与中原音韵》,《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研究《中原》音系，不仅未能体察出力倡"出污泥而不染"的周敦颐六世孙"德清"之"音以正气"，反而强行将《中原音韵》音系附会于元代大都音系，进一步向下沿流为"明清官话北京音标准"的不证自明，以致严重扭曲了近代汉语语音史。

第三节 北方汉儿和金元汉儿言语

1954年，日本太田辰夫发表了一篇非常具有探索价值的论文《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①]

一、朝鲜教科书中的"汉儿言语"

成于元代在明初还通行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常见到"汉言儿语"这个词：

>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
>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
> （《奎章阁丛书》）

"汉儿言语"这个词，在《老乞大谚解》(1670)中改作"汉语"，在《老乞大新解》(1761)以及《重刊老乞大》(1795)中改作"官话"。

据《元典章》，"汉儿"即"汉人"。"汉人"是哪些人？《辍耕录》卷一"氏族"对"汉人"八种列举如下：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求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女直同。

日本箭内认为："汉人"八种中不举汉人是极不合适的，汉人也

① 载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有两种，曾在金国统治下的中国人叫汉人，在南宋统治下的中国人叫南人，而且他们之间在待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因此，“汉人”八种应当改为“汉人”十种。但对“竹因歹”等四种是否真是部族名称持怀疑态度，认为应以汉人、南人、契丹、高丽、女直、渤海六种为研究对象。

太田辰夫认为，广义的汉人不但指契丹、女直等，还包括南人。但就宋以后用例，汉人多与南人并举，汉人不包括南人。广义的“汉儿”与北方汉人相当，包括以汉地为主并且在其他地方居住的契丹、女直、高丽人即金朝治下的诸民。“汉人”与“汉儿”两个词有文野差别，“汉儿”这一口语老早就存在，改成文语“汉人”的可能是中原汉人。“汉儿语言”中的“汉儿”可能是狭义的，但“汉儿言语”却是广义“汉儿”之间的共通语。

“乞大”即“契丹”，北方民族以之称代汉人，朝鲜教科书名之“老乞大”即指“乞大话”或“汉语”。由此可见，元代的“汉儿”是已经汉化、正在汉化以及未汉化但在金朝治下的诸民。“汉儿言语”是金朝治下诸民，包括中原汉人和北方民族居民之间的共通语。

二、中国北方汉儿溯源

汉人、南人的二分区别法始于女真金人。但“汉儿”一词，早在北朝就已经出现。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折杨柳歌辞》

可以肯定“汉儿”的初义是指汉人，但是后来在北方民族中也用来指懂汉语和汉化的胡人。此“虏家”是胡人，听不懂的是“汉儿

歌”，但到底是胡人青年唱的汉儿歌，还是汉人青年唱的汉儿歌？需要从胡汉民间通婚的研究中取证。在北史中，“汉儿”一词常见，《资治通鉴》卷一七一有“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胡三省注：“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阿那肱所说的“汉儿”源师是鲜卑秃发氏的后裔，无疑是胡人，却被侮诟为“汉儿”。这说明北朝时的胡汉区别并非拘于种族血统，而是依据其汉文化的教养，“汉儿”已经从种族概念引申为一个文化概念。“汉儿”不一定指祖籍的汉人，也包括汉化了的北方胡人。

日本《询刍录》：“汉武帝征伐匈奴二十余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之为汉儿人，又曰好汉，自后为男子称矣。”又《事物记原》：“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原，故胡人骂中国曰汉人，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夷自太始太秦已还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曰取两汉盛者也。”由此可见，由于汉代强盛，“汉”由“汉兵”之勇猛派生出“汉儿人”、“好汉”、“汉子”这类词。到了抵挡不住胡人而晋室南迁，建立北朝以后，在用来称呼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的同时，“汉儿”也由褒变贬。由此推定，这些北方胡人“汉儿”说的汉语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儿言语”。

南朝的江南汉人被胡人的北朝称为“吴儿”非常自然，但中国南北统一以后，唐代“汉儿”和“吴儿”的称呼依然十分通行。

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

（顾况《和知章诗》）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司空图《河湟有感》）

这种以“汉儿”和“吴儿”对待称呼的通行原因，除了长期分裂，北方汉人已经不再全是中原血统的汉人，大量汉化鲜卑人已自称“汉儿”并以之与南朝“吴儿”相区别，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隋唐皇族即使不是胡人的后裔，也肯定具有非汉血统。日本汉字音的“吴音”与“汉音”的不同名称，可能就根植于这种南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南吴和北汉的语音区别。

辽金时期，称呼南方的“吴儿”似不再使用，可能逐渐被“南人”替代，但称呼中原北方的“汉儿”仍然极其普遍地通用着。《辽史》中有“汉儿司”等官衔的名称，《契丹国志》中有数例“汉儿”，《大金国志》中使用的“汉儿”更多，《三朝北盟会编》中不胜枚举：

> 初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亦听支使，久之仓廪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怒。道路相逢，我军骂侮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也，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
>
>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

“我军”为金国军队自称，“义胜军”为“山后汉儿”。所谓“番人”，野蛮人也，汉人对外族人的蔑称也。原来在汉人心目中的“番人”的金国将士，却把“汉儿”看作“番人”。原来是汉人骂胡人的话，却成了女真骂“汉儿”的话。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诏谕指挥说：

> 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

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二）

在南宋，却把中原北方的"汉儿"和女真、渤海、契丹人归为一类，把南宋治下的士民则称为"中国人"。这种"中国人"，在金国则称为"蛮子"。

元代仍然使用"汉儿"一词。在北方毗邻的朝鲜，除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使用，其他文献中也可见到：

见达达说达达话，见一般火者说高丽话，见汉人说汉儿话……

（《高丽史》卷四四）

宋金对峙分裂时期，"汉儿"的地位显得十分尴尬，在金人看来他们是"番人"异类，在南宋看来他们与女真、渤海、契丹人一类。元朝统一时期，人分四等，其中辽金遗民称之为"北人"，而南宋遗民称之为"南人"。从北朝以来直到辽金蒙元，"汉儿"一词是指留居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后者人数在不断扩展，他们的口语就是在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之间通行的"汉儿言语"。

三、辽金元时代的汉儿言语

汉儿言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北朝。北朝各代对于汉语的态度是不同的。北齐（550—577）、北周（557—581）通行鲜卑语，对当时的中原汉人来说，鲜卑语是一种文化教养，也是出身立世之道。《隋书·经籍志》中列有数十种鲜卑语或国语的书籍，可以证明当时鲜卑语盛行。作为统治者的北方民族并非不懂华语，"高祖申令三

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语”（《北齐书·高昂传》）。他们采用的自然是鲜卑语底子的“汉儿言语”，而不是中国文人的雅语。北魏（386—534）太和十九年（495）“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其结果自然推广了“汉儿语言”，以至于出现了“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颜氏家训·音辞篇》）这种与传统书语具有差别的“北杂夷虏”的“汉儿语言”，也就是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

依据《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中的用例，代词“你”多为北方民族的口中说出，这一代词在北朝可能只是“汉儿语言”。到了唐代，由于都市的发达和市民生活的充实，口语的势力更加盛大，中原汉语向近古系统的转变。“汉儿语言”在发展中消融，成为更加普遍的中原口语，“你”成为普通的民间词语。

五代时期，中原又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北宋时期，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口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随后中原又一次受到北方民族的入侵和统治，辽金治下的“汉儿”被看作和南方中国人相区别的“番人”。当时文献中提到的“蕃曲”，不外乎是在“汉儿”间流行的曲子。宋代的口语资料有大量的诗词、话本、禅儒语录和诸宫调，但最接近口语的仍是这种“汉儿”和北族统治者所使用的“汉语”。“汉儿语言”在中原“汉儿”中间使用，也在北族和“汉儿”之间使用。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母语不同的北族之间也被作为共同语，并且极其偏僻的北方（今东北）也通行，以至“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大金国志·许奉使行程录》）

南宋使者出使北方，回朝后要交上交涉始末的详细记录，其经过必须按说话的原貌记录，如王绘《绍兴甲寅通知录》记载：“都是元帅自道的言语，更无文采，再三道：‘你我直述著那言语，煞有

意。'"太田辰夫认为，这些记录中表现出来的"汉儿言语"很难断定它们没有受到某种形式的胡语的影响，但其自身是不掺假的汉语，尽管如此，似乎总被看作非汉语的东西。考虑到"汉儿"与"中国人"相区别，这种现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据文献推断，"歹"在宋代是"汉儿语言"，但在元代已经普遍使用。徐复先生考证，宋代的好歹之"歹"，字但作"觧"，元人起初借用藏文字母的"歹"作为记音字，后又用作好歹之歹。[①]

元代的"汉儿"用来指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等。之所以"汉儿"广义化，其原因在于"汉儿言语"比以前在北方民族之间更加流行，故"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元史》卷十三)《白话圣旨》、《元典章》里边的口语文献是元代使用的一种蒙古式"汉儿语言"。一方面，在把蒙古语与汉语对译的过程中，作为蒙汉文书媒介的直译体的"汉儿语言"成为当时汉人和汉化蒙古人都能理解的共通语；另一方面，依据现在见到的当时口语记录资料，发觉通晓蒙汉双语的蒙古翻译官所用的口头"通俗语"和书面直译体语词不相一致。但是句末频繁用"有"的相同点证明，直译体的"有"在口语中是使用的。

在明初，元代的"汉儿言语"还保持着继续变化的余势，但不久"汉儿言语"消亡，其中一部分似乎变成通行语而继承下来。太田辰夫认为取代它的是"官话"，同时由此质疑："但明代产生'官话'的称呼，是'官话'作为对'汉儿语言'卑俗性的反动面产生出来的呢，还是出于排斥南方音的意图呢？尚不明白。"

太田辰夫所指的"南方音"是什么方言，没有明确。通过对"汉儿言语"的追溯，所谓元代的"汉儿言语"其实是阿尔泰化的中原汉

① 《歹字源出藏文说》，载《东北杂志》1944年40:22。

语:即以宋元中原汉人民间口语为目的语,用阿尔泰语言底子换用后的汉语。从语言角度来说,也许就如见于朝鲜申叔舟《洪武正韵译训》(1455)和崔世珍《老乞大谚解》(1670)所记录的与明代正音(当时的官话)相对照的俗音(北京一带的土话)一类。随着明代官话的兴起,汉儿言语接受其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北方话。

宋元以来,随着两宋之交汴洛居民的南迁,宋代中原正音南播江淮。在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汉语逐步变化并日趋统一的同时,只有江淮语言带保留了相对纯正的两宋中原正音。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行商交易需要通语;元末农民起义军多为江淮居民,且朱元璋祖籍金陵之句容,明初定都南京;江南行省的市民文化日益发达,形成新的雅俗共赏的口头文学语言。正是这些传统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决定了江淮方言在近古汉语史上的枢纽地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成为明清两代的通行"官话"。

第九章 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与基础方言

宋元以后,以大运河为动脉,以淮南之盐、江浙之丝绸为主要产品,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市民社会形成。据说元代曾经来华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蛮子省流行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一种统一的书法,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仍然有不同的方言”,然而没有出现“官话”这一术语。靖康南渡将宋代中原语言带到南方江淮,因此在蒙古元统治的南方蛮子省地区可能流行一种以之为基础、南宋以来已经存在的通用语。随着宋代商业社会的兴起,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明代通用语称之为“官话”,蕴涵着丰富的市民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上的雅言、正音不同,官话不仅是官场和文学用语,更广泛的是作为商贾市民通行用语。明末来华传教士称之为 mandarin,后根据汉语字音拼作 Quon-hoa。金尼阁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地道的中国话”改为“纯粹的南京话”,可作为明代南京话就是当时中国通用语——官话的确证。

第一节　官话考释及其市民文化内涵

一、“官话”考释

元代柯丹丘的《荆钗记》现流传本中，出现了“官话”一词：

（外乡人到了福建）一日在船上，只见岸上一簇人在那里啼哭。我问那门子，那门子说没有了个脸。我说：“打官话说来”，他说道：“没有了个儿子，在那里啼哭。”我方才晓得“脸”是“儿子”。

（《六十种曲》第一册，第13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荆钗记》今传本多为明代改本，“官话”一词可能系明人改定所致。至江淮汉人建立朱明政权以来，“官话”屡见于明代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四十一年九月》（转引自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

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

这是目前所确知的“官话”一词的最早出处。“官话”见于记载李朝成宗四十一年（1483）事件的朝鲜文献，距离明代开国（1368）已有115年。偰长寿《直解小学》为李朝（1392—1910）初期广泛使用的汉语教科书，到了成宗四十一年，被认为与当时“官话”有所不同而“不合时用”，由此推测“官话”一词产生在15世纪的明代。

2. 谢榛(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转引自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

> 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

谢榛是山东临清人,母语为齐鲁方言。

3. 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十五·史十一》(转引自《辞源·官话》):

> (王)雅宜(宠)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

何良俊是江苏华亭人,母语为吴方言。王雅宜可能也是吴语区人。

4. 张位(1582年前后)《问奇集·各地乡音》:

> 大约江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张位是江西新建(今南昌)人,母语为赣方言。《问奇集》接着又列举不像官话一样容易通行的"各处土语"字音,地域涉及燕赵、秦晋、梁宋、齐鲁、西蜀、三楚、吴越、闽越,独独未言江淮,由此可以推知江淮为官话所在地域。所谓"江南",不是"长江以南"的狭义概念,而是指明代承袭了宋代江南路建制的南直隶辖境(苏、皖等地)行政区划。与"江南"相当的不仅指"江淮之间"(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域),而且包括江淮流域(长江下游南岸和淮河北境地域)的"江淮"。"江淮之间"古称"淮南",而淮河以北习称"淮北",狭义的

"江南"指"长江南岸"。这三部分可以统称为广义"江南"。张位所说的"江北",字面是"长江以北",然据"入声多作平声",实指"江淮流域以北"的语言,因为江淮流域至今尚有入声。所谓"江南多患齿音不清",即指正齿(章组)和齿头(精组)二音不别,这正是如今江淮话的显著特点之一。如果不首先认定官话即江淮话,张位不可能说"此亦官话中乡音耳"。

5. 徐充(生卒年月待考)《暖姝由笔·方言》(转引自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

> 凡问物之在者则曰在那里,此官话也。吾地曰来边,常州曰来头,丹阳曰来个,无锡曰来上,苏州曰来打。

徐充是江苏江阴人,母语为吴方言。徐充的词语比较表明,官话非江南苏、锡、常的吴语。与苏、锡、常吴语可资比较的对象,最近处即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

6. 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转引自邓兴锋《明代官话基础方言新论》):

> 弋阳则错用乡语,土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

顾起元是江宁(今南京)人,母语为官话。弋阳腔与海盐腔为明代南戏的流派。顾说表明江西弋阳腔官话中夹杂赣语,吴语区的浙江海盐腔多用官话,而当时南北二京通行官话。

7. 凌濛初(1584—1644)《二刻拍案惊奇》卷37(此条为刘丹青见告):

> 便有几只鹦鹉飞将来,白的、五色的多有,或诵佛经,或歌诗赋,多是中土官话。

凌氏是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母语为吴方言。此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徽商,在辽阳幸遇海神,召来鹦鹉戏耍。鹦鹉所习也是中土官话,"中土"即"中州"、"中原"、"中国"。这徽商常往南京,此"中土官话"即指靖康南渡迁来、发展到明代的南京"官话",故沿用"中土"之名。

二、明末来华传教士们对"官话"的界定

根据美籍华人杨福绵(Paul Fu-mien Yang)的《利玛窦的葡华字典:历史的和语言学的介绍》,[①] 明末西洋来华传教士对"官话"的英文界定(汉译是我的理解)如次:

1.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1573 年到达远东。1577 年来到澳门。称官话为:common language(共同语)、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mandarins and of the court(官吏和朝廷的公务语言)、the mandarin language(官吏话)。

2.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1579 年到达澳门。称官话为: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court(朝廷汉语)、the court language that they call mandarin(中国人称之为官吏话的朝廷语)。

3.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2 年来到澳门。称官话为:auniversal language(通用语)、We can call it the language of the forensic court(我们可以叫它为衙门语言)。后来知道中国对此种

① *The Portuguess-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econ Sinology*, Taipei, Taiwan, R. O. C, December 29 ~ 31, 1986;英文本承曾晓渝博士惠寄,特此致谢。

通行语早有专名，在《中国札记》中将“官话”拼作 Cuon-hoa，后又拼作 Quon-hoa。

对于“官话”的外语名称 mandarin 的词源，或以为源于清代称呼官吏“满大人”的谐音。《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①] mandarin 条：1.(old use) name for hig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满清高级官吏；2. standard spoken Chinese (as uesd by educated Chinese in all par ts of China)中国国语。既然明代传教士已经使用 mandarin，拟音解源显然错误。mandarin 的词源与“满大人”无关，用 mandarin 称呼“满大人”或满清官吏是西洋人对明代用法的承袭。在英语中，mandarin 是 mandate 的派生词。mandate 的名词含义是“命令”、“训令”、“所获权限”，动词含义是“委托管理”。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用 mandarin(命令者)称呼中国官员。他们在广东登陆后，从这些与之打交道的 mandarin 的交谈中听到的是与当地广东话完全不同的中国通行语，由此用“falla(语言)mandarin(命令者)”指称官员口中所讲的“官话”(命令者的语言)，或直接称为 mandarin。[②]

据张卫东所言，mandarin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经出现，[③] 到底是出现了“蛮子省流行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这一描述，还是出现了 mandarin 这一术语，张文没有明确交代。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刘太监)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这样送礼是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

①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第 10 版。
② 参见吴孟雪：《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文史知识》1993 年第 1－3 期。
③ 《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1991 年广州。

神父纯粹的南京话。

（何高济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何译本所依据的是英文本，英文本的祖本是金尼阁抄写的拉丁文本。依据《鲁国尧自选集·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的附记，杨福绵在《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一文中指出，《中国札记》的利玛窦意大利文本的汉译是：

因为这个男童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bene [la]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开始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

杨福绵由此认为：

金尼阁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一句原文“地道的中国话”改成“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到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

（转引自《鲁国尧自选集》，第 303 页）

“纯粹的南京话”和“地道的中国话”互换，可以确证南京话就是当时中国的通行语——官话。

通过明代海内外文献中的“官话”诸例，可以看出：明代的两京、吴赣、齐鲁各地通行“官话”，朝鲜人学习汉语学“官话”，来华传教士学习的汉语是“官话”，而“官话”——“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即以南京话为标准的江淮话。

三、"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

官话之"官",在明代,并不如西洋传教士起初在广东上岸时所认为的仅指朝廷、官吏、官场和官司这些官方概念,到了南京,传教士就明白:"官话"这是当地的民间语言。官话之"官"就是普通市民,因此南京小孩的口音自然最为地道。

在南朝以前"官"("馆"的本字)的含义如下:1. 初义为治众之所的"官舍"、"官府"(后代的"馆"保留了这一本义),《礼·玉藻》:"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2. 引申为治众(后代的管理之"管"承担了这一含义)之位的"官职",《左传》:"摄官承之。"3. 引申为治众之人的"官员"、"官吏",《书·武成》:"建官惟贤,位事惟能。"4. 派生出专司某事的人的称呼,驾车传命的小臣则称为"倌"或"倌人"(见《说文》)。5. 引申为官方"公有"事物,如官车、官仓。6. 引申为君主、尊长的敬称。"官"的词义,由初义居所,而职位,而官员,而专司,而领属,而敬称。

但到了南朝时期,"官"泛滥为王族及士大夫年轻子弟(当时父贵而子荣的"高干子弟")之称。唐朝"官"的词义收缩,做官的才能够称"官人"。人宋以后,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促使市民社会出现,作为新兴阶层,凡有一定社会地位以及某种职业行当的男子即皆可敬称为"官人",遂成为"市民"的通称。

《通俗编》:

唐时惟有官者方得称官人,宋乃不然。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金四官人以棋著,李大官人以书画著,陈三官人以演史著,乔七官人以说药著,邓四官人以唱赚著,戴官人以捕蛇著。吴自牧《梦梁录》又有徐大官人幞头铺,张官人文籍铺,傅

官人刷牙铺，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

宋元以后，以大运河为动脉，以淮南之盐（扬州）、江浙之丝绸（苏州）为主要产品，江南商业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市民社会在江南形成。虽无一官半职，但新生的商贾于乡里多以“朝奉”或“员外”自居，“官”由敬称进一步演变成泛称。奴婢称主人为“官人”，妇人称丈夫为“官人”，以致百姓皆可被称之为“看官”、“客官”，故“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有如“当代殆无不老板者矣”），亦可单称“官”。①

1. 官人。用于称商人、艺人、丈夫、主人：

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人家，到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

（《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以下为称商人例：

棋待诏，金四官人；书会，李大官人；演史，周八官人……

（元·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以下为称艺人例：

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

① 以下例子主要引自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传灯录续》二六)

这个便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

(《水浒传》四十回)

以下为称主人例：

只见女使锦二叫道："官人，寻得好苦，却在这里！"

(《水浒传》七回)

亦可以只称"官"：

(王知军被盗)王老戚戚成疾，蓝姐密白曰："官何用忧，盗不难捕也。"

(《夷坚丙志·蓝姐》)

另外，《金瓶梅》称丈夫为"官儿"、"官客"。

2. 官名。别于乳名、别名的正名：

周三，名进昌；刘二，无官名……

(宋·唐积《歙州砚谱·工匠》)

正末云："写官名。"六斤云："我是王六斤。"

(《村乐堂》三折)

3. 看官。看戏、听书的顾客：

小人其实本事浅，感谢看官相可怜。

（《蓝采和》一折）

“看”是侍奉；看官，被侍奉的顾客，泛指观众。

4. 客官。旅客：

客官失晓，好起了。

（《水浒传》二回）

至今在江淮一带仍然将旅客或顾客称之为“客官”。

除了沿袭“官员”、“官府”的传统用法，从宋元开始“官”的称呼市民化。因此明代通用语称之为“官话”，包含着丰富的市民社会文化内涵，官话的出现及通行与宋元以来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官话不仅用于官场、官司（诉讼的双方大多是百姓），不仅用于诵佛、吟诗，更广泛的是用于商贾贸易。以宋代的话本、元代的戏曲为渊源，明代的南戏、弹词、小说，这些与百姓生活忧乐与共的市民通俗文艺，对官话的萌芽、兴起、流行、传播起着政府所不能起的巨大作用。因此，明代的官话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两晋的洛生咏、北宋的正音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它不再局限于朝廷用语、公文辞章与文人吟诗作赋，而是有着广泛的市民社会基础，为社会各界（官吏界、商业界、文艺界等）所使用的通行语。连在关外辽阳听到的鹦鹉诵佛、吟诗的言语也是“中土官话”，可见明代官话的通行和通俗。

第二节　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说

一、《洪武正韵》的音系性质

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1375),"壹以中原雅音为定"。由于《洪武正韵》音系中存在入声韵和浊声纽,因此王力提出,"《中原音韵》既没有浊纽,五十年后的'中原'不该又恢复了浊纽;《中原音韵》既没有入声,五十年后不该又有入声;《中原音韵》'寒'、'删'不分,五十年后不该又有分别",从而推断:因为奉诏编撰,所以对于古说不敢完全推翻;编者以南人居多,难免为自己的方音所影响。由此结论:《洪武正韵》是"许多方音杂糅而成的"。[①] 由此可见,认定《洪武》为南北杂糅的预设是:1.《中原》没有入声;2. 南人编者的方音影响了音系的格局;3.《中原》与《洪武》没有地域差别;4.《中原》与《洪武》没有语体差别。

关于第一个预设,近年来的研究已经确证,就是《中原音韵》时代的中原地区,也存在入声。"入派三声"为"广其韵耳",但非"入声消失"。

关于第二个预设,《汉语音韵学》(第505页)说:"依据卷首宋濂的记载:参加撰述的是乐韶凤(安徽全椒人)、宋濂(浙江浦江人)、王僎、李叔允、朱右(浙江临海人)、赵壎(江西新喻人)、朱廉(浙江义乌人)、瞿庄、邹孟达、孙蕡(广东顺德人)、答禄与权(蒙古人),更质正于汪广洋(江苏高邮人)、陈宁(湖南茶陵人)、刘基(浙江青田人)、陶凯(浙江临海人)。"领衔撰述的乐韶凤和质正的汪广洋,是江淮语区人。编撰和质正的七位浙江人,是否靖康之难从中

① 王力:《汉语音韵学》,第509页。

原迁来而祖籍为吴语区人,未考。靖康南渡,迁往浙江的中原之音对杭州吴语影响颇深。编撰和质正的学者,有江西人(赣语区)、湖南人(湘语区)、广东人(粤语区)和蒙古人(北方汉语区),可谓四方云集、博采通人。这些学者所说的口语不可能是当地土语,必以带有乡音的通语进行交际。质正于四方学者,也许就是为了排除土音,以中原旧音为则。

关于第三个预设,《中原》是以元代曲韵语音为基础,中原地区声母清浊对立的中和,从唐宋就开始了;《洪武》是以明代江淮语音为标准,南京语音存在声母清浊的对立。

关于第四个预设,《中原》与《洪武》编撰的功用不同,所依据的语料存在语体差别,《中原》是以口语唱白为主的文人曲韵,《洪武》是以书面雅音为主的官方音韵。

因此,《洪武》音系以南京音系为主体的江淮语言为基础,入声韵和浊声纽是当时南京书面雅音的实际反映,既不是"南北杂糅",更不是"复古倒退"。

满田新造在《中国音韵史论考》[①] 中很早就认为:"明初首都为南京,《正韵》编纂当是在迁都北京之前,《正韵》序文中的所谓'中原雅音'指的是当时南京的地方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崔玲爱的《洪武正韵研究》(1975)和周世箴的《洪武正韵:与南京话的关系及其对官话的影响》(1989)为代表,一些学者相继论证了《洪武正韵》与当时南京音的密切关系。高本汉把宋元语言称为"老官话",这一术语并不恰当。除了不是当时的术语,更重要的是这一术语容易误导,把"官话"的历史向前盲目推移。反映宋代两京话的《蒙古字韵》和反映元代曲韵音的《中原音韵》,尽管它们与

① 东京武藏野书院 1964 年版。

官话具有某种渊源关系，但是妥当的术语还是“正音”或“中原雅音”。《洪武正韵》与稍后称之为“官话”的这种通行语，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许《洪武正韵》音系代表明初的文人读书音系，而“官话”属于当时的市民口语音系。

然而，由于盲目推崇明清旧都的文化心态和一些满族汉语音韵学家的断言，“明清官话音系是明清北京话”——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音韵学界，似乎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音韵学界开始证明——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是明清的南京话。

二、朝鲜汉语课本正音是明代南京音

较早注意到南京话在明代占有标准音的地位的是日本远藤光晓。① 根据朝鲜的汉语会话课本《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汉语声调的研究，他得出属于下江官话的南京话在当时最有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北京一带当时通行南京官话的结论。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每一个汉字都有左右两种注音。②《凡例·正俗音》:“今之反译书正音于右，书俗音于左”。左侧音是申叔舟《四声通考》的俗音（远藤光晓认为，以什么方言为基础音系，目前还很难断定；依据笔者推测，大概是元明之际北京一带的汉人和北族通用的“汉儿言语”），右侧音（正音）是崔世珍尽量用朝鲜话中常用的谚文字母来拼写的正音。

阴平，“与国音去声相似”，远藤光晓拟测为45；河野六郎描写

①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老乞大》、《朴通事》成书于元末，在明代的1423—1434年、1480—1483年两次修订，16世纪初崔世珍加上谚文注音和朝鲜话译文。

为高(平);金完镇拟测为45;梅祖麟拟测为35。

阳平,"如国音上声之呼",远藤拟测为214;河野描写为先低后高;梅祖麟拟测为13。

上声,"如国音平声之呼",远藤拟测为11;河野描写为低(平);梅祖麟拟测为22。

去声,"与国音去声相同",远藤拟测为55;河野描写为高(平);梅祖麟拟测为55。

入声一(阴入),非高元音右侧音加两点的"直而高,呼如去声",远藤拟测为5;梅祖麟拟测为2。

入声二(阳入),高元音右侧音加一点的"先低后厉而促急",远藤拟测为24。

左侧音的入声韵都带有表示喉塞韵尾的[']或[V],可见申叔舟接触的15世纪俗音的入声是收[ʔ]尾的。右侧音没有韵尾,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喉塞韵尾的脱落,因为右侧音只用常用的谚文字母,喉塞韵尾字母在朝文中很少使用。右侧正音入声分化的条件,具有高元音的入声字大都加一点,其他非高元音加两点。例外的有三类:1. 非高元音的牙喉音字;2. 以声母的清浊对立为分化条件;3. 可能由于误刻。由此可见,直接对入声的分化起作用的语音条件是元音或伴随元音高低而产生的其他语音特征。

远藤光晓认为,既然右侧正音所反映的这个方言的入声是以元音高低为分化条件的,就与北京一中原一带的方言很不一致。作为教科书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反映的是当时的官话正音。《四声通解》的"今俗音"和散见于《老朴集览》的"又音"可能是北京一带的土话,与当时的官话有较大差别。《老朴集览》有贬低北京人口音的记载:"南方人是蛮子,山西人是豹子,北京人是呔子,入声的字音是都说的不同"。呔,指说话口音不正。豹子,就是一些

方言中的"冒子"。《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正音的两个入声之间有分化条件可寻，所以来自一个声调，其基础方言也应具有这个特征。现代北方话中，只有一个入声的方言有山西话、下江官话和云南官话。考虑到明朝成立时最初定都南京的历史背景，南京话在当时最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洪武正韵》就以南京话为依据。1420 年，明代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北京，有相当多的官民伴随皇帝来北京。因此远藤光晓认为，右侧音反映的是来自南京而当时通行于北京一带的官话。

关于元明时期朝鲜汉字音中的正音是南京音，俗音是北京音，韩国和日本学者看法比较一致。蔡瑛纯《〈译语类解〉所见中国音系之研究》[①] 认为：李朝撰修《洪武正韵译训》(1455)，以之作为学习汉语的最高权威书籍，而将"俗音"附记于"正音"之下。关于《译语类解》的注音，日本学者前间恭作说，"在各语的下方附加南京、北京的发音之体例，与《老乞大》、《朴通事》一样"；[②] 韩国学者金根洙说，"在各语之下用韩文记上南京、北京的发音"。[③] 并以满田新造说为据推定，假若南京音是指《洪武正韵》的音，那么北京音就是朝鲜人所接触的俗音，而以《洪武正韵》为正音。由于朝鲜与北京地域陆路毗邻，因此派人往燕京多次，向中国学士求教"以尽正俗异同之变"。

三、来华传教士所记官话音系为当时南京音

1985 年，鲁国尧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④] 中，根据

①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 年。
② 《古朝册谱》，《东洋文库》，昭和三十二年。
③ 《国语国文学古书杂录》，东国大学校 1962 年
④ 载《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官话的描写，提出“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美国杨福绵表示同意鲁的观点，次年在台北所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汉语学会研讨会上宣读了《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历史的和语言学的介绍》，后来修改为《〈葡汉字典〉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中国声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浸会学院 1990 年），最终定稿为《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① 另外，日本平山久雄等也持明代官话南京方言说的观点。

明末来华传教士为学习官话，制定汉语罗马字拼写汉语的书籍，除了没有印行的《宾主问答释疑》（*Pin ciu ven ta ssi gni*, 1580）、《葡汉字典》（*Dizipnario Portoghese-Chinese*），还有利玛窦 1605 年在北京编撰的《西字奇迹》（*Hsi ju ch' i chi*, “The Miracle of Western Letters”，载《程氏墨苑》）和金尼阁（Nicolas Trigult, 1577 – 1628）的《西儒耳目资》（*Hsi ju erh mu.tzu*, “Au Audiovisual Aid to Western Sholars”，1626 印行）。

关于《西儒耳目资》（以下简称《耳目资》）的基础音系，前人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是《耳目资》反映的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明末普通音（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史语所集刊》1:3，1930）；一是《耳目资》代表的是明末山西方音（见陆志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燕京学报》1948）。自鲁国尧大倡“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说”后，海内外学人相继论证《耳目资》所记音系为当时南京音。

1. 曾晓渝在《〈西儒耳目资〉音系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

① 载《中国语言学报》第 5 期，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文,1989)、《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言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1]和《〈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2] 等论文中整理拟测了《耳目资》音系(声母21个、韵母45个和声调5个),并且讨论了其语言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明末山西方音说"的理由,一是金尼阁是在山西记音,并且在山西人韩云的帮助下完成;二是《耳目资》和今山西方言都有入声。据曾晓渝研究,《耳目资》山西方音说完全是臆断。一方面,金尼阁到山西以前已来华十多年,随身携带《耳目资》稿本,"或与此中人士交谈,得闻未知、难知之音,或展阅此中奇书,得闻未知、难知之字,一开旅人字学音韵之编,随手可得,不待一一询之人也"。[3] 金尼阁采取的是利玛窦后期的注音体系,据罗常培研究,《耳目资》与《西字奇迹》音系几乎一样。另一方面,不但汉语中有入声的方言较多,而且山西方言调类与《耳目资》并不一致,以山西方言入声作为《耳目资》山西音说的证据不能成立。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金尼阁学习汉语的对象是南京话,并是"在南京习汉语"[4] (1947)。参照徐宗泽《明清耶苏会士译著提要》等材料,金尼阁来华直至去世的活动线索如下:1609年来华,次年秋到澳门。1610年春到南京,循利玛窦等人汉语罗马字之道,以《洪武正韵》收字为依据,编撰成《资耳》以"闻新言",编撰成《资目》以"观新字"的学习手册,"表之曰《耳目资》"。1612年从南京返澳门。1613年回欧洲,1620年再抵达澳门。1621年往南昌、建昌,1622年在杭州。1623年往开封传教,1624年往山西绛州,1625年

①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载《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西儒耳目资》上册,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④ 《辞海·金尼阁》。

赴西安。后“上封以金擅长华文，召回杭州”。1626年在杭州印行《耳目资》。此后专事著述，直至1628年11月14日卒于杭州。

一直在南方传教的、精通官话的金尼阁，已经完成《耳目资》的主体部分《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和《列边正谱》，1624年在山西，与韩云等人只是“互相质正，细加评核”，[①] 并在他们的资助下出版，并非“在山西记音，在山西人韩云帮助下完成《耳目资》”。与当地学人商讨，反映山西通行以南京话标准的官话。

至于“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明末普通音即官话音系说”，显然隐含着“明代北京话语音基础说”，罗常培说：（传教士）“他们的语言环境虽然如此广泛，但是当时的国都在北平，因为政治上的关系不得不以所谓 mandarin 也者当作正音”。[②] 其实明末来华传教士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要学习北平话，倒是现代学者由于“政治上的关系”盲目推崇北京话的历史地位。北京音系与《耳目资》风马牛，根据《耳目资》音系特征（声母分平舌与翘舌；五个声调；有入声韵母）和历史背景，能够推定为明代官话的只有南京话。之所以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搞得节外生枝，可以说是“永乐北迁”惹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者缺乏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的系统知识，无视南京话在近代汉语史上的显著地位，盲目推崇北京话在明清的地位。

2. 张卫东在《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③] 中认为，《耳目资》所记当是明代官话的标准音南京音，不是北平音。依据张问达（天启初吏部尚书）《刻〈西儒耳目资〉序》中对于《洪武正韵》的评价是“尽洗江左之夙臼，丕定中原之正标”，认为《耳目资》“一遵《洪武

① 《西儒耳目资》上册，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书。

② 《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史语所集刊》1930年1:3。

③ 载《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正韵》"。《耳目资》的主要语音特征是:平分阴阳、清上为上,浊上归去、保留入声的五调系统;知组二三等韵、庄组二等韵、章组三等韵为舌尖后,而庄组三等韵为舌尖前;山摄重唇合口字仍读合口,见组山摄合口一二等"官关两韵"基本不混;中古咸山二摄开口三四等字及二等见组字,除知三、照三有重读外,都记为 - ien;深臻二摄知照系,除庄组三等部分字一读 cen 或 cen/chin 重读外,都读记为 chin 等。这些具备音系类型资格的特征,都是《耳目资》和以南京、扬州、合肥为代表的江淮话所共有的音韵特征。

3. 韩国金薰镐在《从利玛窦、金尼阁的汉语拼音看明代晚期的官话音系》[①] 中,剖析了罗的"《耳目资》基础音系北京说"和陆的"《耳目资》基础音系山西说",赞同"明代官话音系南京说",认为"这个问题可算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

4. 王松木在《〈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②] 中的结论是:"《西儒耳目资》的基础方音为何? 笔者以为当是以南京话为主体的江淮官话"。在分析俞敏的"官话安徽方言说"时说:"明代官话当是以江淮官话音系为基础,而南京话为主体。"

四、《宾主问答释疑》鼻韵尾特征的解释

日本古屋昭弘在《〈宾主问答释疑〉的音系》[③] 中,对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问答》的音系进行了研究。古屋昭弘的结论是:"1584 年罗明坚、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布教编写的《问答》,和金尼阁根据耶稣会在全国活动的需要于 1626 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

① 载《语言研究》1994 年增刊。
② 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 年。
③ 载《中国语学·开卷》第 6 卷,1988 年;刘丽川译文载《音韵学研究通讯》1991 年总 15 期。

资》这两份文献，音系上没有太大差异。在考虑到明代'官话'的方言基础这点上，是令人揣摸的。"为何"令人揣摸"？盖缘于未完全明白《问答》对鼻音韵尾为何处理得"模糊不清"。

在韵母部分，《问答》与《耳目资》的显著差别是对鼻音韵尾的处理不同。

摄	《问答》	《耳目资》
通	-m(少用-n)	-m
江、宕	-n(少用-m)	-m
梗、曾	-n(少用-m)	-m
臻、深	-n(少用-m)	-n
山、咸	-n	-n

古屋昭弘认为：1.《问答》中无论在哪一摄，使用频繁的鼻化记号跟-m、-n是没有区别的。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字有鼻化和非鼻化两种记音方式。2.《问答》中有的摄虽然-m与-n表示出一些偏倚，但只要鼻化记号介于中间，鼻音韵尾似乎最终成为了一种结尾。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是罗明坚、利玛窦所调查的官话鼻音韵尾本身具有那种性质；或者尽管有严格区别，但到听话记录下来就变得模糊不清了。4. 罗常培把《耳目资》的-m构拟成[-ŋ]，如果考虑到这个-m的记音性质时，《问答》中所表现的原始状况（也可以用鼻化记号）很有启发性。5.《问答》中的-m、-n和鼻化记号不过都是用来表示同一类鼻音要素，官话记录中的[ŋ]、[n]的区别，可以说[ŋ]这一类是人为分配的。6. 为什么《问答》中的例字(-m)只集中在通摄里，这还不清楚。

我曾经提出：利玛窦《西字奇迹》和金尼阁《耳目资》中的-m，

罗常培和李新魁构拟为[ŋ]不对,因为他们错误地认定了《耳目资》的音系基础("北京音说"和"山西方言说"),自然不会去深入了解江淮方言的特点。根据19世纪南京话和现在老南京话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三组(an/aŋ、in/iŋ、ən/əŋ)混同,再参照江淮方言中一些地区的鼻韵尾读音,"这个-m不是后鼻韵尾[ŋ],而是一个处于向鼻化韵过渡的、弱化了的后鼻韵尾,表示的是鼻化韵"。[①] 后来读到古屋昭弘的文章,证实了我构拟的可靠性。1. 因为明末南京话中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合流,所以《问答》中用-n来表示。2. 少数的用-m(相当于-ŋ),是因为这些字模棱两可,尚未完全合流。3.《耳目资》将鼻韵尾分为两类,就南京口语音确实是"人为分配的"。金尼阁可能认为这是南京土音(不排除在南京读书音里能分清),与非江淮区交流不宜,因此承袭了传统韵书的两类,采取了从分不从合的原则。4. 至于《问答》中的-m例字只集中在通摄里,这是因为通摄的韵腹是u,不存在前鼻韵母un和后鼻韵母uŋ的对立,um中的韵尾表示的是元音后鼻化性质。《问答》中的鼻化记号跟-m、-n韵尾的使用情况,再一次证明了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同时又表明《耳目资》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的区分,承袭了《洪武正韵》或南京读书音系统。

另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问答》中的蟹摄一等字,有时不记作ai而记作oi,是因为a在南京话中是一个圆纯的后ɒ,听起来像a又像o。《问答》中的入声字用-p或者\,表示的是听觉上与[-p]相近的塞音,即类似[ʔ]的韵尾。以《官话新约全书》(1888)用-h表示[ʔ],可证此处可能是用便于书写印刷的-p表示[ʔ]。

---

①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五、从汉语史角度阐述官话是以南京话为标准的江淮方言

除了音系的考定，一些语言学家试图从汉语演变史的宏观角度，阐述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或明代官话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

1. 李葆嘉在《论汉语音韵研究的传统方法与文化学方法》、[①]《论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②] 中相继论证：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汉语标准语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变迁而演变。由河洛（周秦汉魏西晋）到金陵（东晋南朝），又复迁河洛（隋唐宋元），再移到下江（明、清），晚近才转至北京。由于靖康之难汴洛居民多迁江淮，由于宋元以来江南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元末农民起义多为江淮居民且朱元璋祖籍金陵之句容，由于江南市民文化日益发达，因此明清官话的基础方言势必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方言。

2. 邓兴锋在《明代官话基础方言新论》[③] 中，首先概括了现代学者对明代官话基础方言的四种观点：罗常培、吕叔湘的“北京方言说”；李新魁的“中州方言说”；俞敏的“安徽方言说”；鲁国尧的“南京方言说”。其次，引用嘉靖、崇祯年间南京人顾起元所撰《客座赘语》中的论述。顾氏既沿用《广韵》旧音以正“南都”音讹，又提及“中原音”以纠正方言，可见当时知识阶层的书面共同语沿用《广韵》旧音或中州音；顾氏又认为“南都”音“或亦通诸海内，而竟不知所始”，可见南京话通行范围极广，为官话口语的基础方言。另外《客座赘语》说“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可证南京话和北京话应

①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②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③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是比较接近。再次，从三方面揭出明初南京和北京的人口变动具有相似性。移民规模相似：部分原来的居民迁出，大量外地移民涌入；移民来源相似：来自江淮地区的移民占了大多数；移民结果也相似：南京话和北京话都具有综合性并且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新论》也以《老朴集览》中贬低北京土话的记载，证明“北京方言说”不可信。官话的基础方言虽最有可能是南京话，但“南京方言说”有其局限，因为在明代官话中较通行的一些语词，在南京话中找不到痕迹，却能在安徽等江淮方言中找到。因此官话（口语系统）基础方言是“综合性”的江淮方言，不妨称之为“南京型的江淮方言”，可以把“安徽方言说”纳入。《新论》的结论是官话因使用场合的不同别为两系：一是用于知识阶层的书面共同语，沿用《广韵》旧音或韵书中的中州音；另一个系统是南京型江淮方言的口语共同语。

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第一，知识阶层讲究的“正音”，与明代“官话”有别。探讨明代官话的基础音系是指通行口语，依据利玛窦、金尼阁所习明代官话，“中州方言说”与“官话两个系统说”同样不能成立。第二，明初两京人口变动的相似性，使得两京话都以江淮方言为基础，但是南京话以原来的江淮话为基础，因此差别不大；而北京话以原来的大都话为基础，因此在北京形成南京官话和大都土话的并存局面，“北京方言说”纯属臆断。第三，在现代南京话中找不到痕迹的官话中较通行的语词，并不能够证明在“明代南京话”中不存在，考虑到明代以后南京居民成分的巨大变化势所必然。第四，所谓明代官话基础方言的争论，主要针对语音系统的性质。强调以南京方言为基础，并非排除江淮方言。江苏、安徽本为“江南”一体，到康熙才实现分治。“安徽方言说”与“南京方言说”

并不冲突，无须另立。俞敏在《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①] 中列为"安徽方言说"证据之一的、现代北京话若干词语 n-、l-不分的现象，即是明代安徽话特征的残留，其实是现代江淮方言的普遍特征。陈刚在《关于"妈虎子"及其近音词》[②] 中所考的"妈虎子"，广泛流行于江淮及山东一带(胶东地区有江淮移民)，不独仅在安徽的部分地区。根据清人赵翼的考证，其语源为隋朝开挖大运河时一个专吃小孩子肉的残暴官吏"麻胡"(鲁国尧先生告知，泰州话说"麻胡子")，所以江淮人用"麻胡来了"吓唬不听话的儿童，其语音流转成"妈虎子"、"毛虎子"(东台话)等。第五，关于明代官话的性质，准确的说法是以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方言，可以简称为"明代官话南京方言说"。

3. 张卫东在《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江淮官话的形成》[③] 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把中原官话带到了长江中下游，造成了一个新的北方官话区即后来的江淮官话区。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努力，确立了江淮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切韵序》所谓"江东取韵"即指江淮官话。唐宋两代汉语官话尽管又受黄河流域中原官话的影响，但音系性质并未大变，仍然以江淮官话为标准音。元灭南宋后虽定都北京，但因元人是外族和北京第一次做首都，北京音还不具备标准音的资格，因而元大都的官话只能仍然是在中原音系影响下形成、反过来又支配已有民族共同语600年历史的江淮官话。明初定都南京，官话正音代表点又回到南京。虽然定都南京仅五十多年，迁都北京有二百多年，可是江淮官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南京

① 载《方言》1984年第4期。
② 载《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
③ 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会论文，1991年广州。

音作为官话正音标准的地位并未动摇。以江淮官话南京音为标准音不但贯穿整个明代，而且一直延续到晚清。

第三节　清代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说

一、琉球官话课本音系南京说

1991年，日本濑户口律子发表《从声调上推测琉球〈白姓官话〉的方言性质》，[①] 根据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天理大学收藏）音系5个声调，推断当时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白姓官话》里有一些字下注有同音字，如滩：汤、参：生、民：明等，这种 -n：-ŋ 不分的现象，濑户口律子依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所记今南京方言 -n：-ŋ 区分的情况而茫然。其实老派南京话至今"参：生"、"民：明"、"滩：汤"尚不分。南京周围以及江淮语区都保存着这一特点的全部、局部或孑遗。随后几年内，濑户口律子完成了《琉球官话课本研究》[②]（以下简称《课本研究》）。

学习清代官话的琉球课本有《广应官话》（琉球梁允治约在1760年编著）、《琉球官话集》、《尊驾》（别名《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以下简称《官话问答》）和《白姓官话》。《白姓官话》系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商人白世芸所作。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为农历，时在1750年），白氏雇常熟的船装豆子贩往江南，从山东出海驶到半洋忽遇风暴，十二月二十九日漂至琉球。应琉球通事郑氏世道所邀，撰写了《白姓官话》（乾隆十五年序），记载了在琉球的交往和当地风土人情。

---

① 《日本语学教育研究论丛》第8号，大东文化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

② 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4年版。

根据《白姓官话》福州林守超乾隆十八年(1753)序文:1."间尝考天下言语,各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惟有正音官话所以通天下",可见林氏推崇正音官话。2."学习者唇喉齿舌,须辨别清明,方得正音官话",可见官话正音不是福州音。3.琉球青年郑凤翼"怀有一集《问答官话》,请予删正",可见此书原名《问答官话》。4."细阅其词,果系细论条目工夫,又奚须更正为哉?但思行文,用此虚字虚句,可以为起承转合之过接,今止平常说话,可以不必用此文辞也,遂援笔略改一二,便见直截",可见林氏删改了些微文言色彩使之更口语化。

依据濑户口律子《课本研究》(下文中所注页码即该书页码)列举的材料,可以断定清代官话基础方言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

1.语音系统

《官话问答》、《学官话》和《白姓官话》声调系统的特点是:(1)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种调类。(2)书中注为入声的字很多,显然不是北京话。如:学、国、日、得、白、物、乞、一、说、活、没、若、肉等。(3)只有平声分为阴阳两个调类。清声母读阴平,如:今、初、中、心、官;浊声母读阳平,如:求、才、名、堂、麻。(4)浊上变去,不分阴阳。如:从纽:在、罪;定纽:弟、道;禅纽:是、上。声母系统的特点是:(1)全浊声母变为清音。(2)微、影、云、以、疑、日母合并成零声母。(3)见组、章组分洪细。(4)章组部分字与知组合并。(5)见组细音腭化,与章组部分字合并。(6)平舌和翘舌不分。(7)晓、匣母和非组混同。韵母系统的特点是:(1)三、四等合并,如:止摄和蟹摄。(2)一、二等与三等合流。(3)-m与-n相混。(4)-n与-ŋ相混。(5)入声塞尾混同。

2.词汇特点

(1)《课本研究》所举《学官话》、《官话问答》及《白姓官话》对话片段(第49~53页),是典型的“江淮腔”:表方面的“一来”、“二来”,表序数的“头一桩”、“第二桩”、“第三桩”,表程度的“着实(用心)”,表有时间的“得空”,问时间的“几时”,表安心的“安稳”,表再住几天的“多待(日子)”,表出发的“起身”,表特殊的“稀奇”,表仅仅的“不过”,表原因的“怪道”等。

(2)《课本研究》中与福建话比较的《官话问答》的词语,多见于江淮习语(第38~47页):“在行”(内行)、“做戏”(演戏)、“古时候”(古代)、“先头”(开始)、“到尾”(结束、末尾)、“礼数”(礼节)、“劳神”(费心)、“家私”(家具)、“滚汤”(沸腾的开水)、“吃亏”(吃苦)、“各人”(大家)、“不曾”(没有)、“不听见”(听不见)、“自家”(自己)、“起伙食”(做饭)、“散去”(纷纷离开)、“不舍得”(舍不得)、“时辰”(时间)、“吃烟”(抽烟)、“月头”(月初)、“那块”(那地方)、“滚水”(开水)、“勤力”(勤劳)、“汤匙”(舀汤餐具)、“茶钟(盅)”(茶杯)、“雇只小船”(雇一只小船)、“你钱拿来”(你把钱拿来)等。

(3)《课本研究》中与福建话比较的《学官话》的词语,多见于现代江淮习语(第58~66页):“早起”(早上)、“看相”(外表,李按:江淮此类词语还有吃相、玩相、品相、坐相、睡相、跑相等)、“挨”(拖延)、“大卵包”(大阴囊)、“了不得”(厉害)、“加你”(多给你)、“低低大的”(一点点大的)、“各样”(不同的)、“快活”(舒服、高兴)、“起大风”(刮大风)、“晏”(晚、迟)、“这块”(这里)、“一街”(满街)、“往时”(以往)、“备办”(准备、办)、“由在你”(由你自己)、“哑”(语气词)、“则声”(吱声)等。

(4)《课本研究》中与福建话比较的《白姓官话》的词语,多为现代江淮习语(第75~80页):“路头”(路)、“栽”(种)、“拘礼”(客气)、“做甚么”(为什么)、“起烟”(冒烟)、“丢吊”(丢弃)、“天时”(天

气)、"劳心"(费心)等。

(5)数量词:一遭(第65页)

①我去了一遭。(第5页)

②下遭还要做买卖。(第30页)

江淮话"一遭"(一次)、"头一遭"(第一次)、"下遭子"(下一次)为习语。

3. 语法特点

(1)真真(语气副词)

①老人家真真有心;我真真不晓得;真真说得好。(《官话问答》)

②真真气人;真真把人笑死了;实在我真真舍你不得的。(《学官话》)

"真真"相当于"实在、的确",最是江淮话习语。

(2)怪道(原因副词)

①怪道有这样的事。(第21页)

②怪道这里人,叫我们是唐山人,原来是这个缘故么。(第21页)

扬州、泰州话保留这种用法,也可说"怪不道",如:怪不道你来迟了。

(3)早早/一早早(时间副词)

①我明日早早来。(第15页)

②我七月初一早早就来。(第17页)

《课本研究》释为"一大早、大清早",作时间名词不切。此为重叠式时间副词(做状语),应释"很早地"。

(4)不当(程度副词)

①地上还没有十分干,不当好走。(第4页)

②大半晓得内中只有一二句，细微处不当懂。（第16页）

江淮话的说法是“不大”，“当”、“大”的阴阳对转。《课本研究》释为“不算、并非”，误。又《课本研究》（第48页）所附《金瓶梅》“官人在上，不当老身意小……”其义为“不当作”、“不介意”，与《官话问答》的“不当”不同。

(5)可曾（疑问副词）

①可曾吃药么？（第7页）

②前日托令舅寄去的书，通事可曾收了么？（第37页）

“可曾”是近代白话疑问语气副词，江淮话仍然使用。

(6)替（介词/连词）

A. 相当于介词“跟”。

①我替他讲，刚才回去问他，他说不想什么东西吃。（第9页）

②烦劳兄台，替令姐夫说一声……（第33页）

B. 相当于连词“和”。

①我们替通事，才相熟了，通事又要回府，叫我们怎么舍得？（第20页）

②弟替兄们住处，虽是天各一方，既到敝国……就像一家人了。（第25页）

C. 相当于介词“给/为”。

①不论什么价钱，这里替我卖去，弟们感恩不尽。（第10页）

②通事才来，就这样替我们劳心，感谢不尽。（第24页）

《课本研究》认为C这种用法，北方话一般多用“给/为”；A和B这两种用法，北方官话中不用。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语法》说清代已出现这种用法，属于方言的一种表现，但是没有指出是什么方言。濑户口律子认为：“对于这种用法，有人提出受吴语的影响，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结论。”（第78页）这三种用法在江淮语（比如通

泰方言东台话)中还存在。吴语有没有这种用法,待考。太田辰夫(一味以北京话为立足点研究近古语法)和濑户口律子(盲目强调福建话对琉球课本的影响)因为不了解江淮话在近代汉语史上的关键地位,没有江淮语的语感,因此不可能给出正确的解释。

在《课本研究·结语》(第82~85页)中,濑户口律子将琉球官话课本词语和"广大南方地区的词语"以及"苏北话"做了比较。

1.这三部课本还包括了广大南方地区使用的词语:(1)吃:①吸、抽;②喝。(2)晓得:知道。(3)[形容词+得紧]:表程度强。(4)欢喜[形容词]:高兴。(5)[好+形容词]:表程度深。(6)寻[动词]:找。(7)[形容词+不过]:表程度。

2.有些词汇在苏北话中还有少数存在:(1)着人:叫人、派人。(2)希臭:臭气。(李按:希/稀,为轻微程度副词。)(3)盘缠:路费。(4)东首:东头。(5)妨事:碍事。(6)虚邀:请。(7)得空:有空闲的时间。(8)挨晚:黄昏。(李按:挨,靠近。)(9)没得:没有。

包括前文的举例,并非如濑户口律子所说:"有些词汇在苏北话中还有少数存在",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大量词语存在于现在的"苏北话"如扬州、泰州话之中。

《课本研究·结语·南方官话的性质》(第85~87页)中的最终结论是:1.官话课本虽然包括了不少南方方言词,但并不是为了学习南方方言而编写的课本。2.根据官话课本的语言特征推断,它是流行在南方广大地区的一种"南方地区官话",而不是北方官话。3.通语可以分为南支和北支,有-m的是流行在南方的共同语音,没有-m的是流行在北方的共同语音。可以理解"南支"受到南京方音的影响,但不能说以南京话为共同语南支的代表语言。4.三种官话课本的旁注,显示了-m尾并入其他韵尾的现象,但并不是它们所反映的"官话"语音确实如此。5.官话课本的旁注

所表现出来的语音现象，表现了当时闽方言的语音特点。以上这些结论，都值得一一商榷。

1. 什么是“南方方言”？“南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濑户口律子没有界定。根据官话课本词语和语法与福建话的大量比较，可以认为她心目中的“南方”大约泛指长江以南地区，而主要是与琉球隔海相望的福建一带。

2. 所谓官话课本“包括了不少南方方言词”，就是在不了解江淮话的情况下所认定的“福建方言词”。由于琉球与福建隔海相望，多就近向福建文人学习“官话正音”非常自然。虽然不排除《学官话》和《官话问答》中可能掺有个别福建方言词，但是琉球官话课本总体上是官话词语。林守超《白姓官话·序文》和“又奚须更正”可以证明，福建学者并不以福建方言词语删改山东人所写的官话课本。如果官话课本“表现了当时闽方言的语音特点”，为何要请山东人编撰《白姓官话》为课本？

3. 只要注意到《白姓官话》的作者白世芸是山东人，在并非“南方地区”的山东和江苏地方经商，琉球官话课本是“流行在南方广大地区的一种官话”的结论就进退失据。

4.《课本研究》不了解南京话和江淮方言就轻率断言：官话课本语言“不能说是以南京话为共同语南支的代表语言”，势必使官话课本语言成为没有任何基础方言的一种通行语。

5. 既然“三种官话课本的旁注，显示了 –m 尾并人其他韵尾的现象”，《课本研究》却又认为“并不是它们所反映的‘官话’语音确是如此”，未免自相矛盾。“–m 尾并人其他韵尾的现象”，正是江淮方言或官话的特点之一。

6. 同样，《课本研究·结语·南方官话的性质》(第 87 页)所列举的“表现了当时的闽方言语音的”五点，也正是现在江淮方言的

特点。

江苏境内方言可以分为苏南吴语、江淮方言、徐州方言（中原方言）和赣榆方言（胶辽方言）。就江淮方言而言，通泰方言是古老的形态，宁扬方言受北方话影响大而变化快。以下论证《课本研究》所列举的闽方言语音五点正是江淮方言特征，主要资料引自《江苏省志·方言志》。①

第一点，中古晓匣纽字[x]与轻唇音[f]。"虎"与"斧"相混为f的有江淮方言通泰片从大丰到如皋、从扬中到如东的9个点。苏南有溧阳、高淳2个点，其原因是这些地区有通泰移民。其中如东点和高淳点"分"与"婚"也相混为f。"虎"与"斧"、"分"与"婚"相混为f/x两可的有泗洪点。"虎"与"斧"相混为x的有连云港点。"虎"与"斧"、"分"与"婚"相混为x的有灌云点。

第二点，齿头音[ts]组声母与正齿音[tʂ]组声母不分。"丝"、"生"、"升"不分，没有翘舌音、读为平舌音的有，从苏北响水到太湖吴江，中部从洪泽湖盱眙、西南从高淳到海边启东的47个点，包括江淮方言区和苏南吴语区的部分。在通泰方言的泰兴、如东、东台等点的许多乡村有翘舌与平舌的对立，估计为较早语音的留存。最北边的属于徐州方言的沛县点不分。

第三点，中古的日[ʐ]母字变读为零声母。"人"变读为零声母的有江淮方言的南通、通州2个点；"绒"均为零声母的有江淮方言的涟水、淮安、句容、溧水、南通、通州等。这一语音现象《江苏省志·方言志》未能详细调查，比如东台点西乡（早期居民）的日母字，如"热"、"穰"等一律读零声母（明清以后的东海地区移民一律读z），可以推知在泰州方言区（大致以古范公堤为界的以西的里下河

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地区)一带占有一定比例。

第四点,三种鼻音韵尾[- m]、[- n]、[- ŋ]混而为一。"宾" = "兵"、"林" = "零"、"音" = "英",除了赣榆和徐州方言区以外,江淮方言和苏南吴语都混而为一,基本上多为鼻化韵。"班" = "帮"、"兰" = "浪",除苏北泗阳点以外,主要集中在南京、仪征、六合、江浦、江宁方言区。此外响水到东台的苏东沿海一带也有不分的情况或孑遗。

第五点,三种入声韵尾[- p]、[- t]、[- k]也没有分别。除了徐州方言区没有入声之外,江淮方言和苏南吴语的入声韵一律收喉塞韵尾 ʔ。

由此可见,《课本研究》可谓"材料真而结论伪"。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囿于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成见,未能认识到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方言在近古汉语发展史中的时间上沟通古今、地域上兼接南北的重要地位。其次,对江淮方言的特点只能局限于查阅已发表的一些并不充分的资料(与中国学者对江淮方言的研究不足有关),难免出现了一些盲目比较。在没有把琉球官话课本语言系统与江淮语语言系统全面比较以前,就匆忙把课本语言系统中与闽语也"相同"的语言现象确定为闽语的特点或源于闽语影响,从而掩盖了这些特点确是江淮方言特点的真相。而不了解闽语中的这些"相同"的语言现象,可能源于明清的通语官话的影响。再次,为之写序的李新魁先生是等韵学和粤语方言学专家,但缺乏江淮方言的知识和语感,对《西儒耳目资》音系性质承袭陆志韦旧说的失误已经表明这一点,因而不可能指出《课本研究》中的这些根本性的失误。

官话课本的音系分析已经最清晰不过地表明:琉球官话具有五个声调,而只有南京话符合这一显著特征。濑户口律子在 1991

年发表的《从声调上推测〈白姓官话〉的方言性质》中认为,《白姓官话》是根据南京话写的。然而《课本研究》不仅没有抓住这一突破口,再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全面详加论证,反而陷入了与"福建方言"比较的误区。但是,仍然得非常感谢作者,因为提供的琉球官话课本音系的详细语料,证明了至清代中叶汉语官话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为基础方言的结论,不仅山东商人和福建文人以之为官话正音标准,就是域外学习官话也以此为标准。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日本学者的濑户口律子,居然没有注意到——与之可以互证的南京话的学习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日本也是传统。日本汉字音之一的"唐音",主要是江户时代由黄檗宗的僧人和长崎的通事及民间商人传入的汉字音,可以与《白氏官话》音系互为验证——这种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正是明代至清代中期(14－18世纪)的南京话。中日商贸对明清官话在域外传播所起的作用,与前文所论明代官话的兴起和流行与江南商业经济的勃起密切相关的观点契合一致。

二、江户—明治时代的唐话是南京话

为了交易上的需要,江户时代的日本从1604年起在长崎奉行之下设置唐通事机构。负责中国商船翻译和贸易事务的官员唐通事,把所学的中国语称之为"唐话",起初有南京口、福州口、漳州口三种方言。通事采取世袭制度,其子女从小就学说唐话。一开始,通事们所学的汉语口音不尽相同,教学方法也有差别,但长崎港口最多的是南京船,所以学说南京话的占大多数;再以后,他们所学的中国语渐渐就以南京话为主,"唐话"就指当时的"南京话"或"官话"。在日本唐话教科书《小孩儿》中写道:

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相通了。苏州、宁波、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那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1]

六角恒广指出："所说的'福州人、漳州人也通'的唐话，是指南京口，即南京语"。"外江"即沿江，泛指长江下游一带，包括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南部，其通语也称"外江说话"。"云南"列在"外江"其内，是因为明代从南京地区曾迁徙大批居民前往（至今云南许多人的家谱记载，先人来自南京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依据原籍和口音也算外江人（1442 年，兰茂所撰《韵略易通》就是云南地区的官话系统），"昆明方言到现在还和南京话有某些共同点"。[2] 所列外江城市中独独没有"南京"，是因为"南京话"为通语而无须列出。当时的闽语区，乃至"中华十三省"（明代十三布政司）都通行以南京话为标准的"外江说话"或"唐话"。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还引录了唐通事卢笃三郎的自传：

笃三郎（高郎），弘化四丁未……生于长崎港……卢家因当唐通事，跟郑干辅……诸先生学支那话（支那南京音）。

除了"支那话"在日本就是指"支那南京音"以外，对于著名唐

① 转引自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0 页。

② 鲍明炜：《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初探》，《语言研究集刊》，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话学者冈岛冠山(1674－1728)《唐译便览》卷一之首的“每字注官音”,六角恒广也指出:“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音”。

明治初期继承了江户时代的“支那南京话”的教育传统,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的汉语学所,教的仍然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话”。直到明治九年(1876),其前身是汉语学所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才确定,根据当时与北京交往的实际情况,将“南京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牛岛德次指出:

> 把以往学习对象“南京语”改为“北京语”。以后,又以“北京官话”为代表性的称呼。有时也叫“清国官话”、“支那官话”等。单纯用“官话”指“北京官话”是日俄战争前后(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的事。①

元明以来,日本和朝鲜所学汉语各有特点。日本主要是通过海路与中国交通贸易,与苏、浙、闽一带客商交往,所习唐话为可以通天下的南京音,因此根本不需要考虑北京俗音的因素。但是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域相连,有海路和陆路两条交往途径,常根据当时的形势并考虑使行的安全选择不同的出使路线。当辽东、辽西地区安定的时候,一般选择通过此地的陆路;但在蒙古和女真势力强大而发生战乱时则避开此地而选择海路。大体上说,在元明交替时期和明清交替时期,即14世纪末和17世纪初选择海路,其他安定时期主要利用陆路。高丽末期和朝鲜初期的出使路线是选择当时明朝首都南京为目的地、距离较近的海路;明代迁都燕京之后,

① 《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又选择了地理上安全且便利的陆路,而陆路所达的目的地就是北京。[1]

由于这一特点,所以明代朝鲜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要以南京官话正音(长期以《洪武正韵》为依据)为标准,又要了解北京俗音,由此形成了正音和俗音的观点和双解的习惯,以至于给现代研究者造成了明清朝鲜所习汉语官话基础音系摇摆不定的困惑。其实,在做过以上比较研究以后,只要参照日本当时汉语官话的标准音是南京音,就可以证明当时朝鲜汉语官话的正音也是南京音而北京土音为"俗音"。

三、清代欧美学者所记官话是南京音

从1822年第一本《圣经》汉译本(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等译)出版以来,一批官话和方言《圣经》汉译本相继问世。18世纪的清代《圣经》官话汉译本和欧洲学者编写的汉语官话课本对研究清代后期官话音系很有帮助。

1.1869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官话课本》(*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根据濑户口律子的研究,与《白姓官话》的音系一致。[2]

2.1888年英国伦敦大英圣书会印行《官话新约全书》(以下简称《新约》),叶宝奎在《明清官话音系》[3] 对此音系做了研究(但是没有说明此书来源)。《新约》的声母20个:p、p'、m、f、t、t'、n、l、ts、

① 蔡英纯:《试论朝鲜朝的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之关系》,《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从声调上推测白姓官话的方言性质》,《日本语学教育研究论丛》1991年第8号。

③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

ts'、s、ch、ch'、sh、r、k、k'、h、hs、ø。与《耳目资》相比，"微"母、"疑"母变为零声母；"知、庄、章"三组完全混同于 ch，"日"母已经是 r。"见"组中多出一个 hs，表明部分已腭化，如："希"hsi、"下"hsia。《新约》的韵母 43 个，与《耳目资》相比，从开合洪细变成开齐合撮；唇音声母的合口成为开口；"官"uon、"关"uan 两摄并为 uan。《新约》的声调系统与《耳目资》相同，五个声调，存在入声。所有入声韵一律带有喉塞韵尾 -ʔ，采用便于书写印刷的 -h 表示。

叶宝奎得出《新约》（1888）和成书时间早些的《白姓官话》（1750）、艾约瑟《官话课本》（1869）的音系完全相同的结论，同时认为"《新约》出版时间虽在清末，但该书音系实际上代表了清代中后期的官话音"（第 97 页）。然而，如果《新约》和《官话课本》与《白姓官话》的音系相同，很难设想 18 世纪来华传教士要去学习 17 世纪的官话，合理的推论应当是十七八世纪官话音系具有一致性，清代中后期的官话音系性质稳定。

3.20 世纪初，熟悉当时南京话的德国何美龄（K. Hemeling）撰成《南京官话》[①]，所附"发音说明"以英、德、法和苏格兰等语音为比况，记载了当时南京话的音值。此外，赵元任后来也做过南京方言调查并且撰成《南京音系》[②] 一文。在日本佐藤昭对何美龄《南京官话》音系进行归纳的基础上，[③] 邓兴锋（1994）将《南京官话》与赵元任《南京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④]《南京官话》声母 22 个：p、p^h、m、f、t、t^h、l、ts、ts^h、s、k、k^h、h、r、ch（知）、ch^h（蚩）、sh、j（r）、ch（基）、

① *The Nanking Kuan Hua*，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上海统计局 1902 年版。

② 《〈南京官话〉所记南京音系音值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

③ 《科学》1929 年 13 卷第 8 期，所用材料是 1907 到 1910 居住在南京时所听到的音和 1927 年的调查。

④ 《清末民国初期の官话方言の音韵·南京官话の音韵》，《北九州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1988 年 64 号。

ch^h(欺)、hs、w、y(移),没有 n 与 l 的对立。韵母 35 个,声调 5 个。《南京音系》声母 23 个,多分出一个"于"母(yu),韵母 36 个,声调同样 5 个。二者记录的南京官话音系基本一致。对于南京话的入声,何美龄认为是一个升促调而收音急遽(This tone is ascending and short and ends abruptly),如同英语对 cut、lit 等单词时去掉末尾 t 的音。赵元任在《南京音系》中将南京话入声调值标记为 44,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 441 页)中却标记为 45,这表明何美龄将南京话入声记载为一个升促调是正确的。

美国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98 年写成的《官话萃珍》,耿振生在《明清等韵学通论》[①] 中做了介绍。《官话萃珍》的声母 21 个,除了多一个"微"母 w,其余和《新约》全同。韵母 38 个,比《新约》少五个。显著特点是入声派进四声,"四声里边入声字的分派仍与今天北京话有不同之处,但为数甚少"。(第 179 页)据 ieh、üeh、ih 的 -h,可能存在与《新约》相同的带喉塞韵尾 -h[-ʔ]的入声韵。由于《官话萃珍》不是每一字音都标注字母,比《新约》韵母少的原因也可能遗漏了其他入声韵,而只有这三个韵母带 -h 尾。并不排除生活在北京的富善认为,既然当时北京的官话中听不到入声,欧美人也就没有必要再掌握这些难以掌握的入声韵母。更确切的说法是,《官话萃珍》记录的是在北京流行的官话,但不是北京话。

此外,1878 年至 1882 年,第一位受聘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徽州籍举人戈鲲化(1835—1882)所教汉语也是南京话。[②] 当时美国《每日图文》(1879 年 11 月 3 日)介绍:

---

① 语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 年第 3 期。

官话是全中国普遍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中国文学的载体，也是贸易界使用的语言。

琉球所习官话、日本所习唐话、欧美学人所记官话、中国学者到美国所教汉语，这些事实都是清代官话也是以南京话为标准或“官话”就是专指南京话的明确佐证。显而易见，无论是微观分析，还是宏观通论，二者都指向同一结论：所谓明清官话基础音系北京音说纯属臆断，明清官话基础音系南京音说铁证如山。

第四节　明清戏曲小说与明清官话

除了各种历史、经济、政治的因素，明清官话之所以以江淮语中的南京话为标准，是因为还存在着浓郁的江淮市民文学背景。

一、南戏曲韵基础音系南京说

《洪武正韵》本为规范当时读书音而作，但由于朱元璋不满意并没有成为明代取士科举的官韵，比《洪武正韵》更“古”的平水韵则成为取士科举的标准。由于《洪武正韵》与南方方言比较接近，因此被南曲家用作曲韵标准，由此出现了曲坛“北用《中原》，南宗《洪武》”之说。近代百戏之祖昆曲源于南曲，而南曲韵宗虽名为《洪武》，实为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1378—1448）为南戏所作的《琼林雅韵》（1398）一系韵书的语音系统。

依据张竹梅的《琼林雅韵研究》，[①]《琼林雅韵》声母系统的特点是：1. 仄声中的声母清浊合流，平声中的声母清浊对立显而易

①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见。2. 非敷、泥娘、知照等合并。3. 微母存在。4. 喻(影、疑)并未变成零声母。《琼林雅韵》的19韵部包括44个韵母,韵部系统的特点是:1. 有闭口韵 - m;2. 另外有一个变体:箫韶的 ieu 和周流的 ieu 中和;3. 撮口呼的音值为 iu。《琼林雅韵》具有平、上、去、入四声,声调系统的特点是:1. 平声未分阴阳;2. 浊上变去;3. 为了适应戏曲的要求,入声被派入相应的平、上、去声中,但在"入声作某声"下单独成类。

《琼林雅韵序》曰:"于是有卓氏著为《中州韵》,世之词人歌客莫不以为准绳久矣"。元代燕山人卓从之依据《中原音韵》(1324)改编为《中州韵》(1353),朱权又依据《中州韵》改订而成了《琼林雅韵》。《琼林雅韵》(1398)与《中州韵》的重要差别在于平声未分阴阳,而与《洪武正韵》平声未分阴阳一致。另外《洪武正韵》入声独立,《琼林雅韵》虽然没有单立韵部,但将"入声作某声"单独成类。虽然承袭了《中原音韵》和《中州韵》的做法,但本质上与《洪武正韵》相一致。在这以后,陈铎的《词林要韵》(1483)、王文璧的《中州音韵》(1488—1521),都是平声未分阴阳、入派三声的体制。从《琼林雅韵》到《中州音韵》之间的一百多年,成书于不同时间的韵书却具有相同的特征,只能说明它们反映出一种相同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它们的地域都在江苏,产生的时代都在《正韵》之后,它们的背景是南曲。"[①] 兴起于宋光宗朝(1190—1194)的南戏,在元末明初"南北合腔"的背景之下,戏曲实践上的拖腔使入声字失去韵尾而唱,与平上去声字无异,以《琼林雅韵》为龙头的南戏曲韵系统,承袭了"入派三声"的传统。

张竹梅认为《琼林雅韵》"平声不分阴阳"却"入派三声",与元

①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末明初时期的南戏曲韵是一致的，同时也记录了十三四世纪江南语音的主要特点。朱权生于南京，他的乡音当是土生土长的明代初年的南京话。虽然吴语声母的清浊对立至今依然存在，但《琼林雅韵》所记录的江南语音不可能是吴语，其基础音系应是源于靖康南渡时由中原迁来江淮而发展到明初的南京话。

二、白话小说语言江淮官话说

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① 说："宋元以来……有影响较大的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这些白话文学作品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将明清白话小说认定为用北方方言写就，太笼统了。显而易见，这些白话文学作品都是用江淮官话写成的，而江淮官话与北方方言存在明显区别。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江苏兴化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我的家乡在苏北东台，属于通泰方言。小女上小学看了《西游记》说："里边都是家乡话"。《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久寓南京。陈贵麟《杉亭集·五声反切正均音系探赜》② 认为其弟吴烺所撰《五声反切正韵》，其音系即当时南京话。吴又与江云樵合撰《金陵传声谱》，经汪鎏改编为《空谷传声》，为文人击鼓传声所用，影响十分广泛。《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幼居南京。据研究者认为，版本越早南京话成分越多，北京话成分增多盖传抄中改动所致。又那宗训的《从押韵看曹雪芹的语音》③ 发现该书中曲韵阳声韵分押系统，合于南京、扬州一带方言，可以认为是曹氏

①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语言研究》1994 增刊。
③ 台湾《大陆杂志》，1981 年 63:5。

母语的特色。刘丹青的《红楼梦姨类称谓的类型与底层研究》[1]认为书中姨类称谓的类型不反映北京话，而与南方方言一致。太田辰夫《红楼梦的语言》[2] 证明《红楼梦》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例子“早起”，在江淮官话中为基本语词。至于在论及《儿女英雄传》的北京土音土语，所举的例子如罕见字沍 wù（焐）、硌 luò（摞）、礓礤 jiāng cā 等皆为江淮口语。

又作者隐姓埋名的《金瓶梅》，今人多从语言上考证，有山东方言说、徐州方言说（可以合称“鲁方言说”）、吴地方言说，皆各执一端。该书最早刻于吴中（见沈德符《野获编》），与此书发现有关的沈德符（浙江嘉兴人）、徐文贞（江苏松江人）、刘承禧（湖北麻城人）、袁宏道弟兄（湖北公安人）、冯梦龙（江苏吴县人）多为通行南京话的江南人或江淮官话区人。江淮地处豫鲁吴越之间，为南北语言交会之地。宋元之际，青徐流民多徙此处；明初“洪武赶散”，曾将苏州与杭嘉湖平原居民迁往江北，因此江淮方言中杂有北鲁南吴的俚语俗词。一些词语鲁、吴今已不用，《金瓶梅词典》[3] 中列入“难解词语待问篇”的“花靠”（花样），至今江淮方言中仍用。因此《金瓶梅》虽然杂有原作者或修改者的一些方言俚语，但总体行文上是用明末官话写就，而不是一部方言小说。

宋元以来，在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汉语日趋统一的同时，只有江淮方言保留了相对纯正的两宋正音，南京话成为明清“官话”的标准。除了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行商交易需要通语，江南市民文化的日益发达、雅俗共赏的口头文学语言也有力推动了官话的流播。综上所述，明清官话是宋元以降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有着

①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6届年会论文，1994年。
② 载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王利器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

丰富的市民文化内涵，既运用于官场又为广大市民社会使用的，以保留在江淮方言中的中原正音为基础的通行语。换而言之，明清官话或明清两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江淮话为基础方言，以通俗的明清白话小说为语法楷模的通行语。

第十章　官话音系特点和北京官话渊源

《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① 中说："语言学界一向认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近年来有了一些异议……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仅凭零星的间接材料作推断，这些新说尚不足以动摇主流观点。"然而必须指出：一方面，用以证明近代官话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并非"零星的间接材料"，另一方面，"语言学界一向认为的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其实从来也没有人用"系统的直接材料"证明过，只是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从辽金以后北京一直是京都出发而导致的"一向认为"。由于先入为主，要使人们舍弃从来没有证明过的"主流观点"确非易事。

① 唐作藩，耿振生撰，载《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一节　明清官话基础方言非南京说商榷

一、官话没有标准音系说商榷

耿振生在《明清等韵学通论》[①] 中认为："历史上的官话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音系，不同的人对官话的理解各有不同，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地方所说的官话必然互有出入"。

官话既起于市民社会，又并非官方颁布，虽然不可以设想明王朝颁布一个类似现代普通话那样的、有所规范的"官话音系"，但同样不能够断言官话不存在基础方言或不具备历史形成的社会标准。根据记录明代官话的文献，对官话的理解具有一致性——以南京音为标准或以南京音为基础方言，否则为什么金尼阁能将《中国札记》中的"地道的中国话"改为"纯粹的南京话"？为什么日本学者会在"支那话"后注明"支那南京音"呢？

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学习官话过程中母语对目标语干扰的结果，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地方所说的官话必然互有出入"。既然官话以各种变体形式存在，就不能否定官话基础方言的存在，因为变体是常体的变化，而常体是变体中的典型。

二、官话以读书音为基础说商榷

叶宝奎在《明清官话音系》（以下简称《音系》，下文引文所注页码即该论文页码）中将明清官话分为三个阶段：1. 明初官话音系（《洪武正韵》）；2. 明代中后期官话音系（《西儒耳目资》、《韵略易

① 语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通》、《五方元音》、《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3. 清代官话音系(《官话新约全书》、《李氏音鉴》)。一方面，作者不赞成“官话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普通话”和“官话是明清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认为“明清官话并不是以北京音作为标准音”；(见《内容简介》)另一方面，作者力图探讨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之间的“同源异流”的关系。结论却是：“明清两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是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并不直接代表一时一地之方音”(第 124 页)。

除了依据徐孝是顺天(北京)人，《音系》提出“《等韵图经》所代表的音系大概是当时的北京音”(第 71 页)，并没有指出其他官话音系韵书的基础方言在何处。在批评濑户口律子 1991 年的观点“清代琉球《白姓官话》南京话说”时认为：“仅仅根据声调来证明《白姓官话》是根据南京话来写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清代官话音与南京音岂止声调吻合，声母系统、韵母系统也都很相同。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断定清代官话就是南京音”(第 95 ~ 96 页)。既然持有这种“即使声调、声母、韵母系统都很相同，也还是不能断定清代官话就是南京音”的刚性观点，《音系》也就完全取消了官话的基础方言。把官话音曲解为没有基础方言的音系，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官话音系。显然，作者混淆了“历史上通用语言的基础音系”和“现代方言的音系调查”这两个概念，“官话的音系基础”就是当时官话语音赖以存在的活方言，并不等于对这一方言所做的“现代化”的严格描写。

三、官话音系近于北京音说商榷

丁锋的《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①]（以下简称《琉汉对音》，下文引文所注页码即该书页码）利用明代《琉球馆译语》等材料，采取对音研究方法考察明代官话音系，认为"对音所反映的语音面貌，近于官话北京音而疏于官话南京音"。

正如《琉汉对音》（第19页）所说："对音虽然有很好的科学认识价值，但因为它本质上是两种语言语音层面上的对应，两种语言各自的语音分布、语音组合规则、语音数量等因素给对音状况和对音质量施与深刻的影响，'强人就我'，近音替代的现象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剖析《琉汉对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一个语言的音位系统包括所有的音质音位和音位的组合，但是《琉汉对音》没有列出琉球语（相当于明代的语音系统）的音节表。2. 根据日本语中本音节结构只有V与CV两种推断，琉球语音节结构可能也是如此，而汉字音节结构的是(C)V(V)、V(V)C、C(V)VC。《琉汉对音》没有列出汉字与所对琉球音节的对应表（只是分别列出了《声母的琉汉对音》、《韵母的琉汉对音》）。3. 因为琉球语没有入声音节，因此长、短元音自然成为汉语入声字与琉球语对音的重要凭借。但是，《琉汉对音》没有统计汉语入声字对应琉球语长、短元音的情况，因此关于对音汉字所反映的"明代官话的入声韵尾消失"的结论值得怀疑。4.《琉汉对音》中声母的琉汉对音没有辅音ŋ、v，只有十九母。也正是因为琉球语没有ŋ（疑母）、v（微母）这两个辅音，所以在对音过程中只有无可选择的一种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方式，将它们归入 ø(零声母)。5. 琉球语原本没有辅音声母 ?，但在《琉球馆译语对音解读》的对音中存在 ?(主要出现在嗑、加两个音节前原为 k 音位的位置上)，《琉汉对音》没有考证 ? 的来源。6. 琉球语原本没有塞尾 ?，但是在对音中存在 a?、u?、u(o)?、i?、i:(e:)?、i(ie)? 等六个入声韵。《琉汉对音》没有考察语 ? 尾的来源。

另外琉汉政府的正式交流不是始于中国明代，《白姓官话》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贵国进贡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呢?

·敝国进贡是从唐朝开始的。

·贵国有飘风来的人，我们琉球都叫他们为唐人。

·怪道这里人，叫我们是唐山人，原来是这个缘故么，

汉语对琉球语的影响从唐朝就发生了。在讨论琉球古音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历史因素。

综上质疑，《琉汉对音》“从而可知当时来自全国各地，任职朝廷的官员说的未必是南京式官话，而可能是北京式官话”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琉汉对音》中没有提及琉汉声调对音的材料。如果存在琉汉声调的材料，并且是五个声调，那么琉汉对音汉字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只能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

《琉汉对音·韵母的琉汉对音》中的材料证明了我的推想。现依据《韵母的琉汉对音谱》(第 96 ~ 103 页)材料进行重组，然后进一步统计分析以得出结论。1.《对音谱》有些音位为：u:(o:)、u(o)?、u(uo)、iu(io)、i(e)、i:(e:)?、i(ie)、i(ie)?，《琉汉对音》(第 75 页)说“括号中的是日语音(伊波先生以为代表早期的琉球语音)，前面相对的是琉球音”。对于以上这些音位，采取伊波先生的说法，只

列出代表早期琉球语音的音标。2. 由于印刷校对问题，在《对音谱》遗漏了使用次数的译音字后一律以 * 标明，在统计时仅作使用一次计算。

1. aʔ

(1)aʔ　[盍]磕 1、喇 1

(2)a　[盍]榻 5;嗑 36+4+2//5+3+1+1;喇 13;刺 1　[曷]撒 34+1;达 50+1//1;噶 1;辣 1;挞 1　[合]答 9//3;纳 1//3　[黠]扎 2;扒 4+1//1;八 1;吶 * 1　[洽]插 * 1　[狎]狎 3;押 2　[铎]恶 1　[末]末 1　[陌]迫 2　[麦]麦 1　[乏]法 16

(3)ia　[狎]甲 * 1　[黠]扎 3　[薛]别 1　[曷]撒 1　[药]雀 1

(4)ua　[末]括 1

2. uʔ

(1)uʔ　[屋]屋 1

(2)u　[屋]独 1;禄 18;木 4;速 7;秃 2;谷 15;人 2;屋 1;福 11;六 1;陆 1;宿 1　[烛]足 8+4;俗 1　[物]不 4+1/1　[没]窟 2　[铎]莫 1;托 1　[缉]立 1

(3)iu　[屋]郁 1

3. oʔ

(1)oʔ　[末]活 5

(2)o　[屋]禄 7、木 16;谷 1;碌 4;六 1;曲 1　[沃]酷 2　[没]骨 1;窟 1　[铎]恶 2+1;各 1//6、莫 7;诺 2　[觉]壳 1　[末]活 1

(3)io　[药]着 1;约 1　[觉]角 11

(4)uo　[屋]屋 1　[铎]恶 2//1

(5)oː　[屋]速 1;谷 1　[觉]壳 1　[铎]各 * 1

4. iʔ

(1)iʔ [质]失3、一1 [职]识2

(2)i [缉]立51+2;及37+7//1、集12;急17+2//3、+2;执1 [质]失43+3+1//1;日3;必15+10;密36//7、蜜6;~(原文误为-字线)7;失1;式1、实1//1、笔1;匹3 [职]食1;即2;力3;息1 [昔]石7//1、亦33;辟4 [锡]的18//1//1;吃1 [迄]乞29+8+1 [德]墨17//1、默1 [薛]泄1

(3)iː [德]刻1 [职]力2 [缉]立2 [药]着1

5.eʔ

(1)ieʔ [麻]些1

(2)e[缉]及7;集3;立5//3、急5 [质]密3//1 [迄]乞1 [锡]的3+2 [叶]聂*1 [帖]帖2+1 [薛]别3;杰2 [屑]结2;洁2 [德]刻1

(3)ie [薛]热1 [叶]叶14

(4)eːʔ [缉]立1

汉语入声字与琉球长短元音对音比较统计表

<table>
<tr><th rowspan="2">音位</th><th colspan="4">短元音</th><th colspan="2">长元音</th></tr>
<tr><th>塞尾短元音</th><th>短元音</th><th>i-短元音</th><th>u-短元音</th><th>塞尾长元音</th><th>长元音</th></tr>
<tr><td>aʔ</td><td>二/2</td><td>二三/213</td><td>五/7</td><td>一/1</td><td></td><td></td></tr>
<tr><td>uʔ</td><td>一/1</td><td>十九/86</td><td>一/1</td><td></td><td></td><td></td></tr>
<tr><td>oʔ</td><td>一/5</td><td>十五/55</td><td>三/14</td><td>二/4</td><td></td><td>四/4</td></tr>
<tr><td>iʔ</td><td>三/6</td><td>二九/404</td><td></td><td></td><td></td><td>四/6</td></tr>
<tr><td>eʔ</td><td>一/1</td><td>十四/47</td><td>二/15</td><td></td><td>一/1</td><td></td></tr>
<tr><td rowspan="3">合计</td><td>八/15</td><td>一百/805</td><td>十一/37</td><td>三/5</td><td>一/1</td><td>八/10</td></tr>
<tr><td>八/15</td><td colspan="3">一一三/847</td><td>一/1</td><td>八/10</td></tr>
<tr><td colspan="5">一二二/863</td><td>八/10</td></tr>
<tr><td rowspan="2">比例</td><td colspan="5">93.8%/98.5%</td><td>6.2%/1.5%</td></tr>
<tr><td colspan="6">一三〇/876</td></tr>
</table>

说明:1. 汉字数码表示译音字数,阿拉伯数字表示使用次数,中间用/隔开。2. 同一音位中所使用的同一个字,不计开合等第之别,只算一个字。3. 在不同音位中所使用的同一个字,则算不同的字。

与琉球长元音对音的八个汉语入声字，除了[屋]速、[德]刻、[药]着三个，其余的 o:[屋]谷、[觉]壳、[铎]各和 i:[职]力、[缉]立等五个都同时在短元音中出现。而[屋]速在 u、[德]刻在 e、[药]着在 io 对音中也分别出现。这些与琉球长元音对音的汉语入声字的极个别现象，或许在同一音系中这些字音具有入声与非入声两读，或者记音者受其可以方音影响，可以忽略不记。

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汉语入声字塞尾失落以后成为单元音，因此在记录琉球词语短元音时使用了这些单元音的入声字。凭什么证明这些字当时一定是入声字？今就五个入声韵各举一个对音字例(字例后括号内为普通话汉语拼音)如下：

1. 麦·麦(mai)，为什么不对长元音 a:，而对短元音 a？因为当时读 * maʔ

2. 屋·六(liu)，为什么不对长元音 u:，而对短元音 u？因为当时读 * luʔ

3. 屋·屋(wo)，为什么不对长元音 o:，而对短元音 uo？因为当时读 * voʔ

4. 薛·泄(ɕie)，为什么不对长元音 i:，而对短元音 i？因为当时读 * ɕiʔ

5. 帖·帖(tie)，为什么不对长元音 e:，而对短元音 e？因为当时读 * t'iʔ

此外，琉汉对音中韵母有鼻韵尾 - m、- n、- ŋ，闭口韵有 am(寒韵、覃韵)、im(真韵)、em(先开)、um(东一、唐合、魂韵)、om(东一)。根据《琉汉对音》(第 96 页)，其来源有二：一为以琉球语音读汉字韵尾和少数动词变格产生的拨音，一为琉球语音的浊辅音带有鼻冠音，听起来像前一个音节的韵尾。根据闭口与抵颚韵尾对音的不齐，可以断定当时的“琉球人所习汉语”闭口与抵颚韵尾的

混淆，当不能够证明“琉球人所习汉语”闭口韵的完全消失。既然有覃韵字读 am，那么应当认为“琉球人所习汉语”有闭口韵。依据邢公畹依据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事实所归纳的观点和我从系统论角度的推论(参见第八章中关于《中原音韵》入声的研究)，凡有闭口韵的音系不会没有入声。

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在琉汉对音中，汉语入声字与琉球长元音对译；2. 在与琉球语对音的这种官话音系中，入声字是存在的；3. 这一官话系统同时存在入声韵与入声调；4. 符合这一音系特征的只有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即明代的官话。

第二节　官话南北两系论和官话音系特点

一、官话南北两系论商榷

罗常培在《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① 中提出：14 世纪北方有两种并行的语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代表官话的系统，“不免凑合南北方言想作成‘最小公倍数’的统一官话”。

罗氏所言“14 世纪”代指元代，而“北方”范围过于笼统。如果指北京一带，“读书音”应是《蒙古字韵》一系的两宋传统正音；“说话音”就是阿尔泰化的汉儿言语。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且四方之音不同……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马可·波罗所说的“蛮子省”的通用语就是明代官话的前身——宋元江淮话，并非“凑合南北方言的最小公倍数”。

① 载《中国语文》1959 年第 12 期。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① 说："现代的官话区方言，大体可以分成北方（黄河流域及东北）和南方（长江流域和西南）两系。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在宋、元时代这两系已经有相当区别……现在的北方系官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到了金、元两代入据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北方系官话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南方系官话更向南引退。"

根据吕说，"现代的官话区方言"大概就是现代北方的中原官话区和东北官话区，南方的江淮官话区和西南官话区。宋元时代的北方汉语（中原方言、燕代方言等）和江淮方言当有区别。如依据金、元两代女真与蒙古先后"入据中原"，那么"北方系官话"源于"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即汉儿言语。如依据靖康之乱中原"人民大量南迁"江淮，南宋时中原汉语确实"更向南引退"。但在宋元时代，南迁中原的汉语当时还不是"南方系官话"，同样汉儿言语亦非"北方系官话"。到了明代，才有"官话"。"官话"就是官话，明代没有与北方话相对的"南方官话"。北京地区的在明代通行"淮兵扫北"和"永乐北迁"迁去的江淮话，由此演变而成的"北地官话"，最终时间应是在清代中后期的满人完全换用汉语以后。因为宋元时代还没有出现官话，因为官话就是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明代江淮方言，因为明代北京地区通行的官话源于江淮，因此宋元时代不可能存在什么北方官话系统和南方官话系统的差别。"南北官话系统说"的误区，就在于不了解什么是明代官话。如果一旦了解明代官话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南北官话系统说就不复存在。北方话就是北方话，至于现在称北方方言为"官话区方言"，这是 20 世纪贴上的标签。尽管这些方言受到官话的不同程

① 学林出版社 1985 年版。

度的影响，但仍然有着与各自的形成途径和文化背景，并非都是明代官话的分化。

从历史上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的南迁地区已经与现代江淮话的分布一致，[①] 由此形成江淮话的中古历史层次。"靖康之难"，中原士族的南迁，又给江淮流域带来了北宋中原语音。南宋初年的人口迁徙，其中淮南路人口的增长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达到144.1%，为当时之最高，约三人中就有一人为南迁中原居民，可见北宋中原语言对江淮流域语言的覆盖率程度。[②] 由此形成江淮话的近古历史层次。

西南方言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既有长江流域江淮话的成分，也有黄河流域北方话的成分。两晋之交、唐五代、两宋之交的中原移民语言不论，所谓长江流域江淮话的成分，包含不同历史时期的江淮移民带来的语言：元末明初湖广籍和安徽籍的军民留居四川，清朝前期以湖北籍(江淮方言黄孝片)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和西南方言的体系。[③] 虽然西南方言中包含着许多江淮话的特点，但是入声大都消失的一些特征显然来自明清北方话，中原方言或西北方言的影响。

二、官话音系的特点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以下简称《私编》)，明代上元(今江宁)人李登(万历年间贡生；1573～1619)所撰，李新魁认为能够代表明

① 鲍明炜：《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初探》，《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刘静：《南宋初年的人口迁徙与今长江下游流域的文白异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年会论文，1990年。

③ 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

代口语标准音，[①] 而耿振生以之代表明代官话中的江淮方音。[②] 黎新第在《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③] 中，以《私编》作初步依据，再引证其他材料，推断明代官话的语音特点如下：

1. 入声独立。根据李新魁研究，《私编》入声三类已经混然无别，但入声韵依然独立存在。

2. 平声中清浊对立。根据对《琼林雅韵》和王文璧《中州音韵》的研究，平声的浊音清化晚于仄声。《私编》的平声中可能尚有全浊声母，声调阴阳未必已经转化为独立调位。

3. 庄组字声母较多并入精组，部分并入章(知)组。

4. 寒、桓分韵。反映江淮方言的《洪武正韵》(1375)、《琼林雅韵》(1398)、《中州音韵》(1503)、《韵略易通》(1586)、《耳目资》(1626)和《私编》全部是寒、桓不同韵，而反映北方方言的全都是寒、桓同一韵类。

5. -n、-ŋ韵尾进一步相混。《私编》未反映这一特点，可能是从明代南京读书音特征出发。

张卫东在《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④] 中认为，《耳目资》所记明代官话的主要语音特征是：

1. 平分阴阳、清上为上，浊上归去、保留入声的五调系统。此为黎1. 同。

2. 知组二三等韵、庄组二等韵、章组三等韵为舌尖后，而庄组三等韵为舌尖前。与黎3. 同。

---

① 《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载《重庆师范学报》1995年第4期。
④ 《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 山摄重唇合口字仍读合口，见组山摄合口一、二等的“官关两韵”基本不混。与黎4. 同。

4. 咸、山两摄开口三、四等字及二等见组字，除知三、照三有重读外，都记为-ien；深、臻两摄知照系，除庄组三等部分字一读cen或cen、chin重读外，都读记为chin等。

缺少一个关于-n、-ŋ韵尾的相混特征，可以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宾主问答疑释》的记音为补充。无论哪一摄里鼻化音记号与-m、-n都没有区别，表示的是同一类鼻音要素，同一个字往往有鼻化和非鼻化两种记音。至于金尼阁《耳目资》中的-ŋ、-n区别，可以说-ŋ这一类是人为分配的，可能承袭了《洪武正韵》传统或依据南京读书音所分的两类。与黎5. 同。

关于-n、-ŋ韵尾的合流，宋元时期已有不能区分（朱熹协音中臻摄与曾、梗摄韵尾已经相混），到了明代进一步发展。陆容《菽园杂记》有“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袁子让《字学元元》：“徽东读堂如檀，读郎如兰，读阳如延，读刚如干，盖谬阳韵于寒韵也”。“徽东”之地，不管理解为徽州东部（包含在徽州之内），还是理解为徽州以东（与徽州毗邻的以东地区），都证明-n、-ŋ韵尾的相混起于徽语和江淮语，具体原因可能与当地吴越土著语言具有-n、-ŋ交替的语音习惯有关。

濑户口律子认为琉球官话课本所反映的清代官话的音系主要特点是：[1]

1. 齿头音ts组声母与正齿音tʂ组声母不分。

2. 三种鼻音韵尾-m、-n、-ŋ混而为一。

① 《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4年版，第87页。

3. 三种入声韵尾 -p、-t、-k 没有分别。

依据一些方言学家的调查研究和归纳，黎新第又罗列出现代江淮方言语音特点如下：

1. -ən 与 -əŋ、-in 与 -iŋ 不分。

2. 山摄一、二等唇音和牙喉音合口字（搬：班、官：关）部分方言点同音。

3. 果摄一等牙音开、合口字（歌：锅）部分方言点同音。

4. 大都方言点没有卷舌音。

5. n、l 不分。

6. 卷舌音 tʂ、tʂh、ʂ 和不卷舌音 ts、tsh、s 部分方言点相混。

7. 有独立的入声。

依据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①] 的归纳，现代江苏境内江淮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

1. 入声有独立的韵母系统，读短调且有喉塞韵尾。

2. 咸、山两摄的阳声韵字合流，变成鼻化韵，或分为三个主要元音（淮阴 a、I、o）；或分为两个主元音（南京 a、e；镇江 ɛ、o）。

3. 深、臻、曾、梗四摄开口阳声韵字合为一个韵部或两个韵部。韵尾或为 -n，或为 -ŋ，或为鼻化韵。

4. 遇摄唇舌齿音字、流摄唇音字，多数点的多数字与果摄韵母合并。宁扬地区多读 o，通泰地区多读 u。

5. 开口二等见系字有些点口语中读 k、kh、x，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推移状态。

6. 知、庄、章、精四组声母字，绝大多数合为一组。除连云港几个点读卷舌音，其余都读不卷舌音。南京分为不卷舌 ts 卷舌 tʂ

①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组,其中读不卷舌音的字较多。

7. 泥、来两母的字,大多数方言(29 个点)合并为一个声母。除个别点读 n,宁扬地区读 l。

现代江淮语,除了清浊声母对立的消失(通泰方言中的"清声母"介于清浊之间),和明清官话音系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三、京剧音韵源于官话说

江淮官话音系,除了明代早期随永乐北迁大举进入燕京,清代后期又以戏曲文化形式对北京语言文化潜移默化。京剧虽在北京定型,但并非北京土产。京剧音韵并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也不像地方戏曲,比如以河南音为依据的豫剧,而是在徽、汉(湖北)两调合流的皮黄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继承了昆曲"中州韵"传统的戏剧音韵。

苏雪安《京剧声韵》说:"中州韵这一名称还没有人能确切地找到它的来源……我们认为中州韵这个名称,既不是指河南中州的语言,也不是在古代戏曲中有一种中州韵的唱念方法,而是从当时(很难确定年代)人们的口头上叫出来的,一直流传到今天。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叫出这样一个名称来呢?很可能是从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韵》一书而来。"①

由此可见,戏剧界不知"中州韵"原来是书的名称。这本书就是元代燕山人卓从之依据《中原音韵》(虞集《序》称之为《中州音韵》)所编的《北腔韵类》,或称之为《中州韵》。周德清长期滞留江淮,《中原音韵》与元大都音无涉,与已经变化了的元代河南语音也不尽相同。从明初开始,在依据《中州韵》和《洪武正韵》改订的《琼

① 转引自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 页。

林雅韵》、《中州音韵》等一系曲韵书成为南戏语音标准的同时，"中州韵"也就从音韵系统名称逐渐演变为戏曲文化概念。

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徽班受到昆曲的影响，清末又在徽调二黄腔的基础上增加了汉调西皮腔，"京剧"方脱胎而出。明代中叶，在江苏昆山兴起的昆曲，"凡腔调与字面俱南，韵则宗《洪武》而兼主'中州'"（清王德辉《顾误录·南北曲总说》），可见昆曲也推崇《琼林雅韵》一系的"中州"曲韵。顾起元《客座赘语》曰"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海盐腔为明代南戏流派之一，而多用南北两京通行的官话。

安徽潜山人（属于江淮方言洪巢片）程长庚、湖北罗田人（属于江淮方言黄孝片）余三胜等著名演员，在京剧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所唱虽西皮、二黄，但吐字发声仍宗法昆曲"中州韵"传统。这一"中州韵"，自然以京剧发祥地保留着南宋南迁中原音韵的江淮方言为语感。为了适应当地观众，后来北京演员吸收了京音的一些因素，由此才逐步形成了传统"中州韵"、官话（皖鄂）音和北京音相混合的京剧音韵系统。

罗常培在《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① 中，以《中原音韵》为参照，将京剧语音中与北京话声韵不同的"保留古音"的"上口字"的条理归纳为十一项：

1. 齐微部的舌尖后音字，韵母不读开口 ʅ，读为齐齿 i。如：知 tʂi。

2. 鱼模部的舌尖后音字，韵母不读合口 u，读为撮口 ʮ。如：猪 tʂʮ。

3. 齐微部的轻唇音字，韵母不读 ei，读为 i。如：非 fi。

① 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4. 齐微部的来母字，韵母不读 ei，读为合口 uei。如：雷 luei。

5. 皆来部的见组细音字，韵母不读 iɛ，读为 iai。如：阶 tɕiai。

6. 歌戈部的见组字和唇音声母字以及一些读 yɛ、iao 的字，韵母不读 ɤ，读为 o/io。如：歌 ko，药 io。

7. 庚青部的开口、齐齿字，韵母不读 -ŋ，读为 -n 韵尾。如：登 tən，京 tɕin。

8. 东钟部的唇音声母字，韵母不读 əŋ，读为 uŋ。如：风 fuŋ。

9. 东钟部的日、娘、来母字，韵母不读 uŋ，读为 iuŋ。如：容 iuŋ（日母变成零声母），隆 liuŋ。

10. 疑、影两母的开口字，声母不读零声母，读为 ŋ-。如：我 ŋo。

11. 车遮部的翘舌字，韵母不读 ɤ，读为 e。如：车 tse。

京剧语音中还有一些与北京话语音不同的显著特点：

1. 京剧语音分尖团。北京话中的 tɕ、tɕʻ、ɕ 的字，源于中古声母精组的字京剧中读为尖音 ts、tsʻ、s，如：酒、千、心；源于中古声母见组的字京剧中读为团音 tɕ、tɕʻ、ɕ，如：见、启、希。

2. 京剧语音中古微母字读 v，如：微 vi。

这些与北京话声韵不同的语音特点，正是皖汉江淮语或清代官话的特点。凡是京剧唱念中保留古音的“上口字”和“尖音字”，都是鄂、皖、苏江淮话中的“方音字”。至于现代北京话“女国音”将声母为 tɕ、tɕʻ、ɕ 的字，一律不知不觉地读为尖音 ts、tsʻ、s，还有将以 w- 开头的零声母音节的起首半元音 w- 读为 v-，可能是受京剧音韵潜移默化的结果。总之，明清通行的“中州韵”并非是近代河南中州语音，而是沿袭了昆曲“中州韵”传统、以江淮皖音和江汉鄂音官话唱白的“戏曲音韵术语”。

第三节　现代国音的确定与北京话的形成

一、南音、北音的文化背景

持有从清代中期开始南京话标准音地位由北京话所取代这一观点者，往往引用禧恩为其弟裕恩《音韵逢源》（道光二十年，1840）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为证：

> 惜其不列入声，未免缺然。问之，则曰：五方之音，清浊高下各有不同，当以京师为正。

禧恩（一定会入声）认为不列入声“未免缺然”，裕恩回答“当以京师为正”。一个“当”字，恰恰反映了当时不“以京师为正”。如果北京音已经取代南京标准音的地位，就不会产生这一议论 。因此，“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北京语音才上升到汉语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①] 的说法不能成立。但是，也正是因为存在议论又表明了清代后期对于传统标准音有不同看法，这一南京传统官话音和北京新兴京师音的冲突，正发生在满人换用汉语的嘉庆（1796—1820）以降“通用汉语”的第五阶段以后，其语言文化背景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大批满人已经完全换用了汉语。

由于京畿这一语言文化的巨大变迁，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南话”和“北话”或“南音”和“北音”之说。清人高敬亭《正音撮要》（1834 年刻本）：“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又“既为官话，何以有南

① 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 年第 1 期。

北之称？盖话虽通晓，其中音、声、韵仍有互异，同者十之五六，不同者十之三四。”对于当时运用官话的情况，《撮要》描写得非常生动：“余尝过江南、浙江、河南、两湖地方，一处处方言、土语不同，就是他们邻府、邻县的人也不通晓。惟有经过水陆大码头，那些行户、买卖人都会说官话，但他望他的街坊的人说土话，我们又一句都懂不得了。后来进京住着就更奇怪了，街上逛的人多着呢，三五成群，唧唧呱呱打乡谈，不知他说什么。及至看他到店里买东西，他又满嘴官话。北话也有，南话也有，都说得清清楚楚的。”①

根据行文口气“望”（南方汉语介词）、“懂不得”（南方汉语顺行结构）等，推知高敬亭是南方方言区人（非江淮人）。他“进京”居住以后，街上的四方“乡谈”（其他方言区来京的人）听不懂，能够听得懂的是夹杂着各地方音底子的“南话”和“北话”。需要提醒的是，《正音撮要》的“南话”就是南方人学说的官话（可能也包括江淮人的官话），“北话”就是北方人学说的官话，可以说指江淮官话以外的“南腔官话”和“北调官话”的两种大变体。《正音撮要》的“北话”不是特指北京话，与沙彝尊《正音咀华》中的北京城话的“北音”不同。这一段道光年间的社会语言学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官话是行户、买卖人和市民的商用通语，特别是在“水陆大码头”或不同方言的人买卖之间通行。

沙彝尊《正音咀华》（1853 年刻本）说：“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李按：此江南具体指南京）建都，即以江南省话（李按：此江南省具体指苏皖，江南省话即指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李按：北京城是北

① 转引自黎新第：《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重庆师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方的一个城市，而不是北方。北京城话源于明代江南省话，因此与周围地区的北方话不很相同）为北音。"《正音咀华》的"南音"，日本岩田宪幸认为"指的应是下江官话"[1]。《李氏音鉴》(1810)也有"南音"和"北音"之说。根据杨亦鸣考证，北平子李汝珍（北京大兴人）的"南音"指的是"江宁淮阳徐海等处的下江官话和北方官话，而以'海'即海州板浦音为代表"。[2] 当时李汝珍的长兄在淮南盐场的东台做场大使，还到东台住过一段时间，《音鉴》中记有通泰方言的东台话。因此"南音"不是吴音，而是指江淮方言即官话音，"北音"就是指李汝珍的家乡北京音。

二、国音确定的历史背景

"南音"和"北音"之说既表明清代后期并不以京师所在的北京话为标准，同时也暗示了南京话的官话传统地位开始动摇。由于西欧各国通常以首都所在地之语音为标准，东邻日本已视"北京话"为新的标准语。明治九年（1876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确定将"南京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后又以"北京官话"为"北京语"的代表性称呼，有时也叫"清国官话"、"支那官话"等。单纯用"官话"指"北京官话"是日俄战争前后(1904)的事。虽然京音地位在清末有所上升，但仍然未得到中国士宦界的普遍认可。赵元任儿时随祖父、父亲居河北，学京音被其兄斥之为"干吗学老妈子说话的声音"，傅斯林家中亦"不屑说北京话"。[3]

20 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日人伊泽

① 《清代后期的官话音及其相关的问题（稿）》，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1991 年。

② 《〈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修二向他宣传“国语”的重大意义：“欲养成爱国之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察贵国今日之形势，统一语言尤为急急者”。回国以后，吴汝纶欲以《官话字母》作为统一语言的工具，“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①] 北方人王照等倡导：“语音必归画一，宜取京话”。南方人卢戆章等主张“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文话皆相通”，与日本唐话时代的“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观点完全一致。南北学者争执不下，遂有1913年“读音统一会”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音之“公决”。这也可以作为京音在清代不是标准音的明证，否则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如果现实中已经存在京音标准，还需要“读音统一会”干什么？

“公决”审音的“老国音”不伦不类，赵元任说：“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尽管京音被南方学者斥之为“京片子”或“胡语”，如胡以鲁直刺的“实际说所谓京片子者，殆惟直隶南满之一部，直隶方言间杂以满语者耳”，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一些南方学者逐步倾向于以京音为“国音”，“京音派”渐占上风：

1.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打破了中原文明原有的一元格局，造成了经济、文化南移而政治中心北上的二元新格局；

2.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700年之久，如果从辽金开始则约千年，为“京音”上升为新的标准音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3. 历史上的北京一直是华夷杂处，北方汉语阿尔泰化的结果致使北京音系比南方音系简单得多；

---

①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4. 明清以后，从东北、华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都通行大北方话，北方话的通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5. 模仿西欧和东洋通例皆以首都语言为标准语，而适逢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南京已成为新的“故都”。

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修改老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又经过近几十年来的推广“国语/普通话”运动，北京语音才最终取得社会公认之国音地位。20世纪50年代，可能是为了与国民政府的旧称“国语”划清界限，也可能是为了标榜大众化，决定采取“普通话”这一术语。然考其来源，“普通话”并不普通，也是舶来品。20世纪初，当时的日本很多学校设立了“普通语研究会”，“所谓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普通话”这一借形词，明显与吴汝纶访日回国以后考虑推广“国语”有关。如果为了与国民政府的旧称“国X”划清界限，总不能够把“国旗”叫“普通旗”、“国歌”叫“普通歌”。“国家法定的共同语”就应当叫“国语”，“普通话”这一来自日本借形词的术语实在不伦不类。

三、近古北京话的形成

然而，并不能因为20世纪20年代确定了北京音为国音，就可以推定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也是北京音。虽然从周初分封燕国，华夏语始落脚北地，但历史上的幽燕地区一直是北方民族南进北退之要冲，语言运动十分频繁。待到五代石敬塘(946)把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被称为“南京”的北京进一步成为华夷杂处的大都会。唐宋以前的幽燕方言暂不详论，辽金以来的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语言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907—1278)契丹辽和女真金的相继兴起。金灭辽，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契丹人就同化为汉人。北宋末年汴梁陷落，徽

钦二帝被掳。金人在北归的同时,带走了大量的中原匠人、艺人和居民。金人统治期间,与汉人杂处的女真居民渐渐同化为汉人。这种辽金居民换用汉语的情况持续了近四百年之久,形成近古北京话的雏型——辽金汉儿言语。

第二阶段(1279—1367)是蒙古元的统治。在汉语和蒙古语接触渗透和蒙古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北京话进一步阿尔泰化。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百年之久,形成了近古北京话的中下层——蒙元时期的汉儿言语。

第三阶段(1368—1643)是朱棣率淮兵扫北,又永乐北迁、定都北平。南京在洪武末年人口约五十万,军队不计约有三十三万居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成祖北迁,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减户口过半"。仅此次人口迁徙,已约有十三万五千人集中移居北京。明初从南京移入北京的人口,无疑成为明代北京人口结构的主要成分。俞敏说:"要说现代的北京人是元朝大都人的后代,还不如说他们是明朝跟着燕王'扫北'来的人的后代合适"。[①] 大量江淮人迁至京津,致使京津语言成为江淮官话在北方方言区中的一个"方言岛"。一方面官场文人、江淮民匠通行官话,一方面北京原居民通行土语,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三百年之久,交融而成近古北京话的中上层主体。

第四阶段(1644—1911)是清朝的统治。在满人换用汉语和满语对汉语的渗透过程中,北京话又出现新的阿尔泰化。这种情况持续了260年之久,形成近古北京话的表面附层。

美籍华人薛凤生在《什么是"标准国语"?》[②] 中引用鲁国尧和

---

① 《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的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

② 第二届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台北1988年。

杨福绵的明代标准音南京话的观点，提出现代标准语（李按：普通话）来自南京；又在《方音重叠与普通话文白异读之形成》[1] 中，通过北京话的文白异读论证了北京话与南京话的渊源及其演变关系。

北京话存在文白异读的现象证明，在明代甚至很晚的近代，北京话并未被读书人以及上层人士看作标准音。元代统治者不关心中国的语言传统，宣布蒙古语为"国语"，以前的标准语就难以维持。在蒙古人被赶走以后，中原官话并没有重获标准语的地位。明朝开国皇帝及其大部分官吏出身于南京地区，讲的自然是南部官话，又选择南京作为新王朝的首都，因而南部官话就成了新的标准语，并编撰《洪武正韵》作为官定标准。尽管在30年以后迁都北京，但南部官话仍然是官方认可的标准。明人吕坤《交泰韵》："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就是以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欧洲传教士学习汉语，要找讲南京话的人做老师，当时朝鲜编写的汉语教材和参考书也特别重视《洪武正韵》，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吸收了一部分北方官话（李按：所谓"俗音"）的特点。

南方官话移植到北京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北京的发音方法进行调整。这种经过移植和修订的南部官话作为标准音，深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李按：士大夫阶层中南方人占有极大比例），因而牢固地确立了它在明代的地位，甚至满人入关以后也无法改变。满人入关以前讲的已经是北部官话（李按：已经是受明代北京话影响的北部"官话"），但入关以后由于清政府特别强调经典教育和科举考试，因而未能改变或未曾考虑改革原来通行的标准音（李按：

① 耿振生译：《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清朝一直在维持本族满语传统的理念和日益采用汉语的实践之间徘徊，根本不可能撇开既有的汉语传统标准语而考虑重选标准语，因为这是由汉文化传统自然决定的结果）。这种从南方官话传来的读音被认为是高雅斯文的（李按：保留入声传统），以致迅速地取代或压倒了北部官话的读音，而当地“旗人”说的话直到晚近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①] 因此，特别是在梗曾摄和通江宕摄的人声字中形成了文白异读，保留了南方官话的特征。

近古北京话形成的四个阶段也就是近古北京地区阿尔泰语“中原化”或汉语“阿尔泰化”的历史进程。在第一、第二阶段，由于这一地区处于北方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北京话变化迅速，极不稳定。只有到了第三阶段，由于是汉人政权，北京话接受江淮方言的巨大影响，才趋于稳定。至于第四阶段，满语对北京话的影响主要在表层。因此，北京官话溯源亦为江淮官话在北方的一支混血“后裔”。现代北京话就是以宋元北迁中原正音为基层、以明代北迁江淮官话为主体，又受到近古时期的阿尔泰语影响的一种方言。

除了南北朝对立以外，唐宋以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的格局为河洛中心一体化。最近1000年来，北方阿尔泰游牧诸民族日益强大，相继向外扩展而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旋风。辽金崛起北方，建都北京，蒙古统一中国，以北京为大都，致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中心趋向于二元分裂格局：一方面政治中心北上幽燕，另一方面经济、文化、语言中心南移江淮。朱明建都南京，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中心一体化格局，随着永乐北迁又出现二元分裂。至满清帝国，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二元分裂格局。

① 董同和：《国语和北平话》，丁邦新编：《董同和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台北1974年。

从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在北中国阿尔泰化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促使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汉语迅速变化并日趋统一。只有江淮语保留了相对纯正的两宋中原正音,并且形成了明清官话文化传统。对近千年历史走向未加深思的一些学者,仅凭中国政治中心近古长期在北京,就贸然作出"元明清以来北京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臆断,以致又衍生出混淆是非的官话南北两系论。

由此可见,"官话"原为南京话专称。20世纪以前的明清时期,"官话"即南京话。尽管存在与南京音不同、夹杂别地口音的"蓝青官话"(陶宗仪《辍耕录·写像秘诀》曰"彩绘法:蓝青,用三青入高三绿合",引申为杂色不纯),但是没有"南方官话"与"北方官话"的术语。20世纪初才相继出现与南京"官话"相区别的"北京语"—"清国官话"—"支那官话"—"北京官话"的名称。随着限定语"北京"等的省略,"北京话"才得以称为"官话"。至于以区域名词为限定的"华北官话"、"东北官话"、"西北官话"和"西南官话"等,则是晚近语言学家为方言研究而制定的派生术语。20世纪的国语运动和方言研究,一方而将"官话"的词义替换,转移为"北京话"的专称;一方面将"官话"的词义扩大,演变成"北方话"的通称。在"官话"冠以"下江"或"江淮"的同时,"官话"的本义最终湮没不彰。而对这种喧宾夺主、张冠李戴的结果,不得不为"官话"正本清源。尽管清代中后期或有"南音"和"北音"之分,甚至高敬亭已经具有"既为官话,何以有南北之称?"的设疑和"北话"与"南话"的称呼,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的名目。近代汉语的研究,仅仅依据文献语料而不了解活的江淮方言,试图正确而深入地阐释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史是难以实现的。

第十一章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尽管从东西方古老的传统经济方式的差别，就可以窥见东西方语言的关系类型的迥然不同，但是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并且依据在世界语言中极其少见的典型分化型印欧语言事实建立了“谱系树模式”，因此当西方学者和那些接受了西方“语系说”熏陶的东方学者以“印欧语眼光”审视远东语言事实的时候，谱系树模式与远东语事实的龃龉必然导致东亚—南洋这一广袤区域的语言系属关系的众说纷纭。[①]

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语网和语区，植根于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的龃龉所导致的语言系属关系观点的纷纭繁杂，有希望迎刃而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价值就在于力图为未来的汉语语言史、中国语言史和东亚—南洋诸语言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思

① 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路或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东亚—南洋语言关系假说的歧异

一、汉藏—印欧语言同源说

1871 和 1872 年，欧洲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英国艾约瑟（Jeseph Hdkins）在《中国在语言学中的位置：揭开欧洲和东亚语言具有共同来源的一个尝试》（*Chain'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中和德国施列格尔（Gustaaf Schilegel）在《汉语—雅利安语》（*Sinico - Aryaca*）中相继提出这一假说。1963 年和 1965 年，美国谢飞（Robert Shafer）在《欧亚语》（*Eurasial*）和《欧亚语言学的超级语系》（*The Eurasial Linguistic Superfamily*）中又发扬这一同源说。1995 年，加拿大蒲立本（E.G.Pulleyblank）在《汉语的史后和史前的联系》（*The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y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中从语音结构和同源词两方面试图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发生学关系。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的两个元音的系统，与原始印欧语元音系统具有对应关系。在辅音方面也存在一些对应规律，如上古汉语 * ŋ - 对应原始印欧语的 * g - 。蒲立本考证的汉藏—印欧同源词有 24 个，即：於（介词）、何、合、目、犬、牛、往、岁、国、偷、叶、一、幺（幼）、要（约）、父、母、考（祖父）、不（弗）、海、西（栖）、作（行）、名、夜、雁。例如：

汉字	上古汉语	缅文	原始印欧语	希腊文	拉丁文	英文
5. 犬	* khwen	khwe	* kjwon	kuon		hound
6. 牛	* ŋuw	nwa	* gwo	bous	bos	cow
11. 叶	* aljap		* leup		liber	leaf
13. 幺	* ʔjɔw		* jeu - n -		juvenis	young

蒲立本并且认为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分化在6000年以前，即在利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存在之前。

在这之前，德国张聪东在《古汉语复辅音在印欧语词汇的印证》[①] 中，从汉语谐声字和印欧语对应词根的音义相通的"同源系列"入手，试图揭示汉语和印欧语的相似性。例如：

	汉字	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	印欧词根	含义
1.	liu 流	* liəo	* zleu	* sreu	to flow, flow
	shu 疏	* seio	* slio	* sreu	to make flow
	shu 梳	* seio	* slio	* (k)sneu	comb, to comb
2.	xiao 小	* siou	* smo:g	* smak	small
	shao 少	* ɕjiou	* smo:g	* smak	small
	miao 渺	* miou	* zmo:g	* smak	small
	miao 秒	* miou	* zmo:g	* smak	small
3.	xiao 肖	* sio	* smo:l	* s(e)mal	similar
	shao 稍	* seau	* smo:l	* smal	small
	shao 梢	* seau	* smo:l	* smal	small

如果这些同源系列对应可靠，如果这些同源系列对应并非来自语言接触，那么东亚语和印欧语就具有非常古老的同源关系，在这背后可能隐含着意义更为深远的人类语言起源单源论的证据。

二、汉藏语系说和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同源说

1881年和1887年，格鲁布(W. Grube)和拉古勃里(T. de. Lacouperie)先后在《汉语的历史地位》和《汉文创制前的汉语》中讨论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1911年，挪威科诺(Sten Kenow)在《印度语

① 《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

言调查》中最早提出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同时认为藏缅语的词序为 SOV，汉语和台语的词序为 SVO。同时，在实际上对藏缅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法国马伯乐（Henry Maspero）提出汉藏语系分为东支汉—台语族和西支藏—缅语族的设想。这以后，施米特（W. Schmidt, 1914）、特罗姆贝提（A. Trombetti, 1923）和普鲁伊路斯基（J. Przyluski, 1924）都提到汉藏语系或汉藏语（印支语 Sinitic Languages）的概念。

1934 年，赵元任在《中国分省新图·语言区域图》中粗略分出与阿尔泰语类不同的，包括汉语系、太（台）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的汉藏语系。1937 年，李方桂以当时的语言调查和语言理论为基础，在《中国年鉴·中国的语言和方言》[①] 中确定了包括汉语族、侗台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汉藏语系，认为汉语和侗台语同源的依据主要是语言结构的单音节和声调。此后，张琨（1947）又证明了苗瑶语声调和汉语的一致性（1970 年，美国马提索夫提出"声调发生"的概念，认为声调的发生和语言发生学无关），邢公畹（1948）和俞敏（1949）又分别从语法角度论证了汉语和藏语的同源（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日本河野和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语法系统差别太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从此李氏四分系统成为中国语言学界长期认同的传统分类法。虽然《中国语言学报》（1972）重新刊登了李方桂的旧文，并且加了"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编者按，但是李方桂在《台语》（1974）中却开始承认台语和汉藏语系的关系从未明确建立。

陈保亚认为，与美国学者的同源标准不同，中国学者的"汉藏

① 中文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 年第 1 期。

语系说"研究方法采取的是同构标准。[1]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是"传统疆域标准"——即宁可把境外语言纳入汉藏语系，而绝不可以将境内貌似汉藏语的语言认定为非汉藏语系，除非这种语言和汉藏语言的差距实在太明显。

三、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

与中国学者的"传统疆域决定论"不同，美国学者采取的是"语言文化决定论"。从1935年，美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的主持下，开始执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计划。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K.Benedict)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提出台语(相当于侗台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加岱语(包括黎语、拉嘉语、仡佬语等)与印尼语才具有真正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不是与汉藏语具有这种关系，台语和加岱语只不过在汉语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加岱语("加"ka是拉嘉语、仡佬语"人"的前缀，"岱"dai是黎族自称)是单音节、孤立型，和台语一样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但是白保罗认为：声调和词音单音节结构不能作为语言亲属分类的依据，而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语是借词。

2. 加岱语和台语、印尼语一样，是NA、VO的顺行结构。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是逆行结构OV，而卡伦语和汉语的VO顺行结构是受澳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影响的结果。

3. 台语—加岱语—印尼语构成一个单一的语言连续体。与印尼语是多音节不同，加岱语和台语是单音节。白保罗认为：这是

① 《百年来汉藏语系谱系研究的理论进展》，《语言学论丛》第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加岱语和台语从汉语中借来声调后，音节脱落的结果。尽管加岱语更接近台语而不是印尼语，但是加岱语是这三位一体的过渡成员。

4. 白保罗提出这一设想：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祖先是原始澳泰人，也许历史上的澳泰人文化技术比北方汉人发达。台语词汇之所以与印尼语相差甚远，而与汉语词汇近似，是因为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后来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

5. 加岱人是中国中南部的土著居民。仡佬人的老家在贵州，由于苗族的进入而迫使他们南迁。白保罗进一步推断，长江流域以南是玻里尼西亚（南岛）人或原始澳泰人的居住地，他们从中国南部海岸经过海南岛迁徙，北支迁移到台湾，东支迁移到菲律宾，南支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印尼语曾经分布在南大陆的底层，可以从加岱语中看出。

6. 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原型，就是 W. 施米特《世界的语系和语言圈》所划出的原始南方超级语系（Austric Superstock）的北支，与南支孟高棉语的分裂一定发生在华南—印度支那地区，随后这两支分别在南北定居下来。1937 年，德国史图博（H. Stubl）在《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中指出印尼人和密克罗尼西亚（南岛）人的许多相同之点。黎族原有的印尼文化特征早已为大陆上汉化的加岱族所忘却，台—加岱—印尼共同的人种图像早已磨损得无从修复。

7. 在孟高棉语为主体的地域以南的马来语今天异乎寻常的位置，只能解释为它是从印尼诸岛由海路迁徙而来的。在北的台语—加岱语、在东的占语和在南的马来语，于孟高棉语的周边呈现出弧形分布状态。

8. 苗瑶语可能是原始南方语的一个分支。与白保罗共同完

成《汉藏语言学》巨著手稿的谢飞，早在1938年就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发现台语和汉藏语系语言之间缺少语音和语义上的紧密关系，认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1955年，尽管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中仍然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但认为汉语与藏语的关系比与台语的关系更接近。即使台语与汉藏语言存在关系，那种亲属关系也很遥远。同时，谢飞的汉藏语系却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外。

1948年，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在《台语的语音和词汇》中认为，台语和汉语接近的常用词是数词、军事术语和工艺术语等一些容易借入的文化词汇，与之相反，人体部位名称和农业词汇都和相应的汉语很少具有共同之处。通过基本词汇比较，欧德里古尔也得出了马来—玻里尼西亚诸语言发源于亚洲的结论。1970年，前苏联伊万诺娃（E. V. Ivanova）在《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1] 中认为：台语民族的祖先属于包括现代印尼和孟高棉诸民族祖先在内的那一原始人种集团。在起源上大概与汉藏诸民族没有关系，但是从太古时代就开始接触了，并且这些接触在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中留下了若干痕迹。赞同这一假说的还有易嘉乐（S. Egerod）、福雷斯特（R. Forrest）、包拟古（B. Nicholas）和马提索夫（J. Matisoff）等。

与白保罗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得到国际语言学家的普遍赞同相反，绝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一时还难以接受侗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的结论，依然固守传统四分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语言学家面对语言事实，从语系研究的“传统疆域决定论”中突围出来。

① 许浩福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印行。

1957年，闻宥在《台语和汉语》中，通过台语和汉语基本词汇的比较，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1983年，罗美珍在《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中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古代台语民族即百越族，其语言原来是多音节型语言。《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记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如怜职（爱）、煦暇（热）、短罢（短）、恒慨（广大）。作为百越的一支，南迁以后的印尼人保留了古老的黏着型和多音节。留居大陆的今台语先民则放弃了百越语或原始马来语，换用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独立发展成一支语言的台语残留着原始马来语的底层。1988年以后，倪大白在《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和《汉藏语系语言的亲属问题》等文中，把侗台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资料、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同出一源，但侗台语的语言类型已经转变，由此认为侗台语的系属应称之为"马来—支那语"（Malay-Sino）。罗和倪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换而言之，根据我所提出的混合语理论，侗台语是一种历史混合语（混合的年代从公元3世纪以后开始），侗台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混入来源语"是汉藏语。

1964年，前苏雅洪托夫（S.E.Yakhotov）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中认为，单一的加岱语支是不存在的，加岱诸语言互相接近的程度和台语支诸语言一样，而不是更接近些。无论是台语支语言，还是加岱语支语言，只能在斯瓦迪斯词表中找到10～15个与现代印尼语一致的词语，这表明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之

间的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雅洪托夫的语言年代学研究结果和白保罗的分类法一样,都认为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在这里必须指出,语言年代学方法以语言分化模式为前提,排除了诸语言之间的接触或混合,只是一种封闭性语言的匀时发展的比较方式。因此,必须折算或扣除接触或混合所引起的加剧的词衰变量,以弥补匀时语言年代学方法之严重不足。如果考虑到汉语对台语的巨大影响,就不能仅仅依据台语与印尼语一致性词语的 10~15 个来计算它们的分化年代,而应当进行年代矫正,因为语言的变化毕竟不是自然物质的变化。

四、澳泰语系说

1. 在《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中,白保罗以"新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澳泰语系说(1975 年出版论文集《澳泰:语言和文化》)。1943 年写成的《汉藏语言概论》[1]经马提索夫编注后于 1972 年出版,公布了他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去的汉藏语系分类法。

原始南方语(Proto - Austric)						原始汉藏语系		
北支:澳泰语系				南支:孟高棉语系		汉语	藏缅语	卡伦语
台语	加岱	印尼	苗瑶 ?	孟高棉	越南			

2. 雅洪托夫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提出与白保罗相似的澳斯特利语系说。

① 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年印行。

澳斯特利语系(Austric)						原始汉藏语系						
印尼	侗台			孟高棉—苗瑶		汉语	藏缅					喜马拉雅
	黎语	侗水	台语	孟高棉	苗瑶		藏语	景颇	缅语	彝语	卡伦	

雅洪托夫认为:统计证明,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而与侗台语共同的词却很少。苗瑶语也属于南方语系,而且在这一语系中比其他所有语言更接近于孟高棉语族,这可能是因为苗瑶语脱离孟高棉语族的时间比南方语系分化为三个语族的时间要晚。

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南岛语系"这一术语是 W. 施米特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它包括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诸语族的语言。关于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关系 20 世纪初就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1916 年和 1922 年孔好古(A. Conrady)发表了《澳斯特利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间值得注意的关系》和《澳斯特利语—印度支那语新的对应》。W. 施米特用"共同底层"建立起包括这些语言的印支(汉藏语)—南方(南岛语和南亚语)超级语系。1942 年,吴克德(K. Wulff)发表《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的关系》。这些研究,通过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词汇对比表,证明在澳斯特利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与藏缅语相比,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0 年,法国沙加尔详加论证"汉语南岛语同源说"。1. 依据白保罗的台语单音节是音节脱落结果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单音节

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末一音节对应。2. 汉语的声调和南岛语的辅音韵尾对应:原始南岛语的 - s 韵尾和上古汉语去声 - agh、- idh、- adh 对应;原始南岛语的 - p、- t、- k 和上古汉语入声 - p、- t、- k 对应。3. 汉语辅音聚合关系和南岛语的对应:上古汉语的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者的对立,相当于原始南岛语的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4. 汉语介音与南岛语中缀的相近:上古汉语的介音 - j - 和 - r - 是具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和原始南岛语中缀 - in - 、- ar - 相近。5. 已经发现的汉语和南岛语关系词有 222 个,其中 17 个见于斯瓦迪斯词表。

谢飞(1955)曾提出一个设问:汉藏语言和阿塔帕斯干(Athapqskan)语言(依据下文"太平洋语系",推知此指南岛语言)配比的词根,与汉藏语言和南亚语言配比的词根完全不同,这是否表明汉藏语系实际上是两种更原始的语系——太平洋语系和南亚语系的某种混合物呢?伊万诺娃(1970)认为:把汉藏语系、孟高棉语系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联合成一个太平洋语系的理论,现在既没有可能创立,但也不必拒绝。在沙加尔的汉语南岛同源论提出以后,邢公畹(1991)和郑张尚芳表示支持,进一步提出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华澳语系(或汉藏泰澳语系)假说。

六、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同源说(汉—蒙语系说)

1853 年,霍奇森(B. H. Hodgson)在《论汉藏语和蒙古语的亲属关系》中,对汉藏语和高加索语亲属关系的论证做过尝试。1939 年,波达(K. Bouda)的《苏美尔语与巴斯克语、西高加索语以及藏语的关系》一文中继续探讨了这一问题。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存在一个"汉—蒙语系"。1995 年,俄罗斯学者斯大罗丝汀(Sergai

Starostin)在《上古汉语词表:一次历史的透视》中,通过35个基本词汇的比较,得出汉语和藏缅语24个同源、和北高加索语13个同源、和南岛语4个同源的结果,以此推断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与北高加索和叶尼塞语。南岛语和台语的关系相当于汉藏语和北高加索语的关系,因此汉语南岛语同源说必须放弃。

七、苗瑶语系属的歧异

1. 孟高棉语族说。1909年,英国戴维斯(H.R.Dawies)在《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中提出此说。另外,他还认为孟高棉语(不包括蒙达语言的南亚语)、掸(台)语、汉语和藏缅语有共同的起源。

2. 澳泰语系说。白保罗(1942)认为苗瑶语属于澳泰语系,但有所存疑。与之相似的是雅洪托夫(1964)认为苗瑶语与孟高棉语族关系密切,属于澳斯特利语系。

3. 汉藏语系说。王辅世在《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1986年)中,批评了戴维斯和白保罗的研究缺陷,从同源词和类型学的相似性确定苗瑶语属于汉藏语系,但对苗瑶语属于什么语族或是否独立为一个语族却没有明确。

八、白语系属的歧异

1. 孟高棉语族说。戴维斯在《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中通过对100个词的分析,得出汉语语源42个、藏缅语源33个、孟高棉语源23个、掸语语源2个。依据现代白语区毗邻没有孟高棉语,推定这23个必定是白语的原语词汇。

2. 混合语说。1916年,李澡在《大理县志稿·方言》中认为,白语是固有蛮音从宋元以后与彝语混合,又受到明初吴越一带迁来

的汉族居民语言影响的混合语。40 年代，罗常培的《语言学在云南》也主张白语为“夷汉混合语”说。徐嘉瑞在《民家语新诂》中认为白语是汉语和白蛮语的混合，当归入汉藏语系，别列语族。徐将“民家”考释为“名家”，其实“民”是汉藏自称，其含义是“人”。

3. 藏缅语族说。1940 年，闻宥的《民家语中同义词之研究》批评了戴维斯的白语属孟高棉语族说，认为白语中最古的成分是藏缅语言，至于孟高棉语的成分简直没有。李方桂早年的《语言和方言》(1937)曾认为白语属于彝语支，但晚年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80)却认为白语在词汇和语序上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系属值得怀疑。周耀文的《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1978)认为白语属于藏缅语族的一个单一语支。赵衍荪在《白语的系属问题》(1982)中同意白语属于彝语支。

4. 上古汉语方言说。30 年代，白族学者赵弢父《白文考》认为白语中保留大量周秦汉语“雅言”词汇，属于在汉代以前就形成的汉语方言，后来受到与之杂处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成为白语。张海秋的《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认为，白族的“言语声音，实能保存三代以来之古语古音”。①

5. 汉白语族说。白保罗(1942)的汉藏语分类把白语归入汉语族。郑张尚芳在《汉语和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1995)中认为白语属于汉白语族，在《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1999)中详细论证了“汉白语族”。

吴安其不同意“汉白语族”说，在《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2000)中认为，白语在语音、语法和核心词的构成上与彝缅语

① 以上内容详见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比较接近，词汇上与汉语的相近是借用造成的，从语音和语序的历史看，白语应是彝缅语的一支。实行火葬（古氐羌人习俗）的白族这一藏缅支系到达滇西北可能是战国至汉，其习俗不同于分布在洱海的"昆明人"（较早从四川进入云南的古藏缅人）和滇池一带的"滇人"。然而，既然白族远祖是古氐羌人的一支，那么与来源复杂且与藏语同源的汉语之间的同源关系就可能存在。问题是要使"汉白语族"成立，就必须证明白语是什么时期从原始华夏语中分化出来的。

九、阿尔泰假说和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假说问题可以说就是阿尔泰语系假说的问题。迄今为止，围绕阿尔泰假说问题仍然有许多争议。主要焦点就在于是否承认阿尔泰语系的存在，或者说阿尔泰语诸语言之间的是亲属还是借贷关系。第一个注意到突厥、蒙古、通古斯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是瑞典冯·斯特来林贝尔格（Von Stralingberg），在 18 世纪上半叶提出"塔塔尔诸语言"假说，分为六个语群。一个世纪以后，拉斯克（R.Rask）重新命名为"斯泰基诸语言"，并将其中包括的语言做了调整。由于阿尔泰诸语言是黏着结构，因而这一特征一度成为判断是否是与之相关的语言的主要原则。马克斯·缪勒（F.M.Müler）将暹罗语言、藏语、拉德维达、马来语也扩大进来，称之为"都兰诸语言"。芬兰卡斯特林（M.A.Kastling）认为语言同源的本质是词素的一致性，只有乌戈尔—芬兰语、萨莫耶德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语才构成一个称之为阿尔泰语的相关语群，现通常分为乌拉尔语群和阿尔泰语群。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真正创始人是芬兰的兰铁司（G.J.Ramstedt），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确立了原始朝鲜语、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通古

斯—满语的阿尔泰语系四种方言说，并且建立了许多语音对应关系。

不接受阿尔泰假说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学者并不认为阿尔泰假说是错误的，但认为所提出的证据尚不充分；一类学者认为阿尔泰假说不能够成立，把阿尔泰语中的这些共同成分解释为语言接触的结果。虽然阿尔泰假说的理论尚不完善，但是迄今为止，反对者并没有提出使语言学家能够接受的足以否定这一假说的充分证据。

之所以有些学者不接受阿尔泰假说，可能是谱系树模式或"语系"说的禁锢。以严格的印欧语系眼光来看世界语言，符合"语系"的除了印欧语系，可能就是闪含语系。狭隘的"语系"说禁锢了欧洲学者的眼界，认识不到——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方式决定了语言的发展方式。在早期语网的基础上逐步分化，又随着游牧经济相互借贷词语的阿尔泰诸语言，确实不可能也无须具有印欧语系那么严格的词语对应规则和明显的分化层次。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语言，全面的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应当是衡量这类语言的亲缘关系的标准之一。依据元音和谐规则、黏着结构类型和部分基本词语对应，可以认为阿尔泰诸语言是以原始语网和相互借贷词语为基础的亲属语言。只是突厥语言是否仅源于阿尔泰语值得进一步深究，因为10世纪以前居住在西域一带的土著是雅利安人。

十、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1990年，李葆嘉提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1996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这一语言文化圈包括澳台语（日本语、南岛语、侗台语）、南亚语（南亚语、越南语、苗瑶语）、汉语（南方汉语、北方汉语）、藏缅语（彝语、藏语、缅语、景

颇语、羌语）和阿尔泰语（朝鲜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1999年，又在《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中提出涵盖历史比较语言学谱系树模式的“语言关系类型学”，即世界语言关系类型的“语网、语珠、语区、语系”四分法。

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语网和语区，以这一假说为指导，在语言描写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参证语言年代学和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遗传学等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可以探索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鸟瞰东亚—南洋语言的演变大势，阐释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同源异流现象，纵横中国境内语言的古往今来，溯源沿流华夏汉语演变史。

第二节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史前渊源

根据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成就，中国境内的旧石器遗存既不局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也并非仅在黄河流域，反之，由于多种新石器文化的冲突交会才形成了后来居上的黄河中原文化。虽然考古学界最近宣布，1997年在河北南庄头出土的陶片、石器、加工角器以及谷物这些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东亚制陶史的开端提前了3000年，但是仍然没有把握断言这就是东亚—南洋新石器文化的原始母体，同期的考古文化就有江南的溧水神仙洞遗存。东亚—南洋语言新石器文化母体有可能存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个源头。

一、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若干预设

在以下若干预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索东亚—南洋语言语言的史前渊源，以进一步阐述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1. 夏娃理论和蒙古利亚人种的形成

依据生物分子学的研究和考古文化的印证，现代人或新人起源于距今15万年～12万年之际的东非大草原。英国科学家依据线粒体DNA特征研究的分组结果，推测现代欧洲人的99%是由大约在4.5万年之际先后来到欧洲的七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按线粒体的DNA特征划分，目前的非洲人可以分为三个“家族”，其中一个“家族”与欧洲的这七位女性祖先血缘关系密切。依据欧罗巴人种的“白化”发生于距今3万年之际，从而推定蒙古利亚人种也形成于距今3万年之际。因此东亚大陆的原始居民，应是在这之前即约距今4万年～5万年之际从中东地区迁来的。

2. 采集—狩猎经济型的连琐性语网

俄国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С.П.Толстов)曾经提出“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说”，某些地区不久以前还保留这一远古时代语言的分布状况的痕迹。在澳大利亚有几百种土著语言之间很难找出明确的界限，因而形成了一个原始语言连锁扩散网络。以此为基础，我提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语网”说。由于人类社会新旧石器时代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和由于生态环境所导致的新石器时代各地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致使世界语言分别出现游牧经济型语系、农耕经济型语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和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等四种语言关系类型及其语言演变模式。在东亚大陆南部、东南亚以及南岛这一广袤区域，直至公元前后及其以后，一些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些地区依然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因此，与印欧语言的语系分布状态不同，语网关系成为这一区域的语言分布特征。

欧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状况。法国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认为：在远东“……显而易见，存在着从藏语到缅甸

语，再到怒江语群诸语言，其后到孟高棉语，最后到大洋洲诸语言的逐步过渡。这些语群中的每一语群都不可能界定得清晰，每一语群都有其特点。其中一些特点则使它与前一语群衔接，而另一些特点则使它与后一个语群衔接……植物学家很熟悉这种'连锁血缘'，也许只有这种类型的分类法才是我们现在构拟的这一范围内的一些大语群的惟一合适的分类方法。"[①] 面对东亚南方区域语言的复杂性，可以设想原始南方语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可能是一个覆盖广袤区域的原始语网，这一语网可以分为三个语链：(1)地贯长江中游流域—江淮平原—渤海环岛（山东、辽东、朝鲜）—日本—琉球的大陆江海语链；(2)地贯云贵高原—东南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印尼群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南太平洋群岛的南部海岛语链；(3)地贯元江·红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马六甲海峡—恒河流域的南亚河海语链。

3. 语言亲缘关系的历史性

正如前苏联安德罗诺夫所说："从语言本质的自然主义理解，留下的所谓一个语系内部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不可能永久性的和最初性的，而是带有历史性的——它是逐渐形成的，同样也能逐渐衰弱以致消失。"[②] 语言亲属关系的历史性观点揭示了语言关系的动态性本质，从而指明了语言亲属关系的认定只能以某一时期内所存在的关系为依据。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把这一时间的上限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即距今一万年前，但是实际难以统一，因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有先后，可以借助推测早期语言同源或接触的新石器考古文化遗存的分布并不平衡。依据东亚大陆

① 转引自［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② 转引自［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的考古文化系统，也许只能够追溯到距今7000年。

马伯乐认为："古代汉族文化与泰族、彝族、苗族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点和显著的相似现象，以致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所有这些民族在史前时期就存在共同文化的想法。有过这样的文化共同是确定无疑的，它可以用汉、藏、彝、暹罗等语言中的大量亲缘关系词得到证实，比方说在所有这些语言中都有共同的数词。虽然不能根据这些相似形式就遽然断言，这些语言一定是亲属语言，但是这些词语可以表明：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彼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许它们不存在语言的亲属关系，可是明显地具有文化的亲属关系。"① 既然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彼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如果限定在某一阶段，它们之间就具有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意未尽在"亲缘关系"的长河中具有两种不同的亲缘：一种是可以追溯的"同源亲缘"，一种是本非同源的"接触亲缘"。反之，也有两种"非亲缘关系"：一种是本非亲缘的"真性异源"，一种是亲缘泯灭的"假性异源"。

4. 语言亲缘标准的综合性

一方面，对于东亚地区语言类型的结构相似性，一些欧洲学者强调不是起源的共同性，而是接触渗透的趋同性。奥德里古尔(1961)认为："在结构中的相似性足以论证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时，认为有可能把东南亚语言地图的复杂性简化为二分法，使汉藏诸语言与南亚诸语言相对立……在不怎么久以前，吴克德曾经试图使这些语言的关系互相靠拢。现在人们既然强调语言邻接的意义及其最终的表现——双重语言制，就不那么倾向于否定结构借用的可能性了，用二分法或单一性简化语言图谱是不能够令

① 转引自[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人信服的……我们觉得以这一假设(李按:接触借用)作为研究根据是比较科学的,按照这一假设——除明显的现象以外——东南亚各种不同的语言区域在发生学上彼此之间没有联系。"① 此外,张琨(1969)、马提索夫(1973)和白保罗(1976)等人,也同样认为类型学(特别是声调)标准不足以证明同源关系。

也许,因为连汉语的声调(对词音结构单音节化的补偿)也是后起的,因此声调和词音结构单音节性确实不能够作为语言同源的证据。尽管受汉语的影响,侗台语和苗瑶语等语言的结构类型发生了转换,但是仍然不能以语言接触中的"结构借用的可能性"否认发生学上的语言结构相似性。史前时期的语言亲缘关系和语言结构类型肯定具有一致性,否则就无法讨论语言的同源。这一亲缘关系和结构类型的一致性,至今在许多"语系"中还可以看到。所谓语言的同源,包括根词同源和结构同源两个方面。依据本维尼斯特"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按照类型相似组成语言集团的话,那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觉得类型的相似性似乎是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的一个证据"② 的观点,那么他另外提出的"语言结构类似不能成为语言同源证据"的观点,二者之间不免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后者不具备历史语言学理论的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像中国学者为维护李方桂的"汉藏语系说"所坚持的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同构标准),还是像外国学者坚持把基本词汇的对应作为惟一标准(同源标准),其实都难免无的放矢。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的各部分要素从来不具有什么固定的稳定性,问题在于接触的方式(借用—渗透—转型—换用—混合)和

① 转引自[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② 转引自[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深度(表层—底层;单层—多层)。虽然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可能出于长期影响,但基本词汇也并非不可能大量借用。依据语言的无界接触观,语言中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渗透和借贷,不但结构类型和音系格局可以借贷,就是核心词汇也可以借贷。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标榜的"语音对应规则",除了是语言同源的证据,也可能是语言趋同的结果。语言接触中最活跃的要素词语,其语音结构特征会对接触语言的个别音位乃至音系格局发生影响,其语义结构方式会对接触语言的语法范畴乃至结构类型发生影响。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语言的任何要素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丧失其"稳定性"。因此认定语言亲缘关系的标准应当是音系格局、结构类型、基本词汇以及文化特征的综合标准,而不应当采取各执一端的单一标准。

5. 同源词和借词的历时相对性

词语的相似性有两种可能:同源和借用。所谓"同源",应当包括新石器时期以来的语系分化和旧石器时代的语网延展两种情况中的同源。虽然连锁血缘的语网关系正是东亚—南洋某些语言区域至今仍然可见的基本特征,但是不可否认新石器时代强势文明的形成促使某些地区的连锁性语网向同化性语区方向演变。随着强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其语言文化的因子必然会向周边扩散,从而促使接触语言进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同化进程。由于东亚地区语网关系和文化扩散的交叉性,致使同源词和借词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最后不得不以"关系词"来掩饰"语词的对应性"。但是前代的借用可能成为后代的同源,二者只是不同历史层次上的关系词,因此相互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由于年代久远的早期借用和同源的界限趋于泯灭。当语言成分借贷到达一定程度,借贷双方也就成为亲属语言。最彻底全面的借用,就是语言的换用。较长历史时期的持续借用和较短历史时期的迅速换用,只是过程

长短的不同,其本质并无区别。因此无论是借用和换用,还是渗透和混合,最终都没有截然的界限。

6. 混合是语言深刻接触的自然结果

以往的中国语言学家都不谈语言混合,即使谈到语言融合,也只是所谓强迫同化,或斯大林主义式的胜利者的一方把失败者的一方的“吃掉”,而根本没有想到通过融合或混合会产生一种新的语言。在人类历史上,语言的混合是若干语言长期接触的必然结果。语言接触必然导致语言要素的渗透以致混合,而对于混合过程中的语言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稳定的要素。除非是完全封闭的社会,语言中具有或多或少的渗透混合成分是不可避免的。在渗透较弱和层次清楚的两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主流特征确定其归属关系。在混合深入和层次复杂的多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惟一明智的选择就是确定其为混合语,揭示其“基础来源语”和“混入来源语”。对于这种混合语是认定为新的语种,还是坚持是原来语言的演变,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学或文化学问题。语种的质的规定性,绝不等于语言的差异度,而是取决于语主的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两种差别迥然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一致认同可以确定为一种语言;而两种差别微殊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拒绝认同则必须确定为不同语言。

7. 语言演变史就是以移民为关键的语言交融史

语言的历史是语主的历史,语言的演变是语主的演变。从来不存在脱离语主的语言系统内部自身的自发演变,封闭的社会语言变化几乎停滞说明了这一现象,而语主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耗散结构。一方面,由移民引起的语言历史分化,可以使方言演变成为亲属语言。另一方面,由移民引起的语主局部嬗变,也可以通过语言换用使所换用语言发生重大变化而成为一种方言。

8. 语言的史前状态必须依靠综合研究法

语言系统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的一个子系统。史前语言学既然为"史前",就不可能像现代语言学那样具有内部自足的语言材料。以已有的各类语言材料为基础,采取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是探索语言的史前状态的惟一途径。

二、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史前构想

人类从距今四五万年起发生巨大突变,从体质上的现代人逐步转变成为心智上的现代人。可以选择人类转折的这一关键点,作为建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史前语言史的起点。

距今四五万年前,作为起源于新人的原始居民从中东出发,经过伊朗高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人东亚大陆。这些进人东亚大陆的新人,身材矮小且皮肤黝黑,和现代蒙古利亚人种不很相同,可以称之为旧蒙古利亚人种或原始太平洋人种。北支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进人黄河流域与大漠南北,然后继续向北,乃至经过白令海峡路桥进入北美,逐步演化为印第安种群、北极种群、北亚种群和东亚种群等新蒙古利亚人种。其中东亚种群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祖先,北亚种群成为大漠南北居民的祖先。南支从印度次大陆,经由东南亚再进入南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而后演化为达罗毗荼人种类型、澳大利亚人种类型和蒙古利亚人南亚种群,其中南亚种群北支——江淮类型成为长江流域居民的祖先,南亚种群南支成为岭南—湄公河—恒河地区居民的祖先。如果汉藏语和印欧语确实存在发生学关系,确实存在一些远古同源词,那么则可能源于最初的欧亚原始人种的分化,否则就是分化以后的文化扩散的借词。蒲立本认为印欧语和汉藏语的分化在6000年前的说法之所以不

能够加以赞同，其理由就是人种体质类型在距今 3 万年形成（欧洲科学家研究结果证明，白种人在 3 万年前肤色才变白），没有任何遗传学证据表明白种人从欧洲来到东亚后再转变为黄种人。当然，并不排除亚洲东部的现代人并非一次性迁徙，可能是一拨一拨地迁徙而来。

印度次大陆达罗毗荼人种类型（据研究，印度次大陆的土著是被从北方来的达罗毗荼人赶人偏僻丛林的说南亚蒙达等语言的原始居民，后来达罗毗荼人又被从伊朗高原来的雅利安人向南方驱赶）和澳大利亚人种类型（巴布亚—阿兰达等）另当别论，东亚大陆南部原始居民所说的语言即原始南方语。进人新石器时期以后，不晚于距今 7000 年前形成北支江淮（南岛）语群和南支南亚（孟高棉）语群。南支南亚语群分布于恒河流域、湄公河流域、马六甲—尼科巴—苏门答腊以及云贵高原，后分化为蒙达语群、孟高棉语群和苗瑶语群。北支江淮语群，一部分北上，沿江越淮迁徙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列岛，成为东夷语群。一部分留居在长江以南洞庭湖和太湖流域，成为百越语群（侗台语群）。一部分后来南迁海岛，成为南岛语群（印尼语群等）。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经由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进人北美的印第安种群，成为说印第安语言的祖先。滞留在北极圈沿海或海岛附近的“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极种群（如爱斯基摩人），成为说北亚细亚语的祖先。北亚原始语网破裂而形成的离散性语珠和印第安语网，皆可另当别论。东亚北部原始居民所说语言即原始北方语言。留居中国北方和蒙古、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所说的语言成为大漠草原的阿尔泰语群，后来陆续向北方、西北、东北方向远徙。在黄河中上游的东亚人种所说的语言成为藏缅语群，后来分为三支：留在黄河中上游的北支成为氐羌

语;进入缅甸的南支成为缅甸语;由川康进入西藏高原的西南支成为喜马拉雅语。

虽然中国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在0.29~0.54之间,南方人群仅在0.03~0.25之间;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仅在0.08~0.39之间,南方人群却高达0.46~0.81。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①] 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两支语言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作为基本词汇,北部叫水流为"河",而南部叫水流为"江";作为句法结构,北部语言为逆行结构,南部语言为顺行结构,但黏着结构却是其共同的原始特征。

考古学上的文化体系与民族学上的含义是相同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系统化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包括的一系列具有特征的文化因素,互相熔铸而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整体。无论是作为文化形态的语言,还是作为工具使用的语言,在考古文化系统或民族系统中都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基本因素。借助考古文化系统研究的成果,以中国境内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为坐标,可以为东亚远古语言概貌的考察找到一个支点。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之前,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迁移型原始农耕经济,而后在一些地区又形成定居型发达农耕经济;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半农半牧型混合经济,而后在一些地区又形成专门的游牧经济。依据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关系的性质可以推定,在东亚大陆早期农牧社会出现之前或原始采集—狩猎经济方式下的语言状况为连锁性原始语网,而农牧化引起的

① 张余善编著:《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迁徙则是促使连锁性语网逐步分裂或重组的历史条件。南亚语、南岛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部分底层相似性，也许正源于此种连锁性原始语网。

前5000年左右，中国境内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标志着太古青莲岗、太古仰韶、太古北方三大原始语区的逐步形成，三大原始语区的共同特征是其语言结构都是原始黏着型。由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多种语言文化的冲突交融促使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因此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斯大罗丝汀之所以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与北高加索和叶尼塞语，而和南岛语关系较远，就是因为依据的是"氐羌化"的周秦汉语语料。沙加尔之所以认为汉语和南岛语同源，是因为利用的是搜集了许多用汉字书写的南方百越语词语的《集韵》，而这些南方词语正与南岛词语具有对应关系。郑张尚芳根据白语和上古汉语的相似度提出的"汉白语族"假说，并非不可以成立，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证明分化的时间和动因。

白保罗认为台语与汉语词汇近似而与印尼语相差甚远，这是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而后来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这种推断之所以不可信，是因为其前提——澳泰人的文化技术比北方华夏人发达——没有考古学证据。罗美珍的大陆台语先民换用原始汉藏语而残留着原始马来语底层的假说和倪大白的台语是"马来(语系)—支那(体系)语"的假说，都隐含着台语是历史混合语的语义。而问题在于：台语先民是什么时间换用原始汉藏语？是什么条件引发了古百越居民的语言换用或大规模渗透？我所主张的"大规模移民引发语言的变化"的观点与雅洪托夫的见解吻合，公元4世纪以后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促使侗台语先民的语言转型或融合。

作为中介将台语和印尼语联系起来的加岱语群，其中拉嘉语

等在越南境内,黎语处于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正好填补了台语和南岛语推移的中间环节。同样,关于苗瑶语是属于南亚语还是藏缅语的分歧,正好表明苗瑶语处于南亚语和藏缅语的中间性质。加岱语和苗瑶语的过渡性正是语言接触渗透的产物。雅洪托夫依据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一致的词语在斯瓦迪斯表中只有 15 个,推定其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以证明加岱语支并不存在。这一结论的不周之处是,既没有考虑语言渗透所引起的词衰减变量,更没有设想在原始网状态下的语言歧异因素。以单纯的语言分化论和封闭的语言年代学方法,也只能够得出这样的不尽符合语言历史的结论。

第三节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变迁鸟瞰

距今 7000 年前,在中国境内大致形成的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文化体系格局,奠定了这以后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所说的太古夷越语、太古氐羌语、太古胡狄语就是现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内诸语言的祖先。

一、现代阿尔泰语是太古胡狄语的后裔

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持久冲突和交融中,除了进入中原的阿尔泰人融入华夏汉族而换用了汉语和迁徙中亚和欧洲的以外,留居大漠南北的阿尔泰人,则保留着原始胡狄语的黏着结构、SOV 和 NA 语序以及语音和谐的特点。

黏着型的朝鲜语的系属比较模糊。处于朝鲜半岛的朝鲜语其

基层为原始夷越语，基本词汇与南岛语同源。[1] 从文化底层来说，朝鲜—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江淮平原等，在远古同属水耕文化系统，所说语言是原始夷越语。从文化接触来说，一方面，战国后期的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初燕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移民为基础建立了政权，扬雄《方言》收录了朝鲜语词，辽东—朝鲜半岛文化受到中原强势华夏汉文化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辽东—朝鲜半岛的北面是阿尔泰人（肃慎、乌桓、鲜卑等）的游牧世界，从商周时代，朝鲜语可能就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由于文化接触，由此形成了以原始南岛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为表层，又向汉语大量借词（70%左右）的后代朝鲜语。在语言谱系研究中，以往的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朝鲜语划人阿尔泰语系，其主要依据就是只看到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的语言类型的一致性，而不了解朝鲜语的底层南岛语同样是黏着型。朝鲜语即使归入阿尔泰语，也是形单影只，在N. 鲍培的阿尔泰语关系图中与“楚瓦什—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统一体”不相联系。[2] 因此朝鲜语是一种历史混合语，可以看作南岛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类型。

二、现代藏缅语是太古氐羌语的后裔

参照雅洪托夫的研究，原始华夏语、藏缅语和喜马拉雅语从太古氐羌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是公元前25世纪或35世纪（中国炎黄时代）。卡伦语分化出来的时间稍晚，约在公元前20世纪到25世纪之间（中国五帝时代）。藏缅语在公元前20世纪到10世纪

① 详见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② 详见李增祥：《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中国夏商时代)开始分化出各独立语支。缅语从彝语支中独立出来是在4世纪或6世纪(中国东晋南北朝时代)。

在原始氐羌语的子语中,有些(如嘉戎语、僜语)还有着丰富的黏着词缀,有些已经不多。现代藏语中黏着词缀还不少,动词的时态都用词缀表示。藏语还存在着被认为可能是后起的屈折方式,由此使藏语的语言类型表现为黏着→屈折→孤立的历史演变趋势。河野和桥本万太郎所说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主要是指现代藏语的黏着结构、SOV型及NA、AN的并用。词汇方面藏语和汉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源于氐羌的姜周使华夏汉语"氐羌化";藏语的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并非受阿尔泰语影响,而是原始氐羌语即黏着型而藏语保留着古老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向远古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前,藏缅语的祖先原始氐羌语应和原始阿尔泰语具有亲缘关系。

三、现代南岛语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

南岛语系的分布区域相当辽阔,北起台湾,南到新西兰,东到南美洲以西的复活节岛,西到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与世界上其他语系相比,南岛语系的数目较多,约有九百多种。中国台湾就有二十几种南岛语言。

白保罗、奥德里古尔都推断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从大陆出发南迁的居民将南岛诸语言流播到南太平洋群岛,马来—玻里尼西亚语和亚细亚—马来人的发源地应该到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中国大陆的华南去找。如果不是美国学者戴恩(Daien)以萨丕尔(E.Sapir;1916)的"任何一群亲属语言的最早居民的故乡是现有多种语言的地区"的假设为前提,提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起源于美拉尼西亚的假说,那么"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的观点早就获得公

认了。麦尔多克(Mekdok)认为,应当放弃在南岛语和东南亚其他语系,如台语、加岱语之间寻找亲属关系的尝试,中国南部——台语、加岱语的可能故乡——距离美拉尼西亚太远。[①] 也许,麦尔多克根本没有注意到,南岛语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的分布状况,表明南岛居民是非常善于海上迁徙的民族。而在从南美西岸的太平洋到东非东岸的印度洋的广大区域中,中国南部正处于中部位置。

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白乐思(Robert Blust)根据语言分类法推论:南岛民族的故乡就在台湾。李壬癸在《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②] 中,推阐依据语言古生物学所提出的南岛民族的扩散中心在台湾中南部之假说。语言古生物学方法包括:1. 依据构拟的动植物群的原始词,寻找这些动植物群的生长地区和气候范围;2. 依据语言的现代分布和移民的历史走向,寻找语言的起源地和民族的原居地;3. 依据移民到新地方常沿用旧地名的习惯,进行地名的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台湾是南岛语扩散中心这一假说的证据还有语言学原理和考古学证据。越早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大;越晚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小。越早分裂的语言,距离起源地越近,越晚分裂的语言,距离祖居地越远。其他南岛语区的分歧性普遍不及台湾地区。南岛语区的其他考古文化遗址年代,都没有台湾发现的距今大约6000年的大坌坑文化古老。如果依据台湾考古文化,推断南岛居民在6000年前就定居在此,那么超过6000年前的南岛居民的前身又从哪里来?这仍然需要使用语言学

① 详见[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② 台湾《汉学研究通讯》1996年第58期。

方法，找出与南岛语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再找出他们更早期的居住地域。比较可靠的证据显示：南岛语和南亚语很可能具有亲属关系。因此，它们的共同起源地应是在亚洲东南部一带。据白乐思推测，共同起源地大概在距今大约八千年以前的缅甸北部，但台湾人类学家凌纯声认为，南岛居民的原居地在洞庭湖流域。依据印尼、福建和三峡一带都有悬棺葬的分布，可以证明南岛居民与中国中部原始文化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一观点，台湾只不过是南岛居民南迁入海的一个中转站。

虽然，南岛语专家李壬癸不赞同沙加尔的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主要理由是没有严格的对应规律，没有严密的方法论论证，但是这一同源说仍然得到了一些语言学家的首肯。沙加尔的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不但有着 20 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家进行东方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渊源，而且有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家对于太平洋岛屿文化和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文化的史前关系研究的国际性学术背景。根据凌纯声的研究，古代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南岛居民原居住在中国长江流域，尤其以中游即左洞庭而右彭蠡（鄱阳）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为“九黎”、“三苗”，其后在西南者曰“百濮”，在东南者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古代中南半岛及这个东亚太平洋区域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民族和百越民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与荆楚文化亦有关联。[1]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家杨江在《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2] 中，根据语言文化、建筑风格、人种遗

① 《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年版。
② 吕凡译，《浙江学刊》1991 年第 1 期。

传、社团组织和宗教信仰的相似性以及文化习俗的共同性等方面的证据，明确提出：越国人后代文化或"百越文化"与马来—玻里尼西亚文化有着远古时代的悠久联系。早在6000年前，马来—玻里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途经台湾、海南岛、中南半岛，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到达印尼。尔后一路向西，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另一路向东，到达南太平洋群岛和夏威夷、伊斯特岛。杨江甚至给出了一份东迁时间与到达地点的年代表：

距今6000年，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距今5500年，到达婆罗洲、帝汶岛；距今4500年，到达印尼所罗门群岛的新几内亚；距今4000年，到达密克罗尼西亚；距今3500年，到达斐济；距今3000年，到达萨摩亚群岛；距今1700年，到达马贵斯群岛；距今1600年，到达伊斯特岛；距今1400年，到达夏威夷；距今1100年，到达新西兰。

在这一迁徙过程中，除了部分人与当地土著巴布亚人混合之外，他们到达的都是原先荒无人烟的岛屿。一方面，他们上岛时带来了不少原先饲养的动物以及原产于东南亚的椰子、野芋等植物；另一方面，没有和其他文化的产生影响和出现冲突，因此保持着源于大陆东南部的远古文化习俗。南岛居民和中国东南部以及东南亚居民的史前渊源关系的研究，还需要用大量的资料去详细描写各个子文化系统之间的发展和变化。

而台语，依据白保罗的加岱联盟的假说就是留在大陆的一支远古南岛语的后裔。拉古勃里(T. Lakubeli)试图用台语的起源来解释汉语和台语中的相似性，他把台语的形成说成是南部诸孟语言和北部诸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混合。按照他的研究，这一混合过程的结果就是台语词汇中包含了三分之一的汉语词汇，

并且接受了汉语的单音节性和声调系统。研究泰国中部语言的史莱格尔(Shlegel)也持有同样的意见。罗美珍和倪大白的意见与之相仿,只不过将语言混合改为语言换用,将底层语言诸孟语言改为马来语。前苏联莫列夫(L.H.Molev)提出,不排除汉语和台语起源于统一原始语言的可能性。① 根据雅洪托夫研究,汉语和台语的共同词汇数量相当多,但是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却较少,修正表中完全没有,这些词汇都是较晚的汉语借词。雅洪托夫认为,可以用黎语作为佐证,它明显与台语具有亲属关系,但几乎完全没有来自汉语的借词,由此否认了台语通常被认为是汉语亲属语言的普遍看法。

黏着型的日本语系属一直比较模糊。在漫长的冰河时代,日本列岛和大陆相连。1949年,在群马县发现了岩宿旧石器文化遗址,表明日本列岛当时已有居民居住。分布在日本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虾夷人),人类学家认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之间的混合类型。但我认为阿伊努人也许并非分化后的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的后起混合类型,反而更可能是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未分化前的原始太平洋人种或旧蒙古利亚人种的后裔。阿伊努人估计是新旧石器时期之交到达日本列岛的,他们的语言属于北极语珠。

关于日本大和的语言,西方学者拉姆斯太特认为和高丽语及阿尔泰语近似,但日本学者松本广信在《日本语和南亚语比较词汇的研究》(1928)中认为,日本语和太平洋群岛的马来语及支那语关系密切。二者的分歧隐含着日本人是来源于北方的高丽人,还是来源于南方的马来人的推测。其实,日本人源于高丽人还是马来

① 详见[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人这二者并没有本质的矛盾,因为这二者都源于太古夷越人或原始南岛人。根据日本绳纹考古文化遗址都在北方,可以推断大和远祖是从北方即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然而他们并非是原始阿尔泰人,而是原先居住在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夷越人(南岛人北支),最早的根在长江以南地区。日本早期居民的这一迁徙路线,和大陆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江淮—山东—辽东—朝鲜—日本)相一致。至于日本语和南亚语(实指南岛语的印尼语族)的相似性,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马来人(南岛人南支)也是从长江以南地区再南迁印尼—马来海岛的。大和人的远祖,除了是从北路迁入日本列岛的原始夷越人,并不排除稍晚时期部分原始马来人从南路经台湾、琉球而后进入日本列岛。

除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移民,从夏商到周秦,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仍然陆续迁入日本。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魏略》),其俗近江南吴越,又自称先周泰伯之后,当是在周代从江南由海路迁入。公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据一些学者考证与秦人徐福东渡带来新的周秦文明密切相关。公元以后,日本又长期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5世纪前后,日本开始使用汉字。隋唐时期,日本先后派遣隋使、遣唐使及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来中国,摄取中国文化。其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适合记录日本语言的假名。在平安文化时代,形成民间假名文化和官方汉字文化的双层结构。2000年来,日本语虽然在语音结构和词汇系统(百分之七十左右)方面深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但是语言结构的黏着类型却没有改变。总之,无论从原始大和居民来源还是语言类型,日本语当源于原始南岛语,为太古夷越语的一支后裔。也许正是日本列岛居民来源的南北交融性和历史层次性,才致使日本

语具有与其他原始南岛语后裔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因此一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语言为混合语说。

四、现代南亚语是太古夷越语的旁系后裔

根据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说，南亚语和南岛语为远亲关系，皆源于原始南方语，分化的时间非常久远，估计在新石器时期早期。现代南亚语的词音结构通常表现为一个主要音节，有时前面可再加一个次要音节（有些语言学家称之为“一个半音节”）。前缀和中缀比较普遍，但后缀不普遍。尽管现代南亚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是词序，但可以推定原始南亚语是黏着语。不可否认，南亚语从黏着型向孤立型过渡，华夏汉语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古代苗蛮后裔的苗瑶族，秦汉魏晋时期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南亚人最初的居住地在云贵以南，也许是在南岛人向东南迁徙以后，他们才从南部进入长江中游这一带。随着“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居民的大批迁来，苗瑶族迁往湘西和云南。根据雅洪托夫研究，苗语从瑶语中分化的时间是公元4世纪或10世纪，恰巧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和黄巢起义所引发的中原居民南迁浪潮相吻合。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汇以及少量的与台语共同的词汇。显然苗瑶语属于南亚语系，在语系内部最接近孟高棉语。苗瑶语中找到的与汉语对应的词，多半是晚近（“永嘉之乱”以后）的借词。

系属比较模糊的越南语，和汉语的结构类型一样。雅洪托夫认为，越南语中有很多来自汉语的词，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有13个，无疑这是较晚（秦兵南征和南越王赵佗统治时期）的汉语借词。越南与侗台语关系复杂，越南语和台语相同的词有些是台语借词，但有些或与台语和孟高棉语，或与台语和印尼语分别具有对

应关系。越南语与台语的对应词见于斯瓦迪斯词表的有 30 多个，其中 19 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

关于越南语的原语有两种假说：一是南越语属于百越语之一种，一是南越语属于南亚语（孟高棉语）之一种。前者如马伯乐的《越南语历史语音学研究》（1912）所论，由于对越南语的单音节和声调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尽管面对越南语中占优势的孟高棉语基本词汇成分，还是假设了越南语和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后者如白保罗（1942）所说，他认为越南语作为孟高棉语群最东北的一个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越南语和孟高棉语系的关系正像台语和印尼语一样。由于汉语的影响，越南语和台语的词音结构大量简化，失去构形词缀并形成了完整的声调系统。鉴于台语的词根在越南语里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变化必须归因于台语的影响。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基本词根还是孟高棉语来源而不是台语来源。根据白保罗对台语分析的类推，孟—高棉—越南语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是肯定的。

越南北部居民，在秦汉典籍中称之为“南越”。秦兵的南征和建立象郡，南越王赵佗的统治，西汉的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都对越南的语言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德里古尔所认为的汉语对台语和越南语最大影响的公元 3 世纪到 6 世纪，[①] 正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时期。939 年，交州人驱逐南汉而吴权称王，越南从此成为独立国家政权，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中断。这种持续的影响无疑是促使越南语，包括台语，类型孤立化的根本动因。根据雅洪托夫研究的结果，越南与侗台语的对应词 30 多个，其中有 19 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也许可

① 详见[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以这样解释:越南西南部的源语是南亚语,越南东北部的源语是百越语(或百越人南迁后所占据的原先南亚语区),越南语是西南部南亚语和东北部百越语(台语)的历史混合语。

第四节 汉语和周边语言同源异流现象阐释

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梅祖麟在《古代华南的南亚语》(1976)一文中提出,一些不见于早期汉语甲金文记录的词语是源于原始南亚语或澳泰语的借词。通过汉语的"牙" * ŋra(上古)、* ŋa(中古)、ia(现代),与越南语"象牙"ŋà 和原始孟高棉语 * ŋo、* la,以及原始台语"獠牙" * ŋa 的比较,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南亚语的借词。

确定为汉语借自原始南亚语的理由是:1. 最早的甲骨文献中记录的是"齿",其词义包含臼齿、动物獠牙、长牙和象牙。2."牙"比"齿"晚出。3. 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表明北中国有过大象,但在商周时象牙稀少且珍贵,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贡,如《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这一结论颇有可以商榷之处。首先,依据某汉字不见于甲金文,就判断为当时语言中没有这个词的前提不能成立。假使如此,那么依据出土甲骨文所见五千多个字符,就会推出商人语言只有五千多个词语的荒唐结论。其次,根据《说文》"牙,象上下相错之形",其形如臼齿相磨之状;根据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者称牙",可见"牙"并非取象于象牙之形,"牙"指象牙是引申义。再次,因为不存在可与甲骨文比较的越南语等古代文献,因此无法证明是越南人等最先使用 * ŋ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根据泗洪的考古发现,距今五万年的淮河流域生活着

菱齿象，根据殷墟发现的大象遗骨，表明中原地区也有过大象，即使商周时来自淮夷的象牙稀少且珍贵，即使原始南亚—南岛人（夷越人）可能最先使用 * ŋ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借词，因为原始华夏族的族源包括古代黄淮一带的夷越人，由东向西推进的、导源于青莲冈考古文化系统的龙山文化就是原始夷越人创造的文化，殷商人就是西进中原的夷越人的一支，在原始华夏语中存在原始南亚—南岛人后裔语言中的词语并不奇怪。当然，如果仅仅从姜周时代的语言层面考察，可以认为 * ŋa 是殷商时代语词的承袭，但这一论断包涵着华夏语仅起源于藏缅语的预设。

同样，在闻宥的《语源丛考·鸭鸥鹜三词次第考》[①]、张永言的《汉语外来词杂谈》[②] 和《语源探索三例》[③] 文章中，也列举出一些见于汉语书面语稍晚而存在于现代南岛—南亚语言中的对应词，并且将这些语词判定为上古汉语中早已完全“归化”的外来语成分。如“贝”，泰语 beer；占语、吉蔑语 bier；马来语 bia 等。商人文化源于东部沿海的海岱文化，“货贝面宝龟”，以贝为装饰和货币，没有理由认定“贝”壳动物不是商人祖先原始夷越族的生态环境中的常见生物，而--定是南亚舶来品。

依据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和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无论是侗台—苗瑶语，还是华夏汉语，其语言文化的动脉中都流动着太古夷越语（原始南方语）的古老血液。如果这些词确实非常古老，也只能够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所共有的，即是华夏汉语从“远祖”语言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词，而并非是从“弟兄”语言那里借来

① 《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4 期。
②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③ 《中国语言学报》1988 年第 3 期。

的外来词。之所以这些中外学者，将见于现在"南方民族语"而在汉语文献中"晚出"(不见于甲骨文而见于先秦时代其实并不晚)的词确定为上古汉语中的外来语成分或归化词，就是因为他们首先预设了谱系树模式基础上的"汉语仅与藏缅语同源"或"殷商人也是藏缅人"，而与南岛—南亚语没有同源关系的前提。然而，如果立足于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就可以改换一种新的思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一直持有预设前提决定材料价值的观点。

如果从语言史观追溯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史观，之所以认定中国北部语言曾经向南亚语言借词，是因为首先预设了史前南亚文明可能曾经高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1966 年以来，在泰国北部班清(Ban - Chiang)墓地考古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尽管有一些美国考古学家通过测定死者骨骼周围的木片，推断套在人体手腕骨骼上的青铜手镯是距今 6000 年的青铜器物，以致出现了是两河流域还是泰国北部为青铜文明的发源地的质疑。但是，后来对骨骼直接测定的年代结果却是在公元前 300 年 ~ 前 50 年之间，因此青铜手镯的年代，远远在商代青铜文明之后。尽管泰国北部盛产冶炼青铜的锡，但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泰国北部后起的青铜文明可能源于更早的中原青铜文明，而不可能相反。

由此可见，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依据史前考古文化表明当时最高的夷越文明发源于江淮，并且溯黄河而上混合形成原始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大陆居民向中国南部沿海以至南洋岛屿的迁徙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的考古文化学证据，"汉语仅与藏缅语同源"就不能够成立。因此，白保罗在《早期汉语借词》(1976)等文章中，采取南方语言文化向北方中原传播的思路(南方语言文化流)来建立新石器时期以来的大陆语言演变的模式的设想，与东亚—南洋的文化史实和语言史实不相符合，马提索夫由此

推定早期台语对汉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观点也同样不能够成立。归根结底，为欧洲学术界至今仍引以自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主要贡献——谱系树理论，不过是欧洲语言学家根据印欧语言材料和古代经济生产方式所建立的一种语言文化演变模型罢了。

第十二章　周边语言的汉语化和汉语的异化

在进行了详尽的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比较以后，白保罗不无感慨地推测："关于汉语和藏缅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 藏缅语中复杂的形态变化在汉语中几乎无迹可寻；2. 这两个语族只有很少的同源词；3. 两个语族的语音系统在好多方面不同，几乎很难找到共同之处；4. 两个语族的声调系统好像没有关系。我们相信这两个语族有发生学关系，最后必定基于下列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来源。从历史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周朝人操某种汉藏语，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汉藏语系的种种假设，至多只是探明极其复杂的汉语史的无数曲径中的一条而已。"[1]

① 乐赛月、罗美珍译：《汉藏语言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年版，第 181 页。

原始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史前氏族融合的结果，后来被称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语言都先后发生过渗透、换用与混合关系。不管汉语的祖先如何扑朔迷离，但有一点非常明晰，从周代开始具有书面文献和文学传统的主导语言的“雅言”形成，决定了周边接触语言的同化趋势，决定了东亚大陆持久扩展的“汉语化”历史潮流。几千年的“南夷和北狄交”，而“中国不绝若线”。在“以夏变夷”的过程中，难免“夷亦化夏”的历史互动。在不断同化周边语言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汉语也异化了自身的结构系统。

第一节　周边接触语言的汉语化

周边接触语言的汉语化是立足于周边接触语言的变化而言，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夷越化是立足于汉语的变化而言，其实二者互动交融，在周边接触语言的汉语化的过程中，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夷越化也就同时发生了。东亚大陆的汉语化，应当包括汉语对朝鲜语、日本语和越南语等毗邻国家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中都有比例极大的历史汉语借词。但是除了20世纪初从日本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借形词，朝鲜语、日本语和越南语等对汉语的历史性影响甚微，因此这里论述的语言互动是中国境内的汉语化和汉语的异化。

一、南邻语言的汉语化

汉语对南邻民族语言的汉语化，主要表现三个方面：南邻民族的交融性语言换用、南邻民族的语言转型、汉语和南邻民族语言的混合。

1. 南邻民族的交融性语言换用

永嘉南渡以后的多次中原居民的成规模南迁，导致了百越的语言换用。一方面，许多百越族居民换用了汉语，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形成了复杂的南方汉语方言。另一方面，在语言换用或融合的过程中，在南方汉语的底层中残留了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土著语言特征。陈忠敏《某些音位变体在语言底层研究和史前史、民族史、人类学研究里所起的作用》(1987)和郑张尚芳《汉语方言一些语音现象的历史解释三题》(油印稿)，列举一系列吴语、闽语、粤语中具有特殊读法而与侗台语言同源的声母。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995)和游汝杰《中国南方方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1995)，也列举出汉语方言中与侗台语言相类似的一些特征。由此证明：(1)这些地区原来确实是百越的原居地；(2)吴语、闽语、粤语属于交融类型的汉语方言，这些特殊声母属于百越语的底层残留。同时，根据古代南方印纹陶文化分区和汉语南方方言区域的对应性，可以推定汉语南方方言具有不同的古越语底层。

2. 南邻民族的语言转型

处在三大太古语区交会之处的河洛地区，由于这三种语言的渗透、换用、混成面形成的原始华夏语，由黏着型经不完全屈折型而演变为孤立语。尽管处于汉语和南岛—南亚语言之间的现代侗台—苗瑶诸语言中，一些还保留着黏附形式，但绝大多数已经演变为与汉语相同的单词语音结构单音节化和具有声调系统，且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的孤立语。本维尼斯特认为，汉语和台语的类型相似，有根据认为它不是从来就有的，面是由于这些语言相互作用、伴随着汉语对原始台语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关于汉语对原始台语发生强烈影响的时间，奥德里古尔认为汉语声调出现在公元初，台语受其影响有了声调。但雅洪托夫认为，台语不是

受上古汉语的影响，而是受中古汉语(4世纪到7世纪)的影响，语言年代学方法证明：共同台语是在公元6世纪或4世纪开始分裂的。可以与这一结论相互验证的就是，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发生在永嘉之乱的公元4世纪。正是从东晋(317—420)到南朝(420—589)这一绵延了三个世纪的大规模迁徙，促使江南百越族四处迁徙，引发了共同台语的分化。“四声起于江左，非中原旧音”，顾炎武说：“今考梁天监(502)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依据汉语复辅音在东汉还没有完全消失和直至齐梁发现四声，可以推断：汉语的声调系统应在永嘉南迁以后的时期才成型，因此南方民族语言接受汉语单音节性和声调系统的影响只能发生在永嘉以后。

3. 汉语和南邻民族语言的混合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汉语和南邻民族语言的混合，形成了一些难以确定系属的混合语言。比如广西融水县永乐乡自称 e^{55} 的壮族人，所说的“五色话”，其混入来源语有汉语、壮、仫佬、毛难、侗五种语言；畲族所说的汉语“畲话”、湖南沅陵一带的乡话、韶关土话、湘南土话；另外还有广西和贵州一些苗族所说的几种土汉语等。

由于百越—苗蛮长期处于守势，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建立足以与汉人抗衡的强大政权，对于中原居民的南迁，百越苗蛮居民或者留居与之融合，或者向边远丘陵地区迁徙，或者形成交错杂居。因此，南邻语言的汉语化主要表现为：汉化百越苗蛮居民的交融性语言换用；未汉化百越苗蛮居民的语言转型；汉化不足的百越苗蛮居民的语言混合。除了这三种类型以外，还有南方民族借用汉语成分的渗透以及盛行本族语和汉语并用的双语制传统。

二、北邻语言的汉语化

北邻游牧民族的阿尔泰人主动进攻中原，建立强大国家。与南邻民族语言的汉语化表现有所不同，北邻语言的汉语化主要表现为：汉化阿尔泰居民的彻底性语言换用。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最大的换用汉语高潮，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辽金人和满洲人所掀起的。

1. 北魏到隋唐的鲜卑人的汉语换用

北魏孝文帝"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孝文帝纪》)鲜卑人以鲜卑语习惯换用汉语，以至于出现了"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的局面。隋唐统一以后，不但皇室血统有一半来自鲜卑，而且朝臣将领多为鲜卑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是汉化鲜卑人，其父陆爽是太子杨勇的洗马。在唐代的369位宰相中，说阿尔泰语言的人约占十分之一。唐代的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刘锡禹等，都是说阿尔泰诸语家族的后裔。[①] 甚至来自西域碎叶的李白，可能也是阿尔泰人的后裔。据说所谓"胡言乱语"源于"胡言汉语"，唐人司空图《河湟有感》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诗句，表明了当时"胡言汉语"的交融。唐代通行"吴儿"和"汉儿"这样的对称，其原因在于：南北长期分裂以后，中原汉人已不再是纯汉血统的汉人，大量鲜卑人已经汉化且自称为"汉儿"，并且已不承认从中原迁往江南的士族是"汉人"，而将之与吴越土著统称之为"吴儿"。从北朝到隋唐，"汉儿"指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且后者不断扩展，他们所说的口语是

① 转引自宋金兰：《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在已经无法分清的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之间通行的“汉儿言语”或阿尔泰化汉语。

2. 辽金时期的契丹和女真的汉语换用

五代时期，中原又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语言的急剧演变难免。与北宋对立并且灭宋的辽金，治下的“汉儿”被看作和南方中国人相区别的“番人”。“汉儿语言”不但在中原使用，也在北方民族和“汉儿”之间通行。即使在母语不同的北方民族之间也被作为共同语，并且极其偏僻的东北也通行。辽亡以后，进入中原和北境的契丹人也就与女真人一起卷入汉化的漩涡。

虽然女真人统治中原北方期间曾使华北汉人一度女真化，正如陆游说“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但日益成为主流的却是女真的急剧汉化。一些“好学嗜书”者，曾劝太宗改用汉制。熙宗本人已“尽失女真故态”。在擅长汉语文的海陵实行统治中心南移的同时，民间女真人与汉人杂处通婚。至世宗告诫“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如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女真汉化已不可遏止。宣宗南迁以后，金廷政治用语几乎完全使用汉语。金亡以后，中原女真完全和汉人融合。元朝不但将“女直、契丹同汉人”，而且用“汉儿”来指契丹、高丽等金朝治下的诸民，当时的汉儿语言在汉化胡人之间流行。元代的汉儿言语就是阿尔泰化的中原汉语，即用辽金人阿尔泰语言习惯大量换用后的北部汉语。也许就是朝鲜申叔舟《洪武正韵译训》所记录的明代俗音即北京一带的土音。

3. 清朝时期满人的汉语换用

清入关以后，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除了留在东北的极少数满

人,都彻底换用了北方汉语。赵杰在《满族话与北京话》[1] 中,论述了满人换用汉语的过程。

(1)明代满汉语言接触。明初开始,女真人就不仅南下辽东,而且纷纷入关不愿离去,永乐皇帝不得不在开原城设置了安乐、自在二州以妥善安置。与女真南迁相应,明朝为了实边固守,也曾迁北京和“江淮齐鲁之民”人居辽东。

(2)清代满主汉辅制阶段。后金“以旗统族”扩大汉军,促使满汉交叉学习语言。又皇太极鼓励满人学习汉语,以“通汉书,习典故,为国宣力”的达海为榜样,在东北出现了女真化的汉语。

(3)清代满汉双语制阶段。清初人关以后,满人进一步熟悉汉文汉语,开始实行满汉文字并用和满汉双语制,颁布诏书“清将则清语读之,汉人则汉语读之”,同时汉语借词日益渗透满语。

(4)清代汉主满辅制阶段。至康雍乾时代,出现了汉语为主满语为辅的逐步合流。1741 年,乾隆告诫“清语尤为本务,断不可废”,并且刊行《御制增订清文典》,但已经挽回不了满语的逐渐衰落。

(5)清代通用汉语制阶段。嘉庆至清末,满人逐步通常使用汉语,满语弃之不习。不但关内满人改用汉语,就是关外辽沈一带“土人皆用汉语,微特民人无习满语者,即土著满人亦如此”。

《满族话与北京话》中所列举的“满式汉语”词语,有些固然源于满语,但也有许多根本不是。如作为区别是否是满人的标志的“去”读 ke,此词语流行于江淮,通常写作“开 ke”,南京话“去”读 ki。再如“老姑娘”、“找碴”、“松人”、“刀螂”、“饭(米饭)”、“面(面条)”;又如赵杰家乡伊通方言中的“瞟”、“兼(夹)”、“撅”、“撺掇”、

①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曲抽"、"一庹"、"心眼子"、"铍棱盖(膝盖)"、"绍(说)"、"阁(放,本字搁)"、"舀"、"问(偏袒)"、"懵"、"下作"、"这/那会子";又如所举《北京土话》中的"花子"、"乱子"、"路子"、"脚丫子"、"丑八怪"、"抖"、"嚎丧(大哭)"、"帮黑儿(傍晚)"、"婆婆妈妈";又如所谓满语和早期女真词语的"膈扎"等。以上所举都是显而易见的江淮词语,但由于赵杰没有江淮话语感而误以为是"满式汉语"词语。明朝实边固守曾迁北京(有许多原来自江淮)和"江淮齐鲁之民"人居东北,这就是东北话和江淮话多相同(包括舌音平翘互混等)的渊源之一。

由于阿尔泰民族处于攻势,在历史上屡屡建立强大的政权,作为战胜者和统治者进人中原,大量军民南下黄河流域,与中原汉人形成交错杂居。虽然也曾企图把中原变为牧场,但最后不得不从游牧民变成农耕民,接受汉文化和汉族风俗,与汉人通婚,以致从文化、语言、心理上完全汉化,甚至自认为是与留居在草原大漠的阿尔泰人不同的汉人。北邻语言的汉语化,除了主要表现为汉化阿尔泰居民的语言换用这一类型以外,还有阿尔泰民族借用汉语语言成分、汉语和阿尔泰语的混合(如青海"河州话"等)和本族语与汉语并用的双语制传统等。

第二节　汉语的阿尔泰化和夷越化

为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一时难以接受的汉语阿尔泰化理论,其实导源于颜之推《音辞篇》中的名句"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并非桥本万太郎首创。在南北接邻语言的汉语化的过程中,汉语的阿尔泰化和夷越化也就发生了。特别是在北方民族大量换用中原汉语的同时,也就启动了汉语的阿尔泰化,由此促成了北部汉语的迅速

变化和日益统一。

一、汉语全浊声母清化的动因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处于长江以南的中部汉语(吴语、徽语、北部赣语和老湘语)具有全浊声母,而处于长江以北的北方汉语和处于岭南一线的南方汉语(闽语、客家话、南片赣语、粤语)都没有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的全清、次清、全浊三分或清浊对立,从上古汉语就一直存在。《切韵》的声母系统和中古三十六字母依然保留这一特征。为什么唐宋以后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的清浊对立会突然消失?

陈其光《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①] 一文,从语言接触和换用影响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了精彩的阐释。北方汉语的浊音清化,与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洲语族的影响有关。唐宋以后,阿尔泰民族长期统治中国北部,居民大量迁入中原且换用汉语。这两个语族的辅音系统,塞音、塞擦音、擦音都是清音而没有浊音,但前二者存在送气和不送气对立。在语言换用过程中,根据母语习惯自然把全浊发成了清音,并且反过来影响了北留中原汉语,最终导致了中古以后北方汉语清浊对立的消失。

南部汉语清浊对立的消失也可以通过语言接触来解释。中国南部的原居民是百越族,由于中原汉人的南迁,杂居的百越人换用汉语,致使形成南方汉语方言。没有汉化的百越后代,其语言现在仍属侗台语族。和汉语一样,侗台语族的古代语言也是全清、次清、全浊三分,但是在中古时期全浊清化,百越语的塞音、塞擦音演变成为清音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浊音中和为清音,只在声调的

① 《民族语文》1999年第1期。

阳调中留有痕迹。侗台语族的一些语言中的 b、d 或 ?b 、?d，是从古全清声母而不是古全浊声母演变来的。[①] 百越人在换用汉语时，像阿尔泰民族一样，母语中已没有浊音的特点会导致目标语的音位对立关系的改变。南迁中原汉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百越语言的反影响，因此南部汉语的全浊声母也在中古以后清化了。

老湘语分布的地区至今是古代蛮人后裔苗瑶族的分布区。苗瑶语族的声母不但古代全清、次清、全浊三分，而且现代也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全浊音。他们在换用汉语或兼用汉语时，清浊自然保存相对，而且不会产生致使汉语浊音清化的外来影响。偏北的新湘语，与北方汉语接近，又脱离苗瑶语区，因此大部分已经清化了。无论是新湘语还是老湘语，全浊音都保留在平、上、去三个声调的字里，在入声字里已经全部与次清中和，这也与苗瑶语的影响具有相关性。现代苗瑶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全浊音，已经清化的全浊音在平声、入声字里多，而上、去声字里少。因此，全浊入声字的浊音声母与次清中和，湘语和苗瑶语的一致性显然不是偶合。

吴语分布的苏南和浙江地区，上古时代也是百越的居住地。由于“永嘉之乱”，大量中原居民的南迁江浙并且促使吴地百越居民的进一步南迁，中古以后全浊清化的百越语已大部分远离吴地，留下的百越语其影响微弱或全浊清化中断。因此中古以后，吴语基本上保留了全浊声母。陈文没有论及的徽语和北片赣语，大概也可以照此情况解释。

二、汉语次浊声母清化的动因

关于中古八个次浊声母的演变，其区域分布特征是越往北消

①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失得越多、越往南保留得越多。陈其光认为，除了在发音部位方面越往前保留得越多，越往后消失得越多的生理发音机制以外，南北差异的形成也与语言接触和换用相关。受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洲语族的影响，北部汉语里的疑母普遍消失，日母也消失了许多。这些民族的语音系统中，鼻辅音一般只有与汉语明母、泥母和疑母的 m、n 和 ŋ，而缺少娘母 ɳ。m 和 n 可以出现在词首，而 ŋ 不能够出现在词首，只能够出现在词末。在换用汉语的过程中，居于音节首的疑母如果不注意，因为不符合母语发音习惯就自然脱落了。虽然注意到了，但如果模仿不到位而发音部位前移，就出现了与 n 中和的结果，就像北京话里的“牛”。为什么疑母和日母的消失没有出现像全浊声母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都清化，而惟独中部汉语保留的马鞍形呢？这是因为南邻苗瑶壮侗语和北邻阿尔泰语不同，南邻语言中普遍存在这四个鼻辅音，因此在鼻辅音在南方汉语中都基本保留下来。

关于陈文的阐释，对于北方汉语的浊音清化的动因缘于汉语的阿尔泰化完全可信，但对于南方汉语浊音清化的解释，仍然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深思的几个问题：

1. 壮侗语的全浊音是什么时间开始清化的？是唐宋以前还是以后？李方桂认为，侗台语中的浊音 b、d 或 ʔb、ʔd，是从古全清声母演变来的。但是，依据现代吴语特别是上海郊区方言中还存在原始侗台语的底层残留先喉塞浊音 ʔb、ʔd，侗台语浊音清化发生在上古时期的说法难以成立。2. 一些苗瑶语仍然存在清浊对立，为什么没有产生浊音清化？3. 北方汉语浊音清化的动因是北邻阿尔泰语的影响，壮侗语浊音清化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

对这些关键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进一步伸发开去：

1. 如果认为吴语的清浊对立在中古已经形成，那么永嘉南渡迁入吴地的中原居民数量就要多得足够完全覆盖当地语言的非清浊对立的百越语言。因此就有理由推定吴语保留了魏晋中原汉语的历史层面，而吴地百越居民的南迁形成闽语，从而为丁邦新等人的"中古吴语是南迁中原汉语而闽语才是古吴语"假说提供了一项佐证。但如果永嘉南渡迁入吴地的中原居民数量多得足够完全覆盖当地语言的非清浊对立的百越语言，那么就不可能在现代吴语，特别是上海郊区方言中也残留百越语的先喉塞音底层。李方桂的侗台语 b、d 等，是从古全清声母演变来的论断就值得推敲。

2. 苗瑶语没有产生浊音清化，这是否暗示苗瑶语属于孟高棉语族，而壮侗语属于加岱—印尼语系？也就是说，上古时期分布在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的苗蛮人是远古南亚人，而分布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百越族是远古南岛人。进一步说，原始南方语曾经出现过东支南岛和西支南亚的东西对立局面，而不是一直保持南部南亚与北部南岛的南北对立格局。

我对南部汉语（闽语、南部赣语、客家话、粤语）浊音清化原来的解释是，依据现代苗瑶壮侗语存在某些声母的清浊对立，可以推断与南方汉语接触或作为这些方言的底层土著语言都存在声母清浊对立。因此具有浊声母的中部汉语（吴语、徽语、北部赣语、老湘语）可能是浊音没有清化的唐代以前，即"永嘉之乱"到唐朝期间保留清浊对立的北方移民运动形成的结果，而没有浊音的南方汉语可能是清浊对立已经消失的唐宋以后北方移民运动形成的结果。浊音已经清化以后的唐宋北方移民运动，又促使了苗瑶壮侗语的不同程度的浊音清化。

三、汉语时体助词出现的动因

产生于唐宋时期的汉语的时体助词"了"、"着"，它们的语义和功能并不仅与完成或持续有关。"了"还具有表示开始义、进行义的功能，"着"还兼有表示方位、目的、语气的多种功能，可能源于具有对应关系的阿尔泰语词缀。①

"了"与阿尔泰语中表完成、将要、持续、开始进行、目的的词尾，特别是与蒙古语的未完成体，具有相似之处。"了"的轻读 lə、la 等，和阿尔泰语词尾 - rə、- ra 等具有对应关系。《说文》曰"了，尥也"，本义训手脚弯曲。表"完结"的"了"，在东汉仅有一例，且可以另解(宋金兰解作"明了"，我以为可解作"料定")。直到唐代，"了"才逐渐取代魏晋表完成义动词"迄"、"已"、"竟"、"毕"等而成为常用词。具有完结义的"了"和先秦的"已"、"矣"没有语音演变关系，当另有来源。完结义的"了"大约是魏晋时期产生的一个口语词，它的出现或许和阿尔泰语的上述词尾有关。这个词尾可能最初变换成为一个汉语单音节词，其语法意义转为词汇意义并借用"了"的书写形式。随着阿尔泰语对汉语的日益渗透，又从词汇层进入语法层。作为汉语词尾的"了"，最早出现在唐代变文和诗词这类口语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变文的"宾 + 动 + 了"格式与阿尔泰的句法结构完全一致。

"着"与阿尔泰语的词尾 - d、- dʒ 具有一系列对应关系。从功能上看，"着"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完成、处所、随同人物、目的、被动、工具和祈使语气等；从语音看，"着"的中古音 * diak，与蒙古

① 宋金兰：《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1991 年第 6 期。

的持续体词缀 - dʒεε 和过去时词缀 - dʒee 音近。作为方位介词的“着”，相当于先秦汉语的“于”。二者的功能和分布的差异表明，“着”并非完全承袭了上古汉语的“于”，反而与阿尔泰语的位格词缀存在许多共同点，而阿尔泰语的位格词缀，与时体词缀在语音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王力等研究者认为，“附着”的“着”是助词“着”的来源，即“着”的演变轨迹是：附着的“着”—方位介词“着”—情貌助词“着”。表方位的虚词“着”的最早用法也见于魏晋，当时的读音 * d - ，与阿尔泰语的位格词尾音近。而后，方位介词“着”又逐渐具有了与位格词缀类似的一系列用法，并且演变为助词。在“着”的演变过程中，如果没有阿尔泰语对其影响的这种动因，单凭其内部潜在语义，未必能够发展成后来这样一个多语义、多功能的虚词。

如果仅就汉语汉字内部的观察，时体助词“了”或“着”的出现像一个实词逐步虚化的结果，其实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与阿尔泰语的渗透密切相关。另外，《元朝秘史》总译中的“了”、“着”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今青海汉语中的“了”、“着”使用频率，不仅高于一般北方话，而且与阿尔泰语词尾具有更加明显的趋同性。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了，时体助词“了”或“着”出现的汉语阿尔泰化背景。

四、汉语“的”字结构的来源

据赵杰《满族话和北京话》中的论述，满语中的词语或短句加属格后缀 - i，能够独立形成很长的名词性结构，这种格式套到满式汉语上的结果就是汉语的“的”字结构。《儿女英雄传》中的这类结构使用频率相当高，使用场合也比汉人用汉语更为普遍，这是满语结构对汉语结构影响的结果。

五、汉语其他一些结构变化的动因

汉语的阿尔泰化还包括北方汉语声调的变化，南方汉语一般都在6个声调以上，而北方汉语却只有4个声调，甚至3个声调。由于阿尔泰语是非声调语言，因此北方汉语声调的锐减是近古汉语阿尔泰化的结果。另外，北方汉语入声的弱化以致最终消失，也与阿尔泰民族换用汉语密切相关。由于阿尔泰语没有入声，因此在换用汉语的过程中也就导致了入声塞音韵尾的脱落。与之相关的是前响复韵母的出现，因为不习惯发塞音韵尾，在塞音韵尾的位置适当延长且口形滑动，也就形成了前响复韵母，如：剥(ɑo)、白(ɑi)、北(ei)、肉(ou)等。

汉语在中原士民迁徙与南北民族融合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于是出现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语的汉语化，形成了"南迁中原汉语"的南方化或南方语言的汉语化。所谓汉语的"阿尔泰化"主要是北方民族在换用北留中原汉语的过程中以阿尔泰语语音特点改变了汉语，形成了阿尔泰语的表层；所谓汉语的"南方化"主要是南迁中原汉语对南亚语言的不完全汉语化，残留了南方语的底层，由此导致了近古汉语的南北巨大差异。在多次移民和语言交融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汉语的演化形成了与欧洲语言演变不同的推移发展模式。换而言之，在过去的两个千纪中，东亚大陆一直处于时起时伏、绵延不绝的汉语化运动之中，华夏汉语在同化周边语言的过程中也异化着自己。

第三节　华夏汉语结构的演变大势

华夏汉语可以分为华夏语和秦汉以后的汉语。依据秦汉以后

历史上的三次大动乱，可以把秦汉以来的汉语历史分为上古汉语期、上古与中古汉语过渡期、中古汉语期、中古与近古汉语过渡期、近古汉语期、现代汉语期等六个时期：

1. 上古汉语（秦、西汉），以长安话为通话。

2. 上古与中古过渡期汉语（东汉、魏、西晋），以洛阳话为正音。

3. 中古汉语（东晋：五胡十六国、南朝、北朝），以金陵话为正音。永嘉南渡，成为上古汉语进入中古汉语的转折点。

4. 中古与近古过渡期汉语（隋、唐、五代十国），以长安话为正音。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五代十国引发中原居民的大规模迁徙和江淮地区的居民的再次南迁。

5. 近古汉语（北宋：辽金、南宋、金、元），以中原语言为正音。靖康南渡成为中古汉语进入近古汉语的转折点。

6. 近古与现代过渡期汉语（明、清），以南京话为官话。

7. 现代汉语，从20世纪开始，以1924年确定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为转折点。在西方语法理论框架的影响下，汉语出现欧化语法的趋势。

为了便于称说，往往把周代语言称之为先秦汉语或周秦汉语。所谓“上古汉语”，通常包括周秦两汉语言。

一、字词音节结构的演变

周秦语音有复辅音，没有音位性声调而可能有伴随性声调，闭音节较多或辅音尾较多，音节结构通常是CCVC型。根据沙加尔的研究，原始南岛语（“原始夷越语”）的语词是复音节的，它的不少后代语言的音节缩短了，上古汉语的语词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单音节结构。



例如：

汉字	原始华夏语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白	* burak	* brak	* bak
刮	* kurut	* kwrat	* kwat

依据这一假说，华夏汉语"字词"音节结构经历了从双音节到复辅音单音节，再到单辅音单音节的演变过程。如果再考虑到秦汉以后汉语双音节合成词的大量产生，华夏汉语的"字词"语音结构表现为双音节→复辅音单音节→单辅音双音节的演变轨迹。

1. 原始华夏语的"字词"的语音结构可能是双音节性，即CVCVC。

2. 周秦时期，由于前一音节的元音弱化渐次脱落而变为复辅音音节结构，即 CCVC。

3. 汉魏以后，复辅音的单化促使汉语音节结构趋于单辅音化，即出现 CVC。

4. 中古以后，字词音节结构产生开音节化和零声母音节化。后置辅音渐次失落，先是阴声韵浊塞尾，接着是入声韵清塞尾（成为单韵母，或以元音性韵尾做补偿），最后是阳声韵 - m 尾与 - n 尾的中和或鼻化韵的出现。前置辅音影 ʔ、喻 dj、微 ɱ、疑 ŋ 等弱化脱落，零声母音节增多。形成汉语的(C)(V)V(C)与(C)(V)V(V)结构。

5. 对字词语音结构单音节化、辅音丛单化以及声母和韵尾逐步失落所做的补偿，除了声调的形成、单元音的复化（介音的增加、元音性韵尾的出现）以外，还有合成构词法（词根复合化、词缀附加化）的运用。合成词的产生表示原来的字词已弱化为"语素"（词根；词缀；音节字），从而使现代汉语的字词以新的方式重返双音节结构，即(C)V(C)·(C)V(C)。

二、韵母结构要素的演变

1. 韵腹或元音系统的演变

上古汉语元音系统的构拟，经历了一个观念上从音素到音位，数量上从繁多到简少的过程。第一阶段，构拟的元音系统最为复杂。高本汉在《汉语分析词典》(1923)中，最早拟订了15个，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1948)改订20个。第二阶段，逐步简化元音系统。首先简化元音系统的是钱玄同的《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1934)，依据传统的阴阳入对转原理，假定为8个。王力《汉语史稿》(1957)吸取了钱玄同的原则，简化为5个，但后来在《同源字论》(1978)中又确定为6个，另有2个介音。陈复华、何九盈的《古韵通晓》(1987)中改拟为单元音6个，复元音3个。包拟古(N. Bodman)的《原始汉语和藏语》和白一平(H. Baxter)的《对上古汉语音韵的若干建议》，分别从汉藏语言比较和音系内部结构出发，提出"包一白假说"6元音系统。张琨提出的是5元音系统。第三阶段，元音系统极端紧缩。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运用音位分布理论，采取内部构拟法提出4元音。周法高《论上古音》(1969年)把主要元音简化为3个。蒲立本《魏晋声韵研究》(1977年)走得最远，提出2个元音系统的假说。

依据拙文《古韵十二摄三十六部系统之假定》，[①] 从内部构拟法和音位前后对立的原则出发，现提出6元音音位系统说：

	前	后
次高	I(支系)	U(幽系)
半高	e(之系)	o(宵系)

① 《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

低　　　　a(鱼系)　　　　ɒ(侯系)

由于原始语言的面貌不清,上古汉语元音的构拟歧异、音系格局变化和元音演变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目前还难以翔实阐述韵腹元音的历史演变轨迹。

2. 韵头或等呼的演变

(1)上古时期,没有介音的对立,可能有辅音唇化 - w - 辅音(kw、khw、gw)与非唇化(k、kh、g)的对立。

(2)中古时期,唇化 - w - 辅音与 u(wu)、o(wo)元音形成合口,与非圆唇元音 a、e 等形成没有 u 与有 u(ua、ue)的开合对立。

(3)近古时期,辅音(见系)通过腭化 - j - ,形成 - i - 介音与 - u - 介音(原来的合口)的对立。介音 - i - 与 - u - 的结合形成 - y - 介音。有 - i - 、- u - 、- y - 的元音与没有介音的元音(a、o、ɤ、ɿ、ʅ)的相对立,最终形成"开齐合撮"四呼对立的格局。

汉语等呼的实质是辅音和元音的唇形变化,所谓 - u - 为圆唇化,所谓 - i - 为展唇化,所谓 - y - 则为 - i - 的圆唇化。合口呼 huaŋ 的实际读音并不是字母排列的线性序列,而是辅音和元音的同时圆唇化,其动作过程是预先合口然后发音。

3. 韵尾的演变

(1)上古早期,汉语音节结构都是闭音节,典型格式是 CVC 或 CCVC 结构。阴声韵带 - b、- d、- g 浊塞尾,阳声韵带 - m、- n、- ŋ 鼻塞尾,入声韵带 - p、- t、- k 清塞尾。

(2)上古中期,阴声韵的 - b、- d、- g 浊塞尾渐次脱落,阴声韵演变为开音节。

(3)近古早期,入声韵的 - p、- t、- k 清塞尾趋于中和且逐步弱化,江淮语和吴语的 - p、- t、- k 中和为喉塞尾 - ʔ。由于北方民族语音系统中没有喉塞音,在换用汉语而形成北方汉语的过程

中，其塞韵尾失落而成为开音节，或读成短元音，或读成延长音使元音双化，或保持独立的声调调位。

(4)近古中期，阴声韵鼻塞尾的 - m 与 - n 中和，北方话中仅剩下 - n 与 - ŋ 的对立；江淮语和吴语中一些方言的鼻塞尾 - n、- ŋ 渐趋中和，或混化为鼻化韵，或脱落为开音节。

三、声母的演变

尽管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以现代汉语方言没有复辅音孑遗为理由，长期拒绝上古汉语具有复辅音的假说，但这一假说还是渐渐被海内外汉语音韵学界广为接受。但是，关于复辅音单化的动因和机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复辅音单化，在什么条件下导致前辅音失落，在什么条件下导致后辅音失落，迄今为止尚未深入详尽的研究。

复辅音单化的动因和机制，还是应当从民族融合与语言混合方面去进行探索。汉魏之交，是秦汉以后中原自乱、外族拥进的第一次大动荡时期。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之中，华北地区到处是战乱动荡和封建割据。初平元年(190)，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 200 里内的数百万民众强行西迁，为中原汉族大规模外迁之始。初平三年(192)，有一二十万原籍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士兵及其家属迁往蜀地。另外，从华北迁往江东吴地的汉族移民，大都率领宗族和部曲同行。在中原汉族向四处迁徙的同时，北方匈奴、鲜卑、乌桓纷纷内迁华北，西部的氐羌曾经攻陷洛阳，江汉地区的苗蛮也乘机北涌中原，在华北地域形成了汉族与匈奴、鲜卑、乌桓及苗蛮各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因此汉魏之交的动乱和迁徙，可能是造成中原汉语复辅音单化的动因。至于复辅音单化的机制，应当从接触语言的特征比较和语言混合的模拟过程中去深

入揭示,此处暂且存而不论。

原始汉语的单辅音系统大致包括四类:重唇(帮组)、舌头(端组)、齿头(精组)、喉音(影组),以北方汉语的演变为历史层次,从古到今单辅音系统的变化线索大致如下:

原始	唇音		舌音			齿音		喉音	
上古时期	重唇 帮		舌头 端	正齿 章	正齿 庄	齿头 精	浅喉 见	深喉 影	
中古时期	重唇 帮	轻唇 非	舌头 端	舌上 知	正齿 照	齿头 精	浅喉 见	晓 匣	影 喻
近古时期	双唇 塞/鼻音	唇齿 擦音	舌头中 塞音	舌尖后 塞擦/ 塞音	舌面前 塞擦/ 塞音	舌尖前 塞擦/ 塞音	舌面前 塞擦/ 塞音	舌面后 塞/ 擦音	零 声 母
汉语拼音	b/p/m	f/v	d/t/n/l	zh/ch/sh/r	j/q/x	z/c/s	j/q/x	g/k/h/ø	

1. 上古晚期:喉音分化为深喉(影 ʔ)与浅喉(见 k)对立;舌头音(端 t)分化出三等舌面前音(章 t→ȶ);齿头音(精 ts)分化二等舌叶音(庄 ts→tʃ)。

2. 中古时期:二等舌叶(庄 tʃ→tɕ)与三等舌面前(章 ȶ→tɕ)中和为正齿音(照 tɕ);舌头音(端 t)分化出舌上音(知 t→ȶ);重唇音(帮 p)分化出轻唇音(非 p→pf)。

3. 近古时期:部分正齿音(照 tɕ→tʂ)与舌上音(知 ȶ→tʂ)中和为舌尖后音[tʂ];浅喉音(见 k)分化出腭化音(见 k→kj→tɕ);腭化舌面前音(见 tɕ)、部分齿头团音(精 ts→tɕ)和部分正齿音(照 tɕ)中和为舌面前音[tɕ]。

另外,由于北方民族语音系统中没有辅音清浊对立,从中古以

来的多次语言换用致使汉语浊音 b、d、ɖ、dz、dʑ、z、ʐ、g、ɣ 等中和为清音。同样，单辅音分化与音变的动因和机制，也应当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融合与语言混合方面去进行探索。

四、声调的形成与演变

依据汉语南岛语同源说，原始汉语词为双音节结构。依据中古的声调分类，四声在《诗经》中通押，没有音位性声调；再参照同源语言藏语的声调是后起的，由此推断华夏汉语的声调也是后起的，其演变机理是为了保持语词的区分度而对音节结构单化的语音补偿。

第一阶段，当单词语音结构是双音节时，原始华夏语是非声调语言；第二阶段，当单词语音结构是复辅音音节并带塞音尾时，周秦时期的华夏汉语出现伴随性声调；第三阶段，在单词语音结构单辅音化和辅音尾失落过程中，汉魏时期的汉语逐步出现音位性声调；第四阶段，齐梁时期，汉语声调定型为四声八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第五阶段，唐宋以后，随着深入而持久的北部汉语的阿尔泰化，沿江和北方区域声调逐渐减少。闽语、粤语 8 个左右，赣语、吴语 6～8 个，江淮语通泰方言 6 个，宁扬淮方言 5 个，以上方言都保留入声调。北部中原方言 4 个，西北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一些汉语 3 个，清代迁往俄国境内的原甘宁地区居民的东干语 2 个。

随着北方汉语声调的急剧减少，同时一些字调在语流中弱化为轻声，显露出声调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也许，随着北方汉语未来复音词的越来越多，而声调最终可能趋于消失。由此构成了华夏汉语声调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即无声调→伴随性声调→音位性声调→声调减少→弱化调出现→趋于消失的演变轨迹。

五、词法结构的演变

1. 上古汉语，由于语音结构比较复杂，因此单音节单纯词为主，双音节单纯词为次，复音节合成词更次。双音节单纯词主要有四种类型：联绵词（双语素的含义磨灭；原始双音节词的孑遗；远古外来词）；叠音词（音节协调；语义强调）；附音词（加衬音；表示范畴的音节，其含义磨灭）；音译词（外来词）。复音节性合成词主要有两种类型：同根重叠和固定词组。

2. 中古汉语，由于语音结构趋于简化，复音节合成词增加。复音节合成词主要有两种类型：复合词（词根不同，词根或为自由语素，或为借同语素）；重叠词（词根相同，词根为自由语素）。

3. 近古汉语，由于语音结构进一步简化，不仅复合法成为汉语构词途径的主流，而且派生词逐步增多。派生词可以分为三种：前缀化（表示范畴的音节含义）、后缀化（名词的子化与儿化、副词和形容词的然化、形容词的重叠性后缀等）和中缀化。

在汉语从单纯词到合成词的演变过程中，汉语语素分为构词位置灵活的自由语素（词根语素）与构词位置固定的黏着语素（词缀语素），自由语素又分为可单独成词的成词语素和不可单独成词的非成词语素。随着上古表示词单位的汉字蜕变为近古表示语素单位的汉字，汉字的性质就从表词文字转变为语素文字。

六、句法结构的演变

华夏汉语处于黏着型成不完全屈折型阶段时，语序并不是刚性的语法手段。随着形态失落向孤立型方向发展，一些附加成分或实词虚化为虚词，语序和虚词逐步上升为主要语法手段。黏着词缀和独立虚词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虚词的汉字表示方式却

突出了虚词的独立个性，强化了汉语类型的进一步孤立化。

在周秦汉语中，南方型的 SVO 及 NA(顺行结构)与北方型的 SVO 及 AN(逆行结构)共存，秦汉以后逐步稳定为 SVO(顺行结构)与 AN(逆行结构)。根据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以动作—施受关系、修饰—被修饰关系为语序结构的观察点，世界语言通常的两种语序结构模式是 SOV—NA，或者 SVO—AN。既然动作—施受关系、修饰—被修饰关系二者的语序结构方式具有内部制约性，但是为什么汉语却突破了这一内部制约性？这一不符合一般结构类型学的特点，给许多语言学家留下了不解之谜。

就东亚大陆来说，以汉语作为参照，北方阿尔泰语和西方藏缅语是逆行结构 SVO—AN，南方孟高棉—苗瑶—侗台—加岱—印尼语是顺行结构 SVO—NA。由于原始华夏语的基层是原始南方语，覆盖层面是原始藏缅语，由于秦汉以后汉语在南北语言的交融中推移融合发展，因此才形成了 SVO(顺行)与 AN(逆行)相结合的语序模式。在动作—施受关系中采取了 SVO，在修饰—被修饰关系中采取了 AN。汉语的这种不符合一般结构类型的 SVO 与 AN 语序，同样表明了华夏汉语的混成性质。唐宋以来，北方汉语受阿尔泰语的持续影响出现了 S(把)OV 格式，致使近现代汉语形成以 SVO 为主、又兼有 SOV 特点的结构类型。

七、语言类型的演变

语言混合既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又是文化交融的必然。语言学上有一条规律，语言成分越混杂，形态成分丢失越多。克里奥耳语的形态都大大少于源头语言，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形态。英语是欧洲语言中形态成分脱落最多的语言。公元前 5 世纪，迁入英伦三岛的凯尔特人的语言成为英伦三岛上的原居语言。公元 5 世

纪，说西支日耳曼语的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相继迁入英伦三岛以后，不同方言之间相互接触交融，进入古英语时期(450—1150)。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几次大规模入侵并称王英伦，东支日耳曼语词语大量涌进英语。1066年，说罗曼语的法国人征服英国，导致英语进入中古时期(1150—1450)。三百年中，法语和拉丁语分别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和教会、学术语言，对英语的演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英语的词尾变化减少和语法功能大大减弱，原先的自由语序OVS、OSV、SOV、SVO被固定为SVO，出现了从综合结构向分析结构的发展趋势。随后，英语进入近代英语时期(1450—1945)，随着英语的世界性扩展，非欧人融入英人(现代英国人有十分之一的黑人血统)，进一步加快了英语的分析型变化，以致20世纪初的叶斯泊森(O.Jespersen)不得不提出不借助形态变化分析词句的"三品说"。从1945年，英语进入当代时期，"美国英语"的地位得到确认。有人预测英语的复数21世纪会消失，也许未来的英语将会成为基本上没有形态变化的准孤立语。

在漫长的7000年中，中国语从太古语、华夏语到汉语，多向性、层叠性的接触、交流、换用和混成致使形态逐步失落，最终蜕变为无形态语言。原始华夏语的黏着性词缀可能有辅音性和音节性两种。随着形态脱落和词缀离散化，在华夏汉语类型孤立化的进程中，一些音节性词缀与实词蜕变为虚字。从隋唐开始，北方阿尔泰语对汉语的深人影响，导致了汉语时体助词的产生。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蒙古元与清统治中国，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语的汉化，致使近古汉语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黏着成分。华夏汉语的语言类型从原始黏着型，经由不完全屈折型而演变为孤立型。除了华夏汉语由于语言混合从黏着型演变成孤立型，在历史上，与

南岛语同源的佪台语和源于印尼语的回辉语，本来都是黏着型，但由于接受汉语的深刻影响而分别转变为孤立型。当然，孤立型不是语言类型演变的终极，演变为孤立型的语言，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可能发生类型变化。明代从江南迁往青海同仁的江淮语，由于受当地强势语言藏语的影响，五百年左右就从孤立型演变成黏着型的五屯语。

第十三章 语言混合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Vendryes)认为:“使语言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不断发展的理想几乎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相反,相邻语言的影响在语言的发展中常常起重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语言的接触是历史的必然,而接触必然会引起渗透。”[1] 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以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导向,像持有“语言糟蹋论”观点的许多欧洲人一样认为,一方面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只能是征服式的一方“吃掉”一方,另一方面“洋泾浜”这一词语被染上“殖民主义”的贬义色彩,继而形成的“语言污染论”在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

近二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界,主要是民族语言学界,对中国境内的混合语言和语言混合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国语言

① 岑麒祥、叶蜚声译:《语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0页。

学界对混合语的兴趣和关注，成为当代中国语言学和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第一节　混合语研究的历史回溯

世界语言发展史表明，语言的演变往往与语言的相互影响密切相关。依据语言之间的影响程度，可以把语言接触归纳为三种类型：

1. 语言渗透。以借用方式造成的语言渗透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中国境内的语言接触大多属于双向渗透。

2. 语言换用。由借用对方的语言成分到直接使用对方的语言，经过双语制直到最终放弃本族语而完全换用对方语言。被换语言以底层方式保留了本族语的孑遗，目标语言在融合对方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异，从而出现了对被换用语言的人们来说是语言换用，而对目标语言来说则是语主局部嬗变的现象。

3. 语言混合。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强烈的相互影响，经历皮钦语(pidgin)和克里奥耳语(creole)两个阶段，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来源语中任何一种语言的混合语(mixed languages)。与中国大陆语言学概论教材中通常所说 pidgin 源于上海人对 business 的发音、creole 其义为混血儿的说法不同，据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耳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①] 中所引用文献，pidgin 是广东人发 business 的变音而形成的；creole 源于拉丁语的 creare(创造)，葡萄牙借作 criar(抚养孩子)，在巴西人葡萄牙语中演变成 crioulo(土著奴隶)，后扩展到泛指在美洲出生的欧洲或非洲后裔，又引申为这些

① 《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4 期。

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这个词借到英语里就成了 creole，而且慢慢地变得专指混合语。

石文中叙述，混合语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对混合语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兰姆（Van Name，1869—1870）。被誉为“克里奥耳语研究之父”的德国语言学家绪查德（Hugo Shuchardt，1880—1914）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了混合语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本世纪初房德里耶斯的《语言》（1920）和叶斯泊森的《语言》（1922）都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洋泾浜语和混合语。但是，许多欧洲人把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看作殖民地人民对欧洲语言的糟蹋，并以此来证明殖民地人民低能，而无法学好宗主国的语言。不少欧美语言学家认为混合语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不良产物，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语言糟蹋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模式眼光，致使混合语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为了全球参战的需要，加强了对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和教学，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也就促使混合语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语言学家霍尔（R. Hall）是第一个正式研究中国洋泾浜英语的语言学家（1944），又是为洋泾浜语正名而大声疾呼的第一人。他从理论上总结了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的生命周期，并且以混合语的研究结果来验证语言变化的理论，对历史语言学方法论做出了重大贡献（1959）。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混合语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1959 年出席牙买加西印度群岛大学的混合语研讨会的一些学者，自称为克里奥耳学家，创立了“克里奥耳学”这个新名词。1973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了《洋泾浜信使》的研究通讯，1989 年成立了国际性的洋泾浜语与克里奥耳语学会。由此可见，混合语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中国境内的混合语言和语言混合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现将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或研究中国境内的语言）近年来（1981—1996）关于混合语研究的一些论文（以下论文被确定为混合语学研究的论文是我的主观认定，并不一定是论文作者的论旨）分类编录如下（本章内引文，仅在如下作者后加注该论文年份）。

一、艾努语

1. 赵相如、阿西木：《艾努语的数词——兼论艾努语的性质》，《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

2. 赵相如、阿西木：《新疆艾努人的语言》，《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二、五屯话

3. 陈乃雄：《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4. 陈乃雄：《五屯话音系》，《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

5. 陈乃雄：《五屯话的动词形态》，《民族语文》1989年第6期。

三、卡卓话

6. 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

7. 和即仁：《云南蒙古族语言及其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

四、本话

8. 陈乃雄：《云南的契丹族后裔和契丹字遗存》，《民族语文》

1994 年第 6 期。

五、五色话

9. 陈其光、张伟:《五色话初探》,《语言研究》1988 年第 2 期。

六、回辉话

10. 郑贻青:《海南岛崖县的回族及其回辉话》,《民族研究》1981 年第 6 期。

11. 欧阳觉非、郑贻青:《海南岛崖县回族的回辉话》,《民族语文》1983 年第 1 期。

12. [法]A.G. 奥德里古尔:《海南岛几种语言的声调》,《民族语文》1984 年第 4 期。

13. [美]P.K. 本尼迪克特:《澳泰语的相似语言——海南一种有声调的占系语言》,日本《亚非语言计算分析》1984 年第 22 本,汉译本见《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第 9 期。

14. 郑贻青:《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民族语文》1986 年第 6 期。

15. 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民族语文》1988 年第 2 期。

16. 郑贻青:《回辉话中的汉语借词及汉字读音》,《民族语文》1995 年第 5 期。

17. 郑贻青:《论回辉话声调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语文》1996 年第 3 期。

七、村话

18. 符镇南:《海南岛西海岸的村话》,《民族语文》1983 年第 4

期。

19. 欧阳觉亚、符镇南:《海南岛村话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8 年第 1 期。

八、那斗话

20. 符镇南:《黎语的方言——那斗话》,《民族语文》1990 年第 4 期。

九、河州话

21. 马树钧:《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民族语文》1984 年第 2 期。

22. 仁增旺姆:《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民族语文》1991 年第 1 期。

23. 喜饶嘉错:《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读后》,《民族语文》1991 年第 4 期。

十、甘青汉话

24. 李克郁:《青海汉话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1987 年第 3 期。

25. 贾晞儒:《青海汉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语文》1991 年第 5 期。

26. 宋金兰:《甘青汉话选择问句的特点》,《民族语文》1993 年第 1 期。

十一、党项/西夏语

27. 陈乃雄:《〈河西译语〉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中国语言

学报》1982年总第1期。

28. 聂鸿音:《西夏词源学浅议》,《民族语文》1995年第5期。

十二、东乡语

29. 余志鸿:《从〈蒙古秘史〉语言看东乡语》,《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十三、原始华夏汉语

30. 李葆嘉:《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语言学通讯》1990年1~2合期。

31. 李葆嘉:《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12月;又题名《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32. 吴安其:《十二兽古藏缅数词考》,《民族语文》1994年第6期。

33. 李葆嘉:《天问:华夏汉语祖先安在——论华夏汉语的混成发生和推移演变》,[韩]《中国人文科学》1994年第13辑。

34. 李葆嘉:《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语文研究》1995年第4期。

35. 陈其光:《汉语语源设想》,《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

十四、原始朝鲜语

36. 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十五、其他相关文献

37. 杨应新:《论语言发展的多向性及对策》,《民族语文》1990

年第 5 期。

38. 李葆嘉:《试论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4 年第 1 期。

39. 梁敏:《对语言类型变化的一些看法》,《民族语文》1995 年第 6 期。

40. 周耀文:《论语言融合——兼评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观》,《民族研究》1995 年第 6 期。

第二节　中国现存混合语的研究

中国境内的混合语往往产生在西北—西南—云贵—广西—海南这一语言文化走廊地带,民族语言学家往往是混合语的首先发现者和研究者。这一走廊,不仅是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毗邻地带,也是周边少数民族频繁接触相互杂居的交融地域,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混合语。

1. 汉语和阿尔泰语的混合。甘肃唐汪话是汉语和东乡语的混合。青海汉语“河州话”具有汉语和阿尔泰语混合的性质。

2. 汉语和藏缅语及阿尔泰语的混合。青海同仁县一部分土族人所操的“五屯话”,是一种以汉语为基础、长期受到藏语等语言影响而形成的混合语。

3. 白语和彝语的混合。居住在云南的卡卓(Kha^{55} tso^{31})人,原是蒙古族一支,所操卡卓语为白语、彝语混成的混合语。

4. 侗台语和汉语的混合。广西融水县永乐乡自称为 e^{55}的壮族人,操一种由壮、侗、仫佬、毛难、汉五种语言混成的“五色语”。

5. 南岛语和汉语的混合。居住在海南岛的回族所说的回辉话,是属于印尼语言的占语和明代汉语官话的混合。

6. 阿尔泰语和印欧语的混合。新疆南部艾努(Ejnu)语是一种伊朗语言在维吾尔语强烈影响下发生质变的混合语。

现对正在使用中的五屯话、卡卓话与回辉话这三种混合语的研究状况试加述评。

一、五屯话:汉语和藏语的混合

五屯话是中国语言学界较早注意并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混合语种。五屯话分布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是当地一部分土族居民使用的一种长期受到藏语强烈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演变而成的混合语。五屯人的来历,陈乃雄(1982)起初认为最早来源于四川,后来有人指出五屯人来自江南。陈乃雄(1988)更改了原先的说法,进一步以语音资料证明,五屯人约在明初,最迟不晚于明朝万历年间,从南京一带迁来。受当地土族首领统治,经过几百年繁衍,今天已自称"土人"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正像许多云南汉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明代从南京迁去的一样,这些西南、西北的江淮移民的所谓"南京"并非限于今南京辖区,当包括今苏皖江淮一带。五屯人原说的江南汉语应为明代江淮官话。

依据传统看法,生产力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在与生产力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的接触中,后者的语言对前者的语言影响较大。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在特定的生态环境、政治格局、人口比例之下,影响力较大的语言是在当地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适应当地生态环境、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语言。南京或江南的农耕生产力与文化水平,虽然比青海地区的畜牧生产力与文化水平高得多,但是从江淮迁来的汉人,由于青海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原因,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农耕生产而改从畜牧生产。再加上政治格局中处于被统治地位与人口比例占少数等因素,就不得不学习

当地的通用语言藏语，但又尽力保持汉语而不愿彻底换用，以致原先的江淮官话久而久之就逐步演变成了后世的五屯话。如今，大多数五屯人是双语者，内部通行五屯话，与藏民等交际时则用藏语。

五屯话有 8 个舌面元音和 2 个舌尖元音，和汉语普通话一样，舌尖元音可以与舌尖前辅音和舌尖后辅音相拼。但是，与普通话由于互补因而 2 个舌尖元音与[i]同属于一个音位不一样，在五屯话中归纳为不同的音位。五屯话有 13 个复元音，有的源于汉语，如/ei/、/ia/、/ie/、/io/；有的源于藏语，如/yi/、/iu/。总的说来，五屯话的元音受藏语影响较小。与元音相比，五屯话辅音受藏语影响较大。五屯话有 33 个单辅音，很多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辅音。如/z/只出现在藏语来源词里；而/l/只出现在汉语来源词里。受藏语影响，五屯话有 24 个复辅音，这些复辅音几乎全见于藏语来源词之中。只有/tq/和/lq/由汉语的/t/和/l/演变而来并且目前尚不稳定，有时仍读作/t/和/l/。声调在五屯话语音系统中变异最为明显。可能是由于多音节词的增多和受到没有声调的同仁藏语的强烈影响，五屯话中基础来源语汉语的声调消失了，转化为一种词重音。如："买米"[`mime]、"卖米"[mi `me]，拆开来并无轻重差异，组合时出现相对不同的轻重，这明显是声调消失后的孑遗。

五屯话中汉语源词占 55%。藏语源词虽然只占 20%，但是已经渗透到了五屯话词汇的每一个角落。汉藏通用词与合璧词在五屯话词汇中占 5%。在表达某些概念时，除了有汉语源词和藏语源词通用的情况，还有以汉语语素和藏语语素组合而成的汉藏合璧词。或在藏语词根的基础上接缀五屯话特有的词缀，如："出发"[lamalan]（藏）—[lamalan`la]（五屯）。或在汉语词的基础上附接藏语词缀，如："犯人"[lo`ke wa]，其中的[lo`ke]源于汉语的"劳改"，

[wa]是藏语表人的词缀。异源通用词和合璧构词法是五屯话在词汇方面和构词法方面的独有特征。这些特点,都鲜明地表现了源于汉、藏语言的混合语——五屯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性。

五屯话的动词体系表现为由基础来源语汉语的孤立结构类型向黏着结构类型变化的趋向。五屯话的动词有数十种形态变化。表示将做未做的行为的[dzi]、表示过去式的[lio]、表示完成式的[guo],这些动词形态后缀大都是由汉语助词"着"、"了"、"过"演变而来。表示领属关系的[ta]和表示处所的[li],也来自汉语的"的"和"里"。汉语的动词虽然也借助虚词表达动作行为的时体,但是无论从使用规模上,还是从思维方式上,都与五屯话有着质的差异。五屯话的语法结构表现出与汉语完全不同的特征,最突出的是SOV语序。与青海汉语方言里SOV虽然较为普遍但也可以是SVO不同,五屯话一无例外地只有SOV结构。

与汉语语法手段相比,五屯话的显著特点除了有类似"格"的语法形式,还有与保安语很相似的"数"和祈使句尾。依据五屯话与土族人所使用的保安语的相似之处,可以推测五屯话形成过程中接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这可能是毗邻的土族语对五屯话渗透所留下的痕迹。当地的土族(自称"蒙古尔",又称"察罕蒙古尔"即"白蒙古")与五屯人在历史上曾同属一个千夫管辖,来往关系十分密切。贾晞儒(1991)认为:"(五屯人)现在讲的语言是夹杂着汉语词又类似阿尔泰语系保安话的一种特殊语言"。在对五屯话和保安语作全面比较研究以后,也许可以说:五屯话是汉语、藏语混合且受到保安语渗透的混合语。

二、卡卓语:白语和彝语的混合

卡卓(也写为“嘎卓”)语是现在云南通海县(由旧治通海、河西两县合并)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因其居民自称 $Kha^{55}tso^{31}$ 而得名。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一带已经是白族和彝族的势力范围。1253 年蒙古军队进入云南消灭大理国后,元代的河西成为蒙古军队的屯驻要地。在白族居民占多数的环境中,蒙古士卒与当地白族妇女通婚,白语成为蒙古儿童的母语,蒙古士卒也逐步换用了白语,本族蒙古语趋于消亡。明初派迁大批汉族人到河西屯田,当地的白族居民逐渐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只有居住在通海的部分操白语的蒙古族居民,没有与汉族同化。但他们在与当地彝族居民的长期接触中,特别是与彝族通婚中,所使用的白语又受到彝语的强烈影响,从而形成了亦白亦彝的卡卓语。

卡卓语与白语在语音方面保留着较多的一致性。卡卓语和白语都只有 23 个辅音,塞音和塞擦音不分清浊,都没有舌尖后塞擦音。元音方面,卡卓语和白语有音值基本相同的 16 个元音。但是,卡卓语在白语 4 种音节结构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源于彝语的音节结构类型[m]、[n]可以自成音节,如“做”[m^{33}]、“牛”[n^{33}]。此外受彝语的影响,卡卓语音节以单元音为主,复元音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里。卡卓语与白语之间 821 个常用词的比较结果,同源比例占 24.8%;卡卓语与彝语之间 850 个常用词的比较,同源比例占 44.2%。卡卓语的语序和彝语的语序基本相同,都是 SOV 式,而白语的语序是 SVO 式。这些都证明,彝语对卡卓语的词汇和语序影响较大。

由此可见,作为混合语的卡卓语,在语音层面上保留了白语语音基层,在词汇与语序层面上被彝语所覆盖。然而,卡卓语既然是

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其中是否有元代蒙古语残留的蛛丝马迹，还有待深入研究。据陈乃雄(1994)的研究，同样生活在云南的契丹后裔本人所说的本话还有个别契丹词语的遗存。

三、回辉话：占语和汉语的混合

宋元以来，由中亚或西域迁入中国境内的波斯、阿拉伯、回纥的穆斯林，起初使用各自的本族语，后来逐渐换用汉语。但是只有海南三亚市回辉、回新两乡的回族居民，其内部却使用一种特殊的回辉话。三亚回族是10世纪末以后陆续从东南亚的占城迁来海南岛的，最晚一批是在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至今也已有500年的历史。P.L.本尼迪克特在《海南岛的占城移民》(*A Cham Colony on the Island of Hainan*)[1] 中认为海南岛的回民语言与占语有关。欧阳觉亚、郑贻青(1983)，仅把回辉话同一些壮侗语言从类型上做比较，在没有能把回辉话与其原居地占语做比较的情况下，就否定了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认定回辉话和占语完全不同，与壮侗语族语言近似。他们的文章发表后，回辉话的研究再度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法国奥德里古尔(1984)与本尼迪克特(1984)相继撰文认为，回辉话与占语有明显的对应关系。郑贻青(1986)将回辉话与占语群的拉德(Rhade)语比较以后，表明回辉话与拉德语有亲缘关系，但不能忽视回辉话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影响下，类型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回辉话是占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占语和印尼语同源，属于南岛语系，其单词是双音节结构，虽然现在的回辉话已经是单音节语言了，但以占语作为基础来源语的回辉话的前身无疑是双音节语言。在单音节化的过程中，作为

①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1年6月。

补偿手段回辉话产生了声调。回辉话和印尼语之间的同源词,对应部分多数在印尼语的第二个音节。如:"田"[ma](回辉)—[huma](印尼)。研究者由此认为,源于占语的双音节词,在周围单音节语言(汉语方言、黎语)的影响下,双音节词的前一个音节脱落,转变为单音节词。这使人联想到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①中的研究,原始南岛语发展为上古汉语曾经历从单词双音节结构到单音节结构的演变过程。例如:"白" * burak < * brak < * bak,用公式表示如下:VCVC < CCVC < CVC。李葆嘉(1994)提出,促使这一演变发生的动因缘于华夏汉语发展过程中的语言混合。可以认为,由占语到回辉话的单音节化正是"基础来源语"占语和"混入来源语"汉语相互混合的结果。

在语音方面,回辉话有一些与汉藏语言明显不同而与南岛语言相同的特点。如没有以元音开头的音节;元音分长短两类;韵尾[i]、[u]、[n]后面带喉塞音[ʔ],韵尾前面的主要元音是紧元音;辅音[ʔb]、[ʔd],前面有先喉塞音等等。回辉话以单音节词占优势,是典型的孤立结构,只有少量带[a]、[i]等前缀的双音节或三音节词。回辉话词语的合成结构通常为 NA 结构,如:"旋风"[nin^{33}(风)vi^{35}(转)],这也是南岛语系的构词特点,但也有少数合成词是 AN 结构。在语法方面回辉话表现出较多的汉语特征,最主要的是利用虚词和语序来表示语法关系,并且和汉语语序基本相同。与构词的 NA 结构相一致,回辉话保留着南岛语言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的特点。

三亚回民来自占城,占城回民来自何方?是否从阿拉伯经由海路而来并换用了当地占语?回辉话中是否还能发现阿拉伯语的

① 第 23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90 年 10 月。

孑遗呢？现在的三亚回族居民会讲汉语海南话（闽南方言），还会说军话（西南官话）、迈话与儋州话（粤方言的两种土语），回辉话究竟是与哪一种汉语方言的混合呢？还有不少回民会说当地的黎语，黎语是否对回辉话也有所渗透呢？

郑贻青（1995）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回辉话的汉语借词及汉字读音与海南岛上的几种汉语方言读音有一定差别，通过回辉话借词及汉字读音与汉语海南话、儋州话字音、军话、迈话的对比，推断回辉话汉语借词及汉字读音是来自比较古的汉语北方方言。郑文中所列回辉话 51 个汉语借词，“除夕”[sa:n^{33} sa^{55} za^{11}]当为“三十伇”；“春节”[nin^{11}]当为“年”（俗称“过年”，“春节”是民国初年的新词）。郑文认为：“回族子弟入学一直使用汉语汉文，其读音是一种接近军话的读书音，或称‘官音’、‘正音’……当时海南岛北部的儋县（古儋州）的汉人除了使用着一种汉语南方方言之外，由于各类官员以及文人学士的传播，当地还同时通行一种北方方言的‘官话’读书音……居住在这里的回族所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古‘官话’。”郑贻青的研究信而有征，有理由认为回辉话不是受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历史上通行官话的影响。只是对于这一近古官话，不宜含混地称为一种汉语北方方言。依据郑文所做的比较，已经可以推定出这种近古官话就是溯源于汴洛宋音演变而来的、以南京音为标准的明清江淮官话。

第三节　东亚历史混合语的研究

随着对混合语存在事实的认可与语言混合研究的日益深入，“语言污染论”注定成为历史的偏见。在中国，虽然没有那种将少数民族居民学不好汉语斥之为糟蹋汉语的观念，但并不是说所有

的语言学家都已经从源于欧洲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语言糟蹋论”或“语言污染论”的阴影中走出来。除了近代史上以西方殖民为背景引起的语言混合之外，有一个更为古老的事实，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语言的混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运动，混合语是特定的民族杂居状况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历史性产物，语言混合是新语种产生的一种模式。

从空间发现时间，历史混合语的研究也是中国混合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988 年，拙文《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根据新石器时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与三大历史传说系统的相互印证，提出原始南方语、原始藏缅语、原始阿尔泰语融合而成原始华夏语的假说，从文化史角度推定南方语和汉语的同源性。1990 年，沙加尔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证了汉语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可与考古文化学和历史传说学相互验证。1993 年，在拙文《语言的发生学研究》中，把语言的发生归纳为历时分化发生、共时聚合发生与克里奥耳语的混合发生三种类型。刘丹青评价：“关于现有语种的来源，各教材基本沿用单讲分化的谱系学说，然而这早已难以面对语种多元发生的大量事实。《概论》将语种的发生分为……三种情况，具有更加全面的解释力”。[①] 混合语存在的事实为语言混合发生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有力证据，语言混合发生的理论又为中国语言史和东亚语言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混合语言和语言混合的研究有着十分深广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无法解决的某些语言的系属问题，若能从语言混合的角度加以研究，或许可望找到答案。朝鲜语系属不明，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还是属别的语系？吴安其(1995 年)认

① 《改革、创新、飞跃与缺憾》，《汉语学习》1995 年第 6 期。

为，朝鲜语有一批身体部位、天地日月等名称词、动作词和数词与南岛语词有对应关系，语法框架又较接近，因此与南岛语关系密切。朝鲜语有关水稻文化的词与南岛语词的对应，说明朝鲜先民是稻作民族，而不是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

可以这样设想，古代朝鲜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其混入来源语是阿尔泰语。也就是说，辽东—朝鲜半岛的本初居民是操原始夷越语（即原始南岛语）的古夷越人。远古时代，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平原到江南湖泽丘陵一带，都是古夷越人的活动范围，以稻作为其主要生产方式。朝鲜族居住区域的北方是阿尔泰世界，阿尔泰语对朝鲜语的影响至少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契丹及契丹先民的语言对朝鲜语的影响长达十个世纪以上。阿尔泰居民先后进入辽东—朝鲜半岛，实行了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混合。另外，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古代夷越语和古代胡狄语都是黏着语言类型，它们的后裔语言现代南岛语和现代阿尔泰语仍然是黏着语类型。因此，发生在辽东—朝鲜半岛历史上的语言混合是属于同一种语言类型而分属不同语言谱系的两种语言的混合。主张朝鲜语归属阿尔泰语系的学者，仅仅注意到朝鲜语与阿尔泰语类型的相似性，而并未了解朝鲜语与南岛语语言类型的一致性和基本词汇的对应性。

依据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同源论”，潘悟云在《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 中认为，三亚回辉话可以视为原始华—澳共同语向古代汉语演变的中间环节的参照之一，为汉语演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李葆嘉试图从语言混合的角度探讨原始华夏语的起源，以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为背景，与历史传说相印证，贯通汉—

① ［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中国语言学报》专题论丛之八，1995年。

南同源论、汉—藏同源论与汉—阿同源论，论证了原始华夏语就是太古夷越语、太古氐羌语、太古胡狄语在中原地区长期互相渗透、换用、混成的结果。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关系而提出的三种同源论，在语言混合理论的阐释中得到化解，为揭开“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远古社会的面纱做了初步尝试。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孤立语是语言混合的结果，得出语言类型的演变从黏着型、屈折型到孤立型的结论，与欧洲语言中心论的屈折语型为最高语言类型论的臆断恰恰相反。

第四节　混合语研究的理论方法

与海外混合语产生的近代世界史上的殖民化背景不同，中国境内的语言混合的社会背景是多民族的自然杂居和文化交流。与国内存在过的广州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为当时中外贸易服务的市场需要也不同，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混合植根于长期的、共同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西方混合语言研究中的以宗主国语言为高层语与以殖民地语言为低层语的概念以及混合语形成的单一起源论、克里奥耳连续流、简化理论、普遍语法理论、低层语影响论和综合理论等等，不能机械地拿来阐释中国境内的混合语言和语言混合的现象。有些理论，比如单一起源论，用以解释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混合语言，明显是错误的。

有一些基本问题尚须探讨，语言渗透与语言混合如何界定与区分？混合语言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中国境内语言混合中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各是什么？

语言渗透是语言混合的起点，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渗透必然导致语言混合。比如历史上的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借入大量的

汉语词汇，历史上的英语借入大量的法语词汇，以致这些语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因为作为语主民族的这一群体的历史没有中断，这些语言面貌的巨大变化通常看作该语言的演变发展。

确定为混合语的语言，以现有的关系语言为参照，是一种既不属于A语言也不属于B语言的语种。一种情况下，操混合语的语主本身就具有混合性（如卡卓人），该语主是通过民族融合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另一种情况，即使语主比较单一（如五屯人），但由于长久脱离源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文化氛围，与源民族的经济方式、文化心理已经迥然不同。乃至源民族与原居地已趋模糊，甚至需要专家考证。所使用的语言与源民族的语言已有本质差别，因此必须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基础来源语的独立语言。一种语言是否确定为混合语，主要依据是语言的接触深度与语主的认同感觉。

语言学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语音和词汇是语言的表层或浅层，语法是语言的底层或深层，并且认为表层容易发生变异，而深层语法结构则根深蒂固。喜饶嘉错（1991）批评了这种机械分层理论，认为："按一般层次观念来说，语音、词汇、语义、语法都各有其浅层次和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具体语音是浅层次的，但语音的规则、系统、结构、框架则是深层次的，词汇、语义、语法也一样。"需要考虑的是，这种语言各子系统皆分深浅层次的划分，是否也以稳定而不易发生变异与否为标准呢？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语言系统中的语音、词汇、语法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因此，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发另外两个子系统的相关变化。各子系统内部也是密切关联的，如具体的语音和语音的结构、规则和系统是互为一体的。拙文《论

汉语音韵的文化内涵》[①] 中认为，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应当包括音位系统与词音系统两个层面，抽象的音位系统寓于具体的词音系统之中。持续的词音系统层面上的具体语音要素的变化必然导致抽象的音位系统层面上的规则、结构以致整个系统的变化。通过对混合语的研究可以发现，语言混合过程中，语音系统、语法结构以及语言类型的变化，都是缘于语词的大量借入。也许，个别的借词不会产生影响或者其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大量的借词不仅会使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发生改变，不仅会使一种语言的单词语音结构类型和构词方法发生改变，而且可以使借入语言的语音要素发生变化，由此引起音位组合规则、音节结构类型的改变，最终导致语音系统的本质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大量借词所带来的被借语言的构词方法（一种语言的词法结构 VO 或 OV 和 AN 或 NA，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以及语法范畴，可以引起借入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结构的改变，最终导致语法系统以致语言类型的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借词既是语言渗透的起点，又是语言混合的关键。中国民族混合语的研究表明，混合语中的语法结构往往与基础来源语差异程度较大，则更多地表现出混入来源语的语法特征。如上述的五屯话、卡卓语和回辉话的语法，都更多地表现出非基础来源语的特征。基础来源语的语音系统一般较为稳定、不易变化，基础来源语的词汇所占比例可大（五屯话）可小（卡卓语），但混入来源语的语法结构往往覆盖基础来源语的语法结构。

中国民族混合语的研究表明，语言的混合可以引起语言类型的转变。语言的混合可以从屈折语型变化为黏着语型（艾努语）；语言的混合也可以由孤立语型转变为黏着语型（五屯话）；语言的

① 《江苏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

混合可以从黏着语型蜕变为孤立语型(回辉话)。虽然孤立语型是语言混合的结果,但并非语言类型演变的终结。

至于不同混合语的个性特征,就词汇而言,具有一些多语通用词、合璧词是五屯话的词汇特点;由基础来源语的单词双音节结构变化为混入来源语的单词单音节结构是回辉话的词汇特点;混入来源语的词语大面积覆盖基础来源语的词语是卡卓语的词汇特点。

混合语言的研究,在中国起步不久,混合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处在趋于成熟之中。综合当前混合语研究的多个个案,这里尝试提出混合语言研究的五个步骤的系统方法。

1. 运用共时描写法。对假定性混合语言自身的详尽描写。

2. 运用历史追溯法。追溯语主的历史,追溯语主在历史上使用何种语言并了解该语言的周边语言。以此为基础,初步确定其可能性来源语(或称源语)。来源语可以分为基础来源语与混入来源语。语主原先使用的语言为基础来源语;后来渗透其中或覆盖其上的语言为混入来源语。某一混合语的来源语可以是两种,也可以是多种。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永乐乡,一部分自称 e^{55} 的壮族居民,使用一种由汉、壮、仫佬、毛难、侗等五种语言混合而成的“五色话”。不同来源语可以共时方式短时混合,也可以历时方式长期混合。

3. 运用源语比较法。将该语言与可能性来源语进行定性的和定量的比较。定性比较的结果,可能性来源语或者被确定为真实源语,或者被确定为虚假源语。如果出现后者,就需要重新寻找可能性来源语,再行比较。在一种语言有多种方言的情况下,应力求利用基础来源语的历史方言或参证后裔方言来与混合语比较,而避免利用非基础来源语方言进行比较。五屯人既然是明代由江

南南京一带迁出，原来的语言当是明代江淮官话，因此选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与五屯话比较并不恰当，应当利用明代江淮官话材料、参证现代江淮方言（选择此方言区内保留明代语言面貌较多的次方言）与之比较。当然，在基础来源语方言系属不明的情况下，利用基础来源语的共同语进行比较也是难免的。定量比较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分析计算出不同来源语在该混合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各自比例。

4. 运用动态阐释法。对该混合语要素的历时混合过程，进行社会的、文化的阐释。对该混合语的性质和特征，比如语言类型的转变，进行结构系统的阐释。

5. 运用理论抽象法。依据该混合语的研究引出语言混合的理论。多种混合语的研究将有可能在几种次类型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语言进化的模式，在对语言的演变性质产生认识的飞跃的同时，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理论。

总而言之，混合语言的研究和语言混合的研究前景非常广阔，深入研究中国境内及其毗邻区域之混合的语言和语言的混合，创建中国混合语言学或东亚混合语言学以丰富世界克里奥耳学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界的一项历史使命。

第十四章　现代语言起源的科学思考

关于语言的起源，现当代的欧美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突发型模式”，认为语言是现代人的独有特征，语言能力是随着脑子增大而在晚近迅速出现的一种能力；一种是“连续型模式”，认为语言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开始，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的自然选择而逐步成熟。所谓现代人或新人，是指我们这些具有意识表现力、艺术想像力和语言交际力的人类；所谓“现代语言”，就是指现代人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这么说，突发型模式是指“现代语言”即“语言”的起源，而连续型模式是指“泛语言”即“交际思维手段”的起源。

在有声分节语言出现以前，尽管人类祖先使用的具有一定结构性的交际手段可以看作“广义语言”的一部分，但是一旦将这种在动物性交换信息的手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非有声分节语言”与“有声分节语言”混为一谈，语言起源的讨论则含混不清而莫衷一是。为了避免把语言的起源和人类符号的起源相混淆，首先有

必要对“语言”做出明确的界定。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具有三个显著特点：1. 人类性。虽然人类的符号交际能力产生于和其他动物有着某种相似点的更原始的交换信息的手段，但是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信息交换的符号系统，就其抽象性、滋生性和开放性而言，与动物交换信息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所谓“动物的语言”是“语言”的泛化。2. 有声性。语言是以语音为能指的符号系统，用“语音”指称人类的“非语音符号交际工具”是引申用法。3. 分节性。语言的声音是以音节或音素为自然单位。表达一定语义的语音自然单位，不但由于具有稳定的音义二重性，与动物嗥叫的连续性发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与早期人类的连续性发音有着质的区别。只有首先讨论清楚“人类有声分节语言的起源”，然后才有可能在“非有声分节语言”与“有声分节语言”之间加以连续性沟通，以推测人类思维交际符号的历史演变连续统过程。

第一节　现代语言起源的考古解剖学思考

虽然“语言起源于劳动说”揭示了语言与社会劳动的依存条件，“语言与思维同时起源说”揭出了语言与神经思维的交互作用，但是，这些思辨性论断除了诱导人们把语言的诞生时间任意前推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忽视了有声分节语言出现的关键条件是人类发音器官的成熟。化石智人的发音器官是否能够发出清晰的元音和有效地控制发音气流，才是有声分节语言何时诞生的惟一准绳。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将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目光投向探索化石智人发音器官的功能状态时，就预示着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转向实证性。

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出许多不同的音素和清晰的音节，这是由

于喉部位置较低,在声带之上存在一个较大的音室——咽腔。除了人,所有哺乳动物喉部都位于喉咙高处,在能呼吸和饮水并举的同时限制了发音功能,只能依靠口腔形状的改变使声音发生些微变化。儿童的体质发育史折射了人类的体质进化史。为适应吸奶和呼吸同时进行的需要,婴儿和哺乳动物的喉部位置一样,但在18个月以后喉部开始下移,14岁时到达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认识到:如果能够确定喉部在人类祖先进化不同阶段的高低位置,就可以对这些个体的发音状况或语言能力做出若干判断。虽然发音器官这些软组织不可能作为化石保存下来,但是依据头骨底部哺乳动物是平直形而现代人是拱形这一差别,人类学家认为可以利用化石头骨底部的形状来模拟发音器官的构造,即依据颅底弯曲度来推断人类祖先的发音功能。

美国科学家选择了生存在距今4.5万年前的一个成年男子的化石。解剖学家爱德蒙·克里林(E. Crelin)制作了这位古典尼人的模拟声道。语言学家菲力普·利伯曼(P. Lieberman)利用计算机测定了通过这一声道模型可能发出的语音。结果表明,尼人不可能发出清晰的、分节的语音,其中包括像[a][i][u]这样的元音,原因在于尼人的口腔与喉部直接相连,没有现代成年人的咽腔或咽腔过于狭窄。由此推论——古典尼人没有现代人的这种有声分节语言。利伯曼认为"尼人文化的普遍水平表明,他们的有限发音能力看来已充分加以利用,因此他们具有某种类型的语言",而俄国学者帕诺乌(E. H. Панов)却认为"从尼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是那样复杂多样这一点来加以判断,他们的语言应是相当发达的了"。①利伯曼的"某种类型的语言"也许是含混语音伴随性手势语;帕诺

① 王钢译:《尼安德特人会说话吗?》,《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

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复杂多样性必然有相当发达的语言”，理由并不充分。语音天然为语言，但语言并非天然是语音，远古复杂多样的文化可以借助“非语音符号”来运作。有声分节语言的产生并不是需要或想要就可以“脱口而出”，必须有待于发音器官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

即使如此，尼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复杂多样性与声道的相当原始性（依据颅底的弯曲度，他们甚至没有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的声道成熟），仍然使人们陷入某种困惑和茫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方面，颅底曲度是否就意味着具有充分发达的语言？杰弗里·莱特曼（J. Laitman）认为，在化石记录上，发现充分弯曲的颅底的最早时间是在距今30万年～40万年之间的远古智人中，可是依据当时的“文化”状况，这些智人似乎并不可能具有充分发达的语言。另一方面，尼人的颅底曲度甚至不如200万年前的能人，这种进化上的退化是不可能的，自然界没有这样的实例。人类学家认为更为可能的答案是：尼人的头骨解剖学结构特征是对寒冷空气的一种适应，这种适应可能影响了颅底形状而又不至于明显降低发音能力，但是这一解释明显缺少说服力。[①]

既然尼人的颅底曲度较平直并非意味着他们的退化，那么是否可以对“颅底曲度与咽腔成熟度的相关性”这一预设提出质疑？根据英国与荷兰科学家的报告，他们通过检查提供一种平衡感的内耳机制，发现在10万年前进化为现代人的原始人，才是第一种完全直立步行的灵长类动物。[②] 这似乎在提醒：人类发音器官的成熟——咽腔与口腔的分离——与人类祖先的完全直立姿态有

① ［美］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等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带良编译：《人类祖先何时开始直立行走：耳朵泄露了其中的秘密》，《世界科技译报》1994年7月30日。

关。四肢爬行的哺乳动物口腔势必直接插入喉部，完全直立姿势的人类，才在口腔与喉部之间产生了一个弯道。与其说咽腔的形成与颅底曲度具有相关性，不如说与直立程度具有相关性。正是由于直立，人类才有了这一喉部与口腔之间的弯道；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弯道式咽腔，人类才有了对气流的缓冲控制能力，语音的分节才成为可能。现代人类有 50 种音素，而猿类大约只有 12 种。在具有一定数量的音素以后，决定现代语言形成的关键并不是音素的多少（巴布亚语言只有十几个音素），而是语音是否能够分节。只有语音的分节，才为音素的若干组合提供了可能。如果颅底曲度与咽腔形成没有必然相关性，而咽腔的成熟度与身体直立度具有相关性，那么仅仅依据颅底曲度模拟尼人声道、测定其发音功能的研究，推出的结论就不可靠。也许，随着新人化石的不断发现，不是对尼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而是对新人进行模拟声道的连续性序列研究，对现代人发音器官的成熟才可能有明晰的看法。

语言的形成除了发音器官的成熟，还需要相应的神经系统的成熟。美国神经生理学家史密斯（C.Smith）认为，一直到 10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的神经生理状况和别的动物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些较为复杂的狩猎活动、地区迁移、社会组织、工具制造和环境控制等，都是由较为简单的符号性学习、记录、储存和革新的神经过程执行的。然后，一系列的前语言或类语言在某一方面的预先适应，与大脑进化到关键体积的相一致导致了语言的突然发明。① 虽然依据颅底曲度模拟尼人声道、测定其发音功能的研究大可怀疑，但人类学家既然普遍同意古典尼人在 3.5 万年前已经灭绝，不是现

① 详见桂诗春：《语言起源问题新探——“祖先的声音”评介》，《国外语言学》1993 年第 1 期。

代人的直接祖先，那么如果根据：现代人的完全直立在距今10万年前，现代人的神经生理突变在距今10万年之际，仍然可以推断人类有声分节语言的出现不会早于这之前。兰德尔·怀特(R.White)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为语言的东西"。虽然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含义的语言，还不是心智上的现代人，直到3.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和文化。

第二节·现代语言起源的分子生物学思考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预见："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形成的序列将为全世界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现代语言的起源和流播，与现代人的起源和迁徙密切相关。持有"区域论进化论"观点的美国人类学家认为，从各地猿人中分离出来的古人再单独进化为各地的新人。依据新人起源多源论，必然推断现代语言的多源论，并据此解释现代语言范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之相反，持有"换代论"或"伊甸园论"观点的欧洲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源于非洲热带大草原的新人，然后流向全世界。坚持现代人起源的单源论，也就蕴涵了现代语言起源的远古单源论。

区域进化论的证据主要来自古人类化石的考古解剖学特征，即通过比较古人化石和当地现代人的头骨、牙齿等解剖学特征而证明两者具有相承关系。但是必须认识到：

1. 某地出土的古人化石与当地现代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某地出土的古人化石这一事实，仅仅表明这一古人曾经在这一地

区生活，并不能够证明出土古人就是这一地区现代人的祖先。除非具有可靠的连续性材料，否则就是"结论溢出发现"。

2. 仅仅依据解剖学性状的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区域进化"。一方面某些性状并不限于某一区域，另一方面要证明某些性状具有区域连续性的参考点太少。虽然铲形门牙在中国人中间占80%~90%，在非洲占10%以上，在欧洲占10%以下，但这并不是东亚人种独具的特征。尽管密执安大学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 Wolpoff)认为，在亚洲北部的颜面形状、颧骨构造和铲形门牙等性状特征，在75万年的化石、25万年的北京猿人化石和现代中国人中都可以看到，但是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克里斯托弗·斯特林厄(H. Stringer)却指出，这些性状并不局限于亚洲北部，所以不能用作区域连续性的证据。

3. 人类解剖学性状研究法是古今相似比较法，类比法的结论不具有必然性而只具有偶然性。

与之相反，遗传基因的研究为换代论提供了佐证的可能性：

1. 分子生物学发现——细胞质中的线粒体也含有遗传物质DNA；

2. 现代生殖学也已证明——在高等动物的受精过程中，精子中的线粒体DNA是不能够进入受精卵的，人类细胞的线粒体DNA都是来自母系；

3. 既然线粒体DNA属于严格的母系遗传，那么如果能够证实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是相同的，就可以推断源于同一个母系。

1987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阿兰·威尔逊(A. Wilson)小组"的科学家吕贝卡·卡门(Rebecca L. Cam)等人，选择了来自非洲、欧洲、中东、亚洲以及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妇女147人，利用她们生产婴儿的胎盘，进行不同种族婴儿胎盘的线粒体DNA研究。结

果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 DNA 基本相同，平均差异率只有 0.32% 左右。由此推定，现代各民族居民的线粒体 DNA，最终都是一个共同女性祖先的遗传。迄今为止，接受测试的人数已经达到四千多人，生物学家宣称没有发现具有古老来源的不同于现代人的线粒体类型。由此美国生物分子学家提出现代人源于 15 万年～12 万年前生活在东非的同一个聚落的共同祖先，在距今大约十万年之后向全球扩散开来，与各地原有的直立人并不相干的“夏娃理论”。支撑这一理论的，还有“新人化石·石器文化”的考古学证据。在非洲发现了距今大约十万年前的新人化石和距今 9 万年～7 万年新人所建立的后起旧石器文化。在欧亚非通道的中东地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九万年的卡夫塞洞穴新人化石。根据夏娃理论，在夏娃后代迁往各地的过程中，虽然古典尼人和山顶洞人这些晚期智人已在欧亚各地生息繁衍，但是夏娃后代并没有与当地的这些原始人种混合交融，而是完全地取代了他们。否则，那些欧亚土著智人就会将自身与夏娃人种不同的线粒体 DNA 遗传下来，现代人中就会具有不同种类的线粒体 DNA。然而，研究思路决定了对实验结果的解释，线粒体 DNA 的实验结果并不能说明一切。为了判断夏娃理论的正确与否，有必要向夏娃理论挑战。

首先，可以采取完全相反的思路：预设欧亚原生智人与夏娃新人的线粒体 DNA 本来就相同，而现代人类是她们的共同后代。也就是说，根据高等动物线粒体 DNA 母系遗传论，如果“夏娃时代”分布在欧亚非的所有智人都起源于同一古老的猿人—能人—古人—早期智人母系，如果这一类祖先都属于现代生殖学研究所界定的“高等动物”，那么通过更早迁徙而分布在欧亚非，并由此进化而来的 15 万年～10 万年之间的人类线粒体 DNA，不就应当也是相同的吗？换而言之，现代人类线粒体 DNA 的相同性可能源于更为

远古的人类线粒体DNA的一致性。夏娃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当时也许有几千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是其他女性都没有能够留下后裔。由此可以质疑，分子生物学家通过什么方法证明了这些“夏娃姐妹”的线粒体DNA与“夏娃”并不相同，通过什么方法证明了夏娃时代的欧亚非智人的线粒体DNA存在不同的类型？如果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只有一种类型，那么分子生物学又能够凭什么证明还有别的种类的线粒体DNA呢？

因此，夏娃理论的成立必须要有第一预设——夏娃时代的欧亚非智人的线粒体DNA各不相同。群体遗传学家认为：如果一个物种的各个群体彼此保持地理上的接触，则由突变引起的遗传变化可以借助于杂交而传播到整个地区，其结果虽然这个物种的遗传构成得到了改变，但整个物种在遗传上保持一致；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物种的各个群体由于河道的改变或沙漠的扩展等自然巨变在地理上彼此隔绝，那么起始于一个群体的遗传变化就不可能传播到其他群体，其结果在遗传上的彼此不同最终导致形成不同的亚种或全然不同的物种。换而言之，由于猿人分化较早和远距离隔绝，夏娃时代的欧亚非区域的人类线粒体DNA是各不相同的，也就可以推定他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不同亚种。

其次，既然夏娃理论的倡导者依据地理隔离形成亚种的生物学公理推导出第一预设“夏娃时代人类线粒体的DNA各不相同”，接着就必须具有第二预设——原生智人女性所生育的子女被夏娃人种赶尽杀绝而绝不可能延续至今。在换代过程中，原生智人是被鲜血淋漓地杀戮，还是自生自灭地消亡？根据人类学家朱布罗（E. Zubrow）提出的群体影响替代模式，一个强势群体只要有2%的优势就可以导致在1000年内另一个弱势群体的消亡。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群体通过暴力优势毁灭另一个群体，但是很难理解一

个群体由于经济弱势而自然衰亡。尽管朱布罗的研究并不能明确地显示出人口统计学上的现代人祖先和欧洲尼人的取代方式，但是确实表明暴力不是造成种族取代的惟一机制。在西欧的3.5万年前，尼人与现代人的祖先共存期间长达2万年～1万年，他们的换代似乎符合朱布罗模式。依据罗伯特·阿德里（R.Ardrey）在《非洲的创世纪》一书中著名的开场白"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辜的"，仍然可以坚持：群体影响替代模式并非完全排除暴力机制，也许种族竞争的替代过程是多种机制在起作用。

为了使这种换代过程减弱一些残忍的"兽性"而增强一些温和的"人性"，还是可以另辟蹊径：既然人类的线粒体DNA都来自母系遗传，父系线粒体DNA不可能进入受精卵，那么夏娃的女儿在向世界流播的漫长的过程中，与土著父系的结合也就不可能在线粒体DNA中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夏娃理论虽然排除了现代人母系多源论，然而并未能排除现代人父系来源的复杂性。换而言之，即使生物分子学证明了现代人来源于同一母系，但是并没有否定现代人可能来源于不同父系的杂交，即同系"夏娃"可能接受不同"亚当"。除了与夏娃同系的"亚当"，另外一些与"夏娃"不同母系的"亚当"是不是有可能是当地进化起来的土著智人呢？或许，正是这些不同母系的人种之间的杂交才产生了更为智慧的现代人呢？可以把这一过程设想得复杂一些：由于土著母系的后代经过多次反复杂交才逐渐消融在夏娃母系基因之中，最终才形成了现代人线粒体基因的一致性。因此，是否可以提出"同系夏娃·不同亚当"或"反复杂交·逐渐消融"的假说呢？

尽管威尔逊说他们的结论在统计学上是无可否定的，可是近来发现他们的分析中有一些统计上的问题，其结论被认为不像曾经宣称的那样肯定。"现代人类线粒体DNA基本相同性"的这一

结论是不完全归纳法的结果,美国科学家是如何解释0.32%的平均差异率的呢?这些差异率是否就是"反复杂交·逐渐消融"的迹象呢?最后,在夏娃理论倡导者那里还存在第三预设——即使新人移民与当地原生人种之间的杂交存在,其程度也是无穷小的,即使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基因,对现代人的群体基因贡献也不大。

对于东亚大陆现代人的来源,中国的考古人类学家在并不排除附带与境外人种杂交的同时坚持"主体区域进化论"。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研究机构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遗传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原本旨在了解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症根源的合作研究,在探讨中国种族群落遗传联系的同时,对东亚人口的起源也进行了研究。1998年9月29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上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东亚人口的遗传标记大都相同,这表明他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作出结论,东亚人口的大多数起源于非洲。"项目负责人说,新发现可能会使中国遗传学研究同行中的有些人感到失望。在中国,最近出土的一些化石证明了东亚地区远古人类的存在,使人类起源于东亚的学说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来源。[①] 尽管迄今为止东亚大陆一直没有发现距今10万年~5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人类学家坚持"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但根据中国分子生物学家在东亚和东南亚采集的1 500~2 000份样本的基因研究表明,没有一例是由当地原生古老人种进化而来的后裔。因此中国分子生物学家假定,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后代在7.5万年~1.5万年之间的冰川时期灭绝了,现代东亚人来源于非洲现代人。[②] 这种假说隐含着

① 霍荻:《中国人从非洲来?》,《南方周末》1998年10月16日。
② 寿蓓蓓:《中国人在哪里长大成人?》,《南方周末》1999年9月24日。

一个新的群体替代模式——由于自然灾变导致原生人种的灭绝而实现人种换代。

换代论和区域论，与其说是欧洲人类学家和美国人类学家的差异，不如说是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分歧。考古学家不相信生物分子学的基因归纳，认为用基因研究的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是间接的；生物学家不赞成化石考古学的解剖比较，认为是把考古实物综合起来讲故事。针对中国一些考古人类学家所说的"欧洲可能是换代的，但不能认为亚洲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中国人的进化是以连续进化为主，附带与境外人类的杂交"的观点，必须提醒：10万年前并没有欧亚非各洲的地理学分界，远古人类的存在的时期并不存在中国，更没有民族和国家意识，包括在现代人的起源研究中，这种虚无缥缈的"民族自豪感"或潜在的"民族中心情结"。从达尔文开始，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绝大多数欧洲人类学家早就彻底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最近又提出白种人由黑种人在三万年前变化而来的假说。尽管为了进一步探索，可以不放弃换代论，然而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已知的最早的300万年以前的人类化石都出自东非。

就方法论而言，与考古解剖学采用的是结论具有偶然性的类比法不同，分子生物学采用的是结论具有或然性的归纳法。最终的结果应是生物学与考古学各自研究的殊途同归，不同研究的相互印证才能增加结论的可信度。

第三节 人类思维交际符号演变的连续统

依据夏娃理论，现代语言的胚胎语的起源应当是单源的，时间在距今12万年~15万年之际；依据现代人的完全直立和现代人

的神经生理突变，现代发音器官和现代神经系统的成熟始于距今10万年之际；依据考古文化学人类心智成熟的研究，现代语言的成熟应当是在距今4万年～3万年之际。

根据儿童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和聋哑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推知，在旧石器的漫长时期，声道没有成熟的人类所使用的是“非语音符号手段”。起初，从动物性交换方式中形成由面部表情、实物指示和身体动作等构成的喊叫伴随性原始体态语，然后在这种体态语的基础上形成较为专门化的发音伴随性原始手势语，与体态语和手势语阶段相应的是实物性直观思维和动作性符号思维。随着声道的逐步成熟，形成与体态语、手势语相伴随的音符辅助性有声胚胎语，原始语言思维的萌芽开始出现。在胚胎语演变成为有声分节语言的同时，体态语和手势语也相应演变为与语言交流相伴随的“副语言”，即现代意义上的说话时的表情体态，与副语言伴随性有声分节语言相应的是现代语言思维。

在使用原始“非语音符号手段”和使用“有声分节语言”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大脑的逐渐发达和语言器官的逐步成熟，人类的“非语音符号手段”日益为次，“有声语言”日益为主。声道的日益成熟、气流的自如控制而使音节的离析成为可能，有声分节语言最终成为人类交际中的主导，在实物直观思维、动作符号思维和原始语言思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现代语言思维。距今3.5万年之际的新人文化，应当是建立在集体狩猎—采集经济基础上的中石器文化和为群体交流服务的有声分节语言文化。由此，我提出“人类思维—交际符号演变的连续统假说”。

阶段	人科形成	能人时期	早期智人	体质新人	心智新人
交际方式	动物性交换方式	喊叫伴随性原始体态语	发音伴随性原始手势语	音符辅助性有声胚胎语	副语言伴随性有声分节语言
思维方式	动物性感受（本能满足）	实物直观思维（联想为主）	动作符号思维（以行会意）	原始话语思维（以音会意）	现代语言思维（条分缕析）
意识形态	动物性混沌意识	原始形象意识	原始抽象意识	原始话语意识	清晰语言意识
现代存在方式	潜意识·冲动	印象·知觉	体态·手势	语言信息紧缺	日常语言
现代存在方式	直觉·灵感（以巫师为典型）	表现艺术思维（以音乐、美术、雕塑、装饰家为典型）	表演艺术思维（以哑剧、舞蹈、体操家为典型）	含混语言思维（情境手段大于语言手段）	文学语言思维（演说家口语表达为主；著作家书语表达为主）

人类思维——交际符号演变的总趋势是：

1. 非语音符号的由强渐弱化和语音符号的由弱渐强化；

2. 语音符号最终取代非语音符号的同时，非语音符号则演变成副语言；

3. 人类意识形态从动物性感受的混沌，经由实物直观性的原始形象意识、动作符号性的原始抽象意识和原始话语性的原始话语意识，演变成现代语言性的清晰语言意识；

4. 现代语言思维方式和清晰语言意识成为现代人的本质特征；

5. 尽管如此，现代人，每一个人的思维和意识中，仍然包括着不同程度的动物性感受或混沌意识（潜意识或直觉）、实物直观思维或原始形象意识（印象或知觉）、动作符号思维或原始抽象意识（打手势）、原始话语思维和原始话语思维萌芽（情境手段大于语言手段）。

6. 大约从 3.5 万年前开始，从实物直观性的原始形象意识中

专门发展出以人的感官知觉为符号的音乐(声乐、器乐)、绘画、雕塑(雕刻)、装饰等表现艺术思维;从动作符号思维或原始抽象意识发展出以人的形体表现为符号的舞蹈、戏剧、运动等表演艺术思维。

人类语言的历史并不那么漫长,有声胚胎语的出现不会早于15万年～10万年前,成熟的有声分节语言的历史可能仅仅只有4万年～3万年历史。原始劳动的历史,混沌意识、直观思维、动作性抽象思维的历史,比有声分节语言思维的历史要长得多。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者独立发展出的农业技术是文化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再追溯到这段社会和经济转变时期以前,会发现冰河时代的欧非的"狩猎—魔法"绘画和雕刻,这些心智产品显示出像我们现代人一样的精神世界。可是再往前追溯到距今大约三万五千年之前,这些标志的火焰逐渐变弱而终至熄灭。人类学家相信,在距今大约三万五千年的考古记录中突然出现的艺术表现力和精巧技术,是现代人进化的一种清晰信号。当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创新的表现力和随心所欲施加的规则才变得普遍。人们开始用打下的石叶制作各种形状精细的工具。格林·艾萨克(G.Isaac)认为,磨制工具必须施加一定规则,规则的施加是意志的执著,这是一种要求复杂口语才能够实现的行为方式。没有语言便不可能将规则施加其所制作的对象上。除了制作工具的规则需要精密的口头语言,有目的的具体狩猎、早期的巫术魔法也都需要这一方便而神奇的符号系统。只有到了距今3.5万年之际,体质现代人才终于完成了心智现代人的突变。

英国人类学家肯尼思·奥克利(K.Okelly)认为:现代人类行为的花朵就是与完全现代化的语言的首次出现相联系的,难以相信,

人类这个物种在其他方面具有完全现代的特征而语言却不是现代的,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根据这些,语言的成熟被确定为“人性”出现的过程中达到顶点的事件。所谓“人性”就是“语言性”;所谓“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正是有声分节语言的出现才使世界变得如此清晰和细密。这一切表明,也许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的成果——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才使人类获得了新的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掌握了开启现代文明之门的“芝麻开门”。

第十五章　世界语言演化的宏观走向

现代语言是随着发音器官的成熟和脑子的增大而在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一种能力。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为语言的东西”。虽然解剖学上的体质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含义的语言”，还不是心智现代人。直到透过人类的祖先在3.5万年前留给他们后人的绘画和雕刻作品的所展现的艺术表现力和技术精巧性，我们才能够断定，到了那时远古先民已经掌握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的语言和文化。

现代语言的起源和流播与现代人的来源和迁徙密切相关。除非生物分子学的基因分析法被彻底推翻，否则现代人起源的总体状况不能改变。根据夏娃理论和考古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勾画出现代人的世界性迁徙分布的历程。在距今十万年左右，为了寻找新的食源，夏娃的后代向北走出东非大草原的“伊甸园”，踏上流播欧亚的不归征途。在漫长的世界性迁徙过程中，夏娃后裔与当地

进化起来的原生智人，不可避免地展开持久的竞争，极其缓慢地进行着的繁殖混杂使“夏娃基因”得以逐步扩散，形成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原始人种。在距今 3 万年～4 万年前最终形成了肤色由深渐浅的四种地理人种的同时，现代语言也就流播到世界各地。

第一节　语言关系类型演变的连续统

关于远古语言的存在状态，俄国民族学家 C.Л. 托尔斯托夫[①]曾经提出过一个“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说”。洪荒之初的人类可能说多种语言，在民族毗邻地域逐一接连发生变化，形成语言连锁扩散网。某些地区不久之前还保留着的这一古代语言分布状况的痕迹。例如，澳大利亚有几百种土著语言，然而在它们之间很难找出明确的界限；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相邻部落的语言虽有差别但能通话，可是在相距较远的部落之间的语言差别大到难以交流。这种在一片区域之中，发音和语法都相去甚远的不同语言，形成了一个原始语言连锁扩散网络的甬道，很难从语系上加以分类。“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说可以成立，只是要给予一个大致形成时间——距今 2 万年～1 万年，并且称之为“原始语网”。

依据达尔文“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确定不移的“基因·语言关联”（the gene-language correlation）应当是无须证明的预设。[②] 尽管在人类进入文

① 尼·切博克萨罗夫和伊·切博克萨罗娃著，赵俊智等译：《民族·种族·文化》，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详见［美］七七元著，李葆嘉译：《汉语的祖先：回顾和前瞻》，《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8 年版。

明社会以后，语主遗传基因和实际使用语言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像达尔文设想的那样逐一对应，但是在文明社会形成以前的相当漫长的时期，人种的基因扩散和语言的"基因"扩散应当是一致的。根据现代人起源的单源论假说，可以相应假设现代语言起源的单源论，其扩散过程大致如下：

1. 距今15万年～10万年，随着夏娃的出现，现代语言的基因单源型"原始语源"或胚胎语言形成。

2. 距今10万年～4万年，随着新人的世界性迁徙，具有同一血缘源头的现代语言向各地缓慢流衍，形成繁衍血族型的"血族语流"。

3. 距今4万年～2万年，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卡拉库姆沙漠—伊朗高原上的沙漠和山脉为界形成西部的大西洋原始人种和东部的太平洋原始人种。在中石器时代现代有声分节语言成熟，与生态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尼格罗、欧罗巴、蒙古利亚和大洋洲四种地理人种相对应，存在中石器时代现代地理人种型的"人种语带"：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分化为南部尼格罗语带和北部欧罗巴语带；以印度洋—太平洋相连海域为界分化为大陆蒙古利亚语带和大洋澳斯特列语带。

4. 距今2万年～1万年，中石器时代晚期的语言系统日臻完善。不同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制约着经济生产方式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发展，对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原始分类认知导致了语言范畴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中心逐步形成。强势文化扩散传播的不平衡性表现为相邻语言的相似性和远隔语言的相异性，不同的血族聚落语趋于不同程度的相连地域同化，经济文化的地缘关系开始冲击语言的血缘关系，逐步形成生态区域型的"地缘语网"。

5. 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到四千年之间，欧亚非的一些地区先后

进入新石器—金属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从原始狩猎方式中形成游牧经济，从原始采集方式中形成农业经济，产品的剩余萌发早期的商品交换，自源文字开始出现。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世界语言关系呈现出经济文化型的差异格局：(1)渔猎·采集民型(存在原始农牧萌芽)保留着"地缘连锁型语网"；(2)海上游牧民型的迁徙不定和交往闭塞形成"地缘离散型语珠"；(3)农耕民型的文化扩散突破原始语网，语言的推移和互动接触形成"地缘同化型语区"；(4)牧畜民型的远距离迁徙突破原始语网，语言的分离和独立发展形成"亲缘分化型语系"。

由此，我提出"现代人语言关系类型历史演变的连续统假说"：原始语源—血族语流—人种语带—地缘语网—经济文化的"语系·语区·语网·语珠"的四分格局，显示出从血缘纽带关系到地缘接触关系，从地缘接触关系到经济生态关系，从经济生态关系到文化传播关系的演变趋势。

15 万年～10 万年前	10 万年～4 万年前	4 万年～2 万年前	2 万年～1 万年前	1 万年～4000 年之前
基因单源型	繁衍血族型	地理人种型	生态区域型	经济文化型
原始语源	血族语流	人种语带	地缘语网	1. 牧畜民型分化型语系 2. 农耕民型同化型语区 3. 渔猎采集民型连锁型语网 4. 海上游牧民型离散型语珠
血缘纽带————地缘接触———经济生态———文化传播				

在西方学者看来，语系形成的时间对于民族起源的研究至关重要。某些考古学家和民族学者认为，语系可能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已有 1.3 万年～0.7 万年。在这一时期的人类迁徙过程中，某些大型原始民族的语言群体可能已在广阔的区域中传播

开来。以游牧经济方式为主的闪含语言、印欧语言、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的分化可能如此，但是如果认识到世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不应当机械套用“亲缘分化型语系”模式。以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仅把“语系”作为归纳语言关系的惟一的最终上位概念，因此除了勉强归纳出一些“语系”（其中有些是语区、语网），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建立200年后的今天，一些地区的语言或者划分太繁（例如印第安语言），或者难以纳入（比如大洋洲原居民语言）而被称之为系属不明。显而易见，西方语言学家引以为骄傲的谱系树理论是建立在印欧语言材料之上的一种语言关系类型。作为解释人类语言关系类型所建立的第一种模式，由于急于操作而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至今没有深入探讨，因此在促进世界性语言关系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之所以以往的语言同源研究出现治丝益棼的状况，是因为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1. 没有考虑语言的同源年代性。语言的同源至少可以分为：(1)新人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现代语言起源的同源；(2)新石器—金属时代或文明中心形成以后的现存语言形成的同源。为了进一步明确语言是同源性研究，不妨分解为两个命题：(1)现代语言的起源性研究——现代语言的同源性研究；(2)现存语种的发生学研究—语种的发生学研究。

语系研究在本质上也是语种的发生学研究，只不过这是在历史上分化为不同子语之前的某一十分古老的原始语种。源头年代的相对性决定了语言起源的相对性，要研究语言的同源务必明确：是什么时期、什么性质的语言同源性。

2. 没有明确语言的同源性包括在“语言的相似性”这样一个更大的命题中。语言的相似性可以划分为同源相似和借源相似。

语言的同源和借源具有相对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预设——语系的同源性——只能是指新石器—金属时代的语言同源性。以金属时代为标准所确定的同源，有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是借源；以文字记载阶段为标准所确定的同源，有可能在前文字阶段是借源。为什么东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在同源词和借源词上争执不休？为什么只得笼统称之为“关系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同源年代性标准和同源相对性观点。而没有同源年代标准就不可能考虑同源和借源的相对性。

3．没有认识到世界语言关系类型的复杂性。如果以新石器—金属时代为上限，除了处于语系模式中的子语具有同源性，处于其他模式的语种之间并不具有同源性，也就是说这些语言没有新石器—金属时代的语系式祖语。如果这些语言具有某种“同源性”；那么也是可能扎根于更早的旧石器时代。因此，我提出“语言关系类型学”理论，并且明确“语系”模式不过是“语言关系类型学”中的一种模式。

第二节　语言关系类型学的四分方法

新的狩猎与采集场地的寻求，在促使新人展开世界性迁徙的同时，现代语言也就分布到世界各地。经由地理人种型语带，在距今2万年～1万年期间，尼格罗语带分化为科依桑—班图—苏丹等语网，欧罗巴语带分化为闪含—印欧—高加索—卡特维尔等语网，蒙古利亚语带分化为达罗毗荼—南岛—南亚—藏缅—北极—印第安等语网；澳斯特列语带分化为巴布亚—大洋洲土著语言语网。新石器革命的成功，导致古老的狩猎—采集经济方式在河流平原地区产生原始农耕经济，在丘陵草原地带形成原始游牧经济。

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农业性定居。公元前4000年以来,随着金属时代的到来和自源文字的形成,随着商业的出现和早期国家的萌芽,人类游牧—农耕—通商文化的早期中心同时形成,并进一步组成金属时期语言文化圈。欧亚非出现苏美尔—闪含—印欧等文明中心,亚洲东部出现哈拉巴—华夏—阿尔泰等文明中心,美洲大陆出现玛雅—印加等文明中心。这一切促使迈进文明门槛的诸多语言冲破原始语网,其语言关系类型向新的多格局方向发展。

一、语系的形成:新石器—金属时代以来最典型的语言文化的同源分化现象

1. 闪含语系。在公元前4000年就存在的含米特古埃及语,公元前后消亡后演变为科普特语。以早期游牧—通商文明为特色的闪米特语言由西亚而南下,在公元前1500年~1000年进入北非。随着闪含人的游牧—通商活动,闪含语言广泛分布在亚非地域而形成闪含语系。

2. 印欧语系。依据原始印欧语构拟出来的动植物语词“山毛榉”和“鲑鱼”及它们的生长地,语言学家推知,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在中欧的维斯杜瓦河与易北河之间的一个不大的地域,出现了最初可能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原始印欧文明。根据考古学的证据,在公元前3000年才出现作为家畜的马和羊,原始印欧文明才有可能逐步发展为以饲养为主的游牧经济。游牧经济需要更新牧场,前2500年左右原始印欧文明开始分裂。向地中海方向南迁的成为希腊语—罗曼语言的祖先,向北海—波罗的海方向北迁的成为日尔曼语言的祖先,向东北方向迁徙的成为斯拉夫语言的祖先,向里海方向迁徙的成为伊朗—印度语言的祖先,由此形成地域广袤

的印欧语系。[1]

公元前1世纪，日尔曼语分化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支、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西支和奥得河以东的东支。5世纪，日尔曼西支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人越过北海，进入不列颠形成古英语。9世纪，日尔曼北支的一部分西传成为古冰岛语。公元前1000年，罗曼人来到巴尔干半岛建立了罗马文明。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地区拉丁语成为独立语言。公元前10世纪，凯尔特语通行在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前5世纪，凯尔特人西迁到英伦三岛。5世纪盎格鲁人入侵以后，凯尔特人后退到西北部形成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部分凯尔特人在6世纪越海迁至法国西北部，成为布列塔尼语。在维斯杜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斯拉夫语言，公元前7世纪以后开始迁徙。西支迁至易北河与奥得河流域，南支迁至巴尔干半岛，东支进入俄国。波罗的海语言在前2000年进入俄国西部，由莫斯科附近的奥卡河一带北迁波罗的海。6世纪，波罗的海人为斯拉夫人所追而西迁。到10世纪，立陶宛和拉托维亚语言已经不能互通，其他几种波罗的海语言在几百年前就消亡了。原始印欧语的一支向东南到达里海，前20世纪进入伊朗和阿富汗，成为伊朗语言的祖先；前15世纪进入印度一带，成为婆罗米语和梵语等语言的祖先。

根据考古发现，古雅利安人在公元前曾迁入当时还是绿洲的塔里木盆地，在西域一带存在着吐火罗语和塞语。与赫梯语同属于西支Centum语的吐火罗语有四种方言：婆罗米字母书写的焉耆语、龟兹语，佉卢字母书写的楼兰语和没有留下文字材料的月氏

① 参见Paul Thieme：《印欧语》，[美]王士元主编：《语言和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语。与伊朗语和梵语同属于东支 Satem 语的塞语(伊朗东部语群)已发现三种方言:于田语、疏勒语和扜弥语。[1] 依据东西支语言特征和"楼兰美女"的遗存,可能吐火罗人迁来西域较早(前第二千纪)而塞人稍晚(前第一千纪)。

3. 乌拉尔语系。公元前 4000 年,乌拉尔人居住在俄国中部,乌戈尔(Ugric)的词源来自古俄语"西伯利亚"的名称乌戈拉(Ugra)。前 3000 年,部分乌拉尔人开始迁移。迁向西北的乌戈拉语,在 1 世纪来到芬兰形成爱沙尼亚—芬兰语。说非芬兰语的原居民拉普人被迫迁人北极。迁往北方的乌戈尔语形成科米语。由北向东迁移的乌戈尔语,在鄂毕河—伊尔蒂什河流域成为奥斯恰克语,在叶尼塞河流域的成为萨莫耶德语。萨莫耶德人又继续东迁,长期居住在西西伯利亚泰加森林地带。公元初,部分乌戈拉人北移直到极北地区。公元前的最初几个世纪,部分乌戈拉人又折回西迁欧洲,9 世纪到达匈牙利的成为匈牙利语的祖先。

4. 阿尔泰语系。有人认为,在远古时代的中亚阿尔泰山脉的森林地带形成的阿尔泰人,随着游牧经济生活方式,西迁至里海一带,北迁到叶尼塞河流域,东迁往蒙古草原、黑龙江流域一带,形成阿尔泰语系。根据中国境内的考古文化研究,公元前 5000 年就已经形成的北方细石器考古文化系统,就是阿尔泰人创造的早期文化。因此我认为,阿尔泰人的故乡在东北亚的草原地带,后来才向中亚一带陆续迁徙。"阿尔泰"这一名称是后起的,并不反映最初活动的地区。

语系诸语言的同源词语或语音结构的对应性程度决定于原始语网分布地区的宽度。集中型语网的原始语言差异度小,而离散

[1] 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型语网的原始语言差异度大。也许，未分裂前的原始阿尔泰语的分布状况是区域性广大的离散型语网，与未分裂前的原始印欧语的分布状况是地域较小的集中型语网不同，因此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对应性不可能如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对应性那样严整，以至于一些历史语言学家不赞同“阿尔泰理论”。与印欧语系相比，乌拉尔语系也有类似阿尔泰语系的情况。

二、语网的蔓延：滞留在旧石器—新石器早期的语言文化的连锁传播现象

1. 原始达罗毗荼语网。公元前2000年甚至更早，达罗毗荼语言就已经存在于印度的中北部，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可能就是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的入侵迫使达罗毗荼人南迁，在闭塞山区的达罗毗荼人及其语言残留下来了。达罗毗荼语网由于雅利安语言的冲决而残缺不全。

2. 原始南亚—南岛语网。从印度次大陆恒河流域到南亚的湄公河流域—云贵高原，从东亚大陆东南部的长江中游—江淮平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日本—琉球—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直至南太平洋群岛的古老语言，组成这一原始语网。从新石器早期开始，南岛居民就开始了从长江流域洞庭湖一带出发的缓慢的南迁活动。先达到台湾和东南亚，然后一部分向西经印度次大陆直至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一部分向东远徙南太平洋群岛。印度次大陆具有差别的蒙达、吴朗沃、多达等语言组成的阿斯垂克(Austric)语群，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带的原始语网断裂的孑遗。

3. 原始巴布亚语网。在16世纪以前，巴布亚语网就与迁来的南岛语部分交织或被其部分覆盖。得到可靠识别的现存语言约

有650种,已证实有远亲关系的有450种,被归纳为76~105个语系,格林伯格将其划为七大语群。其余的200种,大部分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语群,但有50种被认为是独立语言,另外的则亲属关系不明。以谱系树模式为标准的亲属关系不明,则是原始语网的特征。

4. 原始大洋洲语网。在欧洲人进入大洋洲以前,原居民有五百多个严格地守着各自"家园"的部落,同时就存在着五百多种不同的语言。1770年以后,随着欧洲人对土著居民的杀戮驱赶,人口从1788年的30万锐减到1960年的4万,语种急剧消亡,语网不复存在。现存较重要的语言,有通行于中部埃尔湖以北的阿兰达语言(现存仅几百人)和中部最北地区的门金语。

5. 原始印第安语网。现存和可考的印第安语言约有一千种,被归纳为近一百一十种语系(北美印第安语言70个语系,中美印第安语言20个语系,南美印第安语言24个语系),格林伯格将其归纳为10个。不是语系模式而是语网模式的印第安语,与大洋洲语网一样,也早被欧洲人的迁入而变得支离破碎。

6. 原始高加索语网。自古以来,处于黑海和里海、伊朗高原和俄罗斯平原之间的高加索山区一向被称之为"语言之山",现存语言约有五十种。作为欧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区,高加索语言的结构类型代表着现存欧洲语言的最古老的复综—黏着类型,北部语言比南部语言(格鲁吉亚语)形态更为古老。也许,印欧语和高加索语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属于"欧罗巴—高加索语网",由于原始印欧文明的崛起,处于中欧平原地区的原始印欧语从这一原始语网中分离出去,其语言类型转变为屈折语,并进一步分化为庞大的语系,而处于山地的高加索语则成为处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汪洋中的惟一语网孑遗。

三、语珠的散落：旧石器时代语言文化的离散游移发展现象

虽然语珠的早先状态可能是语网中的语链 a1－a2－a3－a4－a5－a6…，但是或者由于 a1 与 a2 之间的地域距离本来就很遥远致使语环松散，或者由于语种 a2、a4、a5 的远迁和相连文明的衰亡造成语环脱裂，以致于形成了 a1…a3…a6…，的语种零星分布状态，或 a1…a6…a3…的语种错位状态。尽管 a1…a3…a6 稀散分布在一个相同的生态区域，由于环节语言的脱落，在现存语种之间已经很难或不可能找到语言的相似连接性。然而，在这些散落的珍珠之间也并非所有的相似性荡然无存，至少语言结构类型可能大致相同。

1. 北极语珠。西伯利亚冻土带到阿拉斯加、格陵兰北极圈内外的一些语言，以往称之为“古亚细亚语言”。其祖先约于五千年甚至一万年前从亚洲中北部迁到白令海峡一带，而后四处漂流。以渔猎为生的这些沿海民族，其经济方式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海上游牧经济”。追逐海洋猎场的漂泊不定、气候和地理的不便于交通、长此以往缺乏相互文化和语言的接触，北极圈语网的破裂则形成阿伊努（24 000 人）—凯特语（1 000 人，据说是匈奴语的后裔）—尤卡吉尔语（800 人）—尼夫克语（4 000 人）—伊特门语（未详）—科里亚克语（8 000 人）—楚科奇语（12 000 人）—阿留申语（5 500人）—爱斯基摩语（97 000 人）的零星语珠。

2. 古亚细亚语珠。苏美尔—米诺斯—巴斯克—亚美尼亚语珠假说。通常认为，前 5 千纪分布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不知来自何方，前 2 千纪分布于爱琴海上创造克里特文明的米诺斯人同样来历不明。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在公元前 2000～1300 年开始消亡而延续到公元前 1 世纪，其结构类型都是黏着型。根据最近的

研究，原先与任何语言无联系的苏美尔语是做格类型的语言。前2000年由小亚细亚移民带来的现存法国的黏着型巴斯克语，也是主要采用后缀、作格等语法手段。虽然现代亚美尼亚人是在前7世纪由乌拉尔图人、斯基泰人（伊朗语族）结合而成的混合民族（现存人种属于巴尔干—高加索混合类型），但前16世纪~前15世纪古代亚美尼亚人已经分布在亚美尼亚高原地带。现代亚美尼亚语实际是一种词汇印欧化，但结构仍然保持着古老黏着型的混合语。根据语言结构类型的相同性（黏着语和作格），我提出“苏美尔—米诺斯—巴斯克—亚美尼亚语珠假说”（可能还包括埃兰、胡里特、伊特剌斯坎等古代语言）。

如果这一假说得以证明，那么欧洲语言结构类型的演变轨迹可能是：复综·黏着型（高加索语）—黏着型（苏美尔—米诺斯—巴斯克—亚美尼亚等语言）—屈折型（印欧语系语言）。

四、语区的推移：新石器—金属时代以来最典型的语言文化的异源同化现象

1. 东亚大陆语区。如果注意到东亚大陆以农耕经济方式为主，依据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可以提出“地缘同化型语区”模式。以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为依据，距今七千年左右，东亚大陆存在南亚—南岛语网、藏缅语网和阿尔泰语系。在这三大语言交会之处的中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逐步混合而成华夏汉语。以文明辐射为背景，强大的语言文明中心（同化其他语言和自身异化）和周边语言文明的持久互动接触（换用汉语和渗透汉语），形成东亚大陆语区。在这一历史互动过程中，一方面是周边语言的“汉语化”，另一方面是华夏汉语的“阿尔泰化”或“南亚化”，以华夏汉语为中心可以合称为“华夏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语

的汉语化，与华夏汉语的南亚化或南亚语的汉语化”。形成这一状态的经济文明原因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原农耕文明的发达；北方游牧文明的善于征战；南方农耕文明的不断再南迁。语区的推移和同化是这一广大区域语言演变的总态势，但并不排除同时存在局部的分化。

2. 巴尔干次语区。所谓“次语区”是指欧洲语言学家在19世纪认为不可思议的畸形现象、后来被称为存在于大语系中间的“语言联盟”，最典型的是“巴尔干次语区”。虽然巴尔干半岛的这些语言（独立语族的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罗曼语族的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族的保加利亚语以及部分涉及斯拉夫语族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阿尔泰语系的土耳其语），除了土耳其语以外都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族，但长期共处同一地域，拜占庭文化的凝聚力和各语言之间持久深入的接触渗透，致使这些语言面貌具有地域趋同性，形成从词汇到音位系统和句法形态的“巴尔干特征”。

语言关系类型学的四分法把“语言关系类型”确定为上位概念，下位概念是语系、语区、语网和语珠。

1. 语系的基本概念包括祖语（新石器—金属时代的语言源头）和子语（历史上或现存的语种）、近亲语（同源相似性密切的语种之间）和远亲语（同源相似性疏远的语种之间）。语系模式的层次是：语系（祖语）——语族（语支的源头）——语支（语种的源头）——语种（子语）。

2. 语区的基本概念包括核心语（新石器—金属时代文明中心的语言）和周边语（周边文明中心的语言）、覆盖语（语言同化中覆盖底层语言的强势语言）和底层语（语言同化中所保留的弱势语言）。语区模式的层次是语区（没有新石器—金属时期的祖语或可能具有旧石器时期的遥远祖语）——语片（相似的语组）——语组

(相似的语种)——语种(单一语言)。

3. 语网的基本概念包括环节语(处于同一语网中的某一语种)和连锁语(处于同一语网内的相连语种)、近邻语(处于同一语网内的相邻语言)和隔离语(处于同一语网内的不相邻语言)。语网模式的层次是语网(旧石器时代的祖语遥远)——语链(相邻的语环)——语环(相邻的语种)——语种(单一语言)。

4. 语珠的基本概念包括语珠(由远距离的语种组成)和语种(单一语言)。

如果采取语言关系类型学四分法,那么也许对从新石器—金属时代以来历史上及现存世界语言的关系状态会有新的认识。

第三节 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连续统

新石器—金属时代以来,随着语言表达的精密、语法范畴的消长、语音接触的影响,现代语言的结构类型逐步发生演变。据现存的语言结构类型推断,最为早期的结构类型可能就是保存着混沌性思维烙印的复综语。这是一种词单位与句单位尚未分离、构句单位为"句词"的古老类型。就其内部结构而言,句词相当于其他结构类型中的形态复合词;就其运用功能而言,句词相当于其他结构类型中的句子单位。以复综结构为出发点,语言结构类型的渐次演变大致如下。

1. 复综结构的离散化趋势。复综词逐步分解为语素结构(如中美印第安 A、B、C 三种语链复综结构的递减);复综结构的语音编插方式,如演变为词单位和语音屈折则形成屈折型;复综结构的语义音节化,如蜕变为词根和词缀相结合则形成黏着型。

2. 屈折结构由内部屈折型演变到内外屈折型。内部屈折语

由辅音构成根词干、以元音屈折为变化手段;内外屈折语在内部手段之外又出现了辅音性和音节性附加词尾。

3. 黏着结构由紧密型演变到松散型。紧密黏着型的词缀对词干依附性极强,松散黏着型的词缀与词干的结合趋于离散化。

4. 松散黏着型的词缀虚词化和词干实词化。黏着型蜕变为以语序和语气为主要手段组合实词和虚词的孤立型(如历史上的汉语);

5. 屈折语由综合型向分析型演变。内外部屈折结构随着内部屈折的消亡、外部词尾的失落和功能词的增多,演变为以语序和语气为主要手段组合词干和功能词的孤立型(未来英语的趋势可能如此)。

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总趋势是:随着语义表达的混沌性到清晰性,语言结构呈现出语言单位的分析化、语法手段的附加化、语法成分的音节化和结合方式的孤立化倾向。具体来说:

1. 语言单位的演变由复综性(复综型句词)到分析性(屈折型形态词→黏着型词根与词缀→孤立型实词和虚词);

2. 语法手段的演变由内部屈折法(闪含语言的三辅音根词的元音性屈折)到外部附加法(印欧语言的辅音性和音节性词尾);

3. 语法成分的演变由音素性(音素交替→辅音性词尾)到音节性(屈折型音节性词尾→黏着型音节性词缀→孤立型音节性虚词);

4. 结合方式由附加法的黏着性(黏着型词缀)到语序法的孤立性(孤立型虚字)。

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假定纯粹结构类型的静态存在,但在现存语言中却找不到纯粹类型的动态存在。可以看到的语言都是以某一类型为主的语言或不同典型之间的过渡类型,由此形成了结构

类型历史演变的连续统状态。

复综型 结构方式：词句结构的整体混沌性 结构单位：复综词（中美印第安C类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巴布亚语）	复综—屈折型	屈折型（内部屈折型）	屈折—黏着型（内、外屈折型）	孤立型 结构方式：语序法和虚字（功能词）法 结构单位：实词和虚词（汉语、壮侗—苗瑶语、越南语）或词干（可能有少数离散性词缀）和功能词（未来英语）
	结构方式：从复综法到语音屈折法	结构方式：以内部音素屈折法为主	结构方式：从音素屈折到音节附加	
	结构单位：复综词·屈折音素（非洲弗拉尼语？）	结构单词：词干·屈折音素·词缀（闪含语、格鲁吉亚语、波罗的海语）	结构单位：词干·屈折音素·词尾·词缀·功能词（现代英语）	
	复综—黏着型	黏着型（紧密黏着型）	黏着—孤立型（松散黏着型）	
	结构方式：从复综法到外部音缀黏着法	结构方式：以外部音缀黏着法为主	结构方式：从黏着性附加到离散性词缀	
	结构单位：复综词·词干·词缀（北高加索语、北美印第安语、中美印第安A类语）	结构单位：词干·词缀（乌拉尔语、达罗毗荼语、南岛语、阿尔泰语、南美印第安语、班图语）	结构单位：词干·词缀·虚词（亚美尼亚语、蒙达语、藏缅语）	

语言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结果非常复杂：

1. 确定某种语言的结构类型，只是就主要特征而言。

2. 在后一类型的语言中包含着不同历史层次残留的前类型孑遗（如藏语）。

3. 层累性、多向性的不同结构类型的接触，导致以一种类型为主的语言中包含着接触结构类型的不同特点（如原始华夏语）。

4. 越是混合的语言形态失落越多，导致由综合向分析（如英语）、由形态向孤立的结构转型（如汉语）。

5. 孤立结构与屈折或黏着结构的深入接触，可能导致孤立语的再转型(如五屯话)。

在史前时期，一定的语言关系类型与一定的语言结构类型具有对应性，一定的语言关系类型和语言结构类型这二者与一定的经济方式具有相关性。直至18世纪，世界性的语言关系类型与语言结构类型的对应性还可以大致看出：

关系类型 结构类型	大洋洲、美洲、非洲采集渔猎文明为主导的语网	北极地区渔猎文明为主导的语珠	欧亚非游牧通商文明为主导的语系	东亚—南洋农耕文明为主导的语区
复综型	大洋洲—巴布亚语；印第安语；高加索语(与印欧语有远祖关系)	北极语(与印第安语有远祖关系)		
屈折型			闪含—印欧语	
黏着型	苏丹—班图—科依桑语(?)		乌拉尔—阿尔泰语(处于欧亚之间)	达罗毗荼—蒙达—藏缅—南亚—南岛语
孤立型				华夏—苗瑶—壮侗—越南语

文明的冲突交融导致语言的接触，打破了语言关系类型和语言结构类型的对应性，语言开始了从地域趋同化到世界趋同化的总体进程。

第四节　人类语言发展的世界化进程

在地中海文化圈，两河流域的泥板尘封着人类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流淌着金字塔的碎影，克里特岛屿引起海洋的探索，腓尼基字母染就智慧的遐思，巴尼尼语法宣扬信仰的圣歌，维纳斯女神从爱琴海浪花和奥林匹克山峰中冉冉升起，古罗马狼嗥在阿尔卑斯山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回荡，耶稣的圣诞光大摩西的教义，阿拉伯世界向欧洲回流着古希腊的智慧，但丁吹奏着神曲驱散中世纪的阴霾，哥伦布的扬帆济海导致殖民主义的横行，蒸汽机的云蒸霞蔚呼唤着科技文明的日出。在东亚文化圈，文明的混合催生出华夏三代，黄河的水土哺育着盛世汉唐，西通丝绸东浮瀛洲，北至黑水南下瓯越，长城挡不住大漠的铁蹄，中原逐鹿导致士族南迁，汴洛文明在江淮的山清水秀中再生，民族的冲突融合点燃中华涅槃的火焰。既然有文明的传播就有语言的接触，那么语言的交融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其程度的深浅和时间的久暂导致语言演变的不同结果。

一、语言的借用

语言接触过程中最自然不过的是借词，除了封闭的文明，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没有借词。持久的大量借词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化，但只要作为独立国家或民族存在，即使同化程度再深仍然可以保持语言的独立性。尽管朝鲜语和日本语的词汇百分之六七十来自历史上的汉语，但基本词汇和结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仍然是独立语言。作为语言的细胞的词，语音系统和语法要素都包含其中。在借词过程中，语音和语法都可能发生结构关联性变化。

受汉语影响,满语的音位系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民族语言向汉语直接借用了许多虚词语法成分。如果主借和被借语言是两种不同类型,语法成分的持续借用可以导致结构类型的转变,如受藏语等语言影响从孤立转型为黏着的青海五屯话,受汉语影响从黏着转型为孤立的海南回辉话。

二、语言的换用

说两种不同语言的居民长久共存于同一地区,会自然形成双语制。在一定情况下,双语制可能成为弱势语言被强势语言替代的中间过程,最终导致语言的换用。除了东北少数地方的满人保留着满语,中原满人语言的换用经历了满语制→满·汉制→汉语制的渐变过程。为了在中原长久统治的北魏王朝,提出与汉人联姻和"断诸胡语"的国策,导致了中原鲜卑语的主动消亡(清代迁往新疆的锡伯族即鲜卑人的后裔,锡伯语是延续至今的鲜卑语)。任何换用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换用,换用者总会以不同方式在新换语言中打上原有母语的烙印,由此形成语言换用过程中的双重性:对于弱势语言的语主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强势语言的语种来说则是语主的部分变换。具有语言底层和表层结构双重性的新换语言,以致于成为强势语言的一种方言(印度英语就是以印度人母语的发音方法,将英语改造而成的一种方言)。汉语的方言,绝大部分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形成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对周边语言的"汉语化"不足。就不同语言之间而言,语言的借用和换用都是指语言间的同化,只是同化的程度不同。就某一语种本身来说,如果是强势语言,那么在同化别的语言的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被弱势语言部分异化;如果是弱势语言,那么在被同化的过程中并非毫不异化强势语言。不管是强势还是弱势语言,都合乎"同化即异化"这一规

律。不同语言的同化与同一语言的分化是语言关系类型中的对立趋向,相邻不同语言之间的同化产生语区,同一语言的迁徙分化形成语系。不但在语区形成之中,"同化即异化"现象比比皆是,就是在语系分化过程中也在所难免。除非迁往无人区,否则远徙的某一语种在覆盖原住居民语言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异化,只是异化的程度与语区不尽相同。

三、语种的消亡

除了自愿换用导致语言自动消亡外,民族文化的灭绝总不免语言的被迫死亡。被阿卡德人打败的苏美尔人,其民族和语言随之隐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19 世纪中叶英国人来到澳大利亚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岛,大肆捕杀原住居民。到 1876 年,作为民族和语言的塔斯马尼亚,随着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妇女特鲁加妮妮的死亡而死亡了。经济弱势且人口稀少的种群的语言也难免自然消亡。人数在 1500 ~ 4000 之间的内婚制小种群,人类学上通常叫做"德莫"。这种滞留在文明社会之外的"德莫"语言,在历史上的消亡不知其数。根据美国萨默语言学研究所的调查,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有 51 种,近五百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 100 人,1500 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 1000 人;三千多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 10000 人;5000 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 10 万人。全世界 6000 种语言的 96%的语种分布在 4%的人口之中。根据估计,其中一半左右将在 21 世纪消亡,即 3000 种语言将在 1200 个月中灭亡,这意味着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消失。语言的创造者、使用者和研究者,禁不住发出"语种的消亡像物种的灭绝一样

可怕"的哀叹！[①]

四、语言的混合

语言接触过程中最深入的是语言的混合。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强大文明都是混合的文明。文明的混合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混合，语言的混合是历史上的自然过程，混合的结果则诞生新的语种。语言的混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然混合语和经济混合语。前者是指同一地区语言的自然接触渗透，导致原语言不复完存而成为一种新语言；后者是指商贸活动出现的洋泾浜语，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便成为克里奥尔语。

现代语言起源于一源，由于人口的流播、交通的阻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等原因，形成史前社会的数以万计的不同的语言。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从人类语言演变的总体趋势来说，语言分化只是局部的或暂时的状况，语言运动最终导向的是语言混一。从15世纪开始，欧洲科技文明冲出旧大陆向全世界洪溢，世界性的文化合流进程拉开帷幕。20世纪的交通便捷、文化交融、通婚混血、经济合作和网络传播，使地球真的正在逐步变为"村庄"。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世界共同语或国际语(不可否认，英语是目前最通用的国际性科技、商贸语言和网络语言)；另一方面，语种的消亡正像物种的消亡一样不可阻挡。可以预见，国际语的形成并不是某些人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以一种语言为主体的自然混合的历史进程。

尽管未来国际语以哪一种语言为主体还不能断言，尽管未来

① 详见戴维·克里斯特尔：《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参考消息》1999年11月10日。

国际语的最终形成可能还需要若干世纪，但是从宏观趋势来看，语言的世界性合流不可避免，世界语言趋同化的进程仿佛重演着东亚地区周边语言“汉语化”的历史。随着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文明接触交融和现当代正在进行的国际化，人类语言又逐步趋于统一。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原始单一性走向民族差异性，由民族差异性走向地区趋同性，再由地区差异性走向世界趋同性，人类语言的演变也必然由一源性到多样性，再由多样性到统一性：这就是人类文化和语言的宿命！

主要参考文献

B

[美]白保罗(1944):《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罗美珍译),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0年。

白保罗(1972):《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

鲍明炜(1986):《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载《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江苏教育出版社。

C

[韩]蔡瑛纯(1978):《〈译语类解〉所见中国音系之研究》(稿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蔡瑛纯(1999):《试论朝鲜的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之关系》,《语言研究》

第1期。
陈保亚(1996):《百年来汉藏语系谱系研究的理论进展》,载《语言学论丛》第21辑,商务印书馆。
陈其光(1999):《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第1期。
陈忠敏(1987):《某些音位变体在语言底层研究和史前史、民族史、人类学研究里所起的作用》,《上海青年语言学》第4期。
陈正祥(1982):《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D

戴庆厦等(1987):《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美]理查德·道金斯(1997):《伊甸园之河》(王直华等译),上海科技出版社。
邓晓华(1993):《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邓兴锋(1994):《〈南京官话〉所记南京音系音值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
丁锋(1995):《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

冯蒸(1989):《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G

[瑞典]高本汉(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版。
高本汉(1954):《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版。
格勒(1988):《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新华文摘》第3

期。
[日]古屋昭弘(1988):《〈宾主问答释疑〉的音系》(刘丽川译),《音韵学研究通讯》总15期。
桂诗春(1993):《语言起源问题新探——"祖先的声音"评介》,《国外语言学》第1期。
郭沫若等(1979):《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H

和即仁(1989):《云南蒙古族语言及其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第5期。
胡坦(1993):《国外藏语语法研究述评》,《国外语言学》第2期。
黄淬伯(1957):《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观点》,《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黄淬伯(1964):《〈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第3~4期。

J

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金光平等(1980):《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
竟成(1986):《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探索与争鸣》增刊。
竟成(1992):《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现代语言学》第21期。

K

[美]戴维·克里斯特尔(1999):《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参考消息》11月10日。

L

[日]濑户口律子(1994):《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

文研究中心。
[美]理查德·利基(1995):《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上海科技出版社。
黎新第(1995):《近代南方系官话的形成及其在宋元时期的语音特点》,《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黎新第(1995):《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李葆嘉(1990):《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语言学通讯》第1~2合期。
李葆嘉(1994):《天问:华夏汉语祖先安在》,韩国《中国人文科学》总第13辑,台北《国文天地》10:9。
李葆嘉(1995):《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语文研究》第4期。
李葆嘉(1996):《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李葆嘉(1996):《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言史宏观通论》,日本《中国语研究》总38号。
李葆嘉(1998):《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李壬癸(1996):《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58期。
李新魁(1983):《〈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
李新魁(1980):《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第1期。
李增祥(1992):《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凌纯声(1979):《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刘静(1990):《南宋初年的人口迁徙与今长江下游流域的文白异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龙晦(1984):《释〈中原雅音〉》,《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
[日]六角恒广(1992):《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鲁国尧(1994):《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罗常培(1930):《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史语所集刊》1本3分。
罗常培(1936):《京剧音韵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罗美珍(1983):《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第2期。

M

马学良等(1991):《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

倪大白(1988):《中国的壮侗语和南岛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倪大白(1994):《南岛语和百越诸语的关系》,《民族语文》第3期。
倪大白(1995):《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问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
宁继福(1985):《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牛岛德次(1993):《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P

[前苏]帕诺乌(1983):《尼安德特人会说话吗?》(王钢译),《国外语言学》第1期。
潘悟云(1990):《第三代汉语音韵学》,载《现代语言学——全方位的探索》,延边大学出版社。

Q

[前苏]尼·切博克萨罗夫等(1985):《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日]桥本万太郎(1978):《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R

喜饶嘉错(1991):《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民族语文》第4期。

S

[法]沙加尔(1995):《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郑张尚芳、曾晓渝译),载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商友仁(1988):《古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鸟瞰》,《北方论丛》第4期。
石定栩(1995):《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耳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第4期。
石兴邦(1988):《中国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
石兴邦(1989):《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腾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载《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史有为(1990):《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
宋金兰(1991):《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第6期。

T

[日]太田辰夫(1991):《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
谭其骧(1934):《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唐建(1981):《语言的起源和思维的起源》,《语文论丛》(1),上海教育出版社。

W

王力(1985):《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王士元主编:《语言和人类交际》(游汝杰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士元主编(1995):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nograph Series No. 8, JCL。

王士元(1995):《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载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王松木(1994):《〈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稿本),台湾嘉义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王远新(1993):《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吴安其(1994):《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第 1 期。

吴松弟(1993):《宋代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51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孟雪(1993):《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文史知识》第 1～3 期。

X

邢公畹(1992):《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第 3 期。

徐通锵(199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整理(1984):《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第 13 辑,商务印书馆。

Y

[前苏]雅洪托夫(1964):《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载胡双宝、唐作藩选编《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严学宭(1990):《原始汉语的研究方向》,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日]岩田宪幸(1991):《清代后期的官话音及其相关的问题(稿)》,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
[美]杨福绵(1986):*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ology,Taipei。
[美]杨江(1991):《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吕凡译),《浙江学刊》第1期。
杨耐思(1985):《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锡璋(1990):《古代南方印纹陶与汉语南方方言》,《中原文物》第2期。
杨振淇(1991):《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
叶宝奎(1993):《明清官话音系》(稿本),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前苏]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许浩福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殷方(1991):《1965—1979年国外汉语音韵学研究述评》,载袁晓园主编《汉语汉字学术讨论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
余志鸿(1987):《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语文导报》第3期。
余志鸿(1990):《汉语的混沌型与结核型》,载《现代语言学——全方位的开拓》,延边大学出版社。
俞敏(1980):《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俞敏(1984):《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第4期。
袁家骅等(1983):《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日]远藤光晓(1984):《〈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
游汝杰(1992):《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1996):《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第3期。

Z

曾晓渝(1991):《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言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

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张光宇(1990):《切韵与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

[美]张光直(1959):《华南史前民族文化史提纲》,台湾《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期。

张光直(1986):《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美]张琨(1972—1979):《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贤豹翻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张善余等(1997):《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

张树铮(1989):《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看汉藏语系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张卫东(1991):《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论文(广州)。

张卫东(1992):《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载《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张竹梅(1993):《琼林雅韵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赵杰(1996):《满族话与北京话》,辽宁民族出版社。

赵相如(1984):《维吾尔语的音节结构和借词拼写法的关系》,《民族语文》第4期。

赵相如(1984):《汉语"氏"和维吾尔语"tɛg"的关系初探——兼及汉语阴声韵的辅音尾》,《延边大学学报》第4期。

赵相如(1986):《哈萨克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初探——兼论qazaq(哈萨克)一词的源流及涵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赵相如(1986):《维吾尔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从语言上看历史上维汉人民的密切关系》,《语言与翻译》第2期。

赵衍荪(1992):《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郑贻青(1986):《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民族语文》第6期。

郑贻青(1995):《回辉话中的汉语借词及汉字读音》,《民族语文》第5期。

郑张尚芳(1990):《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第 6 期。
郑张尚芳(1999):《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载《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周振鹤(1987):《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1~2 合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振鹤、游汝杰(198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各章内容提要(中英文)

Abstracts of Each Chapters

第一章　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理论模式

汉语史研究的每一具体项目的作业都与特定的汉语史观密切相关。那种不适当地夸大语言事实的自明性而漠视理论模式研究的倾向,除了表明研究者已经接受了某种模式的思维定式以外,还隐含着理论和方法原创力的薄弱。清代学者的研究,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古音理论模式的文章,但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并非处于任何理论模式之外。顾炎武的“古韵分部论”与毛奇龄的“古韵通转说”,就是清代古韵学研究中的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而戴震的《转语二十章序》与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等文,则分别蕴含着上古声组研究中的古声流转模式和雅音归并模式,其深层语言史观的分歧是对上古雅音与方音关系的处理不同。



Chapter I
Theoretical Models of Studying Ancient Phonology in Qing Dynasty

The operation of every particular item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specific viewpoint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trend of exaggerating inappropriately the self-evidence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neglecting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models implies the weaknesses 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riginality apart from the expression of the researchers' having accepted certain type of thought set. Although lack of the articles that gave specific counts of the theoretical types of ancient sounds,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had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that are not byond any theoretical models, for example, Gu Yanwu's "Classifying Ancient Rhythmic parts Theory" and Mao Qiling's "Interchanging Ancient Rhythmic Parts Hypothesis" are two contrastive theoretical model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Rhythmic Parts at that time. Dai Zhen's *preface to the Twenty Chapters on Interchanging Sounds* and Qian Daxin's *There were no soft lip sounds in ancient times* imply the model of ancient sounds interchange and the model of ancient sounds mergence respectively, whose divergence underlying the viewpoints of linguistic history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Standard Sounds and Local Sounds.

第二章　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模式

高本汉将西方历史比较法和中国汉语音韵学结合起来，选择

《切韵》音系作为联系古今汉语的枢纽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框架，形成了汉语语音的演变从上古到中古、再到现代汉语方言的直线型模式。在高本汉模式对复杂的中国语现象做简单化处理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汉语音系历时演变的橄榄型状态。如果《切韵》音系是隋唐长安音系，那么这一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现代各大方言的祖语；如果现代各大方言的祖语是《切韵》音系，那么《切韵》音系根本不可能是隋唐长安音。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的失误主要有三个方面：抽去了语言的空间差异，以一维的时间差异来贯穿纷繁杂芜的语言演变；以建立在印欧语事实基础之上的谱系树理论硬性框范与印欧语发展模式不同的中国语言；撇开汉语的历史文化背景，孤立地重建汉语语音史。

Chapter II

Bernhard Karlgren's Linear Theoretical Model

Having combined historical comparitive method in the West and Chinese phonology in China, and chosen *Qie-Yun* as a hub linking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aframework of studying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Bernhard Karlgren formed a linear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unds from Ancient to Middle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re must have appeared an olive state i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Karlgren's Model's making a simplified treatment of complex Chinese phenomena. If the phonology in *Qie-Yun* had been Chang'an phonology in Shui-Tang Dynasty, the phonology could not be the ancestral language of major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If the ancestral language of major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had been the phonology in *Qie-yun*, the phonology could not be Chang'an phonology in Shui

– Tang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about the faults of Karlgren's linear model: the difference in linguistic space has been extracted, and a uni-dimensional temporal difference is used to run through complicated and disorderly linguistic evolution; Family tree theory based on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facts is stiffly used to prescribe Chinese languages that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ir developmental types;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has been put asid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reconstructed isolatedly.

第三章　普林斯顿学派的方言逆推型理论模式

利用现代汉语方言为基础构拟早期汉语的逆向推溯思路，是对一味依赖文献，仅将方言作为音值构拟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普林斯顿学派的方言逆推模式，虽然使用的材料及操作方法与之不同，但是立论的语言史观即“汉语一元分化论”并未摆脱谱系树理论，因此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语料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时空观照的立场出发，方言区内部的地域差异也同时反映着时间差异，将不同历史层次的语料不加区别地置于同一平面上进行比较势必陷入误区。全然抛开文献材料，将汉语的演变与无文献语言的演变等同，不仅不可能重建而且有可能歪曲历史汉语。依据原始汉语来源的复杂性和汉语方言形成的错综性，必须分层构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形成机制的汉语方言。



Chapter III
Pricestonian Model of Counter-Tracing Dialects

The counter-tracing thought of reconstructing Early Chinese based on the use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s a reaction to the Karlgrenian Tradition depending only literature in which the values of sounds are reconstructed with reference to dialects. Pricestonian Model of Counter-Tracing Dialects, although differing from Karlgrenian Tradition in the materials used and the methods operated, has as a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history in its position "uni-dimensional dividing theory of Chinese", which does not break away from family tree theory, and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Karlgren had had a tentative plan of directly reconstructing early Chinese by making use of dialect corpus. Starting from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emporal and spatial viewpoints, we can see that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within a dialect area reflects the 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thus it is certain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will result from putting corpu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hierarchies without differentiation on the same level. If we completely put away the corpus and literature, and identified Chinese evolu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other languages without literature, we could neither reconstruct nor understand historical Chinese. Chinese dialec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with different developed mechanisms must be reconstructed hierarchically with its bases the complexity of originating primitive Chinese and perplexity of developing Chinese dialects.

第四章　张琨的南北差异型理论模式

南北差异型模式包括文献语料的鉴定、时空二维的语言史观和音系投射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关键是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认定及其如何利用。既然方言的差异自古而然，那么汉语音韵的历史文献不但代表的时代不同，而且代表的方言也应不同，汉语语音史南北平行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方言曾在不同时期占有标准语的地位，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标准语的基础也由一个方言突然换成另一个方言。只代表北方汉语的《诗经》音系地理基础较窄，不可能投射出汉语的历史来源，而依据地理基础广阔的《切韵》音系却能投射出汉语的原始系统。时空二维的差异型模式，虽然较高本汉时间一维的直线型模式有极大突破，但仍然未能摆脱“文明一元分化论”，在深层文化史观上与高本汉模式没有本质性对立。

Chapter IV
Zhang Kun's Theoretical Model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fferences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fferences Model established by Zhang Kun includes the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corpus, viewpoint of spatio-temporal bi-dimensional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honological projections. The key to study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is how to identify the phonological nature of *Qie-Yun* and how to use it. There have been dialectal differences in all periods of the world. It follows that the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not only represents different

ages, but also different dialects, and thus a correct descrip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and North China. In Chinese history, different dialects had been dominant as standard languages, but one dialect underlying the standard language all of a sudden changed into another with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s. The phonology of *Shi-Jing* representing only Northern China had a narrower geographical area and thus it could not project out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inese, while that of *Qie-Yun* with a broader area could project out the primitive system of Chinese. In comparison with Karlgren's linear model with temporal uni-dimension, the Differences Model with spatio-temporal bi-dimensions has a great breakthrough, but has not broken away from Civilization Uni-dimensional Divergence Theory, and thus there have not been an ess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it and Kargren's Model with regard to the viewpoints of deep cultural history.

第五章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型理论模式

桥本万太郎的语言类型地理论将汉语置于东亚语言结构类型的连续体之中，揭示出从南方语言向北方语言"横"的推移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纵"的演变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推移型模式包括语言的文明类型与演变差异、语言的地理推移和历史演变、汉语的异质属性和历史背景。与牧畜民型语言不同，农耕民型语言首先必须假设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语言，然后某个文明中心缓慢地同化周边语言，而使各种原先不同的语言成为一种存在着内部若干差异的"统一语言"。在这一语言

中，既没有谱系树的“祖语”假设，也没有语言史的“直线”发展。联结东亚大陆的南亚诸语言和阿尔泰诸语言的汉语，其语言结构不是等质的，今天看到的古代语料其实是混同了异质要素的书面语。虽然谱系树理论和非印欧语事实的方枘圆凿，必然导致20世纪的历史语言研究由“分化演变”转向“扩散推移”，但是桥本万太郎的理论却受到中国语言学界的冷淡和抵制。一方面出于潜在的“汉族主义情结”，无视北方民族政权对北中国乃至全境的长期统治；另一方面深受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墨守“高本”而拒绝“桥本”。桥本万太郎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推移型模式的基础“黄河文明中心说”与中国大陆的考古文化研究成果大相径庭。推移模式可以阐释秦汉以后的汉语发展，但原始华夏语和东亚文明中心的来源确没有探讨。

Chapter V
Hashimoto's Theoretical Theory of Geographical Transition

Having placed Chinese into the continuum of East Asia linguistic structure types, M. J. Hashimoto in his linguistic typological geographical theory reveals the correspo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itudinal transition from Southern languages to Northern Languages and the longitudinal change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and offers a new thought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The Transition Model consists of the civilization types and the evolutional differences of languages, geographical transi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anguages, heterogeneous properti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Chinese. Different from nomadic types of languages, about farming types of languages we must suppose that there

were originally different languages, then certain center of civilization gradually assimilated neighbor languages, and mad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original languages become into a united language within which there are a number of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language, there is neither hypothesis of ancestral language in family tree nor linear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history.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of Chinese linking South Asia languages of East Asia Continent and Altaic languages is not homogeneous, the ancient corpus still visible today is in fact the written language with confused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lthough the disharmony between family tree theory and non Indo European linguistic facts necessarily leads to the turn of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cal linguistic study from divergence and evolution to spread and transition, Hashimoto's theory is disregarded and rejected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of China for two reasons. On the one hand, out of potential Hanist complex, they disregarded Northern peoples' long rule of North China even the whole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Europea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ey cling to Karlgren's theory and Hashimoto's theory.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is no faults with Hashimoto's theory,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Center Theory underlying the Transition Model is widely divergent with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Mainland of China, but the Model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fter Qin-Han Dynasty with the source of Proto-Huaxia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center of East Asia left uninvestigated.

第六章 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距今大约七千年前，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形成，与之平行，太古夷越—苗蛮语区、太古氐羌语区和太古胡狄语区也同时形成。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印证的是传说中的三大民族系统，而三次民族战争则是三大考古文化史前交融的折光。在阿尔泰、藏缅、南岛三种语言文化交汇的河洛地区，以黄帝进据中原为起点，随着原始华夏族的形成，经五帝到三代形成了一种与强势文明相伴的混合型语言。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不管是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分别论证的结果。与其说华夏语仅与某一毗邻语言存在同源关系，不如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之为“华夏语”的这种语言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氏族文化撞击整合为中原文明的互动过程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周代在传播雅言的同时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夏商周三代并非同一种文化的历时一脉承传，而是地域和时间上重叠影响的三个部分，在持久激荡而熔铸成中国古典文明的同时，华夏汉语逐步从原始黏着结构向孤立结构化方向演化。

Chapter VI
The Bl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o-Huaxia Languages

About 7000 years ago, during the New Stone Age in China formed three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s, in parallel with which formed Ancient Yi-Yue and Miao-Man Linguistic Area, Ancient Di-Qiang Linguistic Area and

Ancient Hu-Di Linguistic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Three Clan Systems in Legend and the three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s can be used to confirm each other. The three battles between these clans is a refrac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three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s in pre-historic period.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Luoshui River area where Altaic, Tibetan Burmese and South Islan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ere joined, a blending language was form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proto-Huaxia peoples in accompany with the better civilization, starting from Huang Di's Entering and Dwelling in Central plains, passing from Five Emperors to Three Dynasties (Xia, Shang and Zhou).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e common genesis hypothesi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urmese, that of Chinese and South Island languages, and that of Chinese and Altaic languages are the results of reasoning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ir self-chosen materials. We should say that the language later known as Huaxia language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overlapped blending language formed in accompany with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being formed by impinging and conforming many clans' cultures rather that Huaxia language and certain neighbor language have a common genesis relation. In Zhou Dynasty, Central plains language was made "Di-Qiangize" or "Chinese-Tibetanize" when Ya-Yan (standard language) was spread. Xia Dynasty,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were not a culture's diachronic inheritance, but there parts that overlapped with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area and time. When the three parts were fused and cast into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hina in a long and influx period, Huaxia Chinese language gradually revolved from primitive agglutinating structure to isolated structure.

第七章　秦汉以后汉语的推移发展

秦汉以前中原语言的运动主流是因交融而出现的混成发生，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崛起相一致；秦汉以后汉语的运动态势是因接触而出现的推移发展，与汉民族和汉文明的延伸相一致。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的成果而向农耕世界发动进攻，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成为中国境内语言的交响乐。秦汉以后，尽管中原汉人竭力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北方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区域泛滥。以"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为三大高潮，北族的入主中原引发了中原汉人的一次次大规模南迁，汉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出现了一次次变迁，呈现出西安音→汴洛音（洛阳）→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汴京）→南京音的周而复始的"横折型"迁徙轨迹。这种近乎八九百年一次的音系演变大循环，与北民入主中原密切相关，而北族的进攻又与草原生态的变化周期有关。与古希腊的 dialect 不同，上古秦汉"方言"即"邦国言语"。由北族进据中原引发的中原居民南迁浪潮，彻底打破了汉魏以来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格局。中古以后形成的汉语方言，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既有汉族心理认同又表现为不同民系的人群所具有的语言相，"汉语方言"是以可追溯的文化渊源为内涵的人文历史地理语言学概念。语言的变化是语主的嬗变，汉语方言划分必须以汉人的移民轨迹和周边语言的汉语化程度为依据。一部汉语方言史就是一部中国移民史的投影。黄河流域的语言接触，对于进据农耕世界的游牧征服者而言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则是语主的嬗变。依据史前南方土著印纹陶文化和汉语南方方言的分区对应性，可以推定南方方言的区域性差异与各土著文化区语言的歧异性相关。汉语方言划分的

基本原则应当是:移民轨迹与方言分布的对应性;语音系统和语言结构的综合性;历史语言和方言特点的互证性。

Chapter VII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fter Qin-Han Dynasties

Before Qin-Han Dynasties, the main stream of the movement of Central Plains languages is blending and birth arose in emergen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ise of Huaxia peoples and Huaxia civilization, while thereafter the situ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arose in contac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xtension of Han peoples and Han civilization. With the attacks made by nomadic peoples to farming world for they hoped to share the achievements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contact, emergence, recontact, andreemerg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became symphony of languages within the area of china. After Qin-Han Dynasties, the Northern peoples periodically flooded into central plains although the Han people in Central Plains tried their best to prevent the nomadic peoples from invading southward. With the Turmoil of Yongjia Period, the Turmoil of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and the Disaster of Jingkang Period as the three upsurges, Northern peoples' entrance and dominance of Central Plains led to Central Plains Han people's large-scaled southward migrations, and thus transitions happened to the fundamental phon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 as a dominant language, presenting a cyclic 'transverse and slanting pattern' of migration orbits from to Xi'an sounds to Bianluo(Luoyang) sounds to Nanjing sounds, and again from Nanjing sounds to Bianluo(Bianjing) sounds to Xi'an sounds. The great cycle of phonological evolution occurred once every about 800 or 900

yea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Northern peoples' entrance and dominance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attacks of Northern peoples in turn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ange cycle of zoology in grassland. Different from dialect in Ancient Greece, 'Fangyan (Dialects)' in Ancient Times and Qin-Han Dynasties were 'languages of dukedoms or earldoms'. Central Plains peoples' southward migration wave caused by Northern peoples' entrance and dominance of Central Plains completely broke the pattern of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in the area of China since Han and Wei Dynasty. Chinese dialects formed after the Middle Age are linguistic appearances that are gradually formed in historic process and have Han people's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but represented as shared by differently-originated people, and 'Chinese dialects' is a soci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concept with traceable cultural sources as its connotations. Linguistic changes are the changes of native speakers, and Chinese dialects must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immigration orbits of Han people and the Hanized degree of neighbor languages. So a history of Chinese dialects is a proj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Language contact is th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language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madic conquers of the farming world, but the change of native speakers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nguage of conquered farming world.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ehistoric native Southern peoples' culture of marks, lines and potteries, and the subarea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South China that the local differences of South dialec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vergence of languages in different native peoples' cultural area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lassifying Chinese dialects are: the correspondence of migration orbits and dialectal distribu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phonetic specialty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the inter-evidence of historical languages and modern dialectal

features.

第八章 元代汉语音系和北方汉儿言语

宋元中原正音发展的曲折,从靖康南渡、金人统治就开始了。一方面以北宋汴梁话为代表的中原正音南播江淮浙北,另一方面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原音韵已是契丹、女直换用之后的北方汉语。《蒙古字韵》音系代表的是源于宋代两京正音、而在江淮有所变化的元代读书音系。《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以汴洛宋音为承传、继承了宋词平仄通押与元曲入声与三声相协的习惯,以周德清所习得的书音为语感,为纠正浙闽和燕冀之音而编撰的曲韵音系。虽然称之"中原",但并非定指元代汴洛。靖康南渡以来,"中原"已演变为传统文化概念。成于元代的朝鲜教科书《老乞大》常出现"汉儿言语"。元代"汉儿"是金朝治下的北国诸民,"汉儿言语"是中原汉人和汉化胡人的共通语。"汉儿"早在北朝就已出现。北朝的胡汉区别并非纯靠种族血统,而是据其汉文化教养。隋唐统一以后,中原汉人已不尽是汉人血统,大量汉化鲜卑已自称"汉儿"并以之与"吴儿"相别。宋金南北对峙,女真金朝将汉人、南人二分,而南宋治下的臣民则自称"中国人"。元代之所以把契丹、高丽、女直等视同"汉人",可能是因为"汉儿言语"在北方更流行。在近古阿尔泰化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才促使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汉语迅速变化并日趋统一。

Chapter VIII
Chinese Phonology in Yuan Dynasty and the Speeches of Northern Han-ers

The zigzag development of Central Plains standard sounds began from

the Turmoil of Jingkang Period and the rule of Nuzhen. On the one hand, Central Plains standard sounds represented by Bianjing(now Kaifeng)sound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spread southward in Yangtze and Huaihe areas and North Zhejiang province.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Plains Phonology during the Mongolians' rule or Yuan Dynasty was Northern Chinese changed and adopted by Khitan and Nuzhen people. The phonology of *Menggu-Zi-Yun* represents the reading phonology in Yuan Dynasty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standard sound of Bian-Luo (Bianjing and Luoyang) and changed in Yangtze and Huaihe areas. *Zhongyuan-Yinyun* represents the phonology of opera rhythms that originated from Bian-Luo sounds of Song Dynasties, inherited harmony of level and narrow in Song songs and harmony of entering tone and other three tones, with literal sound acquired by the author Zhou Deqing as its sense of speech and was edited to correct the sounds in Zhe-Min or Ji-Yan areas. Though called "Central Plains",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stand for Bianliang and Luoyang in Yuan Dynasty. Since the Turmoil of Jingkang Period and Central Plains peoples' crossing the Huaihe River to South China, "Central Plains" has evolved into a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 "Han-er Speeches" frequently occurs in Korean textbook *Lao-Qida* completed in Yuan Dynast of China, "Han-ers" in Yuan Dynasty are the Northern peoples under the rule of Jin people, while "Han-er Speech" is a common language of Han people in Central Plains and Hanized Northern minority peoples. The word "Han-er" appeared as early as in the South Dynasty and North Dynasties. In Northern Dynasties, Northern minority people and Han people were not distinguished just according to their race and blood, but to their Chinese cultural breeding. After the union of Sui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the Han people in Central plains are not of pure Han blood, for a lot of Hanized Xianbei

people called themselves "Han-er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from "Wu-ers" (People in Yangtze River drainage area). When two Song Dynasties and Jin Dynasty confronted each other, the Nuzhen rulers of Jin Dynasty divided their subjects into Han people and Southern people, while the subjects under the rule of South Song Dynasty called themselves "Chinese people". In Yuan Dynasty, Khitan people, Korean people, Nuzhen people are regarded as Han people,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much more popularity of "Han-er speech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background of Altaicization in Near Middle Period, the large-scaled migration and large-wide emergence of peoples led large Northern Chinese languages in the north of Huaihe River to change rapidly and become united day after day.

第九章　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与基础方言

除了沿袭"官"的传统用法,宋元时期"官"的称呼开始市民化。官话的出现及通行与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明代"官话"包含着丰富的市民社会文化内涵。远藤光晓较早注意到南京话在明代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提出北京一带当时通行南京话的观点。明末来华传教士金尼阁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地道的中国话"改为"纯粹的南京话",可作为明代南京话就是当时官话的确证。琉球《官话课本》的分析、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话、欧美传教士所记官话,皆表明清代官话仍以南京为标准,"官话"就是南京话的专称。当时的"南京"可指狭义"南都",也可指广义"南省"即"江南省"。朝鲜与中国有海陆两条交通途径,常根据形势选择不同出使路线,因此在学习明代汉语的过程中,既要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又要了解北京俗音,从而形成了汉语正俗音双解的习惯,以至于给现代研究者造成了朝鲜所习官话音系的困惑。

南京话成为明清"官话",除了江淮话相对保留了中原宋音、江南商业蓬勃发展和行商需要通语以外,雅俗共赏的江淮市民文学也有力地推动了官话的流播。官话可定义为:以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江淮话为基础方言,以通俗的白话小说为语法楷模的明清通语。

Chapter IX
Urban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Mandarin in Ming-Qing Dynasties and Fundamental Dialects

Apart from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uses of "guan"(official),the title of "guan"has began to urbaniz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appearance and circulation of Guan-Hua or Mandar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in the Southeast, and Mandarin in Ming Dynasty includes rich urba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Endo Shikalisho very early observed the likelihood of Nanjing speech's taking a position of standard speech in Ming Dynasty,and suggests the point that Nanjing speech was in circulation at that time in Beijing. Niolas Triult, a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in late Ming Dynasty, changed "authentic Chinese speech"in Matteo Ricci's *Storis* into "pure Nanjing speech",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vidence that Nanjing speech was Mandarin in Ming Dynasty. The analysis of *Mandarin Textbooks* in Ryukyu Islands, Tang-hua or Guan-Hua in Edo Age of Japan, and Mandarin recorded by Euro-American missionaries indicate that Mandarin in Qing Dynasty still took Najing speech as its standard, and Guan-hua is a specific title given to Nanjing speech."Nanjing"at that time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either "South Capital" in a narrow sense, or Jiangnan provinces(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drainage area)in a wide sense. There were land and sea routes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and the Koreans

chose different routes of miss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of Ming Dynasty, they not only took Najing speech as its standard, but had to understand vernacular sounds of Beijing, thus they could get the habit of speaking both standard and vernacular speeches, which confused modern researchers in their study of Mandarin phonology acquired in Korea. Nanjing speech became Mandarin in Ming-Qing Dynasties for many reasons, Jiang-Huai urban literature appreciated by both common and noble peoples strong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ndarin, apart from Jiang-Huai's reservation of Song speech in Central Plains, the flour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Jiangnan', and a common language was in ne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rade and commerce. Mandarin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a common langua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Nanjing speech as its standard sounds, with Jiang-Huai speech as its fundamental dialects, and with popular colloquial fictions as its grammatical models.

第十章　官话音系特点和北京官话溯源

仅凭近古政治中心长期在北京，一些学者就作出“元明清以来北京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臆断，进而提出“官话系统南北说”。宋元时期尚未形成官话，明代北京通行的官话即永乐北迁的江淮话。将明代官话和现代江苏境内的江淮话进行比较，除了浊声母的消失，语音系统具有一致性。凡京剧唱念中“保留古音”的“上口字”和“尖音字”，皆鄂、皖、苏江淮话中的“方音字”。随着嘉庆道光年间大批满人换用汉语，清代后期出现了“南话”和“北话”之说。沙彝尊的“南音”和“北音”说既表明了当时并未以京师为标准，同时也暗示了传统官话地位的动摇。虽然紧邻日本已视“北京话”为新标准，但单纯用“官话”指“北京

官话"是在日俄战争(1905年)前后,并不能因为1926年确定北京音为国音,就可以推定明清官话也是北京音。历史上的幽燕一直是北方民族的进退要冲,在辽金元北族政权的治下,北京一带动语言极不稳定。只有在明代汉人政权的治下,京师地区接受江淮方言的影响才趋于稳定,最终形成以宋元北迁中原汉语为基层、以明代北迁江淮话为主体,又在清代大批满人换用汉语过程中有所改变的现代北京话。

Chapter X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Mandarin and the Source-Tracing of Beijing Mandarin

Just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political has been Beijing for a long time, some scholars made the forejudgment that Beijing speech has been common language of Han people sinc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ence proposed the 'South and North theory of Mandarin system'. Mandarin had not been form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andarin current in Beijing in Ming Dynasty was Jiang-Huai speech that was transferred northward with Yongle Emperor. If we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Mandarin of Ming Dynasty and Jiang-Huai speech in modern Jiangsu province, we can find that their phonological systems are conformed apart from the disappearance of voiced initials. All smoothly-read characters remaining old sound in singing Beijing Opera are 'local characters' in Jiang-Huai speech of Hubei ,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With th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Chinese by lots of Manchurian people in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the theory of 'Northern speech' and 'Southern speech' appeared in late Qing Dynasty. Sha Yi-zun's theory of 'Northern sounds' and 'Southern sounds' not only indicates the fact that at that time, capital Beijing had not

been taken as standard, but also implies the shake of the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Mandarin. Although our neighbor Japan had regarded 'Beijing speech' as a new standard, it is not until before and after the Japanese-Russian War (1905) that the notion of 'Mandarin' was purely used to refer to 'Beijing Mandarin'. Beijing speech was established as national speech in 1926,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Mandar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Beijing speech. Hebei province and Beijing areas have been a communication center of Northern peoples' invading and retreating from Central Plains in history, so languages in Beijing and nearby were extremely unstable under the rules of Liao Dynasty, Jin Dynasty and Yuan Dynasty. It is only under the rule of Han people in Ming Dynasty that the influence of Jiang-Huai dialects accepted by Beijing area had become stable. Modern Beijing speech was ultimately formed with as its root Central Plains Chinese language that was transferred northwar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Jiang-Huai speech transferred northward in Ming Dynasty as its main body, and where somewhat changes had been mad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Chinese by lots of Manchurian people.

第十一章　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尽管从东西方古老的传统经济方式的差别,就可以窥见东西方语言关系类型的不同,但是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并且依据世界语言中少见的典型分化型印欧语事实建立了谱系树模式,因此当西方学者和那些接受了语系说的东方学者以"印欧语眼光"审视东亚—南洋语言事实的时候,西方谱系树模式与东方语言事实的龃龉必然导致这一广袤区域语言关系的众说纷纭。如果以东亚—南

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指导，在语言事实描写的基础上，参证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遗传学、文化学和语言年代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探索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鸟瞰东亚—南洋语言的演变大势，可以宏观华夏汉语的发生演变，阐释华夏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同源异流现象。将见于"南方民族语"而在汉语文献中"晚出"的词确定为上古汉语的外来成分，是因为首先认同了"汉语仅与藏缅同源"的预设。无论是侗台苗瑶语，还是华夏汉语，其语言文化的动脉中都流动着太古夷越语的古老血液。所谓一些远古汉语"借词"，可能是从"远祖"那里流传下来的固有词，而并非从"弟兄"那里借来的外来词。白保罗提出的南方语言文化向北方中原传播的设想，与东亚—南洋的语言文化史实不相符合。

Chapter XI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Circle Hypothesis

It can be seen the differences of relational types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languages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ol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ways, but becaus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riginated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West, and a family tree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linguistic fact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at belong to seldom typically diverged type in the world languages ,so when Western scholars and those Eastern scholars who have accepted family-tree theory look at linguistic facts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anguag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Western family-tree theory and Eastern linguistic facts necessarily lead t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 in this vast area. If we take as our guide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Circle Hypothesis and

make reference to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archaeology, history, ethnology, genetics, culture, and linguistic chronology in describing linguistic facts, we can investigate prehistoric sources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anguages, have a bird's eye of great evolutionary trends of East Asia-South Ocean languages, make a micro-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Huaxia Chinese, and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and Neighbor Languag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source but different courses. The words that are observable in Southern ethnical languages but 'lately appear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identified as foreign element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mainly because of the presupposition of identifying the common genesis hypothesi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urmese. Old blood of Ancient Yi-Yue languages runs in the linguistic arteries either of Dong-Tai and Miao-Yao languages, or of Huaxia Chinese language. The so-called 'loan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may be inherent words passed down from 'remote forefather' rather than foreign words borrowed from 'brothers'. P. K. Benedict's supposition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South China spread toward Northern China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East Asia-South Ocean Linguistico-cultural facts.

第十二章　周边语言的汉语化和汉语的异化

不管汉语的祖先如何扑朔迷离，不管华夏汉语的演变如何复杂，但有一点非常明晰，早在商代就形成的文字和周代就出现的"雅言"，决定了东亚大陆持久的"汉语化"趋势，以至于几千年"南夷和北狄交"而"中国不绝若线"。南邻民族语言的汉语化主要表现为交融性语言换用、语言转型和语言混合，北邻民族语言的汉语化主要表现为汉化阿尔泰居民的彻底性语言换用。进入中原的阿尔泰军民，虽然作为战



胜者与黄河流域汉人形成交错杂居，但后裔最后不得不接受汉人文化和风俗并自认为是“汉儿”。在“以夏变夷”的过程中难免“夷亦化夏”，周边南北语言的汉语化同时导致汉语的阿尔泰化或夷越化。尽管一些学者难以接受汉语阿尔泰化论，然而桥本万太郎的观点实源于颜之推的“北杂夷虏，南染吴越”。所谓汉语的“阿尔泰化”，主要是北民居民在换用北留中原汉语的过程中以阿尔泰语的特点改变了汉语，形成了北方汉语的阿尔泰表层；所谓汉语的“南方化”，主要是南迁中原汉语对南亚语言的不完全汉语化，南方汉语保留了南方民族语的底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主中原的鲜卑、辽金和满洲的换用汉语，是促成了北部汉语迅速变化和日益统一的主要动因。在过去的两个千纪中，东亚大陆一直处于起伏绵延的汉语化进程之中，华夏汉语在同化周边语言的过程中也就异化了自身结构。汉语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然音变，而是植根于周边民族大规模的换用汉语。

Chapter XII
Chinization of Neighbor Languages and Alienation of Chinese

No matter how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 is, and now matter how complex the evolution of Huaxia Chinese language, a point is very clear that as early as Shang Dynasty written language had been formed and 'ya-yan(standard language)' appeared in Zhou Dynasty, they determined the everlasting 'Chinized' trend in East Asia Continent so that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he Southern Yi peoples and Northern Di peoples had been contacting and fighting Huaxia people' but 'Huaxia-Han linguistico-cultural has survived like a discontinuous line' Sinization of the languages of neighbor peoples in the Sout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as th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emerged languages, the trans-patterns of languages and blending of languages, while that in the North is as the complet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languages of Sinized Altaic dwellers. Having entered, Altaic soldiers and civilians dwelt disorderly with the Han people in the Yellow Rriver area as conquerors, but their descendents had to accept the culture and customs of Han people in the end and regarded themselves as 'Han-ers'. It is inevitable that 'Barbarians also changing Huaxia' in the process of Huaxia people's converting neighbor barbarians, and Sinization of languages in both South and North China simultaneously led to the Altaicization or Yi-Yueization of Chinese.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some scholars to accept Chinese Altaized theory, Hashimoto's theory indeed originated from Yan Zhi-tui's "The Northern Chinese was infected with Sienpi people's language, the Southern Chinese was infected with Wu-Yue people's language'. The so-called 'Altaic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mainl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dwellers in North China changed Chinese language by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taic language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and adopting Central Plains Chinese language remained in North China and thus formed an Altaic surface of Northern Chinese; while the so-called 'South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complete Sinization of languages in South Asia made by the Central Plains Chinese that was transferred southward, and the deep layer of ethnical languages of South China remains in Southern Chinese. Sienpi, Khitan, Nuzhen and Manchu peoples changed and adopted Chinese as the largest scale entrance and dominance of Central plains, which is the main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rapid change of Northern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ir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nited. In the past two millennia, East Asia Continent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zigzag and continuous Sinization, and Huaxia Chinese dissimi-

lated its own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ng neighbor language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lies not in natural sound change, but is rooted in the large scale change and adop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by neighbor nationally peoples.

第十三章　语言混合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

语言接触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而接触必然会引发语言的渗透、换用以至混合。但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以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述为导向，一方面认为两种语言的"融合"只能是征服式的一方"吃掉"一方，另一方面"洋泾浜"这一词语被染上"殖民主义"的色彩，所谓"语言污染论"在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近二十年来，民族语言学界对混合语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语言学的一个特点。中国境内的混合语往往产生在西北—青海—云贵—广西—海南文化走廊一带。这一历史走廊不仅是汉族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毗邻地缘，也是少数民族频繁接触的杂居地区。除了近代史上以西方商贸和殖民为背景引起的语言混合之外，语言的混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运动。中国境内的混合语是民族杂居和语言接触的历史产物。确定一种语言是否为混合语，主要依据语言的接触深度与语主的文化认同。混合语的存在为语言混合发生理论提供了证据，语言混合发生理论又为语言史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历史比较语言学无法解决的某些语言系属问题，若能从混合角度加以研究，可望找到答案。创建东方混合语言学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界的一项历史使命。

Chapter XIII
Current Status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Blending

Language contact is the necessity of human language, and the contact will necessarily lead to penetration, change and adoption and even blending of language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Stalin's linguistic statements have been guiding-direction for a long period, suggesting that the 'emergence' of two languages is the conquering language 'swallowed' the conquered on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ord 'Pidgin' has been dyed with 'colonial' color, and the so-called 'linguistic pollution theory' has been dominant in the linguistic field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study of blending languages made by ethnological linguistic fie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linguistic in China. The blending languages within China usually happened in the cultural corridor of Northwest China-Qinghai-Yunnan and Guizhou-Guangxi-Hainan Island, for the historical corridor is not only the abutted edge of earth between Han people's culture and neighbor peoples' cultures, but also the area where minority peoples frequenrly contacted and disorderly dwelt. Apart form the language blending caused by Western trade and colo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the blending of languages is a linguistic movement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mixed languages within China are the historical results of peoples' disorderly dwelling and language contact. Whether a language is identified as a blending one mainly depends on the depth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native speakers. The existence of mixed languages provides the linguistic blending and developing theory with evidence, which in turn pours energy into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history. It is likely that some linguistic genetic problems unsolvable by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an be solved from the blending perspective, and thus creating Oriental blending linguistics is a historical task of modern linguistic field in China.

第十四章　现代语言起源的科学思考

现当代欧美对语言的起源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突发型模式认为语言是现代人的独有特征，语言能力是随着脑子增大而在晚近迅速出现的一种能力；连续型模式认为语言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开始，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的自然选择而逐步成熟。作为文化本体和载体的语言，具有人类性、有声性、分节性三个特点。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证据表明“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为语言的东西”，虽然体质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直到3.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语言和文化。在原始“非语音符号手段”的使用和“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之间，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随着大脑神经的逐渐发达和语言器官的逐步成熟，人类的“非语音符号”日益为次，而“有声符号”则日益为主，在实物直观思维、形体符号思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现代语言思维。现代人类行为的花朵是与现代化语言的首次出现相联系的，语言的成熟被确定为人性形成过程中达到顶点的事件。所谓“人性”就是“语言性”；所谓“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才使人类获得了新的认知工具，掌握了开启文明殿堂的“芝麻开门”。

Chapter XIV
Scientific Thought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Languages

There are two opposing theories about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in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Outburst Theory suggests that language is a feature unique to modern human beings, and that competence is a rapidly-appeared a-

bility in late Ages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brains, while the Continuous Theory suggests that language began with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pecies and has gradually matu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s that make an action on all abilities of recognition. As a noumenon and carrier of culture, language has three features: human, vocal and segmented. The evid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earlier than 100,000 years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a complete lack of the thing that can be regarded as language by modern human beings', although physical modern human beings had appeared. Until 35,000 years ago, our ancestors grasped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which now we are familiar. There is a long period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e of primitive 'nonspeech symbolic means' and the maturation of 'vocal segmented language'.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brain nerves and the gradual maturation of speech organs, human 'non-vocal symbols' became more and more less important while their 'vocal symbol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modern language thought was ultimately established based on substance macro-thought and form symbol thought. The flowers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modernized language, and the maturation of language is identified as a summit event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human nature. The so-called 'human nature' is 'linguist nature', the so-called 'human world' is 'the world of language'. It is the first ioformation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human history——the maturation of vocal segmented language thet made human beings acquire a new instrument of recognition and grasp a key to open temples of civilization.

第十五章　世界语言演化的宏观走向

距今一万年前后，欧亚非一些地区从原始狩猎方式中形成游牧经济，从原始采集方式中形成农业经济，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世界语言关系呈现出四种类型：采集渔猎民型的连锁型语网、海上游牧民型的离散型语珠、农耕民型的同化型语区、牧畜民型的分化型语系。与这一"四分法"的世界语言关系类型学不同，西方语言学家引为骄傲的谱系树理论仅是建立在印欧语之上的一种语言关系类型。之所以以往的语言谱系研究治丝益棼，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世界语言关系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之相关，随着语义表达的混沌性到日益清晰性，语言结构呈现出语言单位的分析化、语法手段的范畴化、语法成分的音节化和结合方式的离散化倾向，由此形成了人类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连续统。语言关系类型与语言结构类型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但是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和语言接触打破了这一对应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语系式的语言分化只是局部状况，随着借用、换用、消亡和混合等，语言运动的主流导向语言的趋同。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原始单一性走向民族差异性，由民族差异性走向区域趋同性，再由区域差异性走向世界趋同性，人类语言的演变也必然由一源性到多样性，再由多样性到趋同性：这就是人类文化和语言的宿命！

Chapter XV
Macro-trends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Languages

About 10,000 years ago, momadic economy was formed from primitive hunting, farming economy formed from primitive gathering in some area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and thus entered into New Stone Age. In the eco-

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ppeared four types of linguistic relations in the world: chain linguistic net of hunting and fishing peoples, discrete linguistic pearls of marine and nomadic peoples, Assimilated linguistic areas of farming people, and differentiated linguistic systems of herding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e tetradic typology of world linguistic relations, the family tree theory of which the Occidental linguists are proud is just one kind of linguistic relation type based o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hy the past study of linguistic family tree has become worse and worse is that the variety and complexity of types of the world linguistic relations haven't been recognized, with which is associated a fact with the changes of semantic expressions from chaos to explicitness, linguistic structures show the following trends: analyticization of constitute units of sentences, categorization of grammatical means, syllabicalization of grammatical components and the discreteness of combining means, and thus form a continuu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ypes of human linguistic structures. Although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inguistic relation types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 types could be seen 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the correspondence has been more and more cleared up by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conflicts and language contacts. Since the civilized societies, linguistic family type of linguistic divergence is only temporal or local, but the main human language movement is gradual convergence led by borrowing, concurrently using, changing and adopting, dying out and blending and other forms.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ed from primitive unity to clan differences, from the national differences to regional sameness, from regional differences to global identification, and human languages must evolve from uni-source to diversity, from diversity to unity: this is the destiny of human culture and language.

(英文翻译：司联合博士)

本书作者简介

李葆嘉,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导,兼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语言科学及技术系主任。1986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199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理论语言学专业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训诂学会、汉语方言学会会员。致力于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汉语方言学、中国语言史、语言学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本土传统方法与外来现代理论、微观深入考证和宏观原创阐释、语言文字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融会贯通的研究风格。在海内外发表论文百篇,出版著作(含合作)18种。代表性著作有《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新刊点校广韵》(收入《传世藏书·语言文字》,海南新闻出版中心,1997)、《广韵反切今音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等,及刊有《隋唐音研究》(葛毅卿遗

稿，李葆嘉理校）、《论20世纪中国转型语法学》（合作）、《汉语的祖先》（王士元主编，授权翻译出版中文译本）等。1996年应邀赴台北出席著作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顺访香港中文大学。近年来主要从事面向信息工程的语义语法学理论的建构工作，论证了人类语言的共同本质是语义结构性。依据当代语言学已经凸显"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二分互补格局，提出"语言科技"新思维。目前研究志趣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和"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和哲学基础"等。

后　记

人是一个存在,一个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我的社会存在也许就是看书、教书、写书的“三书”。抚摩着这第七本独著,也是第一本在电脑上写作出来的书稿,感到自己似乎就是一架写作机器,当然首先得是一架语言思维机器。

面对当今社会转型,也曾经想过下海,但是一直未果。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正如同道所说:“有想到的东西要写,下海太可惜了。经商只要平平智力,但学术不是任何人都做得来的。”确实,各种想法总是源源不断,总是有新的问题在不断诱惑着不息的灵魂。似乎一直恍恍惚惚,可知是不可知中的可知,不可知是可知中的不可知;唯物是唯心中的唯物,唯心是唯物中的唯心;微小个体是大千世界的个体,大千世界又是微小个体的世界……也许,人真的是一架不可止息的思想机。记得从报纸上看到过,美国有一种职业叫“思想家”,其任务就是为雇主委托的问题思考数天,躺在椅子或床上,然后提供一个是否,而绝不需要出示任何论证。如果允许自由选择职业,我一定毫不迟疑地选择——“思想家”。

翻开常见的任何一本中国历史的教课书,在叙述三代文明之前,照例首先是“北京猿人”,这迫使人们接受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现

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裔。然而这是一种“推论溢出发现”的盲导，准确的说法是：东亚大陆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30万年生活在今称为北京的一带，仅此而已。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文起羲炎”，依据文献传说可以“稽古羲黄”，也许考古挖掘永远不可能发现像商代甲骨文那样证据确凿的伏羲炎黄的文化遗存，但是仍然无法否定华夏民族心理认同的历史开端。即使在“疑古时代”，除了极个别历史学家认为三皇五帝是子虚乌有，荒唐地把大禹“考释”成一条虫，中国人对自己的远祖伏羲炎黄却从不怀疑。我甚至不赞同所谓“炎黄子孙”，因为黄淮流域伏羲氏的时代比西北炎帝氏和北方黄帝氏的年代要早。虽然东亚大陆早已有原人或新人生活，虽然中国境内已经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但是也没有必要把“中国历史”无限制地前移，甚至上溯到元谋猿人的时代，以标榜还没有产生国家之前的所谓“爱国主义”。像这样追溯下去，人类的历史岂不是要追溯到草履虫？

中国生物基因研究机构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遗传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在探讨中国种族群落遗传联系的同时，对东亚人口的起源也进行了研究。研究组利用以30个被称之为“微型卫星”的遗传标志为对象的基因分析法，获得了中国28个正式划定的人口群落的遗传结构详情，然后再与全球其他11个人口群落进行比较研究。1998年9月29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份“华人基因组差异”的研究成果指出：“东亚人口的遗传标记大都相同，这表明他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作出结论——东亚人口的大多数起源于非洲。”

对于东亚大陆现代人的来源，中国考古人类学家在并不排除附带与境外（务必提醒：那时还没有境内或境外）人种杂交的同时，坚持“主体区域进化论”。然而迄今为止，东亚大陆一直没有发现距今10万年

~5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尽管中国人类学家坚持"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合乎逻辑的说法应当是:没有发现无所谓存在或非存在),但根据中国生物分子学家对在东亚和东南亚采集的1 500~2 000份样本基因研究的结果,没有一例是由当地原人进化而来的后裔。因此可以假定,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后代在7.5万~1.5万年之间的冰川时期灭绝了,现代东亚人来源于非洲新人。

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区域论"和"一元换代论",虽然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争执:考古学家不相信生物分子学的基因归纳,认为用基因研究的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是间接的;生物学家不赞成化石考古学的解剖比较,认为这是把考古实物综合起来讲述的故事,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国族意识形态"和分子生物科学之间的抵触。在中国,最近出土的一些化石证明了东亚地区远古人类的存在,从而使人类起源于东亚的学说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来源,生物分子学研究的新发现可能会使中国人类考古学的一些专家感到失望。然而远古人类生活的时代并不存在任何"国家疆域",10万年前既没有欧亚非各洲的"人文地理分界",更没有后起的"民族意识"。归根结底,这种虚无缥缈的"民族自豪感"或"国族主义"除了源于长期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以前阔过"的情结,还有一种对非洲黑肤色和古代文明停滞的潜在轻蔑心理(在做过的一些随机调查中证明了这一点;甚至某全国重点中学的教师在环境科学选修课上对学生宣讲黑人"又脏又臭")。霍茨的报道文章[①] 的标题选择《中国人从非洲来?》这样一个问句口气(是疑问,是设问,还是反诘?),而不是正面的陈述口气,同样令人深思。与之相反,一报道美洲印第安人由远古亚洲迁去,或南太平洋群岛居民的祖先源于大陆,

① 《南方周末》1998年10月16日。

“自豪感”就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仿佛东亚人曾经是远古的“征服胜利者”。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中心主义”或“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世界革命中心论”，至今仍然是一些人用以掩盖潜意识自卑的思维习惯。我相信中美生物学家的合作研究是缜密的，除非20世纪的生物分子学或基因分析法就是“伪科学”。

新人的起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在这一研究中没有“国族主义”的位置。从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开始，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欧洲人类学家已经逐步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最近又提出现代欧洲人是由4.5万年前迁人欧洲的7个女性祖先繁衍而来，以及白种人由黑种人在3万年前变化而来的假说。尽管为了进一步的探索，可以不放弃区域进化论假说，然而很难改变这一事实——已知的最早人类化石出自非洲。“原人”的祖先，是在100万年前的第一次世界性移民浪潮中，曾从非洲迁到中东、欧洲和东亚。基因分析的结果一再证明，进行第二次世界性移民浪潮的新人才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在分子生物学家看来，如果新人移民与当地原人之间的杂交存在，其程度也是无穷小，即使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基因，对现代人的群体基因影响的价值也不大。

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自身进化的宏观趋势不是封闭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地理区域也不是隔绝的。中国现代人是世界新人的一部分，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汉风唐韵时代的中国，是主动开放的中国。从15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以科学主义和基督教精神为特征的欧洲文明凭借远征、殖民、传教、商贸等方式冲出旧大陆，向全世界洪溢，不可避免的人类世界化进程徐徐拉开帷幕。面对外来泰西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冲突，明清以降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地位的稳定而奉行的闭关自守国策，曾经使中国长期自我孤立于世界化进程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

展和中国文化的再生。“西化”和“民族化”是一对狭隘的字眼，所谓“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世界化”。随着加入WTO的一系列文件的签署，中国将真正进入当代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和现代文化，人性就是人的感受性和语言性，世界就是感受性和语言性的世界。关于“中国宏观语言学研究”的思考，蕴涵于1985年，其时还在徐州师范学院云龙山麓斗室里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次年毕业以后，相继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任职。在这样一个“权力寻租”的时代，尽管生活环境时有改变，但是依然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尽管由于粥少僧多、学术老化和学术腐败，一些项目的申报无缘批准，但我仍然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在英国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当马克思抽着雪茄，沿着撰写《资本论》的崎岖小路奋勇攀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立项资助，只有友人恩格斯时有解囊。对于发生在周围的跨世纪人才培养工程和高校师资“长江工程”，虽然明明知道“跨世纪”只是一项时间法则，能赖在20世纪多待一天多好，但仍然改不了看看1999年的日历是不是又少了一页的习惯。至于夏天到长江边上看看江水是否泛滥，已成为南京人的一种时尚。偶尔我也翻翻中外学术史，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依靠“工程”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也可能是记载时遗漏了。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人文社会科学发表在外的论文，由于国外杂志“良莠不齐”而无法确定其等级，因此不能与国内核心期刊同等对待，甚至不能列入申报学位点的具有代表性论文的目录。另外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理由，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最好的还是在中国，还是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文章。显然，这种幼稚的印象是出于对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状况的无知！如果作为茶余饭后的谈闲，尽可以付之一笑。就语言学来说，对中国最国粹(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粹)的汉

语音韵学,20世纪研究得最成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尽管在后来者看来,他的研究确实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他在中国现代音韵学中的创始地位。国内的一些最有名的专家与之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一些批评他的学者并没有摆脱他的模式。与此可以相提并论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在汉藏澳泰语言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可以对日本学者的“《说文》在中国而《说文》学在日本”不屑一顾,但是难以避开桥本万太郎的“东亚大陆语言结构连续体”和“汉语阿尔泰化”的振聋发聩。另外学术界应当听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并非仅仅由于大量敦煌文献流失瀛涯为洋人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是因为即使保存在国内的也没有得到好好研究。在一些中国人看来,敦煌文献的文物古董价值远远高于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科学的循序渐进性决定了理科杂志有可能排出“国际学术榜”,而人文社会科学的跳跃开放性决定了文科期刊难以排列“学术榜”。认为文科“研究得最好的还是在中国,还是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文章”,显然在抹杀国际汉学家热爱中国文化而从事研究的同时,也否认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如果仅仅说国外文科杂志良莠不齐,还有“莠”有“良”,假使一旦以“良莠不齐”为由而一概拒绝承认,那就是“良莠一律”了,难道这就是某些学人的“理科”逻辑?自然科学研究有国际交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有世界性交流。无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以理科压文科的急功近利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莫大悲哀!在这种盲目推崇理科的鼠目寸光的学术背景下,难怪一些语言学家慨叹:如果再不重视中国语言的研究,一些新的理论又要由外国学者首先提出来。当然,在我看来,新的理论由谁提出来无所谓,因为科学没有国界,学术属于全人类。

现代自然科学的出发点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科学主义”或“物理主义”，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却带来了对可满足欲望对象的无休止攫取和生态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科学主义”究竟把人类导向何方，仍然是一个未来之谜。应当承认，工业革命的一个巨大结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正像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方程式为原子弹的制造提供了物理学根据，出乎自然科学家的意料，“科学主义”的终极目标会陷入高科技式的“丛林法则”。当今信息时代，一切都越来越趋于精致的“形式化”，精致的“形式化”的背后难免捏造，所谓“数字化生存”有可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人，首先是一个自然人，然后是社会人或文明人，再以后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人或科学人。科学，只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手段，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惟一的手段，挽救人类命运还得求助于对人文价值的宽容关怀，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监管。世界文化史表明，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难逃历史的惩罚。

也许，语言研究总是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然而，有幸的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瞻远瞩，将《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列入出版计划，感谢戴昭铭教授推荐本人忝列《丛书》省外约稿作者之一，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才有了一个通盘思考和系统撰写的机会。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件小事。承蒙《云南民族语文》编辑部的美意，一直惠寄杂志，读到连载的《藏缅语·南岛语发生学关系初步探索》，其中《探索(一)》(1999 年第 1 期第 61 页第 19 ~ 33 行)和《探索(二)》(1999 年第 2 期第 50 页第 1 ~ 7 行)约 22 行 700 字的关于“原始华夏族和华夏语混成发生论”的观点，行文中虽然提到“语言学家推测”和“有的甚至提出”，但既没有随文讲明出自某人，也没有随文注明援引某处，给读者留下了悬念。直至《探索(三)》的 25 条尾注，也没有交代以上整段引文的出处。虽然语言学论文不可能成为专利商品，但是掩卷之余，还

是不得不昭告学林——这700字是照抄整移拙文《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① 的第二、三自然段。面对这一漏注出处的年轻同行的“照抄整移”，更加促使我要努力完成这样一本著作。

与专门从事微观研究的学者可能不同，语言的宏观研究有如在大地上空中盘旋，高山丘陵、原野森林、河流湖泊、小径通衢、乡村城市……浏览风光；又仿佛在时光隧道里穿越，旧新石器、青铜铁器、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有清……饱经沧桑。远古居民走过来，涿鹿之战的呐喊，殷商贞人的卜辞，武王伐纣的牧誓，涂山妇盼大禹“候人兮猗”的南音，拥楫女爱恋鄂君子“滥兮抃草”的越歌，孔丘颂《诗经》之雅言，屈原吟《离骚》之楚声……这一切的一切，随着电脑的休眠又消失在旷古的苍茫之中。其中尤以在撰写与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成密切相关的中原居民多次南迁的过程中，文献资料中的中原居民颠沛流离、疲于奔命，每每令人唏嘘长叹……据说，我的祖先(李纲的后裔)也是靖康之难南迁江淮的一族……经济的复苏、民族的融合、语言的换用，是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之后的劫后余生……

1997年春，因为看到我发表的语言学拙文，北京未来研究会的一位学者来南京找我几次，在就《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一文的内容交谈以后说：“你的研究具有超前意识。”也许语言学科永远不会成为“领先学科”，但是作为个人还是可能具有前瞻意识。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具有明确的“世界化”意识，应该着眼于中国文化在22世纪的应有位置来深谋远虑。除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政治的世界化，语言的世界性接触或合流也在所难免，因此当代中国语言学家务必具备“世界语言学”的前卫意识。这也是我进行此项宏观研究的又一旨趣。

本书英文目录和各章内容提要由司联合博士翻译，谨致谢忱！同

① 《语文研究》1995年第4期；《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3期转载。

时对本丛书的编委会专家和责任编辑、技术编辑、封面设计及责任校对等同仁,一并表示感谢!

李葆嘉 谨识

千纪之交于南都三书斋